THE GLORY AND THE
DREAM
光荣与梦想·人物卷



ONE BRIEF SHINING MOMENT

REMEMBERING
KENNEDY

即逝的闪耀之光

肯尼迪

［美］威廉·曼彻斯特◎著

黄延峰◎译

William Manchester

中信出版集团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光荣与梦想·人物卷



ONE BRIEF SHINING MOMENT

REMEMBERING
KENNEDY

即逝的闪耀之光

肯尼迪

[美] 威廉·曼彻斯特◎著

黄延峰◎译

William Manchester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即逝的闪耀之光：肯尼迪

作者:[美]威廉·曼彻斯特

译者:黄延峰

ISBN:9787508671253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在圣克里斯宾节与他并肩战斗的戴夫·鲍尔斯

序

本书并非学术著作。相反，它是在生命的秋天回忆盛夏而写下的文字，是在向我认识的一个人致敬，以及对为什么要珍视、纪念他的探究。如果读者想了解的是对肯尼迪的客观评价，就只有到别处寻踪觅迹了。过去，我从不对他的表现加以评论，现在仍然如此。我认为，争着抢着把人送上月球，完全没有正当理由，把钱用于消除贫民窟或许更好。本书不是历史书，你会发现它是有所取舍的，并不是对一个人的完整记述。很简单，它就是一本写他的书。在我看来，他是一位非比寻常之人。在入主白宫1037天之后，他死于谋杀，从而被剥夺了成为伟人的机会。尽管如此，他仍给世人留下了不朽的遗产，在应当如何度过一生方面，他为世人树立了榜样。他的故事读起来既令人愉快，又让人受益。

随着身份的变化，他有很多称呼。在基督教的坚振礼上，他成了约翰·菲茨杰拉德·弗朗西斯·肯尼迪。像大多数美国天主教徒一样，不久之后，他也放弃了自己的坚振圣名。朋友和亲戚总是简单地称呼他为“杰克”。在所罗门群岛当PT鱼雷艇艇长（众多彼特·泰尔中的一个）时，他经常肚子痛，“我被操弄了”，他说话带有波士顿口音和哈佛腔调，“被操弄了”的英文“shafted”，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成了“shahfted”，所以，那些艇长都叫他“沙夫提”。他自己不无挖苦地说，他先是在1946年当上了“候选人”，之后成了“众议员肯尼迪”，6年以后，成为“参议员肯尼迪”。又过了8年多，他变成了“总统肯尼迪”。他的妻子叫他“兔宝宝”，他的妹妹尤妮斯和弟弟罗伯特在正式场合则叫他“约翰”。五角大楼称呼他“司令”，这是对“三军统帅”的简称。在工作人员的眼里，有时他是“老虎”，而写头条新闻的记者则把他的名字缩写成“JFK”。若是朋友，称呼方式根据具体情形而定。当他的身边只有一位老熟人时，他就是“杰克”，但如果有外人在或者服务人员进来时，他就变成了“总统先生”。

早在1946年，我就跟他相识，而且在他主政白宫的岁月里经常与他单独相处，由预约秘书肯尼思·奥唐奈[注]或其他的总统助理打电话通知我该何时去何处与他见面，尽管如此，我还是尽可能地设法躲在幕后。毕竟，我只是一位旁观者。有时，我只好采取传统的匿名方式表达，比

如“总统告诉一位朋友”或“肯尼迪私下说”，但我的主要方法是采用第二人称，比如“如果你在那天早晨步入白宫，你会知道……”而“你”可能是本书的作者，或者是奥唐奈、戴夫·鲍尔斯、阿瑟·施莱辛格和肯尼迪的其中一个妹妹，也可能是多年以来与我分享其回忆和评论的其他150多位男士和女士中的一位，不过，有些回忆和评论在之前发表过。本书的目的是为读者重现过去。如果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你就会感觉这些不只是发生过的事件，它们会随着你的阅读展现在你的眼前，如此一来，“你”就会真的身临其境，而不是在听本人或任何其他亲历者给你讲述。

对于那些与我分享回忆和见解的人，我欠情太多，但我无法详细地区分开来，一一表达感激之情。我能做到的只是将他们的名字写在这里，这是一个长长的名单，不无勇敢者和值得敬佩之人。他们是肯尼迪总统的家族成员：约瑟夫·肯尼迪、杰奎琳·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爱德华·肯尼迪、尤妮斯·肯尼迪·施赖弗、琼·肯尼迪·史密斯、乔和安·加根；总统的姻亲：休·奥金克洛斯、珍妮特·奥金克洛斯、埃塞尔·肯尼迪、琼·肯尼迪、斯坦尼斯劳斯·拉齐维尔、萨金特·施赖弗、斯蒂芬·史密斯；他的同学、校友和在海军时的朋友：勒穆瓦纳·比林斯、保罗·费伊、小詹姆斯·里德、人称“巴尼”的乔治·罗丝；总统顾问、肯尼迪政府成员、政治顾问和同僚：约翰·贝利、乔治·鲍尔、查尔斯·波伦、亨利·布兰登、杰里·布鲁诺、麦克乔治·邦迪、乔治·伯克利、克里斯蒂娜·坎普、切斯特·克利夫顿、约翰·康纳利、小迈克尔·库克、道格拉斯·狄龙、拉尔夫·邓根、人称“乔”的亨利·福勒、约翰·加尔布雷斯、玛丽·加拉格尔、芭芭拉·贾玛瑞肯、理查德·古德温、吉姆·格林菲尔德、爱德温·格思曼、米尔顿·吉尔兹曼、埃夫里尔·哈里曼、弗雷德·霍德邦、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尼古拉斯·德布·卡岑巴赫、伊夫琳·林肯、约翰·梅西、迪安·马卡姆、约翰·麦科恩、戈弗雷·麦克休、乔治·麦克纳利、杰克·麦克纳利、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比尔·莫耶斯、丹尼尔·莫伊尼汉、安吉拉·诺韦洛、劳伦斯·奥布赖恩、肯尼思·奥唐奈、玛丽·安·奥兰多、戴维·鲍尔斯、蒂莫西·里尔登、小乔治·里迪、迪安·腊斯克、皮埃尔·塞林格、阿瑟·梅尔·施莱辛格、小塔兹韦尔·谢泼德、西奥多·蔡金·索伦森、阿瑟·西尔威斯特、安德鲁·哈彻、卢埃林·汤普森、南希·塔克曼、帕梅拉·特努尔、休·沃格辛格、杰罗姆·威斯纳和乌伊拉德·沃茨；他的朋友、合作者、作家和评论家：利蒂希娅·鲍德里奇、查尔斯·巴特利特、玛莎·巴特利特、卡迈恩·贝利诺、本杰明·布拉德利、托尼·布拉德利、戴维·布尔克利、丹尼斯·布罗根爵士、詹姆斯·伯恩斯、简·伯恩斯、道格拉斯·凯特、枢机主教理查德·库欣、安吉尔·比德尔·杜

克、罗宾·杜克、戴维·哈克特、沃尔特·李普曼、乔·麦卡锡、玛丽·麦克罗里、宾尼·梅隆、沃尔特·“比尔”·波曾、理查德·罗维尔、埃里克·塞瓦赖德、塔兹韦尔·谢泼德夫人、休·赛迪、梅里曼·史密斯、波特·斯图尔特夫人、马克斯韦尔·泰勒、威廉·沃尔顿和白修德；华盛顿高官和他的熟人：尼科尔·阿尔方、黑尔·博格斯、杰克·布鲁克斯、琼·道格拉斯、威廉·富布莱特、阿瑟·戈德堡、约翰·埃德加·胡佛、休伯特·霍拉肖·汉弗莱、林登·约翰逊夫人、迈克·曼斯菲尔德、约翰·麦科马克、戴维·奥姆斯比–戈尔爵士、伊丽莎白·波曾、艾伯特·托马斯、约翰·沃尔什、厄尔·沃伦、拜伦·怀特和拉尔夫·亚伯洛；美国特勤局工作人员：杰拉尔德·贝恩、杰拉尔德·布莱恩、鲍勃·福斯特、比尔·格里尔、克林顿·希尔、罗伊·凯勒曼、山姆·金尼和埃默里·罗伯茨；“空军一号”乘务组成员以及在白宫和海恩尼斯港大院服务肯尼迪家族的用人：约瑟夫·艾尔丝、丽塔·达拉斯、约瑟夫·焦尔达诺、刘易斯·汉森、杰奎琳·赫希、普罗维登莎·马拉代斯、乔治·米勒、人称“马格西”的约翰·奥利里、尚慕杰、莫德·肖、詹姆斯·斯温多、乔治·托马斯和伯纳德·韦斯特。

当然，上述诸位对本书的内容概不负责，一切皆由本人承担。

对我的编辑罗杰·唐纳德，我深表谢意，他的建议和意见总是颇具价值，对于本书绝对是不可或缺的；感谢埃伦·帕那斯在研究照片时提供的帮助；感谢阿伦·古德里奇和波士顿约翰·肯尼迪图书馆的馆员；感谢欧文·格鲁斯哥，是他设计了本书；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感谢我的文字编辑梅丽莎·克莱门丝，但愿她不要先我而去。

威廉·曼彻斯特

卫斯理安大学

米德尔敦，康涅狄格州

1983年8月5日

兰斯洛特骑士啊，如今长眠于此，您确实是无人匹敌的高手。在撑掌盾牌的骑士里，您最有礼貌。在跨马的武士中，您最真实。在佩带宝剑的人里，您最仁慈。在成群结队的骑士里，您最友善。在厅堂上陪着贵妇宴客时，您的态度最谦虚和蔼。在应付不共戴天的仇敌时，看您手握长矛，又是一位威风凛凛的骑士。

——托马斯·马洛里，爵士，《亚瑟王之死》，1469年

---

1. 肯尼思·奥唐奈即后文提到的肯·奥唐奈和肯尼·奥唐奈，肯和肯尼都是对肯尼思的昵称。——译者注

第一章 1963年

他生于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以优等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他既出色，又关心政治；既机智，又思想深邃；既世俗，又能言善辩；既是头脑敏锐的普利策奖得主，又有揭穿陈词滥调的热情。失去这样一位总统，整个美国为之哀痛。

这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因此，现在处于投票年龄的无数美国人对肯尼迪时代并没有什么印象。当听说曾经有一位总统是美国年轻人的偶像，而且在所有被选进白宫的人中是最年轻的一个时，他们大为吃惊。20世纪50年代的学生已被认定是沉默的一代，他们明确表示不想参与政事。然而，在肯尼迪总统任期的第三年，一项在美国大学校园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和平队（Peace　Corps）成了当时这个国家“最令人羡慕的机构”，希望进入行政机构当公务员的大学生人数激增。

那时的学生还没有留长发，因为甲壳虫乐队要再过几个月才会登陆美国，让学生感兴趣的发型大多限于白宫主人的样式。查塔姆大学的院长告诉记者，学生们“忍不住想要体验当上三军统帅的感觉，所以必须得有一种特别的发型，看上去才像那种人”。与此同时，女高中生们热衷研究他的妻子，模仿她的姿势和语调，穿着她那种合身的宽松长裤，喜欢她偏爱的粉红色（有时称“桃红色”）。但自从他们在达拉斯遇刺之后，一切都变了。林登·约翰逊继任总统，拥护肯尼迪的年轻选民从此心无所属。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不只影响了青年人。他激起了各个年龄段的无数美国人和两个政党要有所成就的热情，渴望用自己的行动验证那句古代雅典的格言：只有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到真正的快乐。跟大多数政治家不一样，他永远不会假装成一介平民。他第一次参加选举是在马萨诸塞州，当时，他的竞争对手在做自我介绍时，都标榜自己是那种“经过艰苦努力才达到目前地位”的波士顿人。而轮到杰克发言时，他对着麦克风讲道：“我不是那种经过打拼才走到今天的人。”以优等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他，既出色，又关心政治；既机智，又思想深邃；既世俗，又能言善辩；既是头脑敏锐的普利策奖得主，又有揭穿陈词滥调的热情。演讲中，他总是会穿插引用许多名人名言，比如伯里克利、

斯威夫特、爱默生、福克纳和歌德。他很喜欢在小餐馆里做东，请科学家、诗人、音乐家和知识分子聚餐，比如艾萨克·斯特恩、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巴勃罗·卡萨尔斯、罗伯特·弗罗斯特、威斯坦·休·奥登、保罗·蒂利希和艾伦·泰特。斯坦贝克说：“表面的识文断字已不再是叛国的证据，这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啊。”就像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一样，肯尼迪对于批评非常敏感，但他仍鼓励人们持有不同的政见。如果你在1962年的一个雨夜拜访肯尼迪总统，就会知道有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老年科学家在禁止使用核武器的示威游行中担任纠察员的事。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内，如果你向肯尼迪提及此人，他便会立即派人给这位纠察员送去一壶咖啡和几盒甜甜圈，并邀请示威领导人到白宫里面表明他们的立场。此后不久，他向这位梅开二度的诺贝尔奖得主颁发了美国总统奖。即使因抗议五角大楼的政策而拒绝纳税，埃德蒙·威尔逊还是获得了这份荣誉。

据美国新闻署的调查报告，当时，美国的威望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因在对抗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肯尼迪备受赞誉，他的勇气是不容置疑的，在1961年的柏林危机和一年后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两次挫败了苏联人，但他把自己的外交政策称为“和平战略”。为达此目的，他与尼基塔·赫鲁晓夫进行秘密通信，设置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热线电话”，就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展开谈判，并建立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ACDA）。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他扮演了和事佬的角色。由于预测拉美地区会发生动乱，他成立了争取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当然，他在越南栽了大跟头。但他一再拒绝把作战部队，特别是被征召入伍者送到东南亚地区。在肯尼迪活着的最后一年，仅有17位美国人在越战中丧生。而在他被暗杀后，58655位美国人死在了那里，他们大部分是应征的新兵。正如黑格尔所说：量变如此之大，以致成了质变。

不无讽刺的是，肯尼迪被认为是一位对大企业持敌视态度的美国总统。事实上，不少大企业都对他进行了攻击，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美国钢铁公司的罗杰·布劳。肯尼迪曾促使这个钢铁公司的老板和工人达成了一份协议，即为了对抗通货膨胀，工人们答应撤回加薪的要求。然而，大型钢铁企业的经理们却在随后把每吨钢铁的价格提高了6美元。工人们感到自己被出卖了，肯尼迪也有同感。他威胁要开展反垄断调查、取消工业税收减免和减少其与五角大楼的合同。三天后，钢铁厂商无条件投降。后来，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肯尼迪试图打消人们对企业和政府存有敌意的谬见，但是，那些耶鲁老校友对此并不买账，他们认为他

这是在劫富济贫。

实际上，肯尼迪是想通过让国家致富的方式，让富人更富。他跟着沃尔特·赫勒学习过经济学，他每年的总统预算少于1000亿美元。他那一届的美国政府是历史上第一次将通胀率控制在3.5%以内，同时还能保持商业繁荣兴旺的政府。肯尼迪在白宫的34个月里，美国各项经济指标逐月稳步增长，股票市场牛气冲天。美国在海外的贸易也得到进一步扩张。劳动力的就业率达到了94%，抵押贷款率处于5%～5.25%之间，邮票面值只有5美分，工人的工资也创下新高。当时，美国的百万富翁约有9万人，且在以每年5000人的速度增加。在肯尼迪任内，美国的对外投资从120亿美元跃升至800亿美元。但他最动人的遗产也许还是他的同情心。他生于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直到1960年春参加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初选，才看到美国最底层民众的穷困和凄惨。他的内心深为触动，在就任总统后，他的第一个正式公务行为就是颁布行政命令，将400万美国贫困人口的食物定额提高了一倍。后来，他又推出医疗保险制度，并强化社会保障。

肯尼迪最终将美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定格在了公民的权利上。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发表的演讲中，告诉众多全神贯注的观众："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之后，肯尼迪把金请到了白宫，紧握住他的手说："我有一个梦想，和你是同一个梦想。"肯尼迪发起了军事行动，以确保有关废除种族隔离法律的实施，当亚拉巴马州州长公然反抗他时，肯尼迪派出了军队。1963年6月19日，肯尼迪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全面而意义深远的民权法案，从而成为自林肯之后，又一位全力推动种族平等的美国总统。根据盖洛普的调查报告，他的声望因此大跌，支持率甚至减少了一半。但肯尼迪没有理会这种对抗性的反应。他向国民发问：当美国人声称他们的国土是自由之地时，是否意味着，"除了黑人，我们没有二等公民，除了黑人问题，我们就没有阶级或种姓制度，没有少数族裔居住区，没有优等民族了吗"？他称这个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会见黑人领袖时，他说："这可能会让我的选举败北，但我们不能回头。"在他去世后的美国全国哀悼期间，在林登·约翰逊的促使下，美国国会通过了他的法案。但若肯尼迪还活着，这将是套在他脖子上的沉重的政治负担。

在他担任美国总统的最后日子里，跟现在的情况有较大不同，他仍

受到了不同名流的热议。康拉德·阿登纳、戴维·本–古瑞安和哈罗德·麦克米伦刚刚从职位上退下来。吴廷琛夫人（陈丽春，俗称“琛女人”）是越南专制总统吴庭艳的弟媳，说话尖酸刻薄，她严厉指责肯尼迪政府主张越南应该实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做法，并拒绝用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全球情报系统保护她的官僚家庭。新闻界称呼她为“胭脂虎”（The Tiger Lady），她对《纽约时报》年轻的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尤为愤怒，因为他相信“西贡政权”是注定要失败的。而哈伯斯塔姆最有名和最忠实的读者正是当时的美国总统。

这伙不喜欢肯尼迪总统的人还想弹劾厄尔·沃伦，当法院禁止美国公立学校阅读主祷文或某些《圣经》章节时，更是加深了他们对美国最高法院的仇恨。另有一家美国法院裁定必须为贫穷的被告提供律师。有人怀疑，肯尼迪总统和首席法官相互勾结。他们的确是在“勾结”。用肯尼迪就职时的致辞来说，他们俩都认为：“如果一个自由的社会不能帮助很多穷人，它就不能保护少数富人。”这一切在国际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肯尼迪与大型钢铁公司的对决给中美洲的左翼改革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人曾经相信游击战是他们的唯一希望。欧洲左派的反美情绪也暂时消失了。在柏林，维利·勃兰特则直接复制了美国总统的政治运动。安东尼·桑普森在伦敦的《观察家报》写道：“老牌的意大利激进社会主义者南尼（Nenni）现在也忍不住要称赞肯尼迪了。”

这段时间对罗纳德·里根而言，正是艰难的岁月。当时，他在为《共产主义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Communism*）配旁白，在每周播放的电视连续剧《死亡谷岁月》（*Death Valley Days*）中担任主要演员，并参与演出了他的最后一部电影《杀手》（*The Killer*）。在1962年的美国议会选举中，里根为约翰·鲁斯洛助选，而鲁斯洛是约翰·伯奇社的主要发言人。在加利福尼亚州长竞选中败下阵来的理查德·尼克松当时也处于政治流放期。1963年11月22日，尼克松还只是百事可乐公司的一个代理律师。在“空军一号”搭载着肯尼迪总统及其班底抵达达拉斯的两个半小时之前，尼克松刚刚在瓶商大会上做完演讲，离开爱田机场。此前6个月，纳尔逊·洛克菲勒在共和党中一路领先，但因为他在与妻子闹完离婚后不久就再次结婚，于是公众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了巴里·戈德华特的身上。在肯尼迪得克萨斯之行那周的早些时候，戈德华特宣称“新边疆”政策已经“运行1026天，导致开支浪费、痴心妄想、不必要的干涉、一厢情愿的推测和自信心的逐渐减弱”。记者要求肯尼迪总统对此做出答复。他咧着嘴笑着说：“为时尚早，为时尚早。”但显而易见，一想到要与这位亚利桑那人

展开厮杀，他就满心欢喜。

尽管乘坐希腊航运巨头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的游艇在国外游览的时间有所延长，但在结束之后，美国第一夫人还是于1963年10月17日返回了美国。杰奎琳的频繁出游唤醒了共和党人的聪明劲儿：“不管您在哪里，晚安，肯尼迪夫人。”在某些方面，参加其丈夫这次得克萨斯之行不啻一次简短的忏悔祷告。在他竞选总统前的几次竞选中，她的高雅毫无助益，但选民显然还是把她看成了楚楚动人的第一夫人。

在达拉斯之行前的1963年，还发生过几件大事，包括30万黑人和白人走上华盛顿街头，支持民权运动；在瓦尔特·乌布利希那堵臭名昭著的墙的附近，肯尼迪总统发表了名为“我是柏林人”的演讲；戈登·库珀绕地球轨道飞行了22圈；道奇队战胜扬基队，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夺得四连冠；美国农民大丰收和苏联农作物歉收；以及对金枪鱼罐头肉毒杆菌导致食物中毒死亡者的追查。

电动打字机于1963年首次问世，这一时期的新生事物还有安定药片、邮政编码、节食减肥者、《韦氏大词典》第三版、傻瓜照相机、聚乙烯、宝丽来一次成像照相机、底特律出产的光滑斜后窗的汽车（即斜背式汽车顶）和名字叫“麦当劳”的连锁汉堡店的扩张。朱莉娅·查尔德第一次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今夜秀》（*Tonight Show*）以及约翰尼·卡森也是一样。电话可以直拨长途，但能打长途的座机还不到贝尔公司电话用户的一半。《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第一期于当年9月26日发行，就在同一天，曼哈顿污染达到毒害程度的报告出炉。彩色电视机仍然是稀罕货，再过4年，电视网才转换成全彩播放。1963年9月2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将其晚间新闻节目从原来的15分钟加长到30分钟，一周之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也采用了这一做法。这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越南战争的报道影响深远。

但在1963年，所有这些都是在为将来打基础。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富有独创性的电视广告时代。皮尔斯啤酒公司名为“伯特和哈利的回归”的电视广告正在广为传播。赫兹（Hertz）租车公司的广告则将司机空降到了敞篷汽车里。当时的流行歌曲分别是《假如我有一把铁锤》（*If I Had a Hammer*）、甲壳虫乐队首次取得成功的《我想握住你的手》（*I Wanna Hold Your Hand*），以及彼得、保罗和玛丽的两首畅销金曲：翻唱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Blowin in the Wind*）和《神奇的飞龙帕夫》（*Putt the Magic Dragon*）（“飞龙会永生，但非常小的孩子不会”）。美国人

正在读《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少女群像》（*The Group*）、《美国式死亡》（*The American Way of Death*）、《弗兰妮与祖伊》（*Franny and Zooey*）、《007之霹雳弹》（*Thunderball*）、《第22条军规》（*Catch–22*）、《不用管卡路里》（*Calories Don't Count*）和维克托·拉斯基东拼西凑来抨击总统的《约翰·肯尼迪：其人及其神话》（*JFK: The Man and the Myth*）。在电影院，他们既对《汤姆·琼斯》（*Tom Jones*）感到着迷，又对《去年在马里昂巴德》（*Last Year at Marienbad*）感到无聊透顶。

在伦敦，一位叫约翰·普罗富莫的内阁大臣颜面尽失，他对下议院撒谎，否认跟1963年最有名的妓女克里斯蒂娜·基勒有染（这个故事迷住了肯尼迪总统，他对此是如痴如狂）。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在主演电影《克莱奥帕特拉》（*Cleopatra*）期间陷入爱河，正想摆脱各自的配偶，打算早早地举行婚礼。当时，《展望周刊》（*Look*）、《生活》杂志（*Life*）和《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十分畅销，但在这些刊物中，你永远不会看到这样的字眼：嬉皮士（hippie）、超级明星（superstar）、超级碗（Super Bowl）、完全失去理性的反应（freak out）、引起幻觉的和使兴奋的（mind-blowing）、吸毒场所（joints）、大麻制成的烟卷和烟蒂（roach）、协调（tune in）、令人厌恶的人或物（turn-off）、羞辱或责备的话（put-down）、诈骗（rip-off）、爱情聚会（love-in）、花之权力（flower power）、俗艳花哨的艺术（Day-Glo art）、迷幻剂（psychedelic）和心理感应（vibes）。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附近，水门大厦及其公寓大楼正在建设中。1963年11月25日，周一，为肯尼迪总统送葬的队伍将路过此地。

因为失去了这样一位总统，整个国家为之哀痛，然后伤口逐渐愈合。但如果你与他关系密切，你失去的就是一位老朋友，而这位老朋友如果同时还是一位总统的话，你的心里将会留下永久的创伤。你永远不知道何时心中会突然地剧痛，或者什么事情会引发这种痛苦，或许是一位身穿黑衣的年轻女士，一个扮演士兵的小男孩，一艘帆船，一场叫喊声不断的触身式橄榄球比赛，一张摇椅，其中任何一个都能引起痛苦，在你噩梦般的记忆里，你会听到沉闷的鼓发出的断断续续的急敲声和可怕的突然敲击声，以及波士顿南区老枢机主教粗声粗气主持仪式的刺耳声音：

神羔，将罪恶洗净，让他们安息。

我们会年复一年地悲伤。然而，在那个令人震惊的、无休无止的、动人心弦的周末4天里，我们每个人都有片刻死亡的感觉，现在，到探索这4天意义的时候了。肯尼迪总统之死是悲惨的，但他的生命是成功的，这就是现在他应当为人所铭记和赞美的原因。

第二章 少数幸运儿

他自己改变了自己。在一片不被看好声中，在对政治并不专业的好友的帮助下，他踏上了自己的竞选之旅。他会爆粗口、丢三落四、忘记事情、邋里邋遢，在众人面前讲话时，他会紧张得哆嗦，但他不会放过任何能帮助他的人，他会亲自登门拜访，伸出手说："我叫杰克·肯尼迪。我是众议员候选人。"

第一次听到对肯尼迪的欢呼是在战后不到6个月的波士顿。在美国第十一国会选区党内候选人的初选中，杰克是竞争吉姆·柯利席位的10位候选人之一。因为年事已高，身无分文，又被官司缠身，而且法院还命令他偿还从波士顿窃取的4.2万美元，柯利决定辞去其在美国国会的职务，重返波士顿市政府工作。柯利外号"紫色三叶草"，又叫"领头羊"。11月2日，这株"三叶草"以压倒性的多数票赢得了市长的职位。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某些误解，很快，他又站到了被告席上，被控利用美国邮政进行诈骗。宣判之后，他只能在牢房里管理这个城市了。

了解一些波士顿的爱尔兰政治传统对于理解杰克·肯尼迪所面临的困难很有必要。19世纪时，每隔8年会就有118.6万的爱尔兰移民来到这里。而当地的经济却消化不了这些人。职业介绍所挂出告示牌，上面写着"爱尔兰人不必申请"，或者"急聘——不要爱尔兰人"，甚至在新到的移民已经有了下一代之后，报纸还是会开设两种社会版面，一种针对美国新教徒，另一种的阅读对象则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肯尼迪总统是首位被任命为哈佛大学监事的爱尔兰人。他的父亲也曾就读哈佛大学，却不适合担任此职，甚至肯尼迪总统本人也没有资格加入波士顿萨默塞特俱乐部（Somerset Club）。置身于比肯山（Beacon Hill）的鸡尾酒会，如果你跟肯尼迪的其中一个妹妹评论说路易斯堡广场（Louisburg Square）的鹅卵石很迷人，她便会怨恨地说："那不是鹅卵石，那是爱尔兰人的脑壳儿。"

爱尔兰女人会接些浆洗的活儿在家里做，或给别人家当用人。最聪明的爱尔兰男人会竞选公职，他们将波士顿的政治活动转变成欢乐喧闹的歌舞杂耍表演。最快乐的表演者之一就是杰克·肯尼迪的外祖父约翰·菲茨杰拉德，他也被叫作"甜菲茨""菲茨"，"紫色三叶草"则称他为"小个子

将军”。“甜菲茨”的拿手活儿是《甜蜜艾德琳》（*Sweet Adeline*），但他在唱这首歌时会因为假牙而口齿不清。有一次，他还用西班牙语为一群拉美裔美国人演唱了这首歌。此后不久，富兰克林·罗斯福访问波士顿。当罗斯福发现了他，并且高兴地用西班牙语喊“甜蜜艾德琳”时，“菲茨”就站在路边。就像柯利一样，“菲茨”成为波士顿市长，但为了获得对这座城市的控制权，两个人进行了漫长而复杂的拜占庭式的斗争。不过，双方均未获胜。而他们俩所在的党派对此也束手无策。有句话说得好：“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有1000个头儿，就是没有兵。”

像许多同行一样，“菲茨”不会不屑于使诈。意味深长的是，人们称波士顿的选举为“战斗”，在每一次的国会战斗中，选民都会得到背面带胶的标签，以便将他们中意的候选人的名字贴在选票上。“菲茨”在印刷厂里安排了一个人，他设法让印有其竞争对手名字的标签后面不带胶水。它们全都从选票上掉了下来。

实际上，“紫色三叶草”最后一次对“菲茨”突施冷箭时，杰克是在场的。当时，杰克、他的一位朋友和特迪·肯尼迪正站在州议会大厦的对面。特迪拿着一个绿色书包，他要求外祖父在他跑进杂货店买长条状糖果时举着它。当柯利沿着大街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发现“菲茨”时，“菲茨”还在那儿举着书包。柯利兴奋地喊道：“啊哈！我看到你还带着溜门撬锁的工具呢！”

这就是杰克不得不开始登场的舞台，他就像一个曾经涉足过政坛的人一样严肃。大家都在寻找另一个“领头羊”，即一个吸引人的流氓和推行限产超雇的官员，在把公款装进自己的腰包时，还能让选民笑得东倒西歪，他要具备这种本事。他们期待一位年轻的柯利，他会谴责竞争对手推动计划生育，当被要求委任恩迪科特·皮博迪·索顿斯托尔做一个不重要的职位时，他会问：“他们三个人都要吗？”

肯尼迪有时迟钝，时常会爆粗口。就像所有的船员（和水手）一样，他学会了粗言秽语，当处在能明白是什么意思的男人中间，并且有能当引子的话题时，他很容易就会爆粗口。多年之后，他称一位报纸专栏作家是“Charlie-Uncle-Nan-Tare”（“二战”时期美军中一种很粗俗的骂人用词，大意为“讨厌鬼”），当时杰奎琳也在场。他的妻子问道：“天哪，什么是‘Charlie-Uncle-Nan-Tare’？”肯尼迪随即改换了话题。尽管他从“紫色三叶草”和“菲茨”那种乱七八糟的同志情意中躲开了，却还是要迫使自己表现得像一位竞选老手。他会握手握到手指肿胀，连手套也戴

不上，因为他知道这是必须做的事情。他感到害羞和拘谨，而不是随便，在政治人物常去的地方，比如在州议会大厦对面的萨利酒馆或老贝尔维尤（Bellevue）宾馆的酒吧，他都会感到拘束。很明显，他讨厌竞选用的那些陈词滥调和给人压力很大的政治活动。对于劳工阶层的选民来说，他复杂的智慧是令人迷惑的，有时也是自视高人一等的。即使他的年龄看上去还没有大到可以当一位议员。当日本的战舰将他的鱼雷艇劈成两半时，他受了重伤，自从战前在橄榄球比赛中受伤之后，他的脊椎就一直疼痛，海上逃生又使他的一生都要饱受这种疼痛的折磨。在切尔西海军医院，他的体重减轻至不到140磅(注)。身材瘦削，再加上浓密的头发，让他显得更加孩子气。

因为他的候选人身份，肯尼迪总是拒绝讨论赞助。尽管跟他竞争的其他人都在空口许诺，但杰克却认为，人们支持他，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会是一位能干的众议员。他就是这种态度，而且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都相信这一点。担任总统时，他发现了一位不能胜任的雇员，便问一位助理道：“他现在在政府里做什么？”助理回答说：“他的想象力被你的雄辩、奉献和热情激发出来了。”肯尼迪立即点点头。不过，他说道：“是的，这种事经常有，但能否请你解释一下他在政府里具体做了些什么？”

1917年5月29日，杰克生于波士顿郊区的布鲁克莱恩。他的父亲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总被家人和朋友称为“大使”，不过，1926年，他的父亲举家迁到了纽约，离开宇宙中心（波士顿的别称），不再忍受那里对爱尔兰人的歧视。他们会去科德角度夏，冬天则去棕榈滩，1934年，这里成为老乔和罗丝的投票地。虽然生于布鲁克莱恩，杰克对波士顿的了解并不多，对这个地方的政治更是知之甚少。他知道参加圣名游行、查尔斯顿邦克山游行和波士顿南区的圣帕特里克节游行的重要性，圣帕特里克节游行通常是由重达300磅的诺库·麦科马克领头，跨坐在一匹役用马上，他是未来议长的侄子。在波士顿南区，杰克与美国海外作战退伍军人协会第5880分会（VFW Post 5880）的其他成员一起前行，这个地方分会是以他哥哥小乔的名字命名的，1944年8月，小乔在欧洲自愿执行一次危险的任务时阵亡。但对政治而言，这远不只是一次游行。杰克必须联系到关键的老资格政客，但当时他并不知道他们是谁。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发现，“高尔文妈妈”不是一位女士，而是比尔·高尔文，一位选区的领导人，因为他为查尔斯顿做过很多善事，所以，大家称呼他为“妈妈”。

但肯尼迪渴望了解，他总是希望学习。一天，他站在波士顿老式高架铁道的车站上，美国第十一国会选区尽收眼底。从大约60英尺注的高处，他能够看到波士顿东区，那里是其父亲和祖父的出生之地。他的妈妈生在北区，现在那里住的大多数是意大利人，东区仍旧是属于爱尔兰人的地盘。往下望，杰克能够看到查尔斯顿码头上的装卸工、理货员、卡车司机和搬运工。他轻声地说道，几乎是自言自语："这些就是我想要代表的那类人。"

赞成者认为他无法达成预期目标。丹·奥布赖恩是该选区一位有权威的政治名流，他不无轻蔑地研究过杰克，说道："你赢不了这场选战。你是个外来户。你不属于这里。"其他政治名流对此亦表示赞同。一位百万富翁的儿子，一位住在贝尔维尤街306室的哈佛大学毕业生，如何打败9位知名的波士顿人？其中包括一位身着制服参加竞选的美国前陆军妇女队的上校和两位都叫约瑟夫·拉索的意大利人（后来第三位叫约瑟夫·拉索的人正式宣布参加竞选，他的口号是"给中间的那个人投票"）。当听说肯尼迪的"青年智囊团"时，政治名流们更看不起他了。他的顾问团队都是他在学校和部队时的朋友：托伯特·麦克唐纳是他在韦尔德楼的室友，该楼位于哈佛大学的中庭；本·史密斯是他的另外一位哈佛同学；勒莫因·比林斯跟他在乔特中学时住同一间屋；还有几位鱼雷艇艇长，比如吉姆·里德和小保罗·费伊，费伊又叫"红费伊""红头发"或"老可爱"。事实上，这些好友顾问并非完全不称职。即便完全无益，他们的存在也是肯尼迪三项政治原则之一的体现。如他后来解释的那样，传统政治家是独行侠。选民不了解谋求官职的人，也就不会伤害到他们。肯尼迪比较喜欢他所谓的包容性。如果有人想要助他一臂之力，就会得到一份差事，加入进来之后，这个人就会说服他的朋友和亲戚转变立场。最终，在马萨诸塞州的最后选战期间，他拥有了21286名志愿者。肯尼迪的另一个策略是低调。如果你期待得到30%的选票，你就告诉媒体你的期待是20%，当选举结果出来之后，你要表现出意外的惊喜，并且宣称"横扫"，甚至是大获全胜。最后是会场的选择，除非能保证每一个座位都有人坐，否则，永远不要租用礼堂。摄影记者总是喜欢拍摄空荡荡的座位。房间较小，但坐满了人，这样比较好。如此一来，第二天，人们就会说："我去了肯尼迪的集会，找不着座位，人都挤得满满的。"

如同他之后所有的选举一样，"二战"以后，美国第十一选区第一次党内初选的关键就在于参选人自己。那时，他仍旧是一位谦逊的新手，但人们迟早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位政治老手。他已经逐个街区研究过第

十一选区。在他成为参议员之后，该地区由人称“蒂普”的小托马斯·奥尼尔接替他的位置。1952年和1958年，蒂普竞选众议员，而杰克竞选参议员，在研究了近两年的选举结果报告之后，肯尼迪发现有一个选区给他的投票比奥尼尔多出4票。他们一起查看了投票名单，发现多出的选票来自一户法裔加拿大家庭，他们不喜欢蒂普。1961年1月20日，总统上任第一天，在就职舞会的舞厅里，肯尼迪看到了另一边的奥尼尔。“喂，蒂普。”他叫喊道，“你在北剑桥区得到多少选票？我得到多少？”蒂普同样大声喊出了选举结果。肯尼迪嘴咧得大大的，笑道：“勒费布尔那家人还是投了你的反对票！”

然而，1946年初，他还没有那么高的职业性。他知道这一点。于是，就像常做的那样，他转而求助于父亲。乔·肯尼迪的名字对选举不会有什么帮助。在伦敦出任美国大使期间，他竟想要放弃英国，罗斯福不得不将其解职，因此，他落下了一个“孤立主义大使”的名声，每当想到他时，他给人的就是这个印象。如果一个人让美国最杰出的民主党总统感到失望，那么，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在波士顿或其他民主党大本营激起人们的热情。但乔可以在幕后运作。他有一位有影响力的智囊，手中握有2亿多美元，还有一群朋友随时听候差遣。大使的堂兄是乔·凯恩，在互致问候时，他们总是彼此称呼“堂兄乔”。凯恩是一位秃顶、易怒、愤世嫉俗，却很聪明的政客，其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了市政厅附近的咖啡馆里，就那样面对着一杯咖啡坐着，但两只耳朵却时刻竖着，留心着一切。堂兄乔逼着堂兄乔出手，凯恩为杰克跌跌撞撞的竞选做出的第一个贡献是提出了一个竞选口号：“新生代诞生的一位领袖——约翰·肯尼迪”。凯恩聘请了比尔·萨顿，他是一位精明的活动推手，刚刚退伍。萨顿转而力劝杰克拜访另一位老兵戴夫·鲍尔斯，战前，他曾在查尔斯顿海军造船厂卖报纸，每到周日，他都会在5个圣凯瑟琳群众的集会上做引导员，还为教区学校的球队当教练，提到他的名字，查尔斯顿的每一位选民都知道。

1946年1月21日，周一，寒冷入骨，就在那天晚上，杰克爬上了查尔斯顿费林街88号一幢三层租住公寓的楼梯，鲍尔斯的家位于顶层。屋里，戴夫正喝着啤酒，享受着52–20俱乐部的悠闲，之所以称为50–20俱乐部，是因为老兵享有52周寻找工作的时间，且每周可以领取20美元。听到第一声敲门，戴夫打开房门，看到一位非常消瘦的小伙子，伸出手说道：“我叫杰克·肯尼迪。我是众议员候选人。”戴夫解释说，他已经答应了另外一位参选者，而且认为肯尼迪是白费功夫。不过，他同意

周六晚上陪杰克出席在查尔斯顿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礼堂举行的阵亡士兵母亲的集会。

柯利以一种愤世嫉俗的口气说道："波士顿只有两种政治问题：'所有的爱尔兰人必须是自由的'和'的里雅斯德属于意大利'。"那个周六，在查尔斯顿退伍军人协会礼堂，肯尼迪证实，"领头羊"的蔑视是错的，而且是在鲍尔斯的面前，他是波士顿新兴政治世代中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杰克只讲了10分钟。他谈到了战争期间做出的牺牲、让世界持久和平的需要和幸存老兵的责任。他说"政治"这个词并不坏。严肃认真的政治家应当受到尊敬，没有他们，民主无法发挥作用。他提到了自己喜欢读的书《朝圣之路》（*Pilgrim's Way*），并且引用了约翰·巴肯关于民主的定义，民主"首先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精神契约"，而政治"仍旧是最伟大和最值得尊重的冒险"。然后，他说道："自满、软弱和放纵的社会会随着历史的碎片荡然无存。"允许它们存在就是"背叛了所有为自由付出一切的勇敢的人"。他停顿了一下，最后轻柔地说道："我认为我了解在座的所有妈妈的感受。你们是知道的，我的妈妈也是一位阵亡士兵的母亲。"

妇女们站起来，拥向讲台，抓住他的手，眼含热泪地笑着，相互诉说，杰克就像是她们的凯文、迈克或帕特里克。对戴夫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新发现。那时，政界对老兵致敬的主要表现只有一种形式，即"紫色三叶草"站在市政厅的台阶上，领着他的下属伤感地合唱《我的兄弟》。杰克的表现新鲜，令人兴奋，而且富有感染力。来到外面，肯尼迪问同行的人他刚才的表现怎么样。鲍尔斯答道："你太棒了。我从没看到过这种场面。"杰克问道："那么，你愿意跟着我干了？"戴夫伸出手说道："我已经开始为你工作了。"

戴夫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特里蒙特街18号租赁一处空闲的三层办公室，并把它作为肯尼迪的竞选基地。此后，这处办公室和贝尔维尤街的三楼公寓便成为杰克事业发展的风暴中心。戴夫开始注册退伍老兵，并且为他们每个人邮寄一本重印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里面刊登了约翰·赫西写的《幸存者》（*Survival*），那是一篇对肯尼迪英勇行为的报道，最早见于《纽约时报》。杰克感到不自在，因为"利用一艘沉没的PT鱼雷艇进军美国国会席位，有点儿不太合适"。但鲍尔斯告诉他，这是一张还没有打出去的好牌。戴夫指出，杰克的英勇不在于其舰艇被毁，而在于他救了自己的船员，并把他们带离了日本人控制的水域，安

全回到了150英里[注]以外的美军基地。他因为“极其勇敢的行为”而被授勋，1943年8月1日和2日的晚上，他“毫不在意个人的安危”，拯救了PT–109鱼雷艇上的战友。他的嘉奖令上写道：“他的勇敢、坚忍和出色的领导能力使他得以拯救了几个人的生命，这完全契合美国海军最高尚的传统。”

杰克的工作人员和凯恩的职业团队现在携手工作，密切合作，他们的名单就像是刻在战争纪念碑上的名字一样，使人回想起同志关系、热情奔放和对候选人的绝对忠诚，他们是波士顿选区的多比、麦克劳克林、凯利、道尔顿和麦戈夫；萨默维尔的里尔登和麦克唐纳；剑桥的比林斯、道尔顿、德罗尼和希利；布莱顿的沃德、布罗德里克；查尔斯顿的萨顿；意大利北区的罗塞蒂和德马尔克；西区的格蕾斯·伯克，尽管很柔弱，她却能在第六码头最严重的骚乱中幸存下来。大多数时候，他们怀揣很高的期望，但也有悲观沮丧的时候。费林街是对手的地盘。另外一个候选人在那里很有名，他是柯利的一位前助理，鲍尔斯每次回家，他的邻居们都会向他起哄。“没关系，戴夫。”杰克笑着说，“多年以后，你可以说跟我一起过过圣克里斯宾节。”戴夫茫然地瞪眼看着他。杰克引用了一段精彩的演讲，但稍微修改了一下，隐藏了作者的国籍：

好男人会跟他的儿子讲述今天的故事，
克里斯宾节永远不会过去，
从今天直至世界末日，
但经历过它的我们会被铭记；
敌众我寡，但我们是少数幸运儿，
我们是同生共死的兄弟。
今天与我一起浴血奋战的人，就是我的兄弟，
他不会永远身处卑微，
从今日始，他会变得尊贵，
此时，躲在温柔乡里的绅士们，
理应觉得自己受到了诅咒，
为什么轮不到他们上这儿来，
因为他们的血性不再，枉为男人。

这里的人都在呐喊：

今天是圣克里斯宾节，让我们一起战斗吧！

杰克早在1940年就从哈佛大学毕业了，但现在仍然有人记得，当时在阿瑟·霍尔库姆给大三、大四的学生讲授“政府7”（Government 7）这门课时，他是上此课的学生里面最喜欢提问的。在波士顿的校园里，如果你遇到一位战时的熟人，恰好是肯尼迪的同学，并且告诉他，你对这个城市最新出现的这位菜鸟政治家很好奇，就会被领到附近的贝尔维尤，得到引见。介绍很简短。肯尼迪正在赶往一次集会。匆忙之间，你对他的印象可能会是蓬乱浓密的栗色头发和特别的暗蓝色眼睛，上眼皮耷拉着，态度友好，但让人捉摸不透。通常会开一些老兵之间的玩笑。当他驻扎在图拉吉岛附近的PT鱼雷艇基地时，你是驻防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一名海军，图拉吉岛是所罗门群岛中的一座岛屿，可以从瓜达尔卡纳尔岛看到。肯尼迪对水兵很赞赏，称他们为“一流的团队”，并建议你下午再来。他说早晨联系不到他。每天上午6点，他会站在寒冷黑暗的工厂大门边、码头或查尔斯顿海军造船厂里与抵达的工人握手。上午8点15分，当最后抵达的工人打卡上班之后，他会到路边的小饭店吃早餐。9点，他会返回办公室处理工作，就像送货上门的销售员一样，在租来的公寓里打电话，先是让家庭主妇惊讶，继而让她们高兴。下午，他会去逛街，到杂货店、肉市、酒馆、百货商店、消防站、警察局和理发店里与人握手。下午4点，你会发现他已返回工厂和码头，问候下班的工人。然后，返回贝尔维尤休息。晚上，他将展开旋风之旅，马不停蹄地现身多个家庭聚会，典型的家庭主妇志愿者通常是打字员、总机接线员或教师，在他小口喝着可乐，吃着三明治，偶尔偷看一下手表时，她们就会像追星族一样两眼紧盯着他看。

“紫色三叶草”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在波士顿也是闻所未闻（但有所耳闻的是，柯利成为本州唯一预测肯尼迪会取胜的资深政界人士）。杰克每周会花一天来到其中一个选区所在的社区，周一在剑桥区，周二在萨默维尔，周三在布莱顿，如此等等。他的母亲和妹妹们则面向公众举办茶会，第一次安排在了剑桥区的指挥官酒店，结果有超过1000位女士前来参加。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选举日前夜，肯尼迪和几位朋友在阿灵顿街上开车兜风，看到正前方一位老太太正设法穿越街道。“停车！”候选人肯尼迪命令道。他跳下车，扶着这位女士蹒跚着走到街对面的路边。当他返回时，后座上有人脱口而出：“天哪，你真

的想得到所有人，是不是？”

在宾馆里找到他的最佳时间只有晚餐前。306房间的门通常半开着。你把头伸进去，不大自在地喊出他的名字，感觉自己就像一位闯入者。他那拘谨而诚恳的声音会从浴室里传出来，表示对你的欢迎。（“我在这里。”）除温斯顿·丘吉尔外，杰克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政治家洗澡的次数都多。这不是因为他觉得身上不干净，而是长时间地洗热水澡能缓解他的背痛。在这种地方进行严肃的会话不无奇怪，但因为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窘态，很快，坐在那里跟他交谈就显得自然了。在1952年的竞选中，他会要一块木板，横放在浴缸上，上面摆着他的安全剃须刀、剃须皂和一个看书用的架子，但在那些早期的日子里，他既要忙着修饰自己，又要读书，往往二者不可得兼，结果是常有一两本书需要晾干。那天下午，地板上摆着的是戴维·塞西尔的《年轻的墨尔本》（*Young Melbourne*）和阿尔弗雷德·达夫·库珀的《塔列朗》（*Talleyrand*），它们都翻开着，摊在那里。当你进去的时候，他一直在读着布尔沃–利顿的书，肯尼迪赞许地引用过一句话：“没有必要改变的时候，那就是没有必要改变。”这不禁让人感慨，20世纪美国的政治家中，可能没有比他更认真地读过它们的人了。这些谈话后来被人们称为“浴缸谈话”，这对他很有用：它们让他的思绪从当代政治中转移开来，虽然偶尔证明他所读之书的作者对他的巡回演讲非常有用，但政治术语还是心照不宣地被严禁使用。有时，杰克会对竞选心生厌倦，他会改一些句子来用，他自己熟悉这些句子，但他知道听众并不熟悉，比如“斯科雷广场深沉幽暗又迷人，但我承诺在先须践约，路迢途远不敢眠”。

如果能引起他的兴趣，说明这些想法是奏效的，但若是纯说教，他就会开始摆弄剃刀，这绝对是他已经感到烦躁的标志。他固执己见，却很有魅力；他的理解很深刻，爱钻研，善于分析，并且讲求实效。从一开始，你就会感觉到他确实对你和你的意见感兴趣。他会告诉你，从战前开始，他就会随身携带一个小的黑色活页笔记本，用来记下值得记住的简短的警句。而且，他仍然还保留着那个本子。在浴缸里，他会引用安德鲁·杰克逊的话：“有勇气的人会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勇气”这个词经常出现他的小本子中，谈话中也经常提到。他认为，勇气和动力是人最值得敬佩的品质。“所有人都钦佩勇气。”他说，“而拥有它的那些人才配得到最绿的花环。”

尽管他身患疾病，体重也减轻了，但当他小心谨慎地迈出浴缸，直

起背部时，你看到的仍是一位体态健美的男人：身高6英尺，蓬乱的头发，嘴形端正，皮肤因为洗海水澡而变得粗糙，脸上最初的深纹横跨眉毛，并且散布在眼睛周围，后来这些皱纹又更加深了。如果他感受到敌意或背叛，这双与众不同的眼睛会非常迷人，甚至令人生畏。他的肩部和手臂肌肉发达，他的腿很结实，你会想，如果他的体重增加到170磅，他就是那种轻重量级拳击选手的体形。你感觉他是一位不会不得志的好小伙。

后来，他变成一位穿着时髦的人，但在那时，他却有些邋遢，穿着不成双的袜子，衬衣和外套皱皱巴巴，领带也打得不怎么规矩，还穿着棕色的鞋和蓝色的西服套装。你经常能从他的手看出他的焦虑。在公众面前讲话时尤其如此。可听众从来不会看到这些，从外表来看，他似乎很是泰然自若。但如果你也在台上，并且位于他的身后，你就能看到他的两只手在哆嗦，甚至是颤抖。他经常烦躁不安，此时，他会向上拉扯自己的袜子，漫不经心地摆弄电话，拿起桌子上的物品，然后重新排列，用食指轻轻敲打自己的上唇，或者用5根手指梳理一下自己额前的头发。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有人会说："杰克不是坐在椅子上，他只是临时沾沾屁股。"无精打采坐着时，他会用桌子或什么方便的家具支撑住自己的脚，用手指甲轻快地弹自己的牙齿，或者把领带的下端塞进衣服里，即便它并没有露出来。

巴尼·罗斯是曾跟他一起服役的PT鱼雷艇退伍老兵，他说："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杰克的话，那就是'走'。"确实如此，即便他显然并不知道要走向何处。如果你问了一个他意料不到的问题，或是他不想回答的问题，他会很快地问道："什么？"然后，转换话题。竞选中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何时去何地吃饭，直至最后时刻，它才能得以解决。他会突然觉得肚子饿，必须要想办法填饱它。如果是在选区做巡回演讲，他通常会选择吃汉堡，喝半冻饮料，波士顿人称这种饮料为"奶昔"。之后，在他父亲的家里，你会发现，厨师总是会为他留一大碗蛤蜊浓汤，用一个带盖子的汤碗装好，放在厨房里。他可以狼吞虎咽地快速喝完，只能说，这是暴饮暴食。聚会前，他会限定自己只能喝代基里鸡尾酒（daiquiri）、威士忌和水，他通常都是小抿几口，绝不会喝完。唯一让他无法抗拒的一种酒是法国的唐·培里侬香槟王（Dom Perignon）。

半是大步走，半是滑行，当他用这种奇怪的步态走进房间时，女士们就会精神振作起来，纷纷整理起她们的头发。可以说，如果是找一个

女人玩玩，他几乎很少空手而归。用莱姆·比林斯的话说："杰克总是有很多女孩，并且与她们相处融洽。"但在竞选时，他严肃认真的一面则展露无遗，甚至会让女房东感到绝望。刚一接过饮料，他便会走向同样身为客人的某个人，这个人可能会增进他的竞选知识，或有助于他的职业生涯。有些人感觉这很唐突。他的野心如此赤裸裸，因此，他们希望他能稍加掩饰一点儿。后来，在当上美国总统以后，他确实有所收敛。但这对正在向顶层爬的年轻人来说，往往没有吸引力。如果杰克发现自己正在被迫接受无聊的东西，他便会径直转身，迅速离开。他有一个令人不安的习惯，就是在晚餐即将开始的时候，他会将手伸到口袋里，突然拿出一块焦糖或巧克力放入口中。在竞选时，他唯一吃得像样的一餐就是早餐：用鲜橙汁送服一片维生素、两只煮四分半钟的鸡蛋、4条烤过的咸猪肉、烤面包和咖啡。周五，除非是跟亲密朋友在一起，否则，咸猪肉就免了。

如果你跟他走在镇子上，你很快就会发现，路过报摊，他都会买一份最新的报纸。他会纵向地把它折好，贪婪地读着上面的文字，眼睛在栏间扫视着，速度快到让人无法相信。他全神贯注，你不得不帮着照看他的外套和黑色鳄鱼皮公文包，他经常会忘记带走它们。一天之内，他至少会向你借一次铅笔或梳子。而且他好像从来都不带钱。聚会的集资会让他感到窘迫，但他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靠朋友解困。他会向你要1美元买报纸，然后把找的零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在教堂里，他会在你耳边悄悄地说："我想让他们知道我是一个慷慨的候选人。悄悄给我10块钱。"很长时间之后，他才会归还借的钱，以致你都想向他收利息。当时，他的妈妈也在帮儿子竞选，有一次，她在乘坐出租车时，一路上都在向出租车司机描述杰克的优点。抵达目的地时，司机告诉她，她欠他的车费，另外还要给他1.85美元。罗丝很生气，问他为什么。他答道："因为你儿子昨晚乘坐了本车，我把他送到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分文未带。"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愿意输的人。如果他必须还债的话，即便是为数不多的钱，他也会像是掏出一大笔钱一样，好比国债那么多。在高尔夫方面，从打第一杆开始，他就会解释他那复杂的附加赌注的方法，虽然只有他自己能明白，但却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确保他能赢钱。按照他父亲的信托基金条款，他在上寄宿学校时就已经是一位百万富翁了，想筹钱，几乎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办到，但对于他来说，即使很小的赌注也要掌握操控权，不想输钱。他喜欢玩"大富翁"游戏，但时间不长，他就厌

烦了，正如他后来厌烦西洋双陆棋、看手势猜字谜、中国跳棋和桥牌一样，理由全都一样：他无法做到总是占上风。曾经，你问过他，会不会介意你不再和他玩了，他露齿一笑："如果你正在赢着，就别放弃。"另外有一次，正在玩跳棋，显然你占优势，他会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棋子散落了一地。"哇！"他说道，"现在我们得重新下了。"盛怒之下，你会指责他没有棋德。他会要求你重说一次，然后，把它记到自己的小黑皮本子里。

他最喜欢的消遣是看电影，如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他觉得《北非谍影》（*Casablanca*）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电影。但进入影院后，他必须寻找一个前面是空座的椅子。因为背部有问题，长时间坐在任何地方都会让他觉得很不好受，比如坐在电影院、椅子、大沙发或出租车里。他要有东西支撑自己的膝关节，而且每过几分钟就要换一下姿势。如果电影是个烂片，他就更加不能忍受疼痛，他会靠近你低声说："我们赶紧走吧。"但是，若是好电影，他从来不会离开。那一年，他最喜欢的电影是《失去的周末》（*The Lost Weekend*）、《圣玛丽的钟声》（*The Bells of Saint Mary's*）和《亨利五世》（*Henry V*）。当劳伦斯·奥利维尔哭喊道："我们是少数幸运儿"时，他会紧紧抓住你的胳膊，低声说道："太棒了！"

仅与其在1952年和1958年竞选参议员时相比，他在1946年众议员竞选时的表现就已经显得比较笨拙和业余了，更不用提1960年他竞逐美国总统宝座时的情况了。很多凯恩团队的老人被杰克常青藤盟校学生的身份激怒，厌恶地退出了。他第一次通过电台发表演讲差点儿被取消，因为直到最后一分钟，他才赶到播音室，好在，这次演讲并不是电视直播。他的竞选活动组织得很混乱，以致从技术上讲，他的名字出现在选票上是不合法的。在特里蒙特街（Tremont Street）的志愿者中，有人随意问了一句："杰克，你什么时候提交你的提名文件？"这位候选人顿时惊呆了。"我的上帝。"他气喘吁吁地说，"还没有提交。"当时已经是下午6点30分，最后期限在下午5点就已经过了，接收材料的办公室已经关门。打过令人绝望的电话之后，钱也拿到了，因为所有的资金都出自大使的助理爱德华·穆尔，他要求提交一式三份的申请才能领取，之后一位竞选职员打开办公室，让杰克填写必要的表格，并缴纳相应的费用。人们之所以能够将就这种事情，是因为发现他的魅力不可阻挡。不过，他妈妈另当别论。几周以来，乔·凯恩一直恳求杰克能戴顶帽子，乔认为，他的年轻是个不利条件，而帽子会让他看上去成熟一些。在商店里试戴过所有的样品以后，他戴着其中一顶离去。因为用时太长，他很晚

才赶到集会现场。妈妈站在讲台边，替他撑着场子，保持听众的注意力。当他终于现身时，他指着自己的脑袋，问罗丝道：“我看上去怎么样？”她极其挖苦地答道：“两小时前，你可能更好看。”

自从踏入这个角斗场的那天起，杰克就有个麻烦，而这个麻烦就是他的父亲。反对者指责肯尼迪想要购买一个众议员的席位（那些不得不填写爱德华·穆尔表格的人知道，如果老乔要买，很便宜就能买到）。当受到挑战时，杰克的直觉就是发起攻击。正如1960年他击垮偏执的反天主教徒一样，现在，他要反击指责他的波士顿人。他两眼冒火，怒斥一位找麻烦的人：“我不必为我自己或肯尼迪家族的任何人道歉。我在竞选众议员。请不要扯到别处去。如果你想谈论我的家庭，我会在外面等着你。”乔·奥图尔是柯利的走狗，臭名远扬，当杰克被他诘问时，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奥图尔叫喊道：“你住在哪里？纽约？棕榈滩？不属于波士顿。你是该死的投机政客。”杰克回应道：“听着，你这浑蛋。当我哥哥自愿执行任务并献出生命时，没有人想知道他是哪里人。当我在PT鱼雷艇上作战时，也没有人问过我是哪里人。”听上去，他就像是一个狡猾的家伙。

直到那时，他还像是一位寻求代表工人阶级选民的贵族。保罗·德弗说：“杰克是首位有学问、有教养的爱尔兰裔。”事实上，他是一位亲英派，他会用多种方式模仿英国上层人士。但他为自己百分之百的爱尔兰血统感到骄傲。后来，他在白宫告诉一群朋友说：“你们其他人都是混血。”有人忍不住问道：“那你的孩子们呢？”“什么？”他匆忙地问了一句，又扯到了别的话题上。他对奥图尔的回答是一个巧妙的推论，却不合逻辑，他的愤怒也是爱尔兰式的，这就是现场的听众会为他欢呼的原因。他的无畏也是爱尔兰式的，他的聪明才智、对政治的热爱、注定要失败的事业和放肆的恶作剧也是，还有他的坚韧和浪漫历史观。5月中旬，选民开始感觉到这些。一个爱尔兰人不会为他的哈佛大学学位感到羞愧，他从来不会问：“妈妈怎么样？告诉她，我向她问安。”除非很了解一个人，否则，他们从来不会现身守灵聚会。弗朗西斯·拉塞尔是波士顿的一位政治作家，他注意到：“愚蠢了半个世纪（之后）……郊区的那些胖娘们都愿意让她们的儿子成为他这样的年轻人——吸引人、能说会道、优雅、机智、信奉天主教、喝过哈佛大学的墨水，而且很有钱。事实上，她们中有很多人前来，就是因为把杰克看成了自己的儿子。”

他是第一位对25岁以下的选民有话要说的美国政治人士（后期一项

研究表明，如果在第一轮竞选中，30多岁的人都远离投票站，他也将取得历史性的大胜利。但杰克还是立即建议将投票年龄下限降低到9岁）。他试图问候陌生人，请求他们给自己投票，并最终学会了乐在其中。这让他感到吃惊，也让他的家人惊讶不已。一天，他的父亲来到东波士顿的马弗里克广场（Maverick Square），看到自己的儿子竟从一辆车中出来，穿过街道，走向角落里一群身体健壮的蓝领工人，跟他们握手，介绍自己，并请求他们支持他。大使说道："我从没想到他有这两下子。"阿瑟·克罗克后来说："他自己改变了自己，重塑形象，成了一个新人。"

初选日是6月18日。随着第一轮选举结果的公布，很明显，肯尼迪已经步入了成功之路。他以10170票在波士顿胜出，在布莱顿也领先4000多票，即使在意大利人大本营的北区，他的票数也超越了那位意大利裔的候选人。总之，他的票数是离他最近的竞争对手的两倍。波士顿的民主气氛很浓，一般的选举也很正式，既然要代表第十一区，他决定就住在那里。他在鲍登街（Bowdoin Street）122号租到了一处公寓，有4个房间，但相当破旧，就在贝尔维尤街的转角处。罗丝赶过来为屋子铺上了地毯。该建筑的管理人乔·墨菲似乎总是随叫随到，制作一杯可口的咖啡，家具虽然破旧了点儿，但还算舒服。相当多迷人的、教养良好的波士顿年轻女子找到了去鲍登街122号的路，但这都是谣传。就其浪漫的战绩，你曾经问过杰克这个秘密。在朋友面前，他那富有魅力的机智派上了用场，他说道："有些家伙能吸引美女，有些人就没这本事。你们没戏。"这样的问题就应该这样回答。杰克会用这种方式跟你过分吹嘘，很高兴看到你的不舒服，然后，他会给你提出某个你也想得到却从来不敢要的建议。之后，他可能会邀请你去海恩尼斯港（Hyannis Port）度周末，那可是他父亲的地盘，老爷子的大名叫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钱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有钱有势，而且冷酷无情。

对杰克而言，海恩尼斯港就是家，甚至在其担任美国总统的最后一年，好奇的旅游者纷至沓来，让那里人的生活不堪重负，于是，他在附近的斯阔岛（Squaw Island）租了一个不规则伸展的、历经风雨的小农舍，从肯尼迪家族庄园出来，穿过一个堤道，步行就能到达。他需要科德角，如他所说，他需要"感觉到脸上的盐分"。如同美国这个国家在肯尼迪当总统期间知道的那样，在初选胜利之后他休息的那个夏天，这个

庄园并不存在。海恩尼斯港包括大约100座宽敞坚固的建筑，都是用木瓦盖顶，并加装护墙板的住宅，彼此之间由低矮的新英格兰石墙或修剪过的树篱隔离。大使的家靠近斯卡德（Scudder）和欧文（Irving）大街的交叉口，被其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邻居称为“爱尔兰人的房子”。他于1929年买下了它。后来，在杰克和鲍勃（杰克大弟弟罗伯特的另一称呼，下同）购买了与它相邻的两处房子之后，爱尔兰人的房子变成了大房子。三角地带之间修剪好的草坪成了肯尼迪家族各个年龄段的人和宾客游玩的场所，这里成了一个建筑群。但1946年，肯尼迪家族在那里的唯一房产是他父亲的。侧墙毫无矫饰，是白色的护墙板和绿色的百叶窗，不过，它却很宽敞，共有17间房，外加供仆人住的地方。这里离海滨只有几英尺远。各种船舶用绳子系在停泊处，其中包括杰克的“维克图拉”号（victura）帆船。海鸥在头顶上盘旋，发现下面的食物之后，它们会猛地俯冲下去。海滨灰色羽毛状的丛生植物在瑟瑟悲鸣的微风中温柔地屈膝行礼。在你从众议员选举的敞篷车上下来时，你会认为海恩尼斯港必定是一个理想的休闲之地。

没有什么比这更错误的想法了。如果你知道在前面等着你的是什么，你就会花上一周的时间参加训练了。在房子周围，肯尼迪一大家子人来来回回地投掷飞镖、捉迷藏、踢罐子，当然，也玩触身式橄榄球，所有这些活动会让他们的身体变得坚韧，增强自身的忍受力，有时，为了取胜，甚至会破坏公平比赛的规则。赢什么，并不重要，他们受到的教育是竞争，抢夺第一。罗丝似乎完全受到了大使的影响，她平静地解释道：“我丈夫是个十分严格的父亲。他喜欢男孩子在体育活动中赢得胜利，他们尝试的任何事情都要赢。如果没赢，他会跟他们讨论失败的原因，他对输了的孩子没有多大的耐心。”这样的说法算是很温和的。如果他们输了，而大使感觉他们没有尽全力，他们就得受处罚，不许吃饭。杰克跟他的哥哥小乔曾经比赛游泳，而那时，他们还很小，从岸上都看不到他们的脑袋。他们的父亲会事先说些鼓励的话：“要当胜利者，第二名什么好处也没有。”

在大多数家庭，男孩子会受到警告，不许捉弄弟弟。乔·肯尼迪信仰肌肉放任主义。小乔不仅年龄大，而且个子更高，身体更壮，正如杰克回忆的那样：“我生性好斗。后来，虽然这一点有所减轻，但在我小的时候，这很成问题。”罗丝说：“乔比杰克壮很多，如果发生身体接触，乔真的会使劲打他。”杰克也是一样。特迪小的时候，他害怕离开自己的卧室，因为他知道杰克会等在外面，用枕头猛砸他的头。大使的一位朋友

后来回忆道：肯尼迪家的儿子们“总是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我还记得有个孩子，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被人救起时已经不省人事。他们身上经常缠着绷带，到处青一块紫一块的”。有一次，杰克和小乔之间发生了冲突，之后，不得不把杰克送到医院，缝了28针。

当然，这违反了当代人所能接受的抚育孩子的每一个原则。然而，当后来认识他们的人看到，在他们家，父母与孩子以及兄弟姐妹之间表现出了持久的爱时，内心无不为之打动。毫无疑问，假如杰克·肯尼迪是由一位传统的父亲抚养长大，那么，当他在遇到所罗门群岛沉船那种情况时，就可能无法幸存下来。他哥哥英勇地牺牲在了欧洲，而他则成长为美国众议员、参议员和总统。在他选上参议员之前，其中一位弟弟成了出色的司法部长。另外一位弟弟也是参议员，而且也曾被视为美国总统之位的竞争者，当然，这要他真正参加选举才行。

他们的行为立即体现了他们的养育方式，这让他们的同龄人感到吃惊。读哈佛大学时，杰克患上了流感，白天在校医务室治疗，晚上他却偷偷跑到学校游泳池游了40个来回，因为他希望加入校游泳队。尽管未能如愿，但正如他后来的解释那样：“我努力了，我参与了，这才是重要的。”肯尼迪的兄弟中只有鲍勃加入了哈佛大学的校橄榄球队，有一次，他的腿骨折了，却仍继续比赛，直至球队队长肯尼·奥唐奈出于保护，让人把他带离了球场。约翰·滕尼是特迪在法学院的室友，有一次，他们站在人行道上，来回扔着橄榄球，此时，特迪建议他们稍微玩一下身体接触。滕尼以为他在开玩笑。接下来，他所知道的是，他被彻底制服了。“我无法相信。”滕尼回忆道，“我们还穿着正装……就在水泥地上互相全力地抱摔！”

帕特、尤妮斯和琼是肯尼迪妹妹中的其中三位，她们当时都是20岁左右的年纪，充满活力，不管玩什么，都随时准备着进行下一个游戏。罗斯玛丽28岁，智力迟钝，住在威斯康星一家女修道院里，在被告知她患有智障时，她的父亲怒不可遏，一个接一个的精神病医生都被他撵走了，直到最后，她的父亲发现无一例外的是，他们的意见都跟自己不一致，他只能承认她的确病了。她的父亲从未谈及过她，几乎将她的病视为自己的污点。另外，肯尼迪还有一个妹妹凯瑟琳，也就是基克，生活在欧洲，她是杰克最喜欢的妹妹。基克嫁给了一位公爵继承人，而新郎的父母是虔诚的新教徒，这有违双方家庭的意愿。不久，这位公爵继承人在诺曼底滩头阵地的战斗中阵亡。后来，基克也死于欧洲的一次飞机

失事。但是，即便人死了，大使也仍能挖掘出一些可供他显摆的东西，他说：“如果我的女儿凯瑟琳和她的丈夫还活着，我就是德文郡公爵夫人的父亲和共济会总舵主的岳父。”

难得的是，出于对罗丝的尊重，大使同意将姑娘们送去教会学校读书，但她们跟哥哥们一样，进取心都很强。你或许一直认为单触式橄榄球是一种安全而优雅的运动，但在海恩尼斯港，你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肯尼迪家族的触碰规则很简单。那就是“不为四分卫挡人”。只有四分卫的手接触到球，防守队员才可以越过开球线。然后，你就可以冲传、拦截他。但进攻一方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传球，不管是后撤还是前进。鲍勃那个周末也在场上，他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已经从海军退役了，尽管之前他的父亲强烈反对，但在小乔牺牲之后，他还是入伍参了军。他和杰克是各自球队的四分卫，互为对手。你和杰克在同一队，在一次进攻前的讨论中，他说：“我们这次试着打一下完美的米拉克雷莫（Melacreamo）战术。”你说：“什么玩意儿？”他解释道：“这次我打中锋，开球给你，然后假装往前冲，鲍勃会觉得我要跑向远端接你传过来的球。你拿到球以后，多后撤几步，我会折返回来，你则把球横传给我。等尤妮斯再拦截传球就太晚了，在鲍勃赶来擒抱你之前，你已经跑到了前面，你现在的位置就出现了空档。”这个战术奏效了，他给你传了一个好球，你达阵得分。你或许在看到鲍勃充满敌意的眼神之前，都会觉得得意扬扬。随后，比赛变得更加激烈，姑娘们又踢又叫，又抓又挠。鲍勃似乎挨了17个肘子，天哪，不为四分卫挡人。这个名门望族里的家庭成员都在犯规，在职业比赛中，这样做是要被取消资格的。这让人不禁想起但丁《神曲》中对受邪恶力量摆弄的暴力的描写。最终，鲍勃获胜。后来你了解到，他总是获胜。他总能得到最好的球手，他需要获胜，这种渴求似乎比杰克更迫切。

他们的父亲出来迎接他的新客人，并且观看最后几场比赛。他的身材纤瘦挺拔，浅黄棕色的头发，梳了一个直背头，戴着角质框架的眼镜，让他看上去面孔严肃。在鲍勃突破拦截，跑向达阵线触地得分时，他为之鼓掌。大使说：“他讨厌像我。”其实不对。鲍勃无疑是一位凶猛的斗士。你应该知道：他曾经毫不留情地猛击你。但他并不恨你。他是一位有爱心的人，不是一位仇恨者。他热爱公正，最终，他也开始热爱贫困的美国人、外来采摘水果的人和非法进入美国的墨西哥流动工人，这些人的投票权被忽视了，但他们理应受到保护，获得尊严。他天生和善，会立即跟孩子们亲密起来。在其哥哥执政时，正是鲍勃而不是那些

信仰自由的人让他们做到凭良心做事。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当肯尼迪总统的顾问们倾向于实施空中突袭时，鲍勃阻止了讨论，估测了一下平民的伤亡情况，然后说道：“175年以来，我们还没有人做过这件事。”

然而，他是一个可怕的竞争者。他娶埃塞尔为妻，后来她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外接手，与她结婚之后，几乎从每一个孩子刚刚学会走路开始，他就安排他们进行自相残杀式的竞争。他会告诉他们：“让我们赢得这个大奖”，或者说“让我们努力创造纪录”“肯尼迪家族的人不会害怕”，以及“肯尼迪家族的人不能哭”。最后一条行为准则受到萨金特·施赖弗的挑战，他娶了尤妮斯。萨金特走进肯尼迪庄园，发现自己的小儿子在哭泣，而他的表兄弟们则在重复着说一句话：“肯尼迪家族的人不能哭。”萨金特飞快地抱起他的孩子，告诉他说：“施赖弗家族的人可以哭。放声哭，想哭多久就多久。”另一方面，埃塞尔变得“比肯尼迪家族的人还肯尼迪”，这是这个大家庭能够授予的最高荣誉。杰奎琳对所有的户外运动项目都不在行，最后在玩触身式橄榄球时脚踝骨裂了，从此永远退出了家庭体育活动，但她说过的话及其表现却成了这个家庭的话把儿，大家聚在一起时不免会调侃调侃。在一次相聚商讨问题时，她问道：“直接告诉我一件事情。如果我得到了球，我该怎么跑？”

戴夫·哈克特是鲍勃在米尔顿时最要好的朋友，戴夫曾经为拜访肯尼迪家族的人开列了一个规矩清单。在橄榄球方面，他的建议是：“每场比赛都要疯狂地跑，大声吵闹。不过，不能表现得很是乐在其中。否则，他们会责怪你对待比赛不够严肃……也不要批评另一支球队。他们毕竟全是肯尼迪家族的人，不喜欢这种事……要想真正受欢迎，你就必须表现出粗野的勇气。而要表现这种粗野的勇气，你要时不时地敢于摔个大马趴，甚至在追赶传球手时要不惜撞到墙上。如果你的脚踝扭伤或最考究的西服上被扯了一个大洞，他们也只是会一笑了之。他们喜欢这样。这表明你像他们一样认真对待比赛。”

橄榄球仅仅是个开始。他们还期待你能驾驶帆船、游泳、打垒球和网球，并在海恩尼斯港的9洞球场上打高尔夫，对姑娘们的衣饰和发型给出简洁明了的意见，并为即将到来的晚餐对话做突击准备。流言蜚语不许谈，同样，笑话和钱也不许谈，“大生意人是这个国家中最被期望过高的人”，大使会告诉你，“我在这里，一个来自东波士顿的小伙子，我打败了他们。因此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相反，他们期待你谈论当前的事务。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你应当阅读全部的最新的新闻周刊、报纸

评论，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阅读美国《国会议事录》。这只是热身。压轴大赛是在吃过甜点之后。大使会为下一个周末设定一个话题。那周的话题是《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中的文章，该书促进了美国宪法的诞生。该家庭的每位成员都被指定阅读一部分内容，不是汉密尔顿的，就是杰斐逊或麦迪逊的，等等。因为在他们看来，任何受邀去海恩尼斯港的人都应当是聪明、有天赋、有才能、快乐而有趣的，并且精力充沛、见多识广的。在这家人的词典里，没有什么比“他很一般”或“她很普通”更差劲儿的评价了。最后，所有参与者接受祝贺，听到“好了”这个词常常就表示结束了。如果此时感觉“妙极了”，便会开始唱歌。这通常是自觉自愿的。这对杰克而言，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完全没有约束的时间段。他的声音单调，毫无韵味，但其他人也是这样。他会低声吟唱自己最喜欢的两首歌《蓝天》（*Blue Skies*）和《比尔·贝利，你就不能回家吗》（*Bill Bailey, Won't You Please Come Home*）。其他人则受到鼓励自愿选择随唱，如果没有人唱，这个节目便就此结束，不过，最后大家还会齐唱一首这个家庭的圣歌《我的心肝宝贝》（*Heart of My Heart*）。

顷刻间，他们开始多愁善感，片刻之后，他们就会恢复坚强，甚至变得冷酷无情。客人会受邀做一次演讲，开始是怂恿，最终是强迫。但一旦你不再反对，开始讲话，就会传来嘘声，这家人会喝倒彩，直到你坐下，你都会感到困惑，并且觉得受到了背叛。在乔特中学时，杰克有个绰号，他被人称为“阴险的人”，后来，他让这一绰号更加名副其实。查利·巴特利特被称为“走路像鸭子的人”，本·布拉德利成了“波士顿黑人”，另外一位熟人则是“没有屁股的曼彻斯特”，这很伤人，但是完全正确。一位哈佛大学教授表示反对，因为《纽约时报》有篇文章称他是妄自尊大的人。杰克说：“为什么不呢？其他人也都这样。”大使本能地不信任在就餐前喝了不止一杯酒的任何人，因此，很自然，如果你是第一次在那里参加聚会，杰克便会对他父亲说：“我朋友还想要一杯马提尼。”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他参加帆船比赛时的船员，你可能全程都会感到非常忐忑不安，甚至在你出发之前，他就已经开始讥讽你：“谁去把船首三角帆拉起来，比尔？我已经搞定了主帆，比赛将在两分钟内开始，那么，谁去把船首三角帆拉起来，比尔？”技术娴熟的船长会在抢风调向时让其他船长不断地猜测他要干什么。万一哪位船员没能准确预测出杰克的下一个动作，就可能会被主帆的下桁猛地击倒。因此，这个时候，船长应大声喊出警告：“下风满舵！”当时你正处于楠塔基特湾（Nantucket Sound）中间，没有注意到“维克图拉”号帆船正迎面驶来，也没有注意到船的下桁正朝着你的头顶袭来，那么你就只有一种选

择，从船的一侧跳入海中。幸运的是，你抓住了一条帆缆，把自己又拉回船上。随后，你开始骂未来的美国总统是一个爱尔兰佬、婊子养的和憨熊。而他却只是笑着说："难道你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我刚刚说了'是'。就这意思。"然而，你根本不认为他说过什么。你认为这个人就是想让你从半路游回去。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一种解释是他们在海恩尼斯港的富裕的共和党邻居总是排斥他们。因此，他们不得不创建自己的社交圈子。另一个原因是他们非比寻常的父亲。当乔·肯尼迪的视线转过来，并且全神贯注地盯着你时，效果是惊人的：你的脊梁骨会感到刺痛，感到头发直竖。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基本力量。它与悟性、智慧或良好的判断无关。很快，你就会发现你与他几乎在任何实质性问题上都有分歧。他是反犹太者。他认为黑人是次等人。对外援助是在浪费钱。保卫柏林是荒唐的。如果苏联人突袭，跨过了边境，美国就会与他们并肩作战，对西欧人做出这样的保证是不负责任的；美国人应当退回自己的本土堡垒之中，让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下地狱去吧。持类似观点的并非杰克一个，事实上，他的无数同胞都是这样想的。真正让大使与众不同的是他对待自己孩子的方式，尤其是他的儿子们。他把小乔和杰克送到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师从哈罗德·拉斯基。"拉斯基是一个狂人和政治同路人。"他说，"但我认为……到了他们听取其他人观点的时候了。"他赠予每个孩子1000万美元，"因此，他们可以跟我讲'见鬼去吧'"。他曾经感觉杰克在美国国会一个重大议题上站错了立场。他恳求自己的儿子改变立场。杰克摇了摇头，大使眉开眼笑。"你看到了？"他说，"如果可以的话，他会朝我啐唾沫！"

大使不同寻常的职业生涯从8岁就开始了，当时，他在波士顿的游船上兜售糖果和花生。他就这样半工半读完成了哈佛大学的学业（1912年毕业），在被称为"波士顿的华尔街"的州街（State Street）买下一间办公室，并在25岁那年当上了一家银行的总裁。然后，他去了纽约，成为一位股票非法交易的奇才，他的手法有市场操纵、对敲、利润操纵以及虚售和卖空。通过巧妙地投资和资产配置，他使自己的财富一次又一次成倍增加，并最终成为亿万富翁。

财富无法改变一个人的背景。"二战"后的第一个夏天，在海恩尼斯港的一次闲聊中，杰克的一位新朋友暗示大使可能会瞧不起普通人的观点。"你什么意思？"乔突然发怒，"我恰巧是这一大家人里面最普通的家

伙。”从某些方面讲，他是普通人。跟杰克不同，他不是亿万富翁的儿子。虽然作为一个投资家，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直到罗斯福总统因为急于取缔那些让乔致富的做法，并任命他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之后，他才获得了社会地位。他受到了欢迎，但仍然是一个局外人：不适合、爱耍阴谋、专横、目中无人、浪漫、直觉敏锐，还有些家长作风，对政治很感兴趣，而且还有些性别沙文主义。他喜欢在谈判会议期间演奏古典音乐。他的两位助理曾经对此表示抗议。乔回答说：“你们这种傻瓜欣赏不了这种文化。”

他怀有两大抱负。其一是成为第一位在英国担任大使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罗斯福使之成为可能。其二是看到他的其中一个儿子就任美国总统。他想当然地认为这个人就是小乔，当这个孩子的死讯传来时，他悲痛欲绝，伤心落泪了好几个小时。在此之前，这家人曾认为杰克会成为教师或作家。很明显，杰克是这家人里的智力超群者，他在14岁时就开始阅读《纽约时报》。差不多也就是那个时候，肯尼迪家族的一位朋友到乔特中学看望他，发现他正在阅读《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这是温斯顿·丘吉尔写的一部6卷本的“一战”史。他对外交事务感兴趣。他和一位朋友在战前两次游历欧洲，头一次是跟莱姆·比林斯，第二次是跟托比·麦克唐纳[注]。在德国，他遇到了一位年轻人，是一位获得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后来，他任命这个人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这人就是拜伦·怀特，人称“奇才”。当纳粹的一艘潜艇用鱼雷击沉了英国的“阿西娜”号客轮时，杰克正在伦敦，当时全船乘客1418人，包括300名美国人。那年，杰克21岁，还是哈佛大学的学生，大使派他去格拉斯哥访问幸存的美国人。他们希望美国海军把他们送回家。杰克解释说那是不可能的，但向他们保证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让他们安全返回美国。总的来说，他机智又镇定地处理了一件棘手的事情。返回马萨诸塞州后，他将自己的毕业论文改成了“为什么英国会沉睡不醒”（*Why England Slept*）这个题目。亨利·卢斯为其写了序，并出版发行，最终，它卖出了9万册。当他以优异的课程及论文成绩毕业时，大使发来了电报。

> 一直以来，我了解你两件事，一是你很聪明，二是你是一个优秀的小伙子。爱你的，爸爸。

假如他的哥哥还活着，杰克可能永远不会顶替他的位置。反之则不然。小乔的死并不意味着杰克就一定会因此步入政坛。他犹豫不决，当

他做出选择时，全家人都不确定这是否明智。他从小体弱多病，甚至遭受过一些严重疾病的折磨，比如猩红热和阑尾炎，并且差点儿死于白喉。在所罗门群岛时，他患上了疟疾，后来，医生发现他得了黄疸、肝炎和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他的左耳失聪，对狗过敏，并且还要受胃部敏感的折磨，食用快餐就可能刺激他胃病的发作，而在政治选战中，吃快餐又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像大多数政治人士一样，后来他也需要戴上眼镜阅读，但在公开场合却很少看见他戴眼镜的样子。曾经有一次，他发烧烧到了41摄氏度，医院认为他活下来的希望不大。但他仍忍痛活了下来，不过，只有那些很了解他的人才能分辨出他何时正在遭受痛苦。对于波士顿，对于马萨诸塞州，对于美国，最终对于世界，他似乎是永远年轻的象征，瘦高而结实，头脑敏捷，脸庞外形如林德伯格，红光满面如梅里威尔。这种形象是一种意志上的胜利。

当然，最后决定步入政坛的还是杰克本人。大使努力树立一种沉稳冷静的形象，但他的孩子们知道，他是很情绪化的。他们目睹了小乔去世之后他有多么悲伤，当听到基克的死讯，飞到法国南部一个村庄确认她的遗体时，悲伤再次袭击了他。他扮演的是一个严厉的家长角色，但在他的眼中，他的孩子们是不会误入歧途的。杰克曾经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电视节目，他渴望自己的表现能获得一个公平的评价。他打电话跟父亲讲了此事，事后他说道：“我仍然不知道我该怎么做。如果我在地板上滑倒了，他会说：‘你跌倒后又站起来，姿势优雅，简直太棒了。’”随着杰克地位的提高，他开始声名鹊起，就像卫兵换岗一样，他们的父子关系也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当杰克的话语权受到限制时，大使会告诉家人：“你们要按杰克说的做。”早在那之前，他们爷俩就在家中享有同样的权威，却没有形同水火。大使会定期审查由他支付的账单，掌握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并且在餐桌上训诫他的孩子们。除非这种失控的行为停止，否则，他会警告说：“你们的孩子将会因此穷困潦倒。”有一次，他单独挑出了埃塞尔的账单，将一捆赊账账单不停地在她面前挥舞，直到她哭泣着逃走。鲍勃站起身来，追她而去，大使满面忧虑，面部紧绷得就像绞紧的升降索一样。当他们返回时，屋里仍然处于紧张的情形。杰克打破了局面。他告诉鲍勃：“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爸爸只好出去挣更多的钱。”

---

1. 1磅≈0.454千克。——编者注

2. 1英尺≈0.305米。——编者注

3.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4. 托比·麦克唐纳（Torbey Macdonald）即前文出现的托伯特·麦克唐纳（Torbert Macdonald），是杰克在哈佛大学的室友。Torbey是Torbert的昵称。——译者注

第三章 朋友更珍贵

他目标远大，坚韧无畏，可以忍着背部手术的剧痛，写出一本获普利策奖的著作，并把诽谤它是枪手代劳的人告上法庭，维护自己的声誉；他也坚决地为指责他是外来的政治投机客而辩护，坚决地维护自己作为天主教徒竞争美国总统的权利。“当我参加美国海军时，没有人问过我是不是天主教徒”

事后回想某件事，记忆往往会失真，对一位公众人物的回忆尤为如此。虽然肯尼迪在1963年6月以49.7%的得票率当选美国总统，但民意调查者发现，回忆中给他投票的选民却多达59%，而在其死后，这一数字甚至上升到了65%，这意味着有1000多万投票人重新编辑了他们记忆的内容。相当多的波士顿人后来回忆说，早在1946年，他们就预言肯尼迪会从众议员升任参议员，之后再当上总统。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即使没有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也认为他的政治前途是命中注定的，是命运的产物，而且是某个宏大设计的一部分，就像星星在其轨道上旋转一样不可避免。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肯尼迪的激情和政治直觉才是促使他成功的关键，虽然和幸运也不无关系。有些事纯属巧合，例如，1960年10月19日，马丁·路德·金在亚特兰大被羁押入狱，冲动之下，杰克打电话给科雷塔·金表达自己对此事的关心。要不是这次电话，他就不会获得70%美国黑人的选票，帮助他得到所需要的差额，从而击败尼克松。（金的父亲告诉媒体，他反对肯尼迪，因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但现在，他支持他。杰克愉快地说：“设想一下，假如马丁·路德·金的父亲是一位偏执的人又会怎么样呢？”停顿了一下之后，他又淡淡地说了一句：“但我们都有父亲，不是吗？”）

1947年1月3日，他宣誓就任众议员，而且颠覆了传统，拒绝拜访马萨诸塞州众议员元老约翰·麦科马克和向他发誓效忠。作为一名美国众议院劳工委员会的新晋成员，他针对《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单独提交了一份报告，既不同意共和党人的观点，也不同意民主党人的观点，他批评哈里·杜鲁门政府的贸易政策和预算拨款，成为马萨诸塞州众议员议员团中唯一拒绝赦免柯利的成员，接着，他又抨击了反对为受尊敬的老兵

提供低价住房的游说团体。大使对杰克所说的一些其他事情特别感兴趣，因为他认为，它们需要说出来。它们是右翼的信条，受到共和党人的欢迎，但在杜鲁门眼里，它们是异端邪说，他是一个危险的政敌，他能记得所有的事情。肯尼迪指责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并且反对所有的对外援助。他告诉众议院：在雅尔塔，“病怏怏的”罗斯福听取了乔治·马歇尔将军的建议，把千岛群岛和其他战略要地“拱手让给了”苏联。他说，杜鲁门这届政府还想方设法迫使蒋介石与毛泽东联合。在对待蒋夫人的态度上，即使不是“看不起”，杜鲁门也是很“冷淡”的。由于听了欧文·拉铁摩尔这种人的建议，美国国务院将美国战时的收益挥霍一空。肯尼迪总结道：“这是有关中国的悲惨故事……我们的年轻人挣回来的，却让我们的外交家和总统愚蠢地浪费掉了。”

后来，肯尼迪说：“我刚刚从我父亲的房子里走出来，我知道的事情就是这些。”但待在华盛顿的时间越长，看到自己父亲的时间越少，他就越来越想要献身于自由事业。他改变了关于对外援助的看法。他不断地与家乡的政治领袖和选区的政治名流接触。码头装卸工、搬运工和所有的工会成员都被《塔夫脱—哈特利法案》激怒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亲“老板”的法案。肯尼迪认为他们的不满是理所应当的，并与另一个众议员新手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就此问题展开了辩论，尼克松是加利福尼亚州第十二国会选区的议员。他还与另一位新人就是否需要公共住房展开辩论，这个人就是当时还不知名的乔·麦卡锡，他是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肯尼迪反对效忠宣誓，并且注意到，过去投票给他的那些极端守旧的人都是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乔·肯尼迪态度专横、心肠软、脾气急、爱欺负人，爱与恨都会夸大地表现出来。杰克则平静、有耐心、有礼貌和理性，喜欢保守的陈述。不过，在这两个人之中，杰克显然更强硬。如果有家庭成员取悦大使，大使就会让步。但杰克从来都是寸步不让。他那迷人的微笑很有欺骗性，在其充满魅力的表象之下，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有时甚至是个无耻之徒。

政治现在成了他的职业，他开始卖力地干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全力以赴”。他不得不缓慢而费劲地读完一摞一摞的文件，为此，他还选修了快速阅读的课程。让他疑惑的是，为什么大多数选民对罗马天主教皇不感兴趣，或者说是心怀疑虑，为了找到原因，他阅读了1934年巴肯对克伦威尔和保罗·布兰沙德的畅销书《美国自由与天主教权力》（*American Freedom and Catholic Power*）的研究（但是，这本书并非是反天主教的）。选举几天后，他遇到了自己的老教授阿瑟·霍尔库姆，霍尔库

姆向杰克表示祝贺，并告诉他，自己投了他一票，建议他拿出一下午的时间，参加自己的美国政治研讨班。有12~20位聪明的哈佛学生将会参与此次研讨。杰克首先谈的是政治现实，然后，留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供他们提问。肯尼迪很喜欢参加这类活动，在步入白宫之前，他每年都会返回哈佛校园。那时，霍尔库姆的研讨班硕果颇丰。正是在自己的老校园里，他学会了后来应对总统记者招待会所需要的技巧。

在乔治城，他结交了很多新朋友，其中就有比尔·沃尔顿，时任《新共和》（*New Republic's*）杂志驻华盛顿的记者。他们通过一位姑娘相识，因为他们俩都是单身，再加上沃尔顿当过伞兵，这立即就赢得了肯尼迪的友谊。另外，比尔在伦敦时就认识了小乔和基克。他住在乔治城的N街（N Street）附近，他们时常相聚。然而，沃尔顿当时并不知道肯尼迪很有钱。只有家人和少数几个好友知道肯尼迪将其薪水全部捐给了慈善机构，从做众议员开始，到后来当上参议员和总统，他的捐赠对象不仅有新教、犹太教和天主教事业及其相关的组织，也有像美国“男童军、女童军”（Boys and Girls Scouts）这样的组织，他的捐赠条件是收到捐赠的机构不许公开捐赠者信息。

在政治角逐中，肯尼迪总是尽量避免炫耀性行为，比如长时间的电视广播节目、整版的报纸广告和大幅的广告牌。他从来没有在华盛顿主办过奢华的鸡尾酒会，也几乎不以客人的身份参加这样的聚会。那个时候，沃尔顿对肯尼迪的了解无非是他的这位朋友住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开着一辆普通的汽车，后来，他的妻子给他买了一辆白色的捷豹牌汽车，却被他退了回去。沃尔顿回忆说：“只有当你去了海恩尼斯港，看到那里所有的船，你才意识到这家人很有钱。”肯尼迪家族的人会根据其他人的外表判断人，杰克尤其如此，但他们自己从来没有因为外表被人称赞过。

事实上，他其貌不扬。在很多方面，他似乎还是快到20岁时的样子。他妈妈派家里的厨子去给他做饭，好让他长点儿肉，但她未能如愿，后来，罗丝亲自赶来，监督他住处的重新装修。在大使的要求下，阿瑟·克罗克勉强让出自己的贴身男仆乔治·托马斯，以便照顾肯尼迪。在美国国会大厦，杰克经常被当成游客。因为他经常穿着皱巴巴的条纹西服上衣和卡基布裤子走进美国众议院。周日下午，他会匆忙穿上运动衫，赶到华盛顿山周围广阔的草坪，寻找触身橄榄球比赛，并参与其中。曾经有一次，你在华盛顿报道惠特克·钱伯斯在众议院前做证的新

闻，杰克用车到联合车站接你去国会山，并把车停在了一个写有“禁止停车”的标志牌前。他愉快地说道：“这就是哈姆雷特所说的‘位高权重者的傲慢’。”而此时，一位办事严格认真的警察正好出现，一边开罚单，一边在嘴里议论说：“有众议院的车牌并不表示赦免权可以让予众议员的公子哥。”甚至在肯尼迪通过选举进入参议院之后，一位卫兵挥手示意不许他使用电话：“对不起，伙计。这是留给参议员用的。”当杰克设法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登上总统的专列时，却被詹姆斯·罗利赶了下来，后来，罗利当了肯尼迪总统特勤局的负责人。

杰奎琳·李·鲍维尔超乎寻常的漂亮，她将要步入杰克的生活，在华盛顿的媒人看来，杰克和杰奎琳很般配，都是出身上流社会的罗马天主教徒，而且都特别吸引人。查塔努加《时报》的查利·巴特利特和他的新婚妻子玛莎认为他们应该见见面。查利在其哥哥的婚礼上几乎就促成了此事。他通知杰克待命，并且在杰奎琳碰巧与吉恩·滕尼交谈时强行把她拖走。但杰克不习惯等一位姑娘，一个人离开了。到了1952年早春，玛莎又想继续撮合他们俩，她邀请杰克和杰奎琳吃饭。而当时，肯尼迪一心想着自己在马萨诸塞州的政治发展，鲍维尔小姐则正准备出发去欧洲。那天到场的所有人后来都认为那次聚会没有说什么值得回味的事情。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杰克用他那种害羞的方式问她：“我们是否去某个地方喝一杯？”刚要回答他，她突然看到一个青年男子蜷缩在她的车后座上，原来是到处跟着她的几位求婚者之一。这是众多解释不清的情形之一。她摊开双手，做了一个无助的姿势，在这种情况下，她的确无法到某个地方喝一杯。因为再次被拒绝，肯尼迪生气地走了。

但他产生了兴趣。第二天，他给查利打电话，问了几个问题，了解到她的父母已经离婚，她父亲是股票经纪人，也是纽波特上流社会的一员。她是波特女子高中（Miss Porter）1947年的毕业生，该校位于康涅狄格州的法明顿。（该校的毕业班年刊记下了她的抱负：“不做家庭主妇。”）经过在瓦萨学院、巴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习，她能流利地讲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精通外语给肯尼迪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作为肯尼迪家族的一员，他从没有放弃努力，但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在他被杀害之前，他正在进修法语课程，希望能够跟夏尔·戴高乐进行一次充满智慧的对话。他打电话给杰奎琳，问她是否能够帮他翻译一些论述东南亚的法语资料。她有这个能力，而且答应了杰克的请求。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她为他翻译了几篇材料，包括谈论法国在中南半岛艰难挣扎的文章。几乎可以确认的是，肯尼迪是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

来，第一位主张应当允许法国在中南半岛的殖民地完全独立的美国政治家，不无坦率地表达了对那里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支持。1951年，他考察过这一地区，当时，美国大使馆设在西贡（前越南首都），对于大使馆例行的简要汇报，他感到了不耐烦，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越南的农民要在法兰西帝国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战？回到华盛顿，肯尼迪宣称："在中南半岛，我们将自己与法国政权为保住帝国残余所做的孤注一掷关联到了一起。"他说，"依靠军队"达此目的是愚蠢的，"如此撇开和无视与生俱来的民族主义意愿，是注定要失败的"。

完全有理由认为，肯尼迪会在美国众议院度过余生，最终成为众议院的发言人。1948年和1950年，他轻松地再次当选众议员，没发现什么人能在初选中竞争过他，在第二轮选举中，他是马萨诸塞州胜出优势最大的人。但美国众议院让他感到厌倦，每个成员只负责整个州事务的很小一部分，他越来越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1950年，他决定竞选州长或参议员。根据民意调查的结果，无论他当时竞选哪个职位都会输掉，但他会告诉你，他并不太在乎这些。只要不是陷于那些平庸、极其单调乏味的政治规则和陈旧的论资排辈制度，任何事情都比现在的要好。在1952年的选举中，有两个职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当时，它们分别由民主党派州长保罗·德弗和共和党人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担任。杰克的决定取决于德弗的决定。如果州长与洛奇竞争参议员，肯尼迪就会竞选州长。如果德弗寻求再次当选州长，那么，参议员席位的竞争将在杰克和洛奇之间展开，当时，因为带头说服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洛奇的竞争力得以加强，以致无论是德弗还是肯尼迪都不可能对他构成威胁，其他的对手更是无能为力。

在鲍登街的公寓，卧室墙上贴着一张马萨诸塞州的大幅地图，很快，它的上面就插满了彩色图钉，每一颗图钉都代表着自上次选举以来，杰克已经演讲过的一个地方。马萨诸塞州有39个市和312个镇，在进行下一次民意调查之前，他打算至少要在每一个城镇都露一次面。他一边研究着地图，一边告诉戴夫·鲍尔斯："你必须在这里、这里、那里给我约定日期。当我们用图钉把这个地图全部插遍，等德弗做好了决定，我就会宣布参选。"一位朋友问道：他会在哪里说这番话？回答是：任何地方。可以在天主教的圣早餐和新教教堂的社交聚会上，而且只要想见他，任何人都能见到，包括哥伦布骑士会、友爱互助会俱乐部、慈

善互助会、基瓦尼斯俱乐部、扶轮社、乐观国际组织、圣地兄弟会、圣名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海外作战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和志愿消防人员等。但他只能在周末现身，因为工作日他要去国会山上班。每周五晚上，他会从华盛顿飞往波士顿，每个周日晚上，他会在后湾车站登上美国联邦特快列车，在普尔曼式卧铺上伸展开四肢，在返程时睡上一觉。

他要靠朋友用车接送他，而他们却常常成为他黑色幽默的牺牲品。大多数时候，他都是拄着双拐。他会开车从国会山赶到华盛顿国家机场，而副驾驶座上会有一位朋友随行。在机场，他会靠拐杖费劲地挪动着步子，而他的朋友则坐上驾驶座，把车开回乔治城。当杰克开车时，每次乘坐都会让你难忘。他总是很晚才离开国会山，沿宪法大道快速向南，驶过波托马克河，一路上，什么良好的驾驶习惯，什么遵守交通规则，全部抛到了脑后。你可能还对那次他与一辆绿色雪佛兰车抢道的事记忆犹新。那位司机勉强避开了碰撞。你告诉他，那个人必定狂怒不已，而杰克却平静地说道："他在紧追我们。"杰克抄近道甩掉了他，当那辆绿色的雪佛兰再次出现，停在你的旁边对你大喊大叫时，杰克早已下车，开车的人现在换成了你。那人跳出车子，脸色铁青，叫喊道："是谁开的这辆车？"杰克可怜兮兮地斜撑着双拐，摇着头，指着你不无伤心地说："是他。技术差劲儿的司机。"然后，他一瘸一拐地走开，咧嘴笑着，留下你在那里解释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另外一次是在马萨诸塞州，因为他迟到了，你正以80英里的时速开着车，此时，从后视镜中，你看到一位骑着摩托车的警察追了上来。你停下车，从车里出来，又对着警察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最后，神奇的是，他放你走了。沿路走了几英里之后，你们正靠近一个铁路道口，此时，警铃响起，红灯不停地闪烁着。杰克急切地说："快点儿，我们必须抢在火车之前过去。"你尽力了，但还是太迟了。杰克厌烦地说道："如果不是你跟那个警察在那里废话，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我们可能就抢过去了。"

他可能对你是严厉的，但他对自己更严厉。他的行程安排是繁重而累人的。他知道，一个瘸子候选人是不会让人感到兴奋的。赶到演讲地的时候，他会把拐杖留在车上，咬着牙进入会堂。当掌声开始响起，他会报以微笑，大步走向讲台。在演讲、回答完问题和握手之后，他会瘫倒在车里，痛苦地闭上眼睛，直到抵达汽车旅馆。在睡觉之前，他会在装满热水的浴缸里泡上一个小时。确切地说，只有在有热水和浴缸的房间，他才会泡澡。但在马萨诸塞州的收费公路出现之前，具备这种条件

的汽车旅馆并不多。

1952年元旦，鲍登街公寓里的地图上已经被密密麻麻的彩色图钉覆盖。现在，他已做好了准备。到圣枝主日（Palm Sunday），德弗的个人民意调查表明，他已经没有机会胜过洛奇了，因此，他决定第三次竞选州长。当时，总主教库欣（Archbishop Cushing）还不是枢机主教，杰克打电话给他，询问在圣周期间发表政治声明是否适当。库欣热情地赞赏这个主意，并且补充说，肯尼迪会得到他的那一票。周末现身时，杰克在3英寸×5英寸大小的卡片上记下了当地热情支持者的名字，它们在即将到来的竞选中可能会派上用场。这些人通常是穿着打扮十分整洁的郊区居民，态度无可挑剔。慢慢地，随着夏天的到来和离去，你车上的一张肯尼迪纸贴就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然而，仅仅有名单还不能构建一个组织。肯尼迪需要策划人员和一个架构，帮助他赢得国会选战，想要战胜洛奇，他就要面对共和党的竞选经理们，他们的父亲和祖父都曾为洛奇家族的候选人做过竞选。杰克需要一位能力强的竞选经理，他把电话打给了鲍勃。德弗正在动员富有经验的民主党人，这些资深人士对这个提议感到非常惊讶。鲍勃当时只有26岁，刚刚从法学院毕业，正忙于在美国司法部树立自己联邦检察官的形象。他对马萨诸塞州的政治一无所知。但大使向鲍勃下达了前进的命令，鲍勃只能勉为其难。但他带上了肯·奥唐奈。拉里·奥布赖恩则早已加入。罗丝和她的女儿们在伍斯特、斯普林菲尔德和昆西举办了三场茶会，全部对外公开。事实证明，茶会很受欢迎，鲍勃力促她们多策划几次。截至选举当天，她们一共举办了35场茶会，吸引了6.5万~7.5万的女性参加。就像是玉米螟爬遍一块金黄短穗玉米田一样，肯尼迪家族的人跑遍了整个州，跟1946年波士顿第十一选区的情况一样，1952年，整个州的选情依然让人感到捉摸不定。他们围坐在肯尼迪位于波士顿基尔比街44号的总部里，回忆过往重要的选战，直到鲍勃告诉他们：要么往信封上贴邮票、填写地址，要么走人，大家才动起手来。他本人则承担起几乎不是竞选经理责任的任务：他想在一幢大楼上悬挂一幅肯尼迪的海报，以便让上下班都要跨越大桥，每天往返于波士顿北区和查尔斯顿之间的人都能看到它。他被告知无法做到。“戴夫，拉我过去。”他说，“我去把它挂起来。”据海尔·马里斯回忆，他做到了，在长梯子顶上摇摇晃晃的，而鲍尔斯则在下面把持住梯子的底部。

洛奇告诉阿瑟·克罗克，他期待以高出30万张选票的成绩胜出，并且

声称杰克只不过是在浪费他父亲的钱。但到9月的初选时，肯尼迪拉到了75%的选票，相比之下，德弗只取得了60%的战绩。德弗建议让他和肯尼迪的团队联手合作，大使认为有道理。鲍勃与杰克、奥唐奈和奥布赖恩商量此事，他们的决定是一致的：不合作。德弗很是生气，声称在肯尼迪家族的人当中，他只跟乔打交道。至于鲍勃，他对自己的助理说："不许那个讨厌的年轻人再上这里来。"

洛奇最大的优势也是他最大的劣势。他对艾森豪威尔的认同无疑为他赢得了选票，但洛奇也在其他州发言支持艾克，他不在的时候，杰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两位参议员候选人曾在女性投票人联盟沃尔瑟姆（Waltham）分会赞助的一次辩论中同时出场。实际上，他们在所有议题上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这其实是性格的较量，一方是温文尔雅、贵族气派却谦逊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另一方则是优雅机智的爱尔兰人。某种程度上，优雅和机智为肯尼迪加分不少。由于各种原因，推荐他的观察者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但他们仍然认为，推荐杰克是一种义务。有人说他"非常优秀"，有人说他"说话令人很愉快"，第三个人是个姑娘，她则大声地说："他相信的东西，我都相信。"

1952年11月7日，选举前夜，杰克已经感到筋疲力尽。他已经四处奔波了8个月，吃的是干酪汉堡包，喝的是麦乳精饮料，与人握了75万次手。然而，到了那天晚上，这一切似乎都是徒劳无功的。艾森豪威尔在马萨诸塞州以208800票获得胜利，最终数字显示，德弗以14456票败北。大老党（美国共和党的别称）要囊括该州所有的职位好像板上钉钉了。特别是对支持艾克的洛奇来说，这似乎已既成事实。投票结束之后5个小时，时事评论员仍然相信他不会输。然而，到了凌晨3点30分，有人感觉到了变化的第一波颤动，杰克仍在跟他针锋相对。到了早上5点，不知所措的共和党人承认杰克取得了胜利，他迎着共和党强有力的大潮逆流而上。结果显示，肯尼迪多出了70737票，有超过25万人把票投给了艾克，从而让洛奇的票数落后于杰克。对于期待新参议员选举结果的每一个人来说，一晚上的悬而未决是让人难以忍受的。洛奇对马萨诸塞州政治的掌控现在也到头了。从关键选区的数字来看，杰克在前半夜就预见到了结果。"我想知道艾森豪威尔会给洛奇安排什么活儿干。"当他漫不经心地说出这句话时，他的工作人员都在忧心忡忡地等待结果。

返回华盛顿，他开始重新追求杰奎琳，这被杰奎琳称为“一种超长间歇性的献殷勤”。两次约会之间过去了6个月，她再次跨越大西洋，参加英国新女王的加冕典礼。她现在是华盛顿《时代先驱报》（*Times-Herald*）的雇员。在其求职面试时，当被问及是否知道如何使用照相机时，她给出了非常肯定的回答（事实她不会）。当时，她每周的薪水为42.5美元，很快，她就学会了如何掌握光圈、快门速度和胶片感亮度。1953年1月，在杰克的参议员宣誓仪式完毕之后，她为他拍了一张快照。他带着她在肖勒姆酒店的蓝屋娱乐厅里跳舞，与鲍勃及其新娘一起吃饭，并且看了几场电影，在这些影片中，他们最喜欢《战地军魂》（*Stalag 17*）、马龙·白兰度主演的《恺撒大帝》（*Julius Caesar*）、理查德·伯顿主演的《圣袍千秋》（*The Robe*）和《乱世忠魂》（*From Here to Eternity*）。杰奎琳后来说：“但是，仍然是断断续续的，因为他每周都要在马萨诸塞州花上一半的时间。他会从那里的某个牡蛎餐馆给我打电话，手里抓着一大把叮当作响的硬币，邀请我下周三到华盛顿去看电影。他喜欢看西部片和关于美国内战的影片。他不是那种会送人糖果和鲜花的人，因此，有时会送我一本书。”其中有马奎斯·詹姆斯写的山姆·休斯敦的自传《乌鸦》（*The Raven*），不可避免地，还有巴肯的《朝圣之路》。

献殷勤不只是断断续续的，还是非常随意的。他不给她写情书，确实，除了从百慕大群岛寄的一张明信片外，他压根儿没有写过什么，而那张明信片上写的全部文字是：“愿你在此。”跟埃塞尔不同，杰奎琳厌烦政治。肯尼迪带她到海恩尼斯港，强烈地表明了自己意图，他既觉得体面，又是认真的。在看到她的那一刻，大使就决定一定要让杰克娶她。大使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一位政治家必须要有一位妻子（此时，他不再认为自己的儿子是一位从政的议员），而且“一位天主教政治家必须要有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妻子。她应该时髦漂亮。杰奎琳或许比我们在这里见过的任何女孩都出色”。但她心有忧虑，没完没了的游戏、运动和讨论让她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后来她说：“仅仅是看他们运动就让我筋疲力尽。”虽然她现在完全被杰克的魅力迷倒了，但他的态度有时还是会让她感到气恼。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对此也感到迷惑不解，他认为：“要不是如此平心静气，那种咄咄逼人和固执己见的气质，简直就是傲慢。”偶尔会接近于傲慢。1953年春天，他向杰奎琳求婚，并且告诉她，他实际上在一年前就决定要娶她为妻了。只是那时，他还没有做好准备，现在他准备好了。她生气了，突然回了他一句：“你可真够自大的！”

差不多就是在同一时期，你会注意到他将自己的生活分而治之的做法，却不确定他是否是有意为之。当时，他接触的人中有他的家人、爱尔兰的政治家、报社的人、作家、艺术家，也有坚持政治虔诚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上的支持者，他们中有温和派、自由派，也有保守派，还有就是像弗兰克·西纳特拉这种与众不同的人物，西纳特拉那些琐碎的名人八卦让他很开心。通常，他会让这些人彼此分开。比如，在白宫的时候，他就很少邀请鲍尔斯、奥布赖恩和奥唐奈参加在东大厅举办的艳丽夺目的招待会。在有些场合，尽管都是肯尼迪的熟人，却分属不同的圈子，万一碰到，有可能彼此极不友善。直到杰克遇刺后，杰奎琳才真正认识肯尼·奥唐奈。在肯尼迪主政白宫期间，你可能会说，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应该安排在不同的场合和地点会面。他也承认这一点，但他却拿车轮做比喻，他自己是轮毂，其他人则是辐条。“起初是出于直觉。”他说，“我有不同的身份，这是一种有用的方式，可以表达各种的意见，却不会伤及他人。我知道有时会混淆，但对于统御众人却非常有效。要知道，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这样做的。”

他和杰奎琳之间即将确立关系这件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当他突然问你：“你认为娶一个小你12岁的姑娘真的会有很大的问题吗？”你才得到有关此事的第一个暗示。答案是显然的，戴夫和乔·鲍尔斯相差12岁，但他们的婚姻就很理想。几周之后，他给你留下一张纸条，他说：在“再三考虑了所有的事情”之后，他会“在今年秋天结婚。这意味着有着美好前途的政治生涯要结束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它几乎完全是基于古老的性吸引……基于你的实际生活体验，对于此事，我既太年轻，又太老，需要长谈几次，才能了解在最初的6个月里我该怎么做”。你很好奇杰奎琳是否知道跟一位崭露头角的政治家一起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很快，她就略知一二了。让她感到委屈的是，必须延迟到6月13日之后，他们才能宣布订婚，因为在那之前，《星期六晚邮报》要发表一篇标题为“杰克·肯尼迪：参议院年轻快乐的单身汉”的文章。她又再次乘机飞去海恩尼斯港，期望能与未婚夫在海上航行一周。登船之后，她被介绍给另外一位客人，一位《生活》（*Life*）杂志的摄影师。杰克解释说，尽管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但这位摄影师会伴随他们，为记述他们浪漫关系的摄影报道搜集素材，这篇报道是《随一位美国参议员一起出游》。

筹划婚礼是新娘家的事，人称“胡迪”的休·奥金克洛斯主张场面要豪华。1947年，在哈默史密斯农场（Hammersmith Farm），杰奎琳18岁

生日时，他和杰奎琳的母亲珍妮特已经让她在众人面前亮过相了。那天的招待会非常讲究，以致乔利·尼克博克将她选为当年的“名媛女王”。婚礼嘉宾由胡迪的亲戚和朋友承包了，你被临时安排与“左撇子”威尔马思·刘易斯住在一起，他是沃尔波尔的一位学者，因为娶了一位奥金克洛斯家的女儿，他成了杰奎琳的继姑父。当时，杰克的朋友们正到处寻找，想看看活动在哪里举行。地点好像是在纽波特乡村俱乐部，从哈默史密斯农场就能看得到。杰克是那里的会员之一，但因为太忙，无法打完整场高尔夫球比赛，他同意只打几个洞，然后离开，答应之后再回来把你从第18洞处接走。当他离开的时候，球童们似乎有些焦虑。直到打完最后一洞之后，你才会明白其中的原因。尽管杰克说话很有趣，但不无挖苦讽刺。他说：“我希望你能玩得高兴，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新娘的母亲及其风度翩翩的未来女婿之间的关系几乎就要完全破裂了。原来，俱乐部有一个铁定的规矩，非会员只能在会员的陪同下上场比赛，如果没有会员陪同，比赛就要取消。现在，他们知道，自己最担心的事情正在变成事实。他们确信，美国社会精英的最后堡垒之一正在遭到非名门出身的一群野蛮人的入侵。”这伙人还不收敛，又奔向贝利海滨（Bailey’s Beach），玩起了触身式橄榄球和游泳。

婚礼前一天晚上，胡迪在纽波特的克隆贝克俱乐部设宴招待。杰克送给伴郎们的是布鲁克斯兄弟牌（Brooks Brothers）的雨伞，而杰奎琳的伴娘收到的则是带有花押字母的银质相框。祝酒仪式也很平常，杰克说他希望杰奎琳离开报社，因为她在报业的工作对他的政治生涯是个威胁；杰奎琳则高举着她那张来自百慕大群岛的明信片；鲍勃那时仍旧害怕讲话，结结巴巴地讲完了一篇事先准备好的讲稿。那天晚宴最令人难忘的是“红费伊”（前文提到的保罗·费伊，他是肯尼迪的好朋友）的事。在杰克妹妹的婚宴上，这个又被称为“红头发”“老可爱”的家伙已经担任过三次主持人了。在征求了杰克的意见之后，他说新郎的第一次祝酒应该献给新娘，这很重要，“当酒杯喝干之后，谁也不能再用它们喝酒。必须马上把它们扔到壁炉里”。这可能是“红费伊”在加州社交圈子的风俗（也可能是作为杰克特殊幽默感受害者的他想到的一种报复行为），却不是纽波特的风俗；宴会上用的高脚杯已经在胡迪家传承了几代人。当看到它们被打碎时，他惊得下巴都快掉了。新的雕花玻璃高脚杯拿来了。然后，杰克灵机一动，说道：“可能这里不接受这种风俗，但我想再次表达我对这个姑娘的爱。”它们又被扔进了壁炉，胡迪惊呆了，开始为自己要求更换酒杯找理由。这次换杯花了他很长时间。当第三批酒杯送达时，不禁让人怀疑，它们看上去像是从伍尔沃思商店买的。

1953年9月12日，周六，大主教库欣在圣玛丽教堂主持杰克和杰奎琳的婚礼，二人结为夫妇。新娘吃惊地发现，新郎脸上竟有很深的擦伤，因为他一大早起床又去玩了一会儿触身式橄榄球。那天，教堂里面来了600人，外面至少还有6000人。小两口离开招待会，赶往墨西哥南部港口城市阿卡普尔科度蜜月，经过两个小时的奋战，杰克在那里抓住了一条9英尺8英寸[注]的旗鱼，后来，这条鱼的标本被悬挂在了他参议院办公室的墙上，再后来，又被挪到了白宫西厢办公室的墙上。当时，他已经买下了希考里山庄（Hickory Hill），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弗吉尼亚式的红砖大宅就在波托马克河的对岸。他和杰奎琳都向往着养育一大家子人的生活。他们似乎没有做什么错事，第一年也几乎诸事顺遂。杰奎琳不幸流产了，她的产科医生说，以后，她可能会有生育困难。在参议院，她的丈夫也正在面临挑战，应对乔·麦卡锡的谴责。麦卡锡必定蒙羞，杰克知道这一点，但这个做法可能很不受其选民的欢迎。全美范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持续发现，只有29%的人口不赞成威斯康星州的这位参议员，在马萨诸塞州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徒中间，这一数字还要更低。正如戴夫当时所说："在我认识的人中，乔·麦卡锡是唯一能够在波士顿南区选战中打败库欣大主教的人。"终于，肯尼迪的脊椎病恶化了。离开了拐杖，他寸步难行。

1954年，整个夏天，他都无法参加活动。唯一的希望就是手术，移除1944年由海军医生插入的一块金属板，再融合分开的椎骨。医生一致建议不要手术。因为杰克的肾上腺功能不全，大手术之后，休克和感染就可能会要了他的命。他们说，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他能幸存下来的机会也只有50%。而病人却说，他愿意冒此危险。他猛地一拳打在拐杖上，说道："我宁可死，也不愿意余生靠这个活着。"10月21日，在纽约专科医院，医生尝试对他进行一次腰椎手术，但没有成功。不出所料，发生了感染。牧师进行了临终祈祷。之后，他恢复了元气。12月20日，他躺在担架上，杰奎琳陪在他身旁，来到他父亲位于棕榈滩一处用白灰泥粉饰的优雅别墅，在那里过圣诞节。他躺在紧靠南露台的希腊式漂亮的水池旁，望着长有高大皇家棕榈树的防波堤深思，沉浸在自己内心的躁动之中。

转眼到了1955年1月，鲍勃打电话给"红费伊"，请他陪杰克待上10天。"红费伊"发现杰克痛苦极了，强迫自己阅读，并记下书中描写丘吉尔的一些段落。"老可爱"注视着他的朋友给自己打针，为了活跃气氛，他说："杰克，从你用那玩意儿捅自己的方式看，好像不痛。"在他能够

躲开之前，肯尼迪伸过手来，把针扎到了费伊的腿上。“老可爱”疼得尖叫起来。杰克淡淡地说：“就跟我的感觉一样。”

2月，他又被飞机拉回纽约，再次接受手术，只不过这一次，局部取得了成功。如果你在那时到医院拜访他，看到他换衣服的情景，你会不得不屏住呼吸，他背上的洞大到你可以伸进拳头，而且深到手腕。返回大使在棕榈滩的住宅后，他被送进紧靠露台的房间。杰奎琳则住在邻近的一间，日日夜夜，从来不曾远离，免得听不到他求助的喊叫。通常，大使也会待在离他不远的“牛棚”里，这是一间日光浴室，周围是砖坯砌成的高墙，他在里面一丝不挂，通过电话操纵着自己的大买卖。

肯尼迪从来没有丧失对写作的兴趣。在国会山工作期间，他为期刊写过几篇文章，这些杂志有《麦考尔》杂志（*McCall's*）、《大观》杂志（*Parade*）、《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和《外交政策通报》（*Foreign Policy Bulletin*）。他在棕榈滩的房间里堆满了装书的纸箱，里面是从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借来的书。它们都是根据他的指示由其行政助理特德·索伦森送来的。早在第二次手术之后、在纽约休养期间，杰克就反思过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职业生涯，由于在一个原则性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不受人欢迎，他丢掉了自己在参议院的席位。其他的一些政治家也因为不愿意向民意低头而牺牲了他们的事业。起初，杰克想为杂志写一篇关于他们的文章，后来决定按照这一主题写一本书。因为被束缚在床板上，连续入睡时间不会超过两个小时，他便阅读起索伦森送来的那些书，研究朱尔斯·戴维斯和詹姆斯·兰迪斯给他的回信，朱尔斯是乔治城大学的教授，而詹姆斯是哈佛法学院已经退休的院长。然后，他用那只没有绑住的且被远远隔开的手开始写作，用的是那种白色的法律文书用纸。但进展很慢。他时不时地要暂停，划掉某些句子或段落，再在空白处写上要插入的话。每准备好一章，他就会向秘书口述草稿。如果他的身体虚弱到无法拿着书看，杰奎琳和戴夫·鲍尔斯就轮流读给他听。1955年5月初，他拿到了一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手稿，并把它交给了哈珀兄弟出版公司（Harper Brothers）。在他为每一章各写了一个简短的逸事趣闻开场白之后，该书稿被出版社接受。艾伦·内维斯对哈珀兄弟出版公司说：他认为该书为美国历史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并亲自撰写了前言。肯尼迪将此书定名为“当仁不让”（*Profiles in Courage*），并于1956年初出版，他把该书献给了杰奎琳。

1955年3月，初步迹象表明他已部分康复，大家也都看在眼里。他

可以从床上起身，下地走路，不用拐杖的支撑也可以走到游泳池边的一把椅子那里，距离大约有50英尺远。第二天，他走过草坪，来到海边。站在那里，咸咸的海水拍打着他那赤裸着的双脚，他开怀而笑。

5月23日，他乘飞机来到华盛顿，没有理会放在舷梯底部的拐杖和轮椅，乘车去国会山参加记者招待会，美国两大政党的领导人林登·约翰逊和威廉·诺兰在参议院热情欢迎了他。杰克的办公室是参议院大厦362房间，现在，那里正有一大篮子水果在等着他，并附上卡片："欢迎回家。迪克·尼克松(注)。"

他从来没有摆脱过疼痛，然而，他所患疾病的真实情况，外界并不了解。他的肾上腺功能不全导致社会上传言他患上了阿狄森氏病。在1960年的美国民主党全国大会上，一些约翰逊的支持者到处散播肯尼迪"得病了"的消息，并强烈地暗示他得的是花柳病。实际上，阿狄森氏病患者只是身体虚弱和易于疲劳而已。但是，肯尼迪一天可以忙活20个小时的竞选活动，日复一日，有时工作起来彻夜不眠，比他团队中最年轻和最健康的成员都要拼命。不过，他确实必须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因为肾上腺功能不全，他每天下午都要服用两片药。按照要求，他要一直佩戴着帆布制的脊柱支具，左脚的鞋里加了一个1/4英寸的医用增高垫。他在坐下时，如果可能的话，椅子最好能是摇椅。晚上，在他睡觉的垫子下面还要加一个床板，如果弄不到床板，就要把床垫搬到地板上。他一天需要洗三次热水澡，午饭后要在一个加热的垫子上休息一会儿，之后，还要严格听从纽约医生汉斯·克劳斯的嘱咐，做一系列的健身体操。在他无法忍受痛苦时，能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得到缓解的是珍妮特·特拉维尔医生发明的独特疗法。这位医生将一个长长的空心针推进到让他痛苦的组织，用盐酸普鲁卡因浸泡它，由此使其肌肉放松。曾经有一次，当这位医生在拜访肯尼迪家族时，杰奎琳问她是否能给他打一针，使其完全缓解痛苦。特拉维尔医生回答说："可以。"有这样的针，但会让他腰部以下完全丧失知觉。杰克咧着嘴笑。他说："我们不能打那种针，是不是，杰奎琳？"

长期以来，美国人对知识分子以及诸如此类人的定义让人无法理解。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哈罗德·拉斯基，出版过两本有名的书，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在交谈中能够引经据典，这样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却不被认为是这个国家知识界的一员，似乎是不合常理的。

然而，肯尼迪就是没有资格入选。有一位学生对文学的象征主义困惑不解，有人还记得威廉·福克纳在回答这位学生时说的话："这个问题你得去问一位知识分子才行。我只是个作家。"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自由主义者，在战后的政治家中，唯一博得他们好感是阿德莱·史蒂文森。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跟阿德莱是关系很近的好朋友，了解其保守的秉性，对此自然不会有什么怀疑，但假如他当选总统，其保守的一面就会被公之于众，最多6个月，知识分子就会对他大失所望。

知识分子从未对肯尼迪抱有过幻想，他也没有对他们抱有过幻想。肯尼迪认为他们会给史蒂文森在政治上招惹麻烦，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认为，对自由的虔诚会跟盲信一样狭隘。在被问及其政治理念时，他引用了希腊人对于幸福的定义："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你的能力。"在被逼问如果当上了总统，他会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时，他答道："我希望是负责任的。"知识界仍然持怀疑态度。在他步入白宫之后，他们就表现出了对他的不赞同或排斥。赖特·米尔斯把他看成是"权力精英"的一员，米尔斯后来写道：肯尼迪让他"羞为美国人"。艾尔弗雷德·卡津认为，肯尼迪"敏锐地意识到了知识分子能做什么"与"悲惨的结局没有关系，并且对它们的解决毫无贡献"。卡津写道：钦佩杰克和因得到他的赞许而沾沾自喜的作家是被操纵的牺牲品，甚至在1960年以前，当领先者的身份渐趋明朗时，埃里克·塞瓦赖德在波士顿《环球报》（*Globe*）上撰文，称候选人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区别。塞瓦赖德总结道："'管理革命'已经涉及政治，尼克松和肯尼迪就是其第一批完全包装好的产品。"

《当仁不让》对于让自由主义者重新树立信心于事无补。他们尖锐地指出，肯尼迪挑选出来加以表扬的这些政治家之一是罗伯特·塔夫脱，将塔夫脱纳入本书的理由是他反对纽伦堡审判，却忽视了他的这一立场并不受人欢迎。肯尼迪写道：塔夫脱"就像哈里·杜鲁门一样效忠自己的政党，碰巧他们俩都有从繁纷复杂中看到事物积极光明一面的天赋。但那些看到类似景象的政治家却感到沮丧和忧心忡忡"。在这本书获得普利策奖后，批评肯尼迪的人声称，那根本不是他写的，手稿是枪手代劳的。由于这些不仁义的谣言只是在鸡尾酒会上散播，因此作者也是无能为力。1957年12月7日，德鲁·皮尔逊在美国广播公司"迈克·华莱士访谈"节目中担任嘉宾时重提此事，因没有掌握好尺度，跨越了雷池，变成诽谤。杰克决定起诉。"我别无选择。"他说，"这等于是在怀疑我写书的能力、署名的诚实性和获奖的正直性。"证明真实性其实并不难。杰克的

第一稿草稿还保存着，而且证人也不少：在棕榈滩照顾病人的护士、听肯尼迪口述的秘书、“红费伊”和戴夫·鲍尔斯这样的拜访者。皮尔逊认定枪手是特德·索伦森，他是肯尼迪议员的立法助理，他为杰克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借参考书，并且负责把它们送到佛罗里达。美国广播公司的律师在盘问了索伦森后，承认是参议员自己写的书，研究者和编辑只是提供了协助，而且杰克已经在序言中对帮助过他的人表达了谢意。索伦森签署了一份誓词，肯定了这一点，之后，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和皮尔逊双双道歉，公开收回了那些不实之词。

在美国首都地区散播的下一句讽刺话是：“肯尼迪应少出风头，多拿出点儿勇气。”言外之意，杰克在国会山期间畏首畏尾很是愚蠢。对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抨击，使他在当上参议员后又一次成为新闻人物。他一次又一次地对其选民的地区性呼吁保持沉默，而是将美国的利益放在了前面。他支持关闭沃尔瑟姆的墨菲综合医院，使得1200名马萨诸塞州的选民失业。蓝领工人的选票对任何民主党人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他在参议院带头对工会诈骗展开调查，《纽约时报》宣称：这提供了一个有关妥协艺术“最富技巧的出色案例”。工会在他公开来访时组织大家联合抵制，甚至用栅栏围住，不让他进入。虽然他不是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ADA）的成员，但该组织和《新共和周刊》（*New Republic*）却给他的立法政绩打了80～90分。尽管有大量的信件强烈要求他不要这样做，但他还是赞成艾森豪威尔的国际贸易自由化计划，表示不再对《退伍军人权利法案》（*BI Bill*）效忠宣誓，赞成向南斯拉夫和波兰的共产主义政权提供援助，赞成美国与加拿大共同致力于建设圣劳伦斯航道。一任又一任的美国总统都在寻求能让美国国会通过此计划的方案，却全都受阻于地方利益，而反对者的中坚力量就是来自马萨诸塞州。肯尼迪的议员席位所代表的码头工人反对圣劳伦斯航道的建设。在2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哪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众议员或参议员曾经对该议题投下过赞成票。然而，杰克这样做了，他相信，虽然这对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区是一个打击，但它会为整个美国带来丰厚的回报。波士顿当地的报纸称他是“自寻死路的参议员”。

最棘手的问题是麦卡锡主义，它在他成为参议员之前的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被提出，而且自由主义者会一再拿它找他的麻烦。这会严重伤及大多数参议员，对肯尼迪更是如此。1954年12月2日，当美国参议院以67票对22票通过决议，谴责乔·麦卡锡的做法时，杰克在国会山的记录是“因为有病离开参议院而缺席”。事实上，他不仅住了院，而且还出现

在了病危者的名单上。没有人责备他装病号以逃避职责，但在埃莉诺·罗斯福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看来，他之后仍应当记录下自己的投票，并且应当经常公开反对麦卡锡蛊惑人心的煽动，而且是要猛烈地批评。记录被弄乱了。就像其他参议员一样，肯尼迪同意为调查委员会提供资金，而当时这个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就是麦卡锡，那个时候，自由主义者的权力和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之间存在冲突，在没有明确的计划表明如何才能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时，肯尼迪选择了美国国家安全。然而，他反对麦卡锡想要寻求的所有任命，并且在1954年8月，准备发表一次演讲，呼吁谴责麦卡锡。只要他身体允许，他就会发表。问题在于，无论他以后是否向新闻界发表演讲，他都要澄清是非。但他没有，而且在接下来的烧烤晚宴上打扮成记者唱歌，要知道，这里可是华盛顿的记者嘲笑戏弄政客的地方，而他是以《克莱芒蒂娜》（*Clementine*）的曲调演唱的：

> 你在哪里，约翰？你在哪里，约翰？
>
> 当参议院谴责乔的时候？

麦卡锡是一个愤世嫉俗的“黑爱尔兰人”，跟柯利一样性格暴躁，却没有“紫色三叶草”的可取之处，就这一点而论，他对杰克所代表的一切都是一种侮辱。但是，肯尼迪家族还是卷了进去。鲍勃曾短暂地做过麦卡锡的工作人员，在与罗伊·科恩打了一架之后，他辞职了，有些美国人相信共产主义者已经逐渐渗透进美国政府，而“尾炮手乔”是知道如何将他们赶出去的人，大使就是这些老古董之一。大使曾经邀请乔到海恩尼斯港过周末。现在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但麦卡锡当时有一种粗野的魅力，即便是像理查德·罗维尔那么机敏的记者也承认，在长时间的采访之后，离开参议员办公室时，已完全意识不到他已经“被某一位大师改变了、说服了和欺骗了”。尽管如此，乔仍旧是海恩尼斯港的客人。或许，杰克应该坦诚地告诉朋友，对他来讲，抨击麦卡锡可能“有点儿不情愿”。还有一次，他告诉你：“如果我在麦卡锡受到谴责之后给他额外的一击，而且把这件事小题大做，我就不值钱了。”他后来随口说过的一句话要比这句话更让人信服：“见鬼，我在马萨诸塞州的选民中，有一半人都把麦卡锡看成是英雄。”虽然不够勇敢，但他的表现并没有让他丢脸。让人不解的是自由主义者随后表现出的强烈不满，而且永远不曾消退。休伯特·汉弗莱提出了一项将共产党视作非法的议案，这种行为是对麦卡锡主义彻头彻尾的奴颜媚骨。不过，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很快就原谅了休伯特，不满也很快就抛到脑后去了。

1956年7月，因为有一位共同的朋友要结婚，杰克邀请你跟他一起开车去纽波特。旅途中，他似乎心事重重，当你问及此事时，他解释说他正在斟酌一个问题，即是否应该设法在8月份召开的美国民主党全国大会上争取副总统的提名。他父亲对此强烈反对，指出史蒂文森会输掉竞选，如果杰克上了候选人名单，就会因为反天主教情绪而挫败。你赞同大使的意见，有可能这是你生平第一次这么做。但杰克并不很肯定。他认为这可能是向前冲刺的良机。

实际上，受其朋友热情的推动，肯尼迪为竞选副总统的造势活动已经开始。在他抵达芝加哥康拉德的希尔顿酒店时，志愿者正在分发肯尼迪的小徽章和旗帜，而杰奎琳当时因为怀孕了，正跟施赖弗夫妇待在附近。《芝加哥太阳时报》（*Chicago Sun-Time*）刚刚发表了一篇称赞他的文章，而且每位代表都收到了一份。很多杰克在国会山的同事正在对各自州的代表团成员进行游说工作。新罕布什尔的票在初选时已经许给了埃斯蒂斯·基福弗。新英格兰地区代表团的其他人非常倾向于支持杰克，他们推举阿贝·里比科夫为代表团的领头人，并与他一起开了早餐会。三位新英格兰地区的州长正敦促阿德莱挑选杰克作为其竞选伙伴。在听取了本党“老资格们”的建议之后，杰克拜访了埃莉诺·罗斯福，结果证明，这个主意很糟糕。她当着一屋子代表团成员的面训斥他，嫌他在麦卡锡主义这件事上表现软弱。

大会进行的第三天，消息传来，说是肯尼迪不在考虑之列。他拜访了史蒂文森，史蒂文森要求杰克提名他当总统候选人。似乎传言得到了证实，依照传统，总统候选人提名者不能插手副总统候选人的选择。后来，杰克告诉你：“我想事情解决了，不是特别的不愉快。”史蒂文森很快便提名杰克当副总统候选人，阿德莱的提名随之让整个大会为之一振。在艾森豪威尔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经两次受到疾病的折磨，史蒂文森并没有提及艾森豪威尔，但当他告诉代表们：“如果当选总统蒙主恩召不能干满一个任期”，认真考虑谁将入主白宫就是他们神圣的责任，没有人不明白他的言外之意。在经过认真的考虑之后，他“决定抛弃过去的先例。副总统被提名人应在本次大会上自由投票选举”。

如此一来，非但没有带来自由，反而造成了混乱。代表们必须去芝加哥选择总统候选人。没有人参加过副总统的初选，没有人达到担当此任的资格要求，他们猜测这一次会跟过去的大会一样，看谁排在候选人

名单的头一个就选谁。随着木槌在美国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的再次落下，副总统竞选入围者产生了，他们是埃斯蒂斯·基福弗、艾伯特·戈尔、罗伯特·瓦格纳、休伯特·汉弗莱和约翰·肯尼迪。里比科夫用一次清晰有力的演讲将肯尼迪的名字加进了候选人名单。佛罗里达州的乔治·斯马瑟斯也支持该提议。他们还需要另外一位支持者。鲍勃找到了约翰·麦科马克，他就站在大会会场外，相隔10英尺远，鲍勃告诉麦科马克：如果他肯帮忙，杰克会倍感荣幸。麦科马克感到吃惊。就在几周以前，肯尼迪刚刚打败他，接管了马萨诸塞州的政治机器。他开始讲话：“好吧，他很好。”他的话突然中断，因为鲍勃几乎是把他拉到了讲台上。此时，杰克正在他的指挥部里看电视，当看到他刚刚在家乡打败的这个人在所有美国人面前吹捧他的时候，惊得目瞪口呆。

第一轮无记名投票的结果是基福弗483.5票，肯尼迪304票，戈尔、瓦格纳和汉弗莱远远地落在后面。第二轮投票，肯尼迪的优势就变得明朗起来。他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又获得了126.5票。当林登·约翰逊用颤抖着的声音宣布得克萨斯州56位代表将选票全都投给“打过仗、身上有伤疤的参议员……马萨诸塞州的约翰·肯尼迪”时，杰克正在浴盆里泡他的后背。肯尼迪现在跑到了前头。在提名需要的651.5票中，他得到了618票，而基福弗总共只有551.5票。特德·索伦森赶了过来，伸出了他的手。“祝贺你，杰克。搞定了。”肯尼迪答道：“不，还没有。”他开始在电视机前平静地穿衣服。

此时此刻，有两个因素变得至关重要。显示计票结果的大屏在前天晚上被拆除了，因此代表们无法获知肯尼迪还差多少票才能取胜。另外一个因素是大会主席萨姆·雷伯尔尼，他是该党最精明的政治家，人称“萨姆先生”。萨姆先生望向一大片的代表，看到闹哄哄的会场上，十几个代表正挥舞着各自州的标识牌，希望引起重视。他们想改投他人，但一切取决于主席会选择他们中的什么人。他知道南卡罗来纳州、伊利诺伊州和亚拉巴马州想要改投肯尼迪，而田纳西州、俄克拉何马州和明尼苏达州正倒向基福弗。麦科马克了解到密苏里州已经决定不再投戈尔，而是要先确保基福弗进入候选名单。可能是感觉被鲍勃粗暴地对待和利用了，麦科马克从一个过道里叫道：“萨姆！萨姆！密苏里！”雷伯尔尼本人并不是肯尼迪的热情支持者，他准许密苏里州的代表发言，片刻以后，肯尼迪知道，一切都结束了。他用右拳狠狠地砸向左掌，说道：“就这样了，我们走吧。”他出现在讲台上，咧嘴大笑，说了一番机智、大度的话，提议鼓掌表示通过基福弗获得提名。代表们欢呼着表示

赞同。

正是在那一刻，他成为一位美国全国性的政治人物，而且是在一个理想的情况下做到的这一点。他对基福弗的大度支持赢得了无数人的心，既然他不在候选人名单，11月份的输赢跟他就没有关系了。然而，身在芝加哥的他并没有看到这些。虽然只有一少部分人知道此事，但被人打败，还是让他感觉很窝火。他感到了怨恨和背叛。这是他在天主教徒云集的马萨诸塞州之外的第一次政治角逐，他怀疑自己成了偏见的牺牲品。他感觉被某些州的政治头子给耍了，这种感觉更可信。宾夕法尼亚州的戴维·劳伦斯和新泽西州的罗伯特·迈纳向他保证，会在最后关头改变立场。每当各州的领导人要宣布投票结果时，他们的声音几乎都会被支持肯尼迪的代表愤怒的尖叫声淹没。

此后，他离开科德角，进行了一次长距离的航行，通过把这些事讲给别人听，他沮丧的心情得到了部分消除。尽管他仍感到不快，但在其平静的声音中，已听不到那种自怨自怜的感觉。相反，他的说话方式开始极尽讽刺感。他偶尔会问你是否想过放弃写作，而去追求政治。“如果那样的话，”他缓慢地说道，“你就要准备在劳德代尔堡忍受高温，乘坐一辆车内温度接近34摄氏度的轿车，或者在佛蒙特州的贝洛斯福尔斯和爱达荷州的特温福尔斯忍受严寒，顶着零度以下的冷风乘坐一辆敞篷车……但这只是一部分。还要准备好……听到你的政绩被曲解，以及你公开讲的话被歪曲。（在芝加哥）我几乎不认识自己了……一个邪恶的、反动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他反对农民，反对工人，成了靠不住的民主党人、教皇的奴隶、一个快要死的人，最为不利但确定无疑的是，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如果你成为候选人，你必须时刻记着，说出的话要体现知识水平，不管你的听众受过什么教育、智商有多高或者读写能力怎样，还要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听得懂。”的确如此，他开始开心起来，说道：“我们的党选择了一位完美的人当副总统候选人。得克萨斯的一位代表跟我解释说，基福弗的秘密在于他让得克萨斯州最无知的白人感觉自己挺优秀。不用指责他，这是一种技巧，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史蒂文森发现有必要发错‘elite’（精英）这个词的音。”他略作停顿，但并不准备放弃这个话题。现在是顺风航行，他说：“尽管如此，我喜欢。不是弄虚作假，而是要学会用选民的语言跟他们交谈。史蒂文森并不喜欢这个。他非常想要当总统，但他厌恶搞竞选活动。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不同，这很重要。”后来，在他父亲的门廊里休息时，他平静地说道：“芝加哥教会了我很多。现在我知道了，在你完全变成一位政治家之前，你

是不会在公共生活方面有很大进展的。这意味着你必须做交易，不仅要与选民，而且还要跟政党的领导人达成共识。从现在开始，我要成为彻头彻尾的政治家。”

就在这时，他的父亲现身，听到了最后这几句话，他笑逐颜开。“你知道刚才我跟你妈妈说什么来着？我问她是否注意到在那次愚蠢的竞争之后，你有没有掉过眼泪。仍然没错：肯尼迪没有哭。”他补充说，而这是你第一次听到这些内容，“别发疯，要平和。”杰克点点头，“这周我已经收到2500多次的演讲邀请，我准备接受其中的144次。你看到《先驱论坛报》上对我的报道了吗？”纽约的《先驱论坛报》始终不渝地忠于共和党的事业，它是肯尼迪的麻烦制造者。他的父亲点点头，报道基福弗获胜的文章已经见诸报端：“著名的肯尼迪今天不走运。”杰克说：“只做了大约4个小时的工作，还有为数不多的支持者，我差33.5票就能赢得提名。如果我再努力4年，我应该会有所收获的。”几天之后，当一位参议员同事告诉他4年以后他准能当上副手时，肯尼迪很快说出了下面的话：“我再也不会竞选副总统了，我要竞选美国总统。”在下一次的烧烤晚宴上，有人扮演约翰·肯尼迪，唱道：

我们的一切，为什么不带走我们的一切？

难以置信——离开我们你就活不了，

我儿子杰克走在队伍前头，

然后鲍勃走来，准备接班……

在那些年里，杰奎琳始终缺乏政治上的悟性，让人惊讶的是，后来她竟然承认了这一点。她从没有像埃塞尔那样调整自己，以适应肯尼迪家族，但她要比特德(注)的妻子琼跟这个家族靠得更近。很少有妻子经历过杰奎琳在1956年所经受的那种考验。她赶到芝加哥，满心期待着一个令人兴奋的旅程，但一周下来，她感到的只有痛苦和无聊。大多数时间，她都是坐在施赖弗家的公寓里，盯着电视屏幕看节目。她去过大会为贵宾预留的包厢两次，坐在那里，看着会场里的一片喧闹，她完全无法理解。杰克有时会路过，但他非常紧张、沉默寡言和筋疲力尽，显然，他忙得团团转，以致他们只说了几句话。作为一位怀孕7个月的孕妇，她想当然地认为，一旦这种闹哄哄的“马戏表演”结束，她和自己的丈夫就能一起度假了。但让她感到失望和愤怒的是，他告诉她，最终结

果出来以后，他要乘飞机去里维埃拉（Riviera），跟他父亲一起休假两周。他建议她待在纽波特的奥金克洛斯家。杰克知道生孩子对她来说有困难。他理应预见到这一点，事实上，她的确陷入了困境。

当纽波特的珍妮特·奥金克洛斯打来紧急电话时，肯和海伦·奥唐奈正在海恩尼斯港，与鲍勃和埃塞尔已经玩了好几天。珍妮特早产，是个女孩，但没能活下来。杰奎琳的情况危急。鲍勃试图通过越洋电话通知他的哥哥，但杰克已经出海航行，在他返回之前，没有办法联系到他。鲍勃驱车赶到医院，日夜陪伴在他嫂子的床边，直到他哥哥赶来。从那以后，杰奎琳就时常会充满感情地说："鲍勃总是在你需要他时，出现在你身边。"肯尼迪被暗杀之后，当"空军一号"从达拉斯返回时，鲍勃把车开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藏在一辆军用卡车后面，一直等到飞机降落。飞机停稳以后，他跳出车子，陪伴在杰奎琳的身旁。她已经泣不成声，说道："噢，鲍勃，你总是出现在需要你的地方。"

等到她恢复至能下地走动的时候，杰克就把她从医院接回了家，并领她到父亲的门廊，让她躺在一把休闲椅上。然后他、鲍勃和肯开始谈论政治。她告诉一位朋友："看看杰克的样子，政治有点儿像是我的敌人。"有朋友认为没有孩子可能会让他们的婚姻破裂。那个秋天，确实出现了不稳定。作为一个政治名人，他不得不在美国各地往返奔波，充当史蒂文森的代言人，尽管事实让他确信自己的领导人会败选。

11月6日，艾森豪威尔用一场势大力沉的胜利打碎了史蒂文森的梦想，胜利的优势累计接近1000万张选票。出乎意料，参议员和约翰·肯尼迪太太再次成为快乐而情投意合的夫妻，而原因与败选毫无关系。对此的解释有好几种。他被华盛顿的政治圈子赋予了新的期望，他们到处受到邀请。杰奎琳则与丈夫朋友的妻子们结交，虽然她最亲密的朋友仍是她的妹妹李，但她发现，她新认识的人也同样令人愉快。他获得了普利策奖，被授予荣誉学位，入选哈佛大学监事会，并且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本来，他们计划会有一大家子人，可现在看来，计划确实赶不上变化，为了适应这个现状，杰克和杰奎琳将希考里山庄卖给了鲍勃和埃塞尔，当时，鲍勃和埃塞尔的第5个孩子刚出生不久。他们则搬进了一幢红砖砌就的联邦式房子，它坐落于乔治城N街，还带有一个舒适的后院。

1957年，他们得到的最大礼物是一个女儿，生于11月27日，虽然杰克从来没有对其他人的孩子产生过兴趣，但对于卡罗琳，他还是表现

出了极大的关切，尽管事实上，持续不断的竞选活动常常让杰奎琳独自在家带孩子。她成为乔治城一位普通的妈妈，穿着各种长及小腿的裤子——紧身的西班牙斗牛裤或者女式紧身长裤，用小推车推着她的宝贝女儿，在附近的小公园里跟小宝贝一起玩耍。现在，她学会了如何自如地应对记者的问题。结婚以后，她的丈夫有什么变化吗？“我觉得他比我想的要认真。”她学会分享肯尼迪对体育活动的热情了吗？“没错，我正在学习打高尔夫。”这并非事实。她正设法学习，但她的指导老师，即她的丈夫却不称职。有一次，她就在沙坑障碍中陷入了困境。她一次一次地猛击，但于事无补，球会径直再滚回沙子里。“让我做给你看。”杰克说，“自信地跨过去。”他摆出一个优雅的姿势，完美地挥出一杆。球前进了8英尺，然后又回到原先的位置上。“看到了吗？”杰克一边说，一边把球杆递给她，“你就这样打。”

她很乐意跟别人一起看电影，在当年的那些电影中，她看过并且喜欢的有：费里尼的《大路》（*La Strada*）、迈克·托德的《80天环游世界》（*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和《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比利·怀尔德的《控方证人》（*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杰克·克莱顿的《金屋泪》（*Room at the Top*）、德尔伯特·曼的《鸳鸯谱》（*Separate Tables*），以及理查德·布鲁克斯的《朱门巧妇》（*Cat on a Hot Tin Roof*），还有希区柯克的《迷魂记》（*Vertigo*）。在装修房子这件事上，杰克给了她充分的自由，她选用了18世纪的家具和绘画风格。他会对衣服的价格发几句牢骚，而她会改变预算，以隐瞒冲动之下的购物。她发现两块价格不菲的小地毯，买了下来，然后，她在账单上把它们改成书籍，以防露馅。杰克喜欢这两块小地毯。后来，他发现她做了什么手脚，但此时更多只是感觉好玩，而不是生气。无数的夫妇都玩过相同的游戏。杰奎琳理应永远乐此不疲地玩此游戏，但她攀上的是一颗政治明星，而且这颗新星正在冉冉上升。

他向最高位置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可能要算1958年为参议员连任发起的竞选活动了。他的连任竞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也成为他的部分难题。为了给本党的美国领导人留下印象，他必须将自己的选票拉升到压倒性的程度。但在民意调查公布之前猜到结果的注册选民很可能会待在家里。因为杰克正在全美四处发表竞选演说，支持其他地方的民主党候选人，他在马萨诸塞州的竞选活动被限制在17天以内。在其他州，他并不总是受到热烈欢迎，在当时的年代，作为政治家，到处为公民权利和取消种族隔离呼吁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但在小石城（Little

Rock）发生学校种族融合危机之前，肯尼迪已经接受了密西西比州的邀请，现在不能食言。密西西比州共和党主席向他发起挑战，让他阐明对种族融合的观点。面对听众，肯尼迪说道："我在波士顿说过同样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这位共和党主席，那就是：我认为在这片土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他指出，这意味着，他认为想要实现种族融合的学校做得对。

由于鲍勃、拉里和肯尼的积极活动，再加上另外一位有常春藤盟校背景的爱尔兰人迪克·多纳休的支持，杰克的连任竞选掀起了高潮。奥布赖恩是一个安排行程的奇才。通常，典型的一天是这样结束的：他会骄傲地说："我们拉着参议员在15个城镇出席了15场演讲会，从切尔西到格洛斯特，并且在晚上11点把他带回床上睡觉。"在黑弗里尔饭店后面的一间屋子里，一顿午饭期间，杰克就口授了大约25份任命，本来，这些工作他是想在当天下午结束时再完成的。杰奎琳的观察力总是很强，她不无疑惑地看了一眼肯尼，说道："你总是在记一些东西。但我们离开饭店之后，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看一眼那个便笺本。你做过他想让你做的那些事情吗？"奥唐奈说："从未做过。我会等他平静下来，然后，把那些笔记从便笺本上撕下来扔掉。"她笑了。杰克没有笑。他平静地看了一眼肯，说道："你这兔崽子。我相信这正是你要做的事。"肯回答说，团队中必定有人负责，他说得没错。在与当地的高官显要相互认识时，杰克会开最让人吃惊的玩笑。他会说："阁下，你见过鲍尔斯议员吗？"或者"市长先生，很高兴给你介绍费伊大使。"又或者"州务卿先生，我想介绍你认识一下班吉·布拉德利将军"。他积习难改。一天下午，在靠近哈默史密斯农场的地方，他被一群修女团团围住，他用最真诚的声音说："你们知道吗？杰奎琳老想去当修女……她读过修道院学校，真的打算担任圣职。"当他告诉她们这番话时，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是，天啊，他以她为荣！他相信如果这些话能传到下一个镇子，说她会跟他一起参加竞选活动，参加集会的人数会加倍。确实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是翻两番。他们会沿着一条主要街道与人互动，她负责一侧的人行道，而他就会选择另一侧的人行道。他会时不时地向这边扫一眼，带着假装出来的嫉妒说："瞧，她吸引的人是我的两倍，跟平常一样。"他让这种比赛听上去轻松愉快，事实上也是如此，但在这种彼此玩笑打趣和说些奉承话的轻松气氛下，他的竞选团队却在展开地毯式的拜

访，确保所有角落无一遗漏。这部分的竞选活动是外人永远看不到的。它很累人，志愿工作者要非常辛苦地逐门逐户拜访，每个镇、每个县都要拉选票和签署竞选承诺。在竞选前夜，杰克跟几位朋友在波士顿快速地转了一圈，那是一个雨夜，如果你既没带雨衣，也没有雨伞，那你就只能淋雨了，他们只好躲进了蓝山大街上的G＆G熟食店里，这里位于多彻斯特的犹太人居住区。杰克、鲍勃和特德累得不想说话，他们吃力地趴到一张桌子上，唱起《我的心肝宝贝》。他们唱得很难听，全都跑调了，声音沙哑，就像破锣。他们甚至无法保持旋律。但如果那天晚上你也在那里的话，会永远都忘不了，或者永远不会不记得当选票数量开始滚动变化时，你们的那种兴奋劲儿。他们简直不相信。有接近200万选民去了投票站，创下了非大选年选举的纪录，肯尼迪赢得了73.6%的选票，这是当年美国所有议员候选人赢得的最大比例的多数票。它完全达到了肯尼迪的期望。罗斯科·德拉蒙德在《先驱论坛报》上写道：虽然民主党横扫美国，但肯尼迪胜利的意义最大。另外，德拉蒙德指出，新教徒对天主教徒候选人的抵制曾被几代政治家所接受，甚至被当成了一个信条，但现在已经减弱，或许一起消失了。他以在明尼苏达州参议员选举中尤金·麦卡锡胜过爱德华·赛伊为例称，“一位天主教徒在新教徒所在的州打败了一位路德教徒”。

两年多来，杰克经历了一位潜在总统候选人的整个过程。这让他产生了兴趣，但还远未成为他唯一的选择。离美国全国代表大会还差20个月，就有其他七八位公众人物开始试探政治气候了，他们雇用民意调查人，并且四处演讲，以期赢得有钱有势、有权支配要职任命的政界要人的真诚支持。多数有“波托马克热”[注]症状的人都会对这个主意掂量一会儿，仔细考虑考虑，认真评估其对公众的吸引力，直到时间和事件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才会做出决定。肯尼迪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和自己的父亲浏览选举的统计数据，研究大使所雇分析师的推断，从而得出结论：此时，争取美国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对他们有利。不过，他们没有立即对外宣布，直到1960年的第一周才发布消息，延迟了14个月。与此同时，杰克逐步增加演讲次数，组织竞选活动，将他参选议员的战略扩展至全美，接受在全美发行的报纸、杂志和美国当时全部三家电视网的采访，增加上镜的机会，马不停蹄地到各地与政党领导人交谈，设法取得那些即将成为代表的男男女女们的支持。

尽管尼克松，这位艾森豪威尔相当不情愿选定的继任者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不过，肯尼迪已经设计出第二套策略。因其副总统的身份，艾

森豪威尔自然也是参议院的议长，然而，他在那里并没有发言权。肯尼迪参议员可以经常发言，而且他也意在如此。20世纪50年代的种种重大社会问题，将美国参议院搅成了一团乱麻。他打算在民权、劳工“权利法案”以及结束对教区学校和私立学校联邦补贴讨论方面采取强硬的立场，他说，这种讨论纯粹是一种浪费，因为“权利法案”清晰地将它们排除在外了。他面对的最为敏感的问题是他的宗教信仰，保罗·德弗很微妙地称之为“宗教上的障碍”。这一点，最不能被人理解。现代选举史学家白修德写道：“1960年，在美国许多最重要的教区，人们知道的是，如果天主教会在倾向性上有任何的默许，天平就会倒向理查德·尼克松，而不是约翰·肯尼迪。”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圣统制而言，肯尼迪简直太随便了，而且也很无礼。他说，他曾经问过枢机主教斯佩尔曼：教皇是否真的一贯正确。斯佩尔曼回答说：“我不知道，但他一直称呼我为‘斯皮尔曼’。”不过，这是宗教的内部事务。在美国，每4个人中就有超过3个人不是天主教徒。大多数人只是希望确保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不会效忠于罗马。他强烈反对美国联邦政府对教区学校的支持就是朝着正确的方向下了一步棋的观点，并认为需要有进一步的举措。在一份正式的公开声明中，他宣称：“我相信美国是一个教会和国家绝对分离的国家，不会由哪位天主教神甫去告诉总统该如何做事，也没有哪位新教的神职人员会去告诉他的教民该如何投票。”他继续说着类似风格的话，直到梵蒂冈的报纸《罗马观察报》（*L'Osservatore Romano*）告诉其读者：教会“有责任和权利”告诉他们如何投票，并且已经打算这样做。肯尼迪读出了其中的含义。他把报纸递给一位朋友，用低沉而缓慢的声音说道：“现在我理解为什么亨利八世要建自己的教会了。”

后来，他说他会与所有偏执于宗教信仰的人打交道。但到了1959年4月1日，他在大使棕榈滩的家中召开了两次关键性商讨会的第一次会议，开始谋求国家级的职务。由谁负责毫无疑问。杰克主持，致开幕词，并发表了长篇陈述，全部不用讲稿。这完全是一次艺术大师级的演讲。根据记忆，他将48个州和波多黎各、阿拉斯加及夏威夷的政治形势逐一整理出提纲，列出当地政治人物的名字，将他们划分成友方、敌方或中立方，并根据每个人在民主党大会上能控制的代表人数设定他们的级别。然后，杰克解释哪些州和地区有初选，在这些初选中，哪些州和地区会把票集中在领先的候选人身上，哪些代表团是根据单位投票法由多数代表代为投票，哪些会受到州民主党大会的左右，哪些会自由投票，喜欢谁就选谁。这是内幕大揭秘，甚至那些以精通政党政治为傲的人也很难掌握。有些人看呆了。他抛给他们的东西太多了。这是传奇的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才能做到的事，也就是说，递给你一张美国地图，从任何一个方向画一条穿越它的线，他都能准确地说出沿线穿过的所有县名，而且是按照顺序，不间断。阿德莱·史蒂文森对美国政治的掌握永远达不到这种程度。而杰克能做到，而且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你身边有人探过身子低声说道：“我们不只拥有最出色的候选人。我们还拥有最出色的竞选经理。”

那个夏天，肯尼迪发生了变化，变得深沉了，他会沉湎于长时间的沉默，不太渴望唇枪舌剑。在海恩尼斯港的时间，他几乎都在阅读，书散落在各处，包括《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和《最后的欢呼》（*The Last Hurrah*，其作者埃德温·奥康纳从克莱姆·诺顿那里获得了很多素材，诺顿是杰克第一次议员选举时就出现过的人物）、巴思的新书、卡默斯最新出版的书、安格斯·威尔逊的一个剧集、内维尔·舒特的《在海滩上》（*On the Beach*）、《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此外，还有两本伊恩·弗莱明的惊险小说《金刚钻》（*Diamonds Are Forever*）和《俄罗斯之恋》（*From Russia with Love*）。但是，这些都是消遣。他真正想要谈论的依然是政治。当林登·约翰逊正在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牧场（LBJ Ranch）打盹儿时，这位爱尔兰的偷猎者已经偷偷地在林登的身上打上了“此物归属本人”的烙印，就好像纽约布朗克斯区（Bronx）的查尔斯·巴克利和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喂！”杰克告诉你，“我们都认识林登，他根本就是一个偏执狂。现在，也应该让他尝尝受虐的滋味。他应该感激我。”

长时间的停顿之后，你向他打听汉弗莱的情况。他不太自信的情况，似乎也就仅此一次。期间没有人说话。最后他说：“要知道，这就是这个制度的真正缺点。休伯特本应处在这场快乐追逐赛的前列。但他仍旧只是一个区域性人物，而这是一个辽阔的国家。他只是不被明尼苏达和华盛顿政治圈子之外的人认识。他也没有很多途径可以让人了解。他也负担不起自我推销，只有很富有的人才玩得起这个游戏。通过媒体宣传与公众建立关系的方法已经过时了，这是大部分共和党人干的事。多光顾华盛顿会奏效，尤其是要多拜访美国总统顾问或大使级的人物。艾克已经为尼克松做了这件事。没有这些东西，一位区域性的领导人就只能依靠在初选时显示出很强的实力，才能冲上国家级的舞台。休伯特充满热情，也有才华。但这一次，我们有很多竞争对手，而且多数都很富

有。我不知道他该如何取胜。”

在那一刻，他似乎很脆弱。你等了很长时间，又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认为自己能当上总统？”他凝视了一会儿，然后略微歪着嘴，龇牙一笑，看着外面的海。“难道你不认为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自己上千次了吗？这个想法很吓人。但那时，我在环顾了跟我竞争的其他人后，对我自己说：好吧，如果他们认为他们能做到，为什么我不行？为什么我不行？这就是答案，我认为这就够了。”

1959年10月28日，周三，当天下午，杰克宣布其候选人身份之前的第二次战略会议在鲍勃海恩尼斯港宽敞的家中召开。现在，日历开始快速翻动起来。那一年，美国只有16个州举行了开放式预选。其他地方的代表已经通过利益交换、赞助、互相利用，有时甚至是直接的贿赂预先安排好了。但这16个州很正派，它们给肯尼迪和汉弗莱这样的外来人开通了通向权力的唯一途径。如果他们在那里无法得到大众的认可，在其党内也不会受人待见。但是，如果他们其中一人渐显佳绩，能击败每一位挑战者，那么，拒绝提名他为候选人也是很困难的。在普选时，他可能会成为该党领袖指定的被提名人。美国不会选举一个还没进白宫就会欺骗另外一位候选人的人做总统。在这16个州中，休伯特·汉弗莱已经在5个州做了候选人的备案，约翰·肯尼迪则备案了7个州。4月5日，他们俩首先会在威斯康星州交锋。

万圣节前夜的前三天，周三，在海恩尼斯港，外面的树叶已经变成红色和黄色，很快，它们就会飘落。会议室扩大了，一个大型壁炉占据着主要位置，里面摆着舒服的休闲椅、安乐椅和脚凳，当会议开始后，15位男男女女坐在了它们的上面，包括大使、罗伯特·肯尼迪、肯尼思·奥唐奈、劳伦斯·奥布赖恩、西奥多·索伦森、皮埃尔·塞林格、斯蒂芬·史密斯、舆论分析师刘易斯·哈里斯、康涅狄格州的党魁约翰·贝利和爱德华·肯尼迪。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没有坐下，而是背对着壁炉，面对着其他人，穿着运动夹克衫，轻松而闲适，看上去比他42岁的年龄几乎要小10岁，现在，他是美国总统候选人。

他们的竞选活动逐渐提速。在华盛顿，他们已经租下了10间房子大小的办公室。早在那年秋天，鲍勃·肯尼迪已被任命为美国参议院委员会顾问，负责管理这次竞选。杰克很快脱下外衣，开始了会议议程。后来，他的公开演讲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在全盛时期，他是一位健谈的人，他对今天的人群也是这样说的。这是另外一次一流的作业，三个小

时的政治分析，研究了整个国家，却没有用任何的地图或笔记。他对细节的把握是无可辩驳的。一次暂停时，有位会议成员低声说道：“开车路过波士顿的一条街，他仍然能够记得哪家商店10年前贴过他的竞选海报。”

在做了一番总结之后，他邀请大家提问和指错。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在初选时必须赢得提名。只有当他们证明他广受欢迎时，他们才能跟美国东北部的政治领袖们讨价还价，那些人喜欢他，但认为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他没有机会。从他在某个州开展初选活动开始，就承诺他的政见会跟在其他州时一致，其中包括对财政的承诺。志愿者组织、与职业政治家的联系、办公场地、邮寄名单，这些事情必须全部开足马力高效运转起来。因为如果在他赢得初选之后，发现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在普选中面对共和党的被提名人，那么，这个提名就毫无意义。“每场初选都要赢。”他说：“7个州必须都要获得提名。”初期，存在一个障碍，工作人员对在威斯康星州如何战胜汉弗莱产生了分歧，直至肯尼迪在仅有其父亲和路易斯·哈里斯的支持下毅然推翻了鲍勃和其他人的方案，并向该州发起进攻，这件事才算消停。同时，对那些在初期策划会上没有完成成熟方案的州，要么直面挑战，要么拒绝，这些州有马里兰、印第安纳、俄勒冈（如果你是该州的一位竞选者，不管喜不喜欢，你的名字都会被印在选票上，这是无法避免的事）、西弗吉尼亚、俄亥俄和加利福尼亚。

现在听起来，这一切似乎与当时一样复杂。时任美国总统即将搬出白宫，而有希望入住的房客则排成长长的一队。然而，结果可想而知，精减人员需要借力于初选，在电视时代，初选会立即产生轰动效应，让人在一夜之间成名，但很少有人能预见到这一点。哈里·杜鲁门认为初选是“走过场”，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政治大佬们则把党派被提名人的选举看成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在1960年开放式选举的那些日子里，那些为自己的心爱之物而竞争的人包括：林登·约翰逊、斯图尔特·赛明顿和民主党人的最爱阿德莱·史蒂文森，但他们都轻视了初选。除了这些候选人之外，还有十几位黑马和故乡骄子想必也加入到了候选人的行列，他们每个人都期盼着天上掉馅饼，砸中自己的脑袋。那时候，不论是汉弗莱，还是肯尼迪，没有人认为他们会在竞争中领先。多数经验丰富的观察者预期他们的决斗结果会是喜忧参半，认为他们中有一个人会赢得所有初选的结果是不可思议的，观察者推测，结果会是打个平手，双方都被淘汰。

不无讽刺的是，由于决定在初选时不跟肯尼迪过招，他的那些最难对付的竞选对手被迫放弃了竞争。假如他们选择非要打到分出胜负为止，那么，结果就无从知晓了。汉弗莱跟他们一样，都是很有能力的政治家，但肯尼迪两次打败了他。很多对手同场竞技只会让竞争白热化，或明或暗的阴谋诡计会纷纷出笼，推出的各色人物会在短短的几天内独领风骚，然后永远消失在公众的视野里，各种闹剧、小悲剧和胜利的喜剧轮番上演，它们会赫然出现，然后被人忘记，所有的这些事都让选民感到难以理解，无从解释，甚为恼怒。但因为肯尼迪和汉弗莱是竞技场中硕果仅存的两位民主党候选人，他们只在两个州有面对面的较量，也就是说，要在那里一决雌雄。

他们本应在俄亥俄州就交过手了。不过，肯尼迪找到了不用费时费钱就能搞定俄亥俄州代表团的办法。他是以很不正当的政治手段达此目的的，这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一位总统如果不强硬，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在州预选中，俄亥俄州州长迈克·迪萨尔想要以一位受拥戴的当地候选人身份参与竞选，并且告诉肯尼迪："找几个重要的新教徒为你发声，我就会挺你。"杰克并不相信他。1956年，迪萨尔是反对肯尼迪竞选美国副总统的天主教徒之一。此外，迪萨尔是杜鲁门的门徒，而这位美国前总统坦言不支持肯尼迪当选。杰克现在想要的是一个公开的承诺，他知道如何强迫州长做事。克利弗兰的民主党大佬雷·米勒正一心想跟迪萨尔开战。杰克派鲍勃和约翰·贝利赶到俄亥俄州。鲍勃直言不讳地提议，要么迪萨尔支持他哥哥，要么肯尼迪家族就会在紧要关头支持米勒。迪萨尔屈服了。杰克没有将此事告诉任何人。一周后，全美所有的头版都报道说，整个俄亥俄州代表团承诺支持肯尼迪。选票重要，资讯也重要。阿德莱可能没有理解所发生的事，汉弗莱可能也没有领会。但约翰逊无疑是立刻就看到了消息，同样看到消息的人还有戴利、巴克利和曼哈顿的卡迈恩·德萨皮奥。现在，他们知道，肯尼迪不仅魅力超凡和腰缠万贯，他还可以像海盗一样掠夺，他们钦佩海盗式的领袖。当然，他还必须是赢家。

1959年9月，肯尼迪已经不再乘坐商业航班，他购买了一架康维尔（Convair）公司的螺旋桨飞机（"它便宜"），并将其命名为"卡罗琳"号。现在，它正滑向首航的目的地——威斯康星机场，一位闷闷不乐的肯尼迪工作人员坐在"卡罗琳"号上向下望着最为萧瑟的雪景。只有棱

角分明的光秃秃的黑色树木以及轮廓清晰的农舍和谷仓打破了这种单调，白茫茫的大地一望无垠。

你从“卡罗琳”号的金属折叠梯上走下，寒风击打着你的脸，疼得刺骨。即便是迎新委员会的人看上去也很凄惨。一列车队将肯尼迪从欧克莱尔载到康奈尔，但当他停下车向围观者致意时，他们却只是呆呆地看着他，不说话，也没有反应。在康奈尔的N-Joy咖啡馆，有一个集会正等着他，虽然那里只有8个人。他获准在几所高中讲授公民课程。除了杰克，每个人都感觉郁闷。那天结束的时候，他见了大约1600人，其中有1200人因年纪太小，还不具备投票资格。有人说：“冷冰冰的人，寒冷的镇子，没有热情的人。”他回应道：“这是最艰难的，但不要忽视这些孩子。回家后，他们会跟自己的父母讲，而他们的父母会去投票。”

杰奎琳又怀孕了，她从华盛顿赶过来，声称要来做她该做的事。跟做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她用自己的方式开展竞选活动。在基诺沙（Kenosha），她走进一家超市，了解它的经理是如何就店内广播系统讨价还价的，并给了经理一个温暖的微笑。她询问经理是否介意听她说几句话。难以置信的购物者接下来便听到了杰奎琳的声音。“在我给你们讲我的丈夫约翰·肯尼迪时，请继续购物好了。”她的声音中伴有呼吸，但仍然很有说服力，就这样，她从肯尼迪在战时的服役开始，一直讲到他在国会山取得的成绩。最后她说：“他深切地关注自己国家的福祉，请为他投票。”

除了大使之外，肯尼迪家族的所有人都现身威斯康星州。通过在冰上表演惊险的特技，特迪冒着极大的危险吸引到了一群人。鲍勃请肯尼迪家庭牙医的女儿海伦·凯斯为他妹妹琼、帕特和尤妮斯安排活动，每个人每天参加9个家族聚会，总共参加了378个。保罗·科尔宾是威斯康星州的一位志愿者，由他来协助海伦，因为她在这个州一个人也不认识。从这儿找到一个药店老板，从那儿找到一位殡仪员，她逐渐地取得了进展。在威斯康星州的斯普林斯（Springs）吃早饭时，他们发现给他们服务的女招待是一位共和党人，但她并不打算给肯尼迪投票。“我没法投。”她说，“他是一位天主教徒。”海伦问她是否愿意邀请她的朋友与参议员的其中一个妹妹见见面。女招待说：“好啊，我会问下我父亲，但肯尼迪的妹妹难道不是天主教徒吗？”科尔宾指向海伦。“这位女士是浸礼会教友，她支持肯尼迪。”其实，海伦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此时，她默默地吟诵了一次简式的痛悔短祷。女招待的父亲同意了，聚会取得了

成功。

杰克找到了自己处理宗教问题的方法。他会郑重地说：“当一位出色的州长成为总统候选人时，我们能回想起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我认为这很好。不管他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不管他说话是否直言不讳，竞选活动都是一场灾难。他的观点被曲解。他比该党历史上任何一位候选人得到的选票都少。除此之外，他丢掉了自己为之提供了良好服务的州。”所有人都在等着他说出阿尔·史密斯的名字。他让他们等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你们都知道这个人是谁，我确信你们记得他的宗教信仰——阿尔弗雷德·莫斯曼·兰登，一位新教徒。”这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每个人都笑出了声。不过，在投票日前的那个周日，《密尔沃基日报》（*Milwaukee Journal*）将选民分成了三大阵营：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天主教徒。

肯尼迪受到媒体追捧是20世纪60年代罕见的现象之一。肯尼迪和他的团队成员有吸引力、富有特色、机智且令人愉快。这应该对他的竞选有帮助。然而，在威斯康星州，它反而没有什么好处。政治新闻记者为他深深着迷，他们推断，这个州的选民跟他们有同感。一位年轻的挑战者，宗教信仰不受人欢迎，他要与之对抗的是邻州一位受欢迎的参议员，在媒体的眼里，这样一场攻坚战从一开始就变成了肯尼迪的闲庭信步。在接近初选日的5月10日，几乎每隔一小时就会出现一次他将取得胜利的预测。这与杰克会败下阵来正好相反。有人甚至认为，若不是压倒性的胜利，结果就可以理解成肯尼迪的失败。

事情就是这样。杰克比威斯康星州初选历史上任何一位候选人赢得的民众选票都要多，共获得了6个议会选区和2/3的代表选票。奥布赖恩、奥唐奈、鲍尔斯和索伦森欢欣鼓舞。参议员却高兴不起来。他默默地看着电视评论员，小口吃着一碗鸡肉汤面，没有理会身边的欢呼声。尤妮斯察觉到了他的情绪。她问道：“杰克，这意味着什么？”他苦涩地低声答道：“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全部推翻，从头再来。我们必须要跟所有的人竞争，并且赢下他们每一个人，一路走到美国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些人之中，唯独他明白，美国东海岸那些政治大佬们理解的所谓“选票崩溃”的含义，这些大佬控制着他需要的代表团。他已经赢得了56%的民众选票，但他失去了全部4个新教选区，尽管他差点儿就能拿下其中的一个混合宗教区，并赢得了4个天主教聚居区的全部选票。他非常希望就此结束纠缠他的宗教问题。他没能成功，现在，他必须在一个非常不利

的战场上着手应付这个问题，这个战场就是西弗吉尼亚州，那里的宗教气氛浓厚，95%的居民是新教徒。这看上去像一个陷阱。

但是没有退路。汉弗莱理应退出。因为他在威斯康星州没有获胜，该州邻近他自己的州，不能指望他拿下中西部了，虽然那里曾是他的大本营。作为美国总统之位的竞争者，他的路已走到了尽头。他应该在西弗吉尼亚州撤退。这不只是肯尼迪的观点，也是休伯特政治盟友的意见。但汉弗莱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知道这一点。虽然有人曾提醒过汉弗莱，在初选中很有可能遭遇惨败，但他还是昂首挺胸地参与了这场难分胜负的角逐。另外，威斯康星州有允许跨党投票的规定，即一个党的党员可以将票投给另外一个党的初选候选人，汉弗莱还与一些法官争论过此事，因为这意味着肯尼迪的票数会因信奉天主教的共和党人而增加。他跟打电话到他宾馆房间的新闻记者也是这样讲的："你可以引用我的话，当我是受到了激励，兴奋不已……"汉弗莱仍然是候选人。

在肯尼迪家族看来，约翰逊、赛明顿和史蒂文森的支持者显然是把休伯特当成了一个卒子使用，希望他能在7月份的美国全国代表大会的首轮投票时抗击肯尼迪，给他们留出操纵的时间。但杰克的团队仍旧自信，实际上，是过于自信。鲍勃、拉里和肯飞往西弗吉尼亚的查尔斯顿，经验丰富的政客鲍勃·麦克多诺已在该州组织筹划了一年有余。在威斯康星州初选之前4个月，哈里斯进行过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肯尼迪可以在西弗吉尼亚州彻底打败汉弗莱，二人是七三开。麦克多诺的主要工作人员正在卡诺瓦酒店（Kanawha Hotel）的房间里开会，作为刚进来的新人，鲍勃惊讶地注意到所有人都沉默不语，也没有笑容。"各位。"鲍勃诚恳地说道，"我们有什么问题吗？"一个人跳起来尖叫道："他是天主教徒。这就是我们该死的问题！"突然，整个房间爆发了。那些人叫喊着："不管什么种族，也不管是总统候选人还是捕狗人，西弗吉尼亚人永远不会给天主教徒投票。鲍勃吃惊地看着他们。这些人已经为肯尼迪工作了好几个月了，却没有人告诉他们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是天主教徒。他检查了一下哈里斯的民意调查结果，看上去非常的乐观。哈里斯同样忽视了这一点。鲍勃现在意识到，在西弗吉尼亚这个地方，宗教不只是一个关键问题，它其实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在这里，人们要么有一台电视机，要么就是认识家里有电视机的人。美国新闻网的评论员正在报道威斯康星州的初选，他们强调了宗教问题，并特别指出肯尼迪参议员是罗马天主教徒。结果，哈里斯最新的民意调查数字变成

了汉弗莱和肯尼迪六四开。杰克好像并不知情，他要求民意调查员搞清楚变化的原因。接下来的调查势必要寻找调查对象，而他们的回答不出所料："但在12月时，西弗吉尼亚还没有人知道你是天主教徒。现在，他们知道了。""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不应跟它有任何关系。但……"

西弗吉尼亚人崇拜英雄，因此，电台和电视台已经准备好对杰克进行包装宣传。杰克称呼汉弗莱是为那些不愿意在西弗吉尼亚的土地上与他当面对决的政治家——"站台上的人"。他向人群问道："如果约翰逊和其他候选人想要你们11月的选票，为什么在初选时，他们没有来到这里，表示对你们的尊重，并请求你们的支持呢？"在一个长期感到受到轻视的州，其反响是令人鼓舞的。他拜访山谷中的村庄，进入贫瘠的矿区，并且亲自弯腰钻进矿井。在整个竞选活动中，那些生活凄凉、无望和饥饿的人们触碰到了他未曾接触过的东西。尽管被煤炭弄得一身黑，他还是径直走向麦克风，响亮地说道："艾森豪威尔总统应该拉着尼克松副总统的手，领他到麦克道尔、明戈和洛根走走，然后他就能看到西弗吉尼亚的这些家庭是如何为生存而努力的。"他会握住每一只伸向他的手，一直说到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每到这时，他就安排特迪替他说（特迪做了一次鼓舞人的、充满激情的演讲，听众欢呼喝彩，但时间太长了，以致杰克得走向话筒，用低沉而沙哑的声音解释说他的弟弟还年轻，尚未达到美国宪法规定的竞选总统的最小年龄）。

在洛根、明戈、麦克道尔和斯莱布福克，与肯尼迪接触的那些人可不是发出尖叫声的高中女生。她们是些老妇人，老到让他觉得自己永远活不到那个年纪，她们会伸出颤抖的手指轻拂他的衣袖或外套，但多年残酷的劳动已经让她们的手都变形了。他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对待她们。他会弯下身子，温柔地微笑，让他的脸贴着她们的面颊滑动。在这种亲密的时刻，他会轻柔地说话，轻柔到你必须在现场才能得听到："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

在埃莉诺·罗斯福理解了杰克对待麦卡锡主义的原因之后，他们很快就达成了和解，而且，她还成了他最忠实的赞赏者之一。她告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政治事业中，我认为从富兰克林以来，就再没有谁还能跟群众建立同样重要的关系了。虽然，富兰克林的竞选活动在刚开始时往往会让人感到厌烦和缺乏兴趣，但在竞选过程中，他会从其听众那里获取力量和活力，状态会越来越好。我感觉肯尼迪参议员几乎和他一样，也有足够的才智和勇气能从听众身上调动起情绪，这反过来又会让他振

作，使其坚强。”

在西弗吉尼亚州，肯尼迪的最大资产是全心全意支持他的小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在那些矿山之上，摇摇欲坠的棚屋危险地依附在陡峭的山坡上，就在这样的屋子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照片占据着主要位置，随着岁月的流逝，照片已经褪色和卷曲。如今，他的儿子看上去别提有多像老罗斯福当年的模样了，小罗斯福来到这里，为肯尼迪摇旗呐喊（一个严格保守的秘密：年轻的罗斯福是大使雇用的。另外，在大使的建议下，年轻的弗兰克·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力劝西弗吉尼亚人为杰克投票，并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则把信运到海德公园，并在盖上那个著名的邮戳之后寄了出去）。弗兰克倾心尽力，不无热情和敬佩地谈论杰克，他也厌烦初选日那天一只红肿充血发紫的手。“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在西弗吉尼亚吗？”他会夸张地问道，“因为杰克·肯尼迪曾和我在太平洋并肩作战。他在鱼雷艇上，我在驱逐舰上。”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版本的太平洋战争，有一天，弗兰克接着讲了一个把历史歪曲得有点儿离奇的政事。他竖起两根紧紧贴在一起的手指，宣称：“我父亲和杰克·肯尼迪的父亲就像这样！”

哈里斯的民意调查继续报告说宗教控制了竞选活动。肯尼迪的顾问们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索伦森和其他的华盛顿工作人员劝他不要在公众面前挑起这个问题，它极富争议性。肯尼迪在西弗吉尼亚的工作人员则完全不同意，认为他们的邻居和朋友并不憎恶天主教徒，只是害怕他们。沉默只会助长和强化这种恐惧。刘易斯·哈里斯一边翻动着一叠民意调查报告，一边说他完全同意。投票日前两周，肯尼迪将他的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他要发起攻击，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打破沉默，鼓励就此展开讨论。他准备回答所有的指责、质疑、谴责和含蓄的批评，而且不征求宗教权威人士的意见。“让我们面对它。”他说：“这是本次竞选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大的问题。虽然他将《给我那个旧时的宗教》（*Give us that oldtime religion*）作为他的主题歌，却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休伯特谈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当所有的选民都在思考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时，如果我谈论它，我将是唯一谈论这个问题的候选人。”

第二天，周二，平静地过去了。周三，他在摩根敦略作停顿，在主街上举行的中午集会上，他给一小群人发表演讲，显然，他们对美国联邦政府急需改变的要求漠不关心。他的声音发生了变化，变得尖刻而愤怒，此时，他的一位朋友远远地站在一边，而这位朋友意识到他正在重

复14年前在波士顿发表的那篇演讲，换汤不换药。然后，他为指责他是外来的政治投机客而辩护。在摩根敦，他的目的有所不同。“我在美国海军服役时，没有人问过我是不是天主教徒。”人群吃惊地看着他。这是一个很多社会禁忌已经消失的时代，但与除了你的牧师、传道者和家庭成员之外的人谈论自己的信仰，似乎仍然是一个禁忌。所以，摩根敦主街上的人简直是目瞪口呆。政治家们不会说那样的事情。但杰克在谈论它们，他的话激动人心，很有说服力，而且越来越激昂。他问道：“难道在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的时候，4000万美国人就要失去他们竞选总统的权利吗？”他接着说：“在我哥哥爬进美国的轰炸机执行最后一次任务之前，没有人问过他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杰克转向另外一个更传统的话题。在你右边几英尺的地方，一个男人跟另一个人低声说道：“相当不错的演讲者，我必须得说。”

他从没有说过他是否设计过要说这些话，但在了解他的那些人中，后来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一时冲动才那样做的。人群慢慢散去，他一边钻进汽车，一边说：“这回怎么样？”他所有的朋友仍在发抖，只能说：“很好。继续干。”但你能看到他一脸的自豪。他脑子里想必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现在一个猛子扎了下去，结果发现水还不错。从下一站开始，而且在接下来的10天里，他都如法炮制，继续夹杂着如此坚决而据理力争的话：“我拒不相信在接受洗礼时就被剥夺了成为美国总统的权利。”出席他演讲会的人情绪高涨。人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虽然他整理好了所有可能的答案，并准备回答任何问题，但他们并没有问及与宗教有关的问题。

截至此时，他仍然处于困境。新闻记者几乎不可能报道候选人在街头巷尾说的话，虽然他所说的毫无疑问正被口口相传，但只有少数人真正听到和见过他。选举前两天是5月8日，周日，形势发出了警报。肯尼迪与弗兰克·罗斯福同时现身于时长为半小时的付费电视广播节目中。没有底稿，罗斯福提问题，肯尼迪即兴回答。整个节目的重点就是宗教问题，在他们直播了3～4分钟之后，这个问题就被罗斯福提了出来，想必演播室外面的各家各户已经沏好了咖啡，安顿下来，并且把电视调到了播放这个节目的频道。肯尼迪的回答持续了至少10分钟，接近这次节目一半的时间。他回顾了教会和政府之间长期的斗争，以及将两者分开的重大决定。然后，他直视着镜头说：

……因此，不管是谁，当站在美国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宣誓就

任总统，他就是在宣誓支持教会和政府的分离；在宣誓时，他一只手按在《圣经》上，举起另一只手指向上帝。如果他违背诺言，就不仅是犯了违宪之罪，美国国会可以因此弹劾他，也应该弹劾他，而且他还犯了亵渎上帝的罪。

那时，肯尼迪从一本想象中的《圣经》上举起手，轻柔地重复着他的话：“亵渎上帝的罪，因为他是按着《圣经》发誓的。”

白修德评价说：“在我听过的所有政治候选人的电视节目中，这是最为精彩的。”这番话扭转了当时仍很强势的选民意见。哈里斯的民意调查人员被派驻到该州各地，他们正在卡诺瓦人口密集的主要社区的某些街道上核实和重新核实信息。哈里斯说：“你能看到他们的改变。”节目播出当天是周一，正是选举的前一天，哈里斯发现自竞选活动以来，这是肯尼迪头一次以微弱的优势领先。到周二选举时，肯尼迪以52%对48%的选票率拿下了该县。

在竞选的最后日子里，美国最受挫、最受刺激和最愤怒的政治家是休伯特·霍拉肖·汉弗莱。他的整个人生就是对忍受和宽容这种美德最好的见证。他宁愿割喉自杀，也不愿意接受一位偏执狂的投票。一旦肯尼迪在选民面前谴责反天主教的偏见，就等于是在让选民认为，如果他们想证明自己有宗教宽容之心，肯尼迪就是他们应投票的人选，休伯特的地位就彻底不保了。问题现在成了宽容还是不宽容。没有哪位候选人应该为此负责，这是偏执之人该去做的事。但它对休伯特的影响是惊人的。西弗吉尼亚人决定证明自己有宽容之心，即便是为了自己，也必须要为肯尼迪投上一票。

虽然汉弗莱曾被力劝不要参加此次初选，但他对此无动于衷，并没有做什么事来防止蒙受现在的这种羞辱。在离开威斯康星州之前，他的负债已经累积到1.7万美元。西弗吉尼亚州投票日的前3天，周六，电视制作人威胁说，除非提前收到现金，否则就要取消他在周日晚间的节目。由于只睡了4个小时，醒来之后的休伯特面容憔悴，疲惫地开出了一张支票。但这还不是他受辱的结束。他在一个马拉松式的电视广播节目中购买了时段。观众打进电话，提出问题，候选人回答。但只有在候选人有工作人员来帮他筛选电话时，它才能发挥作用。汉弗莱没有钱，雇用不起这样的工作人员。结果现场一片混乱。一开始有两个通情达理的电话打了进来，他应付自如。接着，一位精神错乱的女士打进电话，

她那粗重刺耳的声音从实况转播中传了出来："你滚蛋！滚出西弗吉尼亚，汉弗莱先生！你可经受不了共和党人胜过你！"最后，一位技师切断了那条线路，但紧随这位疯女人之后，又有一连串喜欢出风头的人打进电话来，他们不会放过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视节目中的机会。这种异常丢脸的惨败持续进行，直到有一个男性的声音不无权威地拖着长腔说道："请把线路改成忙音，这是突发事件！"休伯特束手无策，设法解释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电话，他们正在直播。宣称突发事件的那个人不再说话，留下时间用于接听下一个观众打进的电话。他粗声大嗓地说着，给人的印象甚是荒谬可笑，似乎休伯特·汉弗莱就是一名刚刚从矿业老板手里领到工资的工人。倘若汉弗莱天生具有肯尼迪冷嘲热讽的天赋，他的痛苦或许就能减轻不少。但他缺乏杰克的性格脾气，他的痛苦因为给别人带来了痛苦而加剧，实在是不应有的笑话。

周二，黎明时分，天气阴冷，细雨淅沥，肯尼迪此时醒来，他有一种无法抑制的预感，他会获胜。他认为哈里斯是错的。他能感觉得到。他告诉鲍勃他要回家，他不想看到其他人，中午前，"卡罗琳"号专机把他载回了华盛顿。他提议杰奎琳：邀请本和托尼·布拉德利共进晚餐。后来，他们4个人又去看了一场电影。布拉德利来的时候带来了一瓶香槟。杰克说："无论如何，我们今晚都要打开它。"在去电影院之前，他与在查尔斯顿卡诺瓦酒店的鲍勃通了电话。投票站在晚上8点已经关闭，但选举结果尚未出炉。"好吧。"杰克对其他人说，"我们去看电影吧。"

在卡诺瓦，鲍勃等到了第一组数字。但汉弗莱和肯尼迪是选票上仅存的两个人名。对于政府人员和饭碗难保的猎场看守人来说，这次选举涉及100多个其他族裔，这些数字本身就让其他事情都黯然失色。然后，他们开始收到票数占第一位的结果：在美国东部狭长地带较早进行投票选区，那里的人终其一生都看不到天主教徒，但他们把票大量地投给了肯尼迪。到了晚上9点45分，肯尼迪以60对40击败汉弗莱。在郊区、工业城镇、丘陵地带和迷你小村，情况无一例外。半小时之后，另外一大波选举结果涌来。城市的情况也是一模一样。到了晚上10点，这一势头似乎已经有了席卷全美之势。

午夜之前，汉弗莱决定认输。延长痛苦毫无意义。从其在拉夫纳宾馆（Ruffner Hotel）的房间里，他送出了恰如其分的电报文稿，并给慷

慨的支持者打去电话。他得体的祝贺电文直到第二天下午1点才送达肯尼迪的竞选总部。鲍勃低声说道："上帝，可怜的休伯特。威斯康星，这一次，他是忙了又忙，花了又花，输了又输。"因为杰克现在身在华盛顿，因此，鲍勃就要如往常一样做他该做的事——在他哥哥理应做什么事情，却无法做到时，他就要替他做。他步行穿过查尔斯顿被雨淋湿的大街，赶着去向休伯特的电报表达个人的感激，他甚至没有注意天气，没戴帽子。汉弗莱说，他想在杰克返回时欢迎他。他想要做一个输得起的人，这对他很重要。在美国的国会大街，他们走进汉弗莱的竞选总部。民歌手吉米·沃福德在竞选中一直陪伴着休伯特，此时，他正漫不经心地拨弄着他的吉他，唱着一首忧郁的老歌，那是一首汉弗莱年轻时流行的歌，唱的是罗斯福新政，唱的是并不富裕却无比慷慨的美国人。在开始宣读给其工作人员的声明时，汉弗莱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他没能读完，吉米也开始啜泣。休伯特拍拍他的肩头，说道："噢，吉米。"鲍勃走上前去用胳膊搂住汉弗莱，他把他们一直带到了卡诺瓦，他也在哭泣。你了解鲍勃·肯尼迪，所有人都用同一个词描述他，而这个词就是"无情"。

肯尼迪参议员和他的那伙人挤进车里，前往跨力士剧院（Trans-Lux）观看电影《夏日惊魂》（*Suddenly Last Summer*）。遗憾的是，他们去得太晚了，进不去门，于是，他们步行穿过纽约大街前去纽约广场，那里正在放映三级片。那时，黄色电影还不像它后来的那般粗俗，但《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确实够下流的，主演之一是凯蒂·曼克斯，她扮演的是一位淫荡的家庭主妇，不管是卖牛奶的、送报人，还是卖冰人，只要对她稍加示意，她就会投怀送抱。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有人就怀疑这种下贱的小情人是否会出现在天主教禁片的名单上。它的确是禁映的影片。提出怀疑的这个男人不久之后就要成为美国第一位信仰天主教的总统，两晚之前，他的虔诚才刚刚深入西弗吉尼亚人的心中，现在却在看一部色情电影。

他并没有乐在其中。平常，他就发现性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常常热衷于听那些电影明星和议员的小道消息。几乎任何碰巧从他身旁走过的迷人女郎都会让他目不转睛。如果是在其他时候，他可能会很享受观看凯蒂·曼克斯各种不可思议的体位下的调情，但那天晚上，他的思绪在查尔斯顿。他开始觉察到，自己认输得太快了。每过20分钟，他就溜到大

厅，给鲍勃打电话，返回时会低声说："还没有准信。"然后猛地坐到座位上，用一把指甲剪轻轻地敲打自己的牙齿。最终，最后出场的那位杂务工最后一次让曼克斯太太获得了性满足，而肯尼迪和布拉德利一伙人则前往N街。

在他打开位于N街的家门时，电话正响个不停。是鲍勃的电话。杰克赢了，事实上，是以惊人的多数票获胜。在发出如北美印第安人战斗时发出的呐喊和给大使打过电话之后，布拉德利从冰箱中拿出了他们的那瓶香槟。此时，来了一个电话，提醒这帮人"卡罗琳"号专机马上就要起飞了。布拉德利受到邀请，同时受邀的还有史蒂夫和约翰·史密斯。在卡诺瓦机场，媒体记者们希望听到一个声明。杰克说道："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将宗教问题彻底埋葬了。"显然，他完全忘记了杰奎琳。在卡诺瓦酒店，由于欢闹气氛逐渐热烈，而且临近凌晨3点，她悄悄地走出宾馆，钻进汽车，独自坐在那里，闷闷不乐，等待启程返回华盛顿。在杰克走向门口时，一位记者问他要去哪里。他愉快地说道："今晚我必须仔细研究马里兰的问题。明天我要在那里搞竞选活动，初选是在周五。"他离开时走错了门，不得不到处寻找杰奎琳。他走过休伯特·汉弗莱的新闻采访车，它就停在拉夫纳宾馆外面。有位警察悄悄地把一张违章停车罚单压在了它的雨刷下面。

此时，你与杰克坐在他在乔治城家树叶繁茂的后院，看着他计算各种数字组合，你问他是否真的对美国全国代表大会有把握。他说："每一位政治家都觉得没把握。"他向你展示了一个候选人及其估计可得选票的清单，淡淡地笑着问道："哪个人有威胁？"你马上回答说："约翰逊。"杰克说："不对。他在美国南部之外的地区没有势力。在这个城镇，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全美的知名人物，但出了这个选区，走在大街上的人根本没有听说过他。他的重大错误就在于连一次北部的初选也没有参加过。他可以给参议员施加压力，因为在那里，他有权势，还有赞助人。但议会的权力不是全国性的权力。大多数选民对议员的评价不高。把林登推进白宫得靠神力。不，尽管不是很多，但还是有些担心，毕竟，那个人拥有国际声誉，有当总统的水平，也有一批崇拜他的追随者。"突然之间，你无言以对。史蒂文森曾经是你崇拜的对象，他一度还是你的朋友。杰克知道这件事。他压低声音说道："记住，我是史蒂文森的人。我提名他，但他不是那种人……你能想象你输掉总统竞选会给你

带来什么吗？然后再次竞选？没有人能判断这种人，但史蒂文森改变了。老阿德莱甚至不会想到他这是忸怩作态。”

确实，史蒂文森当时的位置显得有点儿奇怪。似乎所有人都想知道他是不是今年的候选人。阿德莱说过，他自己不寻求提名，不帮助任何其他人提名，也不会想方设法阻止任何人被提名。如果党需要他尽责，不管什么职位，他都会接受号召，并且深感荣幸。你说：“他想要的是直接选派。”杰克说：“不，他认为他想要选派。但他真正想要的是提名，就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做任何他认为有用的事情。”当时你不无怀疑，但后来在洛杉矶，你会听到杰克要求阿德莱将他的名字加入被提名名单，就像4年前他对阿德莱做过的那样。史蒂文森的回答令人伤心：“不，这对林登不公平。”这句话毫无意义。在你们离开时，杰克不无抱怨地说道：“对约翰逊公平？他没长记性。他忘记1956年我对他的支持了，当时，约翰逊和雷伯尔尼都反对他。”杰克很少对史蒂文森有这种态度。后来，你把这件事告诉了戴夫·鲍尔斯。你好奇为什么史蒂文森会那样做？对天生就是政治家的戴夫来说，这没有什么神秘的。他说：“很明显，这个候选人是婊子养的。”

经过威斯康星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初选之后，有人或许认为肯尼迪应该可以休息很长一段时间了。但在政治家的心中，只有失败的人才会休息。接下来的7周是对他毅力的考验。他访问了11个州，并且经常重复访问，出席州代表大会和州委员会会议，与州长和政党领导人交谈到深夜，与专业的政治家磋商，按照代表大会的运行规则，这些政治家要比在花费巨资、用时很长、让人筋疲力尽、令人萎靡不振的初选中选出的代表更有分量。

6月27日，肯尼迪在蒙大拿州发表了最后一次州代表大会演讲，他得到了550票，实实在在，而且经过了确认。没有什么能阻止他赢得这些选票。剩下的就是很吸引人但不确定的地区。明尼苏达、堪萨斯和艾奥瓦代表着78票，它们支持受到拥戴的当地候选人，但这些人最终必定遭到抛弃。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加利福尼亚这三个州举足轻重。在这些州，他们能拿到203票，远超肯尼迪所需要的票数。实际上，他的地位远比这些数字反映的要稳固得多。他审慎地故作低调。许多代表私下里向他保证过，只是，此时宣布会让他们感到困扰和威胁。其他许多准备表态拥护他的人现在也按照他的要求保持着沉默。他的竞争对手仍存

幻想，认为如果他们能够通过第一轮投票，他的支持者就会开始土崩瓦解。他想要他们心存这一幻想，因为他还握有另一张王牌，它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除了他最忠诚的助理之外，没有人知道此事。亚拉巴马州州长约翰·帕特森准备在第一轮投票的时候将其整个代表团的票投给肯尼迪。杰克要求他在开始的时候让某些代表保持克制。亚拉巴马州通常会公开名单。但倘若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帕特森就会宣布其代表团中支持肯尼迪的新力量，这将在关键时刻强化杰克会获得候选人资格的心理暗示。

在美国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差不多一周时，鲍勃与其先头部队抵达洛杉矶，并在比特摩尔酒店（Biltmore Hotel）8315房间建立了总指挥部，实际上，这是一个四居室的套房。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令人兴奋之事的增多，8315房间里洋溢着自信的感觉，让人沉醉。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杰克的团队看到了林登·约翰逊在7月5日举行了一次特殊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此时，距离美国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还有5天。肯尼迪的人不喜欢约翰逊，他们认为他是一个虚伪的、没有原则的投机主义者，而且观点狭隘。约翰逊用虔诚而庄重的语气宣布："经过自我反省，我发现自己能够担当起美国总统的责任，服务于国家，从此刻起，我愿意接受提名。"听到这里，肯尼迪总部里的人笑得前仰后合。约翰逊宣称可以得到502.5票，其中有385票来自美国南部及边界州（border states），占了一大半，但是，他说他还有一些支持者分散在美国东北各州，在西部各州和山地州（mountain states），有80票是属于全场一致通过的，这是新动向。在那间套房中，堆满了文件，4509名代表和代理人每个人都有一份档案。在翻查了几分钟档案之后，听到有人咯咯地笑出声来，随着对文件的深入分析，大家就更高兴了。约翰逊认为已经被他说服的代表全部是隐藏不露的会投肯尼迪票的人，是杰克为自己第二轮投票打的埋伏。

随着"卡罗琳"号专机降落在洛杉矶机场，你看到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3000多人如潮水般涌进机场。乐队在演奏，横幅在挥舞，女孩们在尖叫。人群簇拥着肯尼迪，他很无助，难以脱身。最后他发现自己站到了新闻记者和电视摄像机的前面，并且简短地说了几句机智风趣的话。《纽约时报》已经发表了社论，称他为"最佳候选人"。他严肃地说道："我期望成为能够诚实地说'我是通过《纽约时报》得到工作的'那种人之一。"

他的家人、朋友和工作人员分散在洛杉矶各地。而比特摩尔酒店是神经中枢。威斯康星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老兵，这些关键人物已经先期抵达。鲍勃、拉里、肯和皮埃尔·塞林格则以套房为基地，塞林格现在负责处理肯尼迪的媒体关系。然而，候选人需要隔离。为此，他们又预订了9333套房，但他一点儿也不想待在宾馆里。一周前，他已经派戴夫·鲍尔斯到洛杉矶找到了一处隐身之所。除了他们俩，其位置只有鲍勃和杰克的秘书伊夫琳·林肯知道。戴夫发现了罗斯莫尔北路（North Rossmore Boulevard）522号的一处公寓楼，房主是演员杰克·黑利，他同意把顶层租给肯尼迪，包括两台电视机，可用来观看美国全国代表大会的现场活动。肯尼迪房间的楼下是威廉·加根的房间，他是另外一位演员。黑利和加根发誓守口如瓶。从作为会场的洛杉矶纪念体育馆到这里，杰克开车只用10分钟。4条电话线安装到位，其中一条线用于杰克和杰奎琳在晚上交谈，因为怀孕，她不得不留在海恩尼斯港。杰克的父母则搬进了马里昂·戴维斯在贝弗利山的别墅。在会议初期，杰克打算在那里游泳池旁的电视上观看会议报道，在与双亲吃完饭后，他会返回自己的隐身之所。这是一个稳妥的计划，但它只运行到了周三，即大会的第三天，当时，肯尼迪在比特摩尔酒店短暂停留。皮埃尔恳求戴夫告诉他杰克的隐身地址，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一旦杰克获得提名，摄影记者和摄像师会需要相关的照片。戴夫拒绝了，杰克想要返回罗斯莫尔北路，并开始收拾他的游泳裤。但如果他回去陪伴父母，隐身之处就会暴露。两人来来回回，互不相让。最后，杰克插话说：“噢，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给他地址。”戴夫给了他地址，皮埃尔便高兴地匆忙离开了。就在那时，弗兰克·罗斯福到了，强拉着杰克去参加了一场代表的聚会，使得他延迟了15分钟才离开。当他和戴夫抵达隐身之处时，街道上扔得到处都是电视机的配件，一群看热闹的人聚集在那里。戴夫的职责就是要竭尽全力确保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因此，杰克瞪着眼睛生气地看着戴夫，此地被肯尼迪否决了。“好吧。”杰克说，“这是一个很糟糕的隐身之处，是吧？”想要不被人发现，悄悄离开，的确是个问题。下一任美国总统和他亲密的助理带着他们的游泳裤从楼后的防火梯偷偷地下了楼，翻过后篱笆墙，进入邻居家的庭园，然后步行去了戴维斯的别墅。他们在那里游泳，然后，观看奥维尔·弗里曼提名肯尼迪的直播。

大使以自己的儿子为傲，有时几乎无法抑制对儿子的爱，他会伸出手，触摸杰克的肩头。而且，他也是一个策略高明的政治建议的来源，例如，乔预测新泽西州的罗伯特·迈纳会因为现在拒绝支持肯尼迪而毁掉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告诉自己的儿子：“你会在第一轮投票时获胜，而他

则会陷入困境。”这是政治版街头霸王说的话，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当前的目标，即提名上。他的儿子则在考虑代表大会之后的事情，也就是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他需要一个团结一致的党。遗憾的是，有些老领导人似乎对抨击他而不是打败尼克松更感兴趣。在电视播放的记者招待会上，哈里·杜鲁门已经开始发难，他问肯尼迪：“参议员，你确定已经为这个国家做好充分准备，或者这个国家已经准备好接受你来担任总统的角色了吗？”哈里显然更喜欢成熟的民主党人，他提到了约翰逊（肯尼迪怀疑他是幕后操纵杜鲁门表演的人）、赛明顿、迈纳和切斯特·鲍尔斯的名字（没有提史蒂文森）。杜鲁门提出了其他的理由，但年龄才是真正的争议点。权力的代际转移不可能是毫无痛苦的。8315套房中的4个头头分别是34岁的鲍勃、36岁的肯、35岁的皮埃尔和43岁的拉里，而拉里算是肯尼迪团队中年龄最大的。更糟的是，肯尼迪在华盛顿的首席顾问特德·索伦森只有32岁。当约翰逊怒气冲冲地说他可不想“被一个43岁的男孩摆布”时，他指的是杰克。艾森豪威尔也有同感，在说到肯尼迪时，他总是称杰克为“那小子”。詹姆斯·赖斯顿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本次代表大会会以“目睹换岗仪式的集会”而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肯尼迪所属政党的一位美国前总统对他有所指责，这件事可不容忽视。肯尼迪措辞巧妙地加以反驳，他指出：杜鲁门希望代表大会是公开的直接选举，似乎他是想召开一个“研究所有的候选人，审查他们的政绩，然后听取他的意见”的会议。他补充道，说他没有经验绝对是荒唐可笑的。他在国会山工作了14年，这意味着他在处理美国公共事务方面比20世纪当选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更加老练，这其中就包括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肯尼迪声称：确切地说，白宫需要他所体现的“影响力、健康和活力”。

周一晚上，在经历了派别血拼之后，各方都暂时可以喘口气了。在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晚宴上，演讲者是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年轻参议员。那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演讲，这主要是因为在西弗吉尼亚州初选和当晚聚会之间的两个月中，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已经让一个又一个灾难整得无法控制局面了。苏联击落了U–2侦察机，美国政府给出了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然后，莫斯科向公众展示了美国飞行员和无可置疑的证据，证明美国所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艾克飞去巴黎参加首脑会议，当尼基塔·赫鲁晓夫称美国总统是“伪君子”和“说谎者”时，会议便立即以失败而告终。韩国的示威者推翻了李承晚的政权。卡斯特罗没收了在他所在国家的所有美国资产，并与苏联结成了联盟。美国与苏联的裁减军

备谈判一度似乎前景光明，但还是彻底失败，不得不放弃。在非洲，刚刚独立的刚果共和国很快就出现了分裂，陷入混乱，最终陷于内战和不可理喻的屠杀当中。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伯勒，黑人开始在午餐凳上“静坐”，虽然被此事折磨得心烦意乱，美国总统却在盼望着期待已久的日本访问之旅。但日本首相撤回了邀请，理由是学生和军中左派的反美示威已经进行了三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首相无法保证美国总统的安全，因此，该访问被取消。

这是一个联合起来反对共和党提名人的好年头。但是，尽管肯尼迪大比分领先，约翰逊还是在投票之前的那些日子里视察了各州的代表大会，直言不讳地呼吁“阻止肯尼迪”。他引用自己的政绩，告诉他们，他有权要求他们的支持，也期待着他们的支持。这就是多数党的领袖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如果你不按他的方式投票，他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但这些人不是参议员。约翰逊攻击肯尼迪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资格，然后，他引用《出埃及记》第20章第5节的内容，将父亲的过失加诸其儿子身上，而且将这种过失描述得黑上加黑，声称乔·肯尼迪不仅是“绥靖主义者”，还“认为希特勒是正确的”。最终，有关肯尼迪“疾病”的流言开始四散传播，这也算是拼死一搏。

肯尼迪的医生珍妮特·特拉维尔和尤金·科恩可以为他的身体健康做证。约翰逊举起双手。他当然相信医生的证言，而且想不出谁应该对这个卑劣的传言负责（奥唐奈想公开建议林登·约翰逊不妨问一问他最亲密的政治盟友小约翰·康纳利和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女委员印迪亚·爱德华兹，他们曾提议要为所有被提名人进行“体检”，据说，他们还暗示肯尼迪的“疾病”是性病，但被杰克否认，11月，他希望将得克萨斯州的25张选举人票归到他的名下）。萨姆·雷伯尔尼已经提名林登。然后，明尼苏达州新当选的参议员麦卡锡站出来提名伊利诺伊州的州长阿德莱·尤因·史蒂文森，大会炸锅了。一天之中发生的所有事件都是朝着这一刻而蓄势待发。史蒂文森不只是受到称赞，而且是深受爱戴，1952年和1956年，他曾经发起过竞选活动，那是属于他的圣克里斯宾节，此时此刻，那些跟随他一起经历过战斗的男男女女们都热泪盈眶，双眼模糊。

埃莉诺·罗斯福就在现场，40多年来，在美国全国代表大会上，一直都能看到她的身影，但当她看到这种场面时，她知道这是注定要失败的。然而，麦卡锡对此深信不疑，借由某种时空隧道，他又回到了1952年的夏天。以其与众不同的客观性，肯尼迪评论说，麦卡锡的演讲简直

是大会上最好的演讲。当它结束时，助威活动就开始了。会堂外面的走廊和侧厅挤满了狂热支持史蒂文森的人，他们快速地跑进过道。当金色气球飘过他们的头顶，并且爆破时，他们簇拥在地板上尖叫，扭动身体，晃来晃去。写有“我们想要史蒂文森”的纸质横幅随风飘往各个方向。他们一边重复喊着：“我们想要史蒂文森”，一边在手中上下舞动着州旗。肯尼平静地告诉你：“所有这些到处乱跑的人毫无意义。他们没有办法投哪怕是半张票。”正在马里昂·戴维斯家游泳池旁看电视的大使顿时着急起来。杰克给鲍勃打电话，询问最新的投票情况。鲍勃说：虽然经过精心的组织，但助威活动不会对投票产生影响。实际上，史蒂文森代表团的重要性已经急剧下降。挂上电话后，杰克说：“不用担心，爸爸，史蒂文森万事俱备，却并未获得代表的支持。”

在第一次投票时，杰克及时赶到了他的公寓。他有一个硬纸板做的计数纸。亚拉巴马州的情况已经打电话问过了。该州的代表团团长回答说：“亚拉巴马州投20票给约翰逊，3.5票给肯尼迪，还有……”突然，电视屏幕黑了，声音消失了，公寓里的灯都灭了。“万能的上帝啊！”杰克大叫一声。厨房里一根点煤气炉的火柴被划着了，烧断的保险丝被替换，随着电力的恢复，杰克听到亚利桑那州投给他17票。然后，第二根保险丝又烧了，他们再次陷入黑暗，肯尼迪把他所有用来骂人的话都说了一遍。接着，几位随从和他磕磕绊绊地下楼来到加根的公寓，比尔和他的妻子正安静地关注着名单的情况。杰克说：“比尔，你介意吗？我们的两台电视机都不能看了。”就在那时，电视里正在播报加利福尼亚州投给肯尼迪的选票，加州的票数比杰克预期的多出三票，而阿贝·里比科夫送上了康涅狄格州的全部21票。楼上传来说话声，说是电灯又亮了。伊夫琳·林肯正心烦意乱，大家认为断电是她的电动打字机造成的，其实不是，断电源于杰克为他的卧室新租的空调。他对着楼下喊：“比尔，别关门。我们可能还会来。”

随着投票的继续，他把代表的承诺标在纸板上。他的总票数到了750票，只要再得11票，他就会成为得票最多的人。接下来投票的是怀俄明州。杰克盯着电视屏幕，他看到自己的弟弟蹲在地上，怀俄明州的代表簇拥在特迪的周围。特迪从来没有咧着这么大的嘴笑过。杰克平静地说：“看来有结果了。”没错。该州的代表把票全部投给了他，这使得他成为1960年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所有人都聚集在他的身边，紧握他的手，在对他们表示感谢时，他说：“打电话联系在科德角的杰奎琳。”

在与杰奎琳简短通话之后，他匆忙赶到体育馆，他要在大会上来一个简短露面。当他步行到体育馆附近时，看到了鲍勃，兄弟俩停下来讨论了几分钟，在场的其他人都后退到一定距离，以示尊敬。杰克最后转身离开，看到政党领导人已在一边安静地站成一排，他与他们握手，并逐一表示感谢，他们是贝利、里比科夫、索比·威廉斯、比尔·格林、迪萨尔、埃夫里尔·哈里曼、迪克·戴利和戴维·劳伦斯。一支乐队正在演奏“*Toora-Loora-Loora*”（爱尔兰摇篮曲），然后，当他步入会堂，登上讲台时，乐队开始演奏《幸福的日子又回来了》（*Happy Days Are Here Again*）。当他微笑着站在那里时，代表们扯着嗓子向他欢呼，而他的妈妈和妹妹们则站在他的两侧。他简短地讲了话，表达了他的感激，然后，坐车返回了罗斯莫尔北路的公寓。

到了公寓之后，肯尼迪告诉戴夫，庆祝活动让他累得够呛，他觉得饿了。戴夫为他煎了两个蛋，吃完，杰克便准备睡觉了。与此同时，他的工作人员以鲍勃为首正在讨论副总统的问题。在那里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他们未来的领导人只有两个参议员人选：密苏里州的赛明顿和华盛顿州的亨利·杰克逊。约翰逊的名字并没有被提及。几周之前，肯尼迪曾经说过：如果他不能当选总统，约翰逊就是最佳的替代人选。但约翰逊本周曾放过狠话，而且这个大个子的得克萨斯州人让为肯尼迪的胜利付出艰辛努力的这些人感到厌恶，他们不会提到这个自由主义者的头儿，他给他们的代表团穿过小鞋，或许大部分代表在初选时就是支持肯尼迪的。而且，约翰逊曾经说过，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职位，而换成做一个无所事事的美国副总统的。戴夫煎蛋时，肯尼迪在阅读贺电，他吃惊地发现，最热情和最得体的电文竟然出自投票时得票数位居第二的这位候选人。贺电上面写着：“LBJ（林登·久恩斯·约翰逊名字的缩写）现在的意思是‘让我们支持杰克’。”

睡觉前，肯尼迪试着给约翰逊打电话，但约翰逊吩咐说不得打搅他。杰克随即口授了一份电报给他，要求在第二天上午10点会面。戴夫想：“上帝，他要把它给林登·约翰逊。”鲍尔斯跟小瓢虫一样沮丧。杰克不相信西部联合电报公司，他在第二天早晨8点30分亲自打电话告诉她，他想要跟她的丈夫通话。她摇醒林登，而且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亲爱的，我知道他打算让你做副总统，我希望你不要接受。”林登打电话给萨姆·雷伯尔尼，他说的差不多是同样的内容。

然后，这位得克萨斯人开始思考。无论谁当选总统，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职位都只是艾森豪威尔荣耀下的影子，而美国副总统这个职位则可以让他不再担任党派性较强的角色，而且也不再是一个只考虑得克萨斯州选民之事的领导者。最后，他们必须考虑共和党准备要提名的那个人，对雷伯尔尼来说，这是决定性的。萨姆·雷伯尔尼甚至无法鼓起勇气说出尼克松的名字。他说："林登，你非得接受候选人提名不可。"林登问是什么让他改变了主意。萨姆先生说道："那个家伙说我是叛徒，我可不想让叫我是叛徒的人当美国总统。"

肯尼迪的工作人员非常难以接受。在给林登打过电话之后，杰克又把电话打到比特摩尔酒店的套房，将他的决定告诉了鲍勃。鲍勃感到震惊。塞林格和奥唐奈则十分生气。不过，鲍勃很快清醒过来，说他们需要得克萨斯州，以便在11月取得胜利。戴夫告诉你说："就算杰克希望把它给埃莉诺·罗斯福，鲍勃也可能会说没有问题。"一想到曾经对劳工组织和民权组织领导人要共同抗击约翰逊的承诺，肯尼的怒火就忍不住地往上蹿。杰克赶到套房时，看了他一眼，说道："我们最好在浴室里单独谈谈。"他的情绪正是最激烈的时候，而奥唐奈有权要求一个解释。他说："首先，约翰逊不会接受他的提议，可能不会。"但是，"我43岁，是最健康的候选人。我不会死在任期中。因此，副总统没有任何意义。"然而，这可以让美国南部各州在11月转投民主党的阵营，如果肯尼迪在没有约翰逊的情况下取胜，"作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我就与林登势如水火。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林登成为美国副总统，我会启用参议院的迈克·曼斯菲尔德，或者我信任和依赖的某个人吗？"

奥唐奈开始冷静下来。不过，套房中的其他人仍然不愉快。据见过的人说，沃尔特·鲁瑟、阿瑟·戈德堡和乔治·米尼当时都气得不得了。在他们看来，林登·约翰逊是反工会的，是披着民主党外衣的共和党人。对肯尼迪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而他是否希望林登婉言拒绝将永远不为人所知。这是他没有讨论过的议题之一。然而，他对他的承诺并非是绝对的，因为他给了他一个退出的机会。而借口就是存在党内论战的可能性。约翰逊回答说，没有什么比来一场名副其实的党内论战更让他喜欢的了，就这样定了。毫无疑问，林登跨上了这辆双驾马车。

与此同时，肯尼迪套房里的局面发生了逆转。迪萨尔、贝利、里比科夫和劳伦斯晃悠在杰克周围，向他表示祝贺，因为他让候选人名单的实力得到了增强。直到亚历克斯·罗斯给工会有影响的元老戴维·杜宾斯基

打电话时，自由主义者仍然在嘟囔着“被出卖了”。打完电话后，他转而打给鲁瑟，汇报说：“他说肯尼迪走的这一步棋很聪明。他说选择约翰逊在政治上是一妙招。”约翰逊的提名顺利通过，周五晚上，约翰·肯尼迪在洛杉矶体育馆发表了他接受提名的演讲，宣称“我们站在了新边疆的前沿”，现场的观众为8万人，而通过电视收看的美国人达到了3500万。

非凡的经历被认为可以改变人，而认识他们的人就能找到证据。肯尼迪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改变的过程，的确，他最出色的品质之一就是他的成长能力，如你所知，在获得提名之后，他还是这样的人，只有一次有趣的例外。他对政治对手总是很慷慨。他同情被自己打败的人。在他的参议员办公室里，他警告自己的工作人员，他不想听到丑化与他政见不同的政治家的评论。绝对禁止有关反对艾克的笑话。但在洛杉矶之后，越来越明显的是，他开始嘲弄理查德·尼克松。自从报纸引用了尼克松在夏威夷说的不得体的话之后，杰克就开始蔑视他。肯尼迪笑着说，他希望这是某种趋势的开始。然后，他开始阅读尼克松的竞选演讲。他认为他讲得水平很差，他问：为什么这个人会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跟人说话？他的言辞越来越犀利：“特里西娅说的每句话他都要教她怎么说，我简直受不了。他就是一个不入流的玩意儿，如此而已。”只要尼克松开口讲话，上来就是“帕特和我”，这种习惯把杰克恶心坏了。后来，据哈罗德·麦克米伦透露，艾森豪威尔告诉他，永远不要邀请尼克松去戴维营（Camp David），而艾克说的是：“我不会让他来这个地方。”听到这里，肯尼迪身心大悦。他坚持认为，他不属于恨尼克松成癖的那些人，只不过是觉得他“不可救药”，或在不同的时间说过他“恶心”，或“恶心，恶心”，至少有一次说过“恶心，恶心，恶心”。多数政治家会诋毁他们的对手，尤其是当竞争白热化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些话之所以被人记住乃是因为从肯尼迪嘴里说出来实在是很稀罕。

肯尼迪已经构想好了战略。他会求助于年轻人、蓝领工人和自由主义者。他的两大根据地是美国南部的民主党和工业区，而约翰逊的任务是要牢牢地抓住南部的民主党。肯尼迪的总统竞选活动将集中在9个大州：马萨诸塞、加利福尼亚、纽约、得克萨斯、新泽西、伊利诺伊、俄亥俄、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如果获胜，它们将会给他带来进入白宫所需的269张选举人票中的237票。他的技巧包括700万未注册选民的大规模注册（几乎每4个新注册选民中有3个现在是民主党人），清晰地表达

出其常春藤盟校智囊团的理念，以及爱尔兰经验丰富的政治家的那些创新的政治谋略，这些人以奥唐奈和奥布赖恩为首，当然，还有罗伯特·肯尼迪。

因为运气太差，尼克松在短时间内难以开展工作。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伯勒，他被车门碰伤了自己的右膝盖骨。在伤还未愈的情况下，又发生了感染。他被告知，除非在沃尔特·里德医院（Walter Reed）接受两周的强化治疗，否则，软组织就会坏死。因此，他从8月29日一直躺到了9月9日，腿部做了牵引，一想到失去的时间，他就恼怒不已（在他无法行动期间，肯尼迪一次也没有谈到过他）。杰克打算尽力竞选，尽可能延长时间，但共和党的被提名人认为，竞选活动有高潮，也有低潮，仅无礼这一点，就会有让选民因感到厌烦而冷淡对待的危险。他的目标是让竞选活动在竞选日那天达到“顶点”，将其带到高潮。像其对手一样，他计划全力应对关键的州，它们是纽约、加利福尼亚、密歇根、得克萨斯、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伊利诺伊。他也承诺会去另外的43个州，但后来，他后悔了，不该说出这一承诺。他没有智囊团，现在常常是形单影只，忧郁而内向。肯尼迪竞选活动的基调是美国人的影响力正在下降，美国人必须奋力前进，而他提出的口号是“让我们推动美国再次前进”，这句话是沃尔特·罗斯托贡献的，而共和党的领导人则鼓吹自由企业、个人责任、坚定不移地反对共产主义以及持续和平和繁荣的优点，这些都是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标志。尼克松固有的优势是得到了大企业、更出色的经历、牢固的中产阶级根基和当时还在任的艾森豪威尔的支持。但艾克给了尼克松的竞选活动以最严重的打击。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他：“在你的任期内，副总统参与过什么重大决策吗？”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回答几乎让人无法相信：“如果你给我一周的时间，可能我会想起来一个。”

在尼克松被提名之后，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显示，共和党略微领先，但到了8月下旬，两位候选人就并驾齐驱了，在整个竞选活动期间，两位被提名人都从未有过高枕无忧的时候。竞选中有两项活动让尼克松非常头痛，那就是肯尼迪与宗教偏执派的对抗和电视辩论。西弗吉尼亚州的事实证明，如果不理睬这个问题，肯尼迪的信仰应该会让他损失选票，但一旦沉默被打破，他就会得到选票。因此，尼克松指示他的工作人员避免谈论肯尼迪的宗教问题。遗憾的是，他无法阻止诺曼·文森特·皮尔博士，他可能是美国最著名的新教牧师，也是尼克松的朋友。皮尔领着一群新教徒发表了一个引发争论的声明，他们对信仰罗马天主教的美

国总统能否不受梵蒂冈的影响表示怀疑。尼克松不会抨击皮尔，但他的沉默被理解成了赞成他的想法。与此同时，等于是给了肯尼迪一个无可比拟的机会。大休斯敦部长协会（the Greater Houston Ministerial Association）曾邀请他到会，捍卫其作为天主教徒当选美国总统的权利。尼克松也曾受邀，但被他立刻拒绝了。肯尼迪接受了邀请。

这个话题是由丹尼尔·波林引发的，他是费城的一位牧师，也在竞选共和党的职位。波林指责肯尼迪，称作为一位年轻的议员，他曾经拒绝出席为纪念在“二战”中随“多切斯特”号运兵船（SS Dorchester）一起沉没的四位随军牧师的筹资晚宴。肯尼迪确实拒绝过，但原因是他被邀请以罗马天主教会“代言人”的身份出席。他说，他可以以众议员的身份参加，可以以海军老兵的身份参加，或以公民个人的身份参加，但没有代表他所在教会的资格。约翰逊和雷伯尔尼建议他不要理会休斯敦的邀请，但杰克坚定不移。他被告知可以做一个开场声明，接着是提问和回答的时间，而且整个活动会被电视转播。

那晚，有300位部长和300位观众聚在一起。肯尼迪感到紧张，但如平时一样，你只能从他手部的颤抖看出一点儿端倪。在实况转播中，他敏锐、有力、准确，并能立即调控自己。他告诉他们：此次美国总统竞选的真正问题不是他的宗教信仰，或尼克松的宗教信仰，也不是任何人的宗教信仰，而是饥饿的儿童、付不起医生账单的美国老年人、丢人现眼的贫民窟、学校资源的不足和美国不适当的外交政策。他说：“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但因为我是一个天主教徒，这次竞选活动的真正议题被掩盖了。因此，显然我有必要再次声明：问题不在于我信仰哪种宗教，那只对我自己有意义，而是我信仰什么样的美国。”他重申了在西弗吉尼亚州时采取的立场。对于或明或暗的问题，肯尼迪都准确而轻松地进行了应对。他也被问及波林博士的抱怨，他回答说：“我怎么可能以罗马天主教代言人的身份参加呢？”从而将这一问题化解于无形。在附近一家宾馆的房间里，戴夫·鲍尔斯正与萨姆·雷伯尔尼一起看电视转播。在洛杉矶时，雷伯尔尼对肯尼迪的支持已经冷却了。现在他尖叫道：“上帝做证，看看他，听听他说的！他这是在生吞活剥他们啊！”几天之后，先在奥斯汀，后在达拉斯，他告诉众人，肯尼迪是“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美国北部地区最出色的民主党人。”

随着电话和电报的不断增多，杰克的情绪也高涨起来。他与尼克松的第一场辩论从现在起，还剩两周的时间，休斯敦一行确实是接下来的

辩论所需要的兴奋剂。过去10年来，拥有电视机的美国家庭数量已经增加了8倍。全美国等在客厅里收看这次活动的人大约有7000万。辩论共有4场，但人们预计，第一场是最重要的。到目前为止，情况的确如此。它吸引了最多的观众，而且肯尼迪胜了。结果让尼克松感到灰心丧气，甚感意外。他是一位自信的辩论高手。在观看肯尼迪在美国民主党全国大会最后接受提名的演讲电视转播时，尼克松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竞争对手正是身心疲惫之时，他认为民主党的候选人语速太快，声调太高，而且提到的概念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过于复杂。这就是尼克松敢于接受辩论挑战的原因。

第一场辩论结束时，你感觉在语言和理念上，双方打成了平手。但辩论本身就是肯尼迪的胜利。直到那时，尼克松还是两人之中比较知名的，而且实际上，他的职位也较高。但在这里，他们短兵相接，肯尼迪拥有了自己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他更好看，本来这无关紧要，但事实上，非常重要。那晚通过收音机收听他们辩论的听众认为他们俩长得都还可以，但大量的电视观众看到的参议员是皮肤晒得很黑，身体健康，而尼克松则在沃尔特·里德医院里瘦了5磅。他一脸的憔悴，而且穿的那件衬衫的领子对他来说过大了。他无精打采地站着，表情闷闷不乐，脸色苍白，这是把化妆品涂抹在脸上的结果，而这种化妆品是专门用于遮掩下午长出的胡须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是杰克对其对手越来越不客气的缘故。那似乎是毁灭性的，对任何一个观众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每当尼克松表明一个重要的观点，镜头就会转向肯尼迪，他那愉快而略带蔑视的表情就会打断共和党辩论的思路。在首轮辩论结束时，尼克松把杰克拉到一旁，用最真诚的态度与之交谈了几分钟。后来，你问杰克他们到底谈了什么。他干脆地说：“没什么，绝对没什么。谈了一会儿天气，然后说在竞选期间很难入睡。但他一直两眼盯着摄影师，如果看到哪位摄影师打算按快门，他就会目光坚定地看着我，并用他的手指戳着我的胸膛，似乎是在让我正确了解某些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真是好人呐。”后来，他问道：“你认为人们认识到我是站在尼克松和白宫之间唯一的人选了吗？”

盖洛普接下来的民意调查显示，肯尼迪无疑跑到了前面。尼克松恢复了体重，看上去和杰克一样健康，而且在后面的辩论中获得了更多的分数，但一切都是徒劳的，大众已经看到了他们想看的，他们的脑子里

已经形成了固有的想法。在最后一次辩论之后和艾森豪威尔介入从而掀起一场全新的竞选运动之前，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是肯尼迪赢得了51%，尼克松赢得了45%，另有4%尚未决定归属。

回想一下，关于杰克的总统竞选活动，最能让你记住的是其很强的幽默感。在一次演讲中，肯尼迪说："竞选献金无法取代在外交职务上接受的培训和经验。"几天之后，他补充道："自从我说了那番话，就再也没有从我父亲手里收到过一个子儿。"有时，杰克会和自己没有幽默感的对手开一下玩笑，把他当成自己的诙谐搭档。尼克松称他是"另一个杜鲁门"。肯尼迪反击说："我会毫不犹豫地照样回敬他。我认为他是另一个杜威。"共和党人说乔·肯尼迪将要贿赂选民（并不是第一次这样说）。杰克则说："我的父亲告诉我，若非必要，一张多余的选票也不要买。他说，他绝对不会为一个压倒性的胜利而掏钱。"他似乎欢迎激烈的质问者。在纽约大学，面对一群青年共和党人（Young Republican）对他的嘲笑，他送上了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你们都是尼克松的年轻粉丝，你们8个人都是。"其中一人说他们的候选人在"厨房辩论"中敢于面对赫鲁晓夫。杰克说："尼克松先生可能在厨房辩论方面非常有经验，但我知道很多其他已婚男士也擅长此道。"

选举前8天，艾森豪威尔在万圣节前夕便行动起来，为共和党提名人大造声势，差一点儿就赢得了普选。这其中的巨大的秘密在于，艾克等的时间太长了。答案有几种。4年以前，艾森豪威尔为其副总统安排了一个内阁职位，不是在美国国防部就是在美国国务院，他提出的理由是：他可以以此为基础，巩固其在1960年竞选时的职位，但尼克松对此很生气，认为这是艾克想甩了他。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艾克在自己讲完话后就离开了，没有看到尼克松被提名。尼克松再次感觉受到了伤害，而艾森豪威尔却认为，他是把整个舞台都留给了尼克松，这是在帮他。肯尼迪对艾克政绩的抨击令他感到痛苦，因此渴望马上把他驳倒，只是要等着尼克松先进行反驳。尼克松则期待着艾克自愿出击。最后，白宫里一位低级别的助理听到副总统的一位低级别助理提到，尼克松急需总统的帮助。艾森豪威尔直到听到这个话，才开始做准备。

他吸引了大量的群众，猛烈抨击肯尼迪，激起一片赞同的叫喊。正如白修德写的那样："艾森豪威尔拥有……一种美国政治活动的魔力，也就是他能让人高兴，这是他独有的。"艾克坚信，美国没有什么仍未解决

的问题会在明天突然消失，他的支持者也相信他。杰克则走了一条非常不同的路线。一般情况下，他的开场白是：“我竞选总统不是为了讲你们想听的。我竞选是因为如果我们想维护自由，我们需要在危险的时刻能有人告诉我们必须要做什么。”然后，他会谈及非洲的混乱、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美国停滞不前的经济和那些百无聊赖且胸无大志的年轻人，当杰克如此这般描述这些问题时，你有了危机感。“我们或许是仅剩的自由主义爱国者，阔步行进在竞选之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美国，而它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们正要拨乱反正。”

然而，对其他人来说，对那些在挑战面前畏缩不前的人来说，肯尼迪传递的信息听起来必定像是绝望之人冗长而乏味的陈述。他的自信心动摇了，他尝试着唤醒大众，但他或许只是吓到了他们。怀着这样的心情，他赶到了旧金山。在一群人的簇拥下，他穿过皇宫酒店的大厅，就在那时，他看到一位朋友，那个人做了一个熟悉的手势，意思是说，“到楼上见我”。这完全是1946年波士顿贝尔维尤街的重演。杰克泡在放满热水的浴缸中。他以假装的客套作为开场白：“请坐，别客气。”然后，换作另一副面孔，用全然不同的语调说：“上周，迪克·尼克松惊慌失措，艾克开始讲话了。他每说一个词，我就能感到选民远离我了一步。我告诉你们，他正在痛扁我们。”他又柔声地说道：“如果明天选举，我可以轻松取胜，但从现在起，还有6天，那就只能是争取了。”他几乎是在自言自语。

于是，焦虑向他袭来，这是一个不请自到的客人。但是，他的回忆中没有恐惧，那种感觉简直让人无法再次体验。其他的回忆大量涌现，景象和声音就像蒙太奇镜头一样切换：肯尼迪对尼克松高挥手臂的方式越来越厌恶……杰克自己的手势是右手猛砍，以强调重点……尼克松揭露杜鲁门的不敬行为，他发誓在白宫从没有过亵渎和玷污总统职位的言行……在肯尼迪的车队经过时，十几岁的青少年们有的跟着跑，有的想要触摸他，有的欢呼雀跃，也有的尖声大叫……尼克松曾表示，在他的任期内，永远不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当肯尼迪谈及今后几年，称这将是“具有挑战和革命性的60年代”时，大学校园里爆发出的热情……尼克松想要重启原子弹试验，并指责说其对手的批评“正在削弱美国，并让我们产生自卑感”。

突然，“放映”结束了，肯尼迪要回家了。半夜，“卡罗琳”号专机在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降落，你们汇入到沃特伯里附近的车流之中，

道路两侧接近30英里，到处是欢呼的新英格兰人，他们在睡衣外面穿上外套，挥动着火炬、手电筒和红灯，消防车都在消防站外面排成排，汽笛在尖叫，钟声敲响，在清晨3点抵达他的宾馆房间之后，肯尼迪出现在阳台上，催促人们回去睡觉，但4万群众仍然待在外面，彻夜欢呼，直到黎明。周一，凌晨1点30分，你们抵达缅因州的刘易斯顿。天很冷，街道上空荡荡的，寂静无声。突然，车队拐入一个公园，有2万多人聚集在那里，开着他们的手电筒，当他们认出杰克时，开始欢呼，快乐地欢呼，虽然是半夜时分，而且身处一个寒冷的工业城镇，但此处温暖和狂欢的感觉会让你怀念终生。

最后一天是在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游行队伍穿越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结束于波士顿的北区，14年前，他正是从这里开始竞选活动的。按照日程安排，他要在波士顿花园体育馆的群众集会上致辞，但道路拥堵得很厉害，他迟到了；然后，他不得不再次设法抵达法尼尔厅。大约200年前，“自由之子”在此集会，策划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就在那里，他向全美发表了电视告别演讲。然后，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的14层，他与几位老朋友边闲谈，边吃着鸡肉三明治，喝着一杯牛奶。在过去的一周里，他每晚的睡眠时间都不超过4小时。你以为明天他会起得晚一些，但不是，他想要你在第二天早上7点30分就喊他起床。杰奎琳会从海恩尼斯港赶来，与他一起投票。他对此感到紧张。她已经怀孕8个月了，热情的人群是不可预测的，他自然希望陪在她身边。

那天艳阳高照，68832818名美国人去了投票站，其中就有波士顿鲍登街122号的约翰·肯尼迪夫妇，上午8点43分，他们在第六选区的第三分区投下了各自的选票。杰克预期会有很多人在现场，果不其然，但他的妻子不能在人群中被挤来推去。然而，刺骨的寒风又让他有了新的担忧：她可能会感冒。因此，在开车去机场之前，敞篷车顶就被合上了，现在，他们要在机场登上“卡罗琳”号专机飞去海恩尼斯港。

全家人聚集在鲍勃的房间，等待着第一次的投票结果。肯尼迪以10万票拿下了康涅狄格州。他的妹妹们高兴得叫喊起来，相信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大使的朋友莫顿·唐尼是男高音歌唱家，此时正要求来一块三明治，低声哼唱着《你的母亲来自爱尔兰吗》，在楼上，路·哈里斯坐在那里，拿着一把计算尺和一沓纸，检查自己的计算，并与网络计算机的

结果进行对比。杰克咯咯地笑着说：“路在跟机器比拼。”边说边点燃了一根哈瓦那的皇家细长雪茄。没一会儿，他、杰奎琳和比尔·沃尔顿便起身到杰克的房间吃晚饭，当他们返回与其他人再在一起时，没有人是兴高采烈的。他正在失去俄亥俄州、威斯康星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以及密西西比州西部的农业区，在密歇根州和伊利诺伊州，选票情况也低于预期。可以看出，除了被提名人自己，每个人都很沮丧。他仍保持着自己的幽默感。林登从得克萨斯州打来电话，而肯尼迪接电话时还咧嘴笑着。他转述了林登·约翰逊的话：“我看到我们在宾夕法尼亚赢了，但在俄亥俄，你的情况怎么样？”

等待他们的是杰奎琳后来称之为“历史上最漫长的一夜”。慢慢地，格局显现出来。尼克松输了，虽然肯尼迪在选举人票上领先，但还没有赢。似乎要取决于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明尼苏达和密歇根4个州的结果了。它们中任何两个州的支持都能让肯尼迪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如果没有，那么此次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就要交由众议院决定。杰克打着哈欠，准备起身离开。一位朋友问他要去哪里。他说：“睡觉。选票都已经投了，我现在什么也不能改变。”在他睡觉之时，选战结果仍然摇摆不定。杰克输了加利福尼亚，却赢了伊利诺伊、密歇根和明尼苏达。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获得了303张选举人票，而尼克松只获得了210张。他成功当选美国总统。美国特勤局已于早晨5点45分入驻，让特勤人员感到震惊的是，他们看到了肯尼迪残酷的家族史上最凶猛的触身式橄榄球比赛，而且他们发誓要保护的这个人却正在受到来自其家人的各个方向的攻击，这些人脸上的那种表情至今都留存在你对那天最为鲜活的记忆当中。

回过头看，接下来的10周其实形势并不明朗，就像是局间休息、课间放松或体育活动进行了一半。一系列重大事件已经完成，其他的事件则需要等待选手换好制服才可以开始。这种转瞬即逝的感觉由于杰克的流动性而更加彰显，他约见预期中的内阁成员，并在棕榈滩、纽约的卡莱尔酒店和他位于乔治城的家的门阶上，宣布了对他们的任命。他说过想要一个“贤能内阁”，但找到有才能的人要比他预期的困难得多。他私下里说过：“过去4年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认识能帮我选上美国总统的人，以致我没有时间了解谁能在我当选之后帮我当好一个总统。”他决定任命阿瑟·施莱辛格，而不是让阿瑟来撰写他自己的历史，杰克打算亲自

撰写，因为他知道，阿瑟无论如何都会带有他自己的理解，而且作为一个白宫的特别助理，而不是《时代周刊》或《纽约时报》的读者，更有利于其才华的展示，他将会把工作做得更好。不过，施莱辛格不会搜罗来一帮像争取民主行动组织（ADA）那类的美国人加入，也不允许爱尔兰人“过多地充斥着这届政府，搞得好像是一个哥伦布骑士会（Knights of Columbus）似的”。其团队成员都在忙于研究一本厚重的绿皮书，它描述了不用征求美国国会的意见，总统就能直接委任的1200个职位。杰克说要为所有人找到位置，并说：“不用担心，我已经看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我们全都已经下过一些功夫了。”以此让他们放心。

被委任者一个接一个地被选了出来。在与父亲交流之后，杰克任命迪安·腊斯克担任美国国务卿，任命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担任美国国防部部长。他希望罗伯特·洛维特加入内阁，洛维特拒绝了，但向他推荐了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的院长麦乔治·邦迪，后来，邦迪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的特别助理。奥维尔·弗里曼被任命为美国农业部部长。（一位记者问他为什么会选他，他回答说：“我认为这肯定与哈佛还没有设立农学院有关。”）阿德莱·史蒂文森将要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而美国司法部部长将由罗伯特·肯尼迪担任。鲍勃正为此在奋斗。他知道这会引起轩然大波，《纽约时报》已经告诫过新当选的美国总统，不要任命他弟弟担任某个重要职位。杰克不为所动。其实，这件事跟他们是兄弟没有关系，他说：“我能想到的最能干的人，没有比鲍勃做得更好的。”大使此时介入，说服他不太愿意的弟弟接受这一任命。但事情刚一得以解决，他就开始奚落自己的弟弟，这是肯尼迪的性格特点。在被问及打算如何对外宣布任命时，他说他会等到某天凌晨2点，打开门，环视N街，如果四顾无人的话，他会小声地说：“是鲍勃。”接下来，在回答有关他的这一选择适当性的问题时，他公开地说：“在他到外面当律师之前，给他一点儿司法的经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这句话让他的弟弟吃不消了，他提出了抗议。杰克告诉他，必须学会开自己的玩笑。“但你可不开自己的玩笑。”鲍勃一语道破，“你只是在开我的玩笑。”

在与妻子和女儿过了一个平静的感恩节之后，那天晚上，杰克登上“卡罗琳”号专机，飞去棕榈滩，当飞机驾驶员收到一个加急电报时，他正在讨论非正式顾问团的任命。杰奎琳肚子里的孩子并非预期的那样，还要再等两周，她已经开始阵痛，现在正在医院里，即将剖腹产。杰克感到沮丧，他懊悔地说：“我从未在她需要我的时候陪在那里。”在

佛罗里达落地之后，他立即乘坐一架更快的飞机返回，坐在驾驶舱里，戴着耳机，紧张地等待着来自华盛顿的消息。此时是凌晨1点17分。现在，他成了小约翰·肯尼迪的父亲。杰奎琳和婴儿都平安。肯尼迪用一块手帕擦着他的额头，接下来的两周里，他一直待在乔治城，每天去医院三次，带着卡罗琳走路和骑小马。杰奎琳和小约翰出院后，他们全家便乘飞机来到了棕榈滩，就职仪式之前的几周，她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每天无非就是休息，晒太阳。

12月初，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正式见面。对艾克来说，杰克不只是“那小子”，也是一个“妄自尊大的年轻人”。在为与尼克松的第一次辩论做准备时，肯尼迪曾突击钻研过他们的讲话。克拉克·克利福德陪他来到白宫，艾森豪威尔和威尔顿·珀森斯将军正在那里等着他们。两位美国总统一起度过了一小时外加一刻钟，然后再次现身，手挽着手走出来。后来，珀森斯打电话给克利福德，告诉他艾克“已被肯尼迪参议员征服了，源于他对世界问题的理解、所提问题的深度、对论题的把握和思维的敏锐”。

11月18日，肯尼迪获知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武装和训练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以便返回自己的祖国。艾克告诉他：帮助他们是“这个政府的政策”，他希望“这一努力”能够“继续和加速进行”。在离任的最后一天，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和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再次会面，艾森豪威尔说，当前最让他感到忧虑的是老挝。他站在一幅南亚地图前说道：“这是我留给你，而我并不满意的问题之一。我们可能不得不打仗。”后来，当肯尼迪在白宫安顿下来后，他惊讶地告诉一位助理：“你知道吗，艾克都没跟我简单介绍一下越南的情况。”

位于N街的房子已经卖掉了，就像很多家庭一样，他们准备搬进新房子，肯尼迪的家人正在处理无数的琐碎问题，其中一些是关于他们新住所的。杰克想在就职典礼上戴一个高顶的大圆礼帽，而且想要让玛丽安·安德森在现场唱国歌，让罗伯特·弗罗斯特为自己写一首就职诗，而且想要用菲茨杰拉德家的《圣经》宣誓。他假模假样地挖苦道：如果能找到某种办法防止他的女儿在新闻发布会上抢他镜的话，他将非常感激。而卡罗琳最后一个走进房间，脚上穿着她妈妈的鞋，踉踉跄跄。有人告诉他，这个问题不会再出现了，至少，在这里不会。在剩下的两天交接时间里，他没有和女儿住在一起。杰奎琳从佛罗里达赶了回来，正马不

停蹄地做准备，她把他从家里赶了出去，正如伊夫琳·林肯在电话里给比尔·沃尔顿解释的那样：“把他撵走了，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搬到白宫，他们几乎剩不下几件家具，也就没有他的地方了。”沃尔顿问道：“那他会去哪里呢？”伊夫琳说：“他决定找你去。”说完就挂了电话。1月19日，下午4点15分，在其就职前20小时，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正在沃尔顿家的一个小角落里工作。他正与阿瑟·戈德堡交换意见，戈德堡将要担任他的劳工部长，此时，他瞄了一眼窗外。鹅毛大雪刚开始飘落，看上去不像要停的样子，应该还会下很长时间。

---

1. 1英寸≈0.025米。——编者注
2. 迪克·尼克松即前文提到的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理查德·尼克松），美国第37任总统。——编者注
3. 前文的特迪（Teddy）和此处的特德（Ted）都指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Teddy和Ted都是男子教名Edward的昵称。——译者注
4. 波托马克热（Potomac Fever）并不是一种真的病，因贯穿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而来，它指政治人物久居华盛顿之后沾染的习气，其症状可能是有官瘾，或过高估计自己的身价，对自己的地位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等。——译者注
5. 弗兰克·罗斯福即罗斯福总统的儿子小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弗兰克是别名。“那个著名的邮戳”指的是纽约海德公园（Hyde Park），这是罗斯福总统家的所在地。——译者注

第四章 他自己

肯尼迪以其远见卓识、仁义爱心的演讲感动了对手，进而影响了中苏关系。他又是一个爱父亲的儿子，爱自己子女的父亲，推己及人，在谈到需要阻止核试验时，他告诉你："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还未出生的几代人的总统，而且也不只是美国几代人的总统。"

从漫长、阴郁的冬日黄昏起，雪就一直静悄悄地下着，飘落在地上积成一层厚而松软的白雪，直到上午8点，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和他的妻子才抵达宪法大厅，出席音乐会，此时的哥伦比亚特区覆盖在皑皑白雪之下，天寒地冻。长长的黑色豪华轿车载着尊贵的客人赶去参加早就广而告之的庆典活动，整个城市的交通严重堵塞，陷入一片混乱。在林肯纪念堂周边的某个地方是从希考里山庄来的一个车队，领头的是已经当选但还没有就职的美国司法部新部长及其妻子埃塞尔，随后的车上都是肯尼迪的朋友，他们在其他地方无法找到住的地方。鲍勃一行人正朝着军械库行进，弗兰克·西纳特拉和彼特·劳福德正在那里焦急地等着前去参加"欢庆招待会"的听众，他们为此已经彩排好几周了。突然，他们听到路边的人群重复喊道："是鲍勃·肯尼迪！是鲍勃·肯尼迪！"警察此时贴着人群维持秩序，以便为从希考里山庄来的车队留出地方。

雪还在下，星星点点地落在士兵冻得通红的脸上，这些士兵正用火焰喷射器融化美国国会大厦东侧就职典礼台周边结的冰，华盛顿特区许多方形路和环形路都被深埋雪下，行政办公楼和联邦三角区内许多大厦的屋檐都似乎被一条闪着微光的雪线连接了起来。美国国家广场周围点起了明火，试图为交通提供清晰的标志，但火焰位置太低了，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从波托马克河和潮汐湾刮来的风夹着雪呼啸而至，在湿冷的狂风到来之前，生硬的白色泥沙就已经先行掠过。就像被默林神奇的手触摸过一样，当选总统的豪华轿车及其特勤人员的备用车在交通拥堵中突出重围，快速行进，而其他车辆却静止不动。在人行道上模模糊糊的人群中传来了喊声，请求他打开车里的灯，"这样我们就能看到杰奎琳了"，他照做了，但并不是为了取悦他们，而是为了工作；他仍在修改就职演讲稿。早些时候，他读过杰斐逊的致辞，不无挖苦地告诉沃尔顿："比我的好。"按照沃尔特·李普曼的建议，他把"那些与我们为敌的

国家”改成了“……与我们作对的……”最后还有一次修改，把“问你会（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改成“问你能做什么”。

半夜时分，他拜访了斯图尔特·艾尔索普，然后，又去了就职舞会，一直玩到凌晨3点45分，直至此时，杰奎琳才允许他回到自己的住房。黎明时，雪已经停了，但气温只有约零下7摄氏度，而寒风也正在肆虐。杰克独自去弥撒，这让他的妈妈很高兴，她坐在教堂的另一角，认为他可能看不到她。上午10点40分，萨姆·雷伯尔尼和约翰·斯帕克曼参议员抵达N街，他们坐着总统的透明防弹罩林肯汽车，来接肯尼迪一家人。艾森豪威尔夫妇在白宫的红厅（Red Room）里等待着他们。艾克戴上他的圆顶高帽，其妻子笑了，说道：“他看上去真像爱尔兰的帕迪。”在国会山，很多人等在那里，他们冻得直哆嗦；看到肯尼迪，他们欢呼起来，希望很快就能听到他的演讲。随着枢机主教库欣似乎没完没了的高音祈祷，他们的希望变得渺茫起来。新一届领导班子出场时并没有秩序。主教阁下祈祷结束时，诵经台下面的电线短路，冒出袅袅升起的烟。美国特勤局的负责人吓坏了，害怕整个典礼台都会被大火吞没。他亲自检查，有三次打算下命令疏散人群。然后，烟消散了，只是很快就又发生了一次故障。罗伯特·弗罗斯特站起来读他的诗，但被雪反射的太阳光亮得让他无法看见，因此，他凭借记忆背诵了另外一首诗。最后，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主持宣誓仪式。下午12点51分，差不多再有一个小时，肯尼迪就将正式成为美国第35任总统。他转过脸，面对人群，他们来自四面八方，群情激昂。他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外套，口中呼出的雾气飘散在空气中，精力充沛的美国新总统为新的时代确定了基调：“让这些话从此时此地传到朋友和敌人的耳朵里，火炬已传到了新一代美国人的手中……他们经受过战争的洗礼，从艰苦卓绝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吸取了教训，并为古老的传统而自豪。”

11月的时候，不到一半的美国选民将他们的票投给了肯尼迪，但选民的态度会出现波动，不只是在竞选活动期间，之后也会继续。上任伊始，他决心扩大国民对他的支持。选举之后，他读过理查德·诺伊施塔特的《总统的权力》（*Presidential Power*），该书总结说：总统的公众评价“会影响大多数选民的看法，而且不会晚于他们开始觉得他是总统之时”（不同于把他看成是一位候选人）。肯尼迪决定让美国人在第一次看到作为总统的他时，他是在工作，而且比其他总统更勤奋。虽然第二天是周

六，他却告诉自己的工作人员明天正常上班，在林肯的床上睡了一夜好觉之后，他在上午8点之前便来到了白宫的总统办公室，陪同前往的是他的几位老朋友。他在自己的电话控制台上逐一试了试8个按键，对能召唤伊夫琳和肯的键则是猛按一气，他们的办公室就紧邻他的房间。他还按下了艾克所谓的应急按钮，没过几分钟就有一架直升机盘旋着落在了外面的南草坪上。这一切似乎不真实。杰克问“红费伊”：“保罗，你认为这合适吗？”这很微妙，说明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红费伊”答道：“现在我立马觉得某个家伙将要从某扇门里伸出头来说，‘好吧，各位，离开这里’。”

那天和随后几周里，新总统活力四射。他会在走廊里踱步时快速口授，一边走路，一边阅读，突然冲到外面轻快地散步，然后快步返回，几乎就是全速跑，而且不断地打着响指。詹姆斯·赖斯顿在《纽约时报》描写过他典型的一天：“他期待着今天干的每件事都能光照华盛顿纪念碑。”有位议员评论说：“当你看到总统，你就必须立刻钻进自己的车里，闪电般地开回国会大厦，抢在他发出备忘录影响你对他的描述之前将它们写下来。”肯尼迪曾经说过，总统是“行动的生命中枢”。这符合他的性格脾气，因此，在举行第一次总统记者招待会、组建和平队、重组白宫工作团队和发表前所未有数量的演讲时，他既会凭直觉做事，也会为自己脸上贴金。杰奎琳曾被问及为什么他会如此异常活跃。她答道：“因为他想知道一切。”但他还有另外一个动机。他想最大限度地保持同胞对他的关注。他正在力求实现这一点。记者和电视评论员几乎是马不停蹄地报道新一届政府的工作进展。电视播放记者招待会已经普及。还记得他与尼克松的第一次辩论吗？杰克成为认识到并利用了电视潜在价值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他更加拼命地工作，并决心拓展自己最为重要的基础。他所需要的人正看着他，而且他希望能确保他们喜欢看到他的所作所为。不戴帽子和不穿外套表现出来的活力对他有所帮助，但对制帽行业没有好处，该行业的销售额正在直线下降。尼斯·阿尔·韦布是一位PT鱼雷艇老兵和一家帽子制造企业的执行官，他带来了两顶专为杰克和“红费伊”定做的帽子。在总统办公室，尼斯·阿尔从包装盒里拿出帽子，好像它们是容易损坏的斯特拉迪瓦里（Stradivari）小提琴。杰克和“红费伊”都开始试戴。尼斯·阿尔向后站，以便观察效果。他说：“你们俩戴着看上去都不错。”但语气让人觉得不是很令人信服。杰克和“红费伊”互相看着，突然大笑起来。肯尼迪总统说：“阿尔，难道为了挽救制帽业，你就打算毁坏

美国领导人的可爱形象吗？”尼斯·阿尔垂头丧气地转身走了。为了永久记住这一时刻，白宫摄影记者塞西尔·斯托顿被召到了办公室。肯尼迪总统和“红费伊”的这张照片有幸被保存了下来。在照片中，他们看起来像是一对保安。

但对于美国来说，不戴帽子的肯尼迪越来越像总统了。美国人赞赏积极主动工作的人。让人放心的是，艾克的接班人正在努力地尽职尽责。当然，跟白宫记者团的第一次电视会议极为关键。在这些电视会议中，第三次的观众人数众多，有差不多6500万人坐在2150万个电视机前观看实况。马歇尔·麦克卢汉称赞他是一位艺术大师。现在，民意抽样调查员的研究反映出了诺伊施塔特方法的智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蹓蹓，就知道了。但在比赛伊始，肯尼迪就转变了无数选民的态度，很多原来打算投尼克松票的人便改变了想法。据盖洛普报告，赞成肯尼迪现在做事方式的美国人正在稳定增加。

杰奎琳对以全美知名人士身份抛头露面不是很有兴趣。她觉得生活在白宫中就像生活在金鱼缸里，游客会潜伏在外面的庭园里，看到她在白宫网球场上打球，小伙子们会发出鼓励性的喊叫，业余摄影师会带着长焦镜头给她在游乐场中玩耍的孩子们拍照，对此，她十分讨厌。但她真的很喜欢这座大的官邸，开始专心投身于恢复它之前的高贵之中。皮埃尔·塞林格发现她很有魅力，但当建议她到公开场合露面时，她却表现出了无可救药的消极。后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出让她展示和讲述美国总统官邸的新装饰时，她同意了，这一次，皮埃尔感到高兴。无数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了她，他们看到了她最好的一面，对古董、古典设计、室内装饰和颜色的利用方面知识渊博，很有见地。她从没有放弃对隐私权的争取，更多的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了卡罗琳和小约翰，但在那次节目之后，她不仅成了家喻户晓的人，而且拥有了家喻户晓的形象。此时，法国的城镇开始为哪里是她祖先的家乡展开争论。就像在早期竞选活动中的杰克一样，她完全就是美国父母期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的那种人，因为她看上去仍然还是20多岁的样子，这些父母的女儿们也渴望如此。

道格拉斯·凯特评述道：“就像高档的法国饭店一样，总统有他自己的气场。”肯尼迪的形象正在树立，它混合了多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有杰克的魅力和活力、杰奎琳作为重要配角的美丽、卡罗琳的招人喜欢、小约翰的第一次蹒跚学步、总统演讲的优雅措辞、司法部长桌上的橄榄球

和新的理想主义。（卡罗琳让人想起凯特·格林纳韦写的童书中可爱小女孩的形象。当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团团长说她可以点一首曲子时，她回答说：“《老迈克唐纳有个农场》。”谁能拒绝这样一位小女孩呢？）肯尼迪家族的人非常热爱美国，知道如何用魅力征服美国人，也知道在争取到公众的支持后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

回顾他们执政的第一周，鲍勃·肯尼迪几乎是怅然若失地说道：“因为听到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我们本来认为这些天很成功。”报纸和电视新闻报道的确是连篇累牍。电视专题节目、在多家报刊同时发表的新闻报道和杂志文章都以“头100天”为题事无巨细地评头论足，情况堪比罗斯福刚当上美国总统的那几个月。肯尼迪宣誓就职不过两周，就有几位有名的作家和摄影记者决定着手写一本书《让我们出发吧》（*Let Us Begin*），并在他执政100天时出版。媒体已经做好准备，万一有突发性事件发生，它们就会进行必要的紧急修正。事件还真的发生了，那是美国历史上最荒唐的事件之一，它取名自古巴的猪湾。这是艾森豪威尔在11月18日跟肯尼迪提到过的那个计划。1400名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侵入古巴，他们最为人所知的名称是“旅团”（La Brigada）。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计划过攻击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同意，肯尼迪也给它开了绿灯，因此，这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栽得最大的跟头。流亡者并没有接受良好的训练，武器装备也不足，而且他们的地图已经过期。卡斯特罗军队的士兵人数大大超过他们的数量，达到143：1。在硬撑了不到三天后，幸存者被包围，并在哈瓦那体育宫进行了作秀式的审判，以示羞辱，之后就被关进了监狱。约翰·费希尔在《哈帕斯杂志》（*Harper's*）上写道：“其结果好比是在肯尼迪仍然试着搬来一些家具时，发现房顶塌了，门也被大风刮跑了。”后来，美国人了解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者认为，一旦总统认识到美国的声望可以因此提高，他就会干预，协调美国空军掩护机群、船只和步兵。尼克松可能会这样做，他在1964年11月的《读者文摘》上说过这样的话。他写道：他当时的反应是“找到一个合法的借口……参与攻击”。

新总统拒绝了尼克松的策应之法。他看到了武装干涉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占领之后，不受欢迎的军队会成为恐怖分子和抵抗战士的目标，会被当成人质，带来报复和无休无止、毫无希望的流血冲突。因此，他叫停了此次冒险，并公开声明接受对此次灾难的所有指责。当然，艾森豪威尔其实应承担大部分责任。他下令训练反叛者，将他们的秘密计划与美国政策挂钩，并敦促肯尼迪付诸实施。当新总统征求五角

大楼的意见时，参谋长们一致预测反抗者会取得成功。就是在那时，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方案获得了批准，并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此事件发生在他这届政府刚刚站稳脚跟之时，无疑削弱了肯尼迪的声望。美国的西欧盟友感到震惊。随着证据的不断增加，在与妻子单独在一起时，肯尼迪总统的情绪常常失控，甚至会哭泣起来。后来，他告诉你：从这一个大跟头中，他看到了两件还算是令人安慰的事。第一件是他彻底丢掉了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绝对可靠的幻想。认识到将来在接受它的意见时，要抱着怀疑的态度，必须进行彻底的审查，权衡考虑非军方人士的判断。第二个安慰于5月3日出现，那个事件已经过去了两周。肯尼迪正在评论英国和美国民主形式的不同。他说，假如他是英国首相，他这届政府会垮台，他会被从家中撵出去。就在这个时候，伊夫琳前来，手里拿着一本印有最新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的样书。数字显示，美国人对他的支持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83%。他把它扔到一边，叹了一口气，说道："跟艾森豪威尔一样，我做得越差劲，就越受欢迎。"

白宫很白。在游移不定的月光之下，它那上过漆的砂岩墙反射着微光，透过安德鲁·杰克逊所钟爱的木兰花，感觉就像是从凄美的辟邪蜡烛上发出的光芒，修剪过的草坪静静地躺在那里，就像是空荡荡的停车场，当灯光移动时，整个官邸看上去似乎就更小了。部分原因在于这是景观的错觉，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虽然生活中有很多事情让人烦忧，但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总统充满了兴趣，想要亲眼看一看，而且发自内心，郑重其事。因此，你会怀着敬畏的心情，躲在宾夕法尼亚大街边又黑又旧的围栏后面，从北面眯着眼睛看着用泛光灯照着的白宫正面。心中的疑惑渐增。你简直不相信居然会有人住在这种地方。

这是因为白宫也是一个住宅。在那年冬天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周里，杰克亲自带人参观过几次，这让他感觉很愉快，若你参加过其中的一次，在离开时，你就会对那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有了一些了解。白天，他不能使用楼下的豪华房间，因为它们要向公众开放，用于展示。不过，那里晚间经常举行娱乐招待，身为美国总统，他每年差不多都要以主人的身份在那里举办10次聚会，宾客多达2000人，还有无数小型社交活动，每次150人左右。杰奎琳举办的晚宴大多规模较小，每次10人、8人或6人，其中一次值得纪念的活动是为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过75岁生日。房东的雇主不收租金，而且为其大部分招待活动埋单，不过，这位

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房客发现，每年还是要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很多钱才能过得下去。

这是一个漂亮的庭院，但在这里生活却很昂贵，每当有第一家庭的成员离开这里，就会有一群带枪的男人一路跟随。他们没有选择，这是法律规定的。在院子里，东露台的下面是一个私人电影院，这里会放映曾经发行的任何电影，以及某些好几个月公众都排不到的电影。那个时候，这里还有一个游泳池，水温总是保持在32摄氏度左右，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温度并不舒服，但却深受那个有严重背伤的男人欢迎。坦率地说，这里的电话系统是世界上最好的。电话总机有两处，一处由行政办公楼4楼隔壁的几位女士操控，另一处在行政办公楼的地下室，由白宫通讯处的信号员操控。当时，美国总统官邸的电话号码是NAtional 8-1414，当然，如果你拨打这个号码，杰克本人是不会接的，但如果你知道某位助理的名字，你就会被直接放行。总机能找到世界上的任何人，包括在飞机上的人。曾经有一次，接线员接到指示要找到一位在科德角的电话簿上没有列出其电话号码的人。他们锁定那个人的位置在加利福尼亚州，正在拜访一位朋友，而那位朋友的电话号码也没有列入电话簿。反过来，如果有人想要找到总统，他也没有地方可以躲藏。要想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吃完一顿饭或睡一整宿觉，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如杰克曾经说过的那样：“我有一个不错的住宅，办公室就在附近，而薪水也不错。”事实上，离他的办公室只有差不多50码远（约46米），特勤人员的岗位无处不在。如果总统转而走向一部电梯，它的门就会打开，其他特勤人员也会同时接到他正在走近的通知。如果因为总统的职责，他需要出行，那么，任何时候都会有一架直升机载他去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而用波音707改装的豪华飞机“空军一号”早已在那里做好准备，他一抵达就立即起飞，送他前往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该官邸还有两个较低的翼楼，分别位于东、西两侧，排列着总统助理的办公室。东翼楼向外伸展到东行政大街，街对面就是美国的财政部大楼。游客可以从东大街大门进入。西行政大街位于白宫的另一侧，自1942年就已经封闭，当时，一位美国特勤局常驻白宫的特工指出，狙击手可以在那里瞄准富兰克林·罗斯福。权力集中在西翼楼，因为自从西奥多·罗斯福建成它起，美国总统的办公室就被设在了那里。奥唐奈、奥布赖恩、索伦森那个等级的人分别在总统办公室的上面、下面和旁边工作。在西翼楼的地下室，马克·邦迪掌管着作战室。东翼楼是戴夫·鲍尔

斯、阿瑟·施莱辛格、军事助理、第一夫人社交秘书的住所，他们是第二等级的助理。最低等级的助理则住在行政办公楼，之前，这里曾是美国国务院、作战部和海军的办公楼，西行政大街（后用作停车场）的对面是副总统约翰逊的办公室。林登·约翰逊分配到了一个单独的停车位。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令人羡慕的额外待遇。他和鲍勃·肯尼迪是仅有的两位获准从玫瑰花园进入总统办公室的人。如果能够占用这间办公室4年的时间，即便只有最渺茫的一线机会，人们也愿意为此忍受痛苦的折磨，其中的缘由等你看到它时，就会理解了。它长35英尺，宽稍大于25英尺，安静、明亮而且隔音。阳光从差不多12英尺高的法式大落地窗中照射进来，阴天的时候，这里也从不会显得凄冷。到了冬天，当树木变得光秃秃时，你就能看到林肯纪念堂和骨白色的华盛顿纪念碑，在华盛顿纪念碑顶部闪烁着红灯，以警示向它这个方向飞来的飞机。在肯尼迪时代，美国总统的大徽章被织进了随处可见的灰色厚地毯中，也被塑在了天花板上。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墙壁被粉刷成了冷绿色。肯尼迪则将它们重新涂成了米黄色。现在，这是一位海军军人的办公室，印有高大船只的照片被镶进框中挂在墙上，在壁炉台的上方，则挂着一个美国《宪法》的样本。壁炉两边各摆着两只长沙发，在它们之间，摆放着杰克的一张摇椅。他的办公桌是维多利亚女王送的礼物，制作用的木材取自一艘英国的战舰，杰奎琳在一间潮湿的储藏室里发现了它，现在，它的一侧立着美国星条旗，另一侧立着美国总统旗。桌子上面是贝雕工艺品，雕刻很精细，鲸鱼的牙齿也清晰可数，还有肯尼迪读的皮面装帧的书籍，以及1943年他在上面刻下求救信息的那块椰子壳，所刻文字是：

土著人知道位置

他能领航

11人存活

需要小船

肯尼迪

如果你不是林登·约翰逊或鲍勃，又想见总统，你可以通过奥唐奈或伊夫琳的办公室抵达椭圆形办公室（椭圆形办公室也有一个主门，但几乎不用。它的目的是让工作人员知道总统是否在里面。如果它是关着的，他就在里面；如果是开着的，他就不在里面）。肯尼是预约秘书，他对待自己的工作非常认真。如果你想见总统，他认为，你必须经过

他。但肯精心安排的日程表经常被某些人从内部毁坏，这些人知道伊夫琳是个耳朵根很软的人，因此更喜欢从她那里预约。通过她的办公室进进出出实在太频繁了，以致在肯的坚持下，杰克命令她要一直关闭通向总统办公室的门。两天后，他把肯喊进来，指着伊夫琳的门。门上是新钻的一个窥视孔。肯尼迪说：“我们赢不了。”

当然，其实他完全可以给她甩冷脸子，估计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他喜欢自己身边有一定程度的混乱，他认为，他获得的信息来源越多，他就能治理得越好。对他来说，真正的私有“财产”是设在官邸第二层的第一家庭公寓，他称之为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在肯尼迪执政期间，曾有100多万人排队从一楼的国事厅（state rooms）经过，他们错误地以为自己正在参观美国总统住的地方，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一间设施齐全的博物馆。然而，当一位美国特勤局人员发现你的白宫通行证需要核校，并且打电话寻求确认时，你便会进入一个隐蔽的电梯，升到地上二楼，很显然，你进入了家庭住宅区。这里的风格与之前有很大的不同。房间不对外开放，在杰奎琳的电视节目中也不会看到它们。并非每个人都感觉待在这里很舒服，因为它们绝对属于非常上流的社会。上一伙房客是安逸的中产阶级。他们很有品位，欣赏弗雷德·韦林和劳伦斯·韦尔克的乐曲，买得起大型彩色电视机和战利品。而现在，在所有的装饰品中，唯一与军事有关的东西就是第一夫人的父亲穿着一战时少尉制服的照片，他从相框中向外凝视着，一脸温文尔雅的东卵(注)绅士风度。

新外观表现出淡淡的优雅。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自约翰·乔治·尼古拉称之为“一个令人生厌的、摇摇欲坠的建筑”以来，这个官邸变化很大，然而，它的设计几乎算不上成功。天花板成了高高在上的吸尘器，房间被分成了几小块，门的开关也不方便。走出电梯，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小的连廊，连廊通向一个大厅。这个过道东西走向，就像一条马路将整个楼层一分为二，带来了类似的交通问题。总统的办公室或书房（不同于西翼楼的椭圆形办公室）在走廊南部，卧室亦然，但它位于电梯的正对面。孩子们则睡在北边。走廊的西端被改成了家庭起居室，它通向第一夫人的卧室和餐厅。

其效果很容易让人想到重新装饰过的纽约电梯公寓。经过艺术品的色彩和优美家具的巧妙搭配，类似大谷仓式的空落落的走廊变得柔和，因此它没有成为那种公寓。罩着布套的法式椅子成组地摆放在米黄色的小地毯上，样式很诱人。漂亮的枝形吊灯在头顶上闪耀着明亮的光芒。

乔治·卡特林、莫里斯·普伦德加斯特、温斯洛·霍默和约翰·辛格·萨金特的美国绘画悬挂在淡色的墙上，它们的下面是摆放得很漂亮的花瓶和雕塑、一张刘易斯·金泽的桌子和一架小型立式钢琴。然而，最生动的色彩来自书衣。那里一共有几千册图书，一层层地排放在高高的书架上，它们都是些很有品位的书，其中有艺术和历史类的书、一套多卷本的百科全书、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亨利·刘易斯·门肯的自传《和平的打扰者》（*Disturber of the Peace*）、几本现代小说，包括内维尔·舒特的《在海滩上》（*On the Beach*）和朱塞佩·迪兰佩杜萨的《豹》（*Leopard*），以及一本没有书衣的破旧的《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Profiles in Courage*），因为其他的东西全都整洁、昂贵，而且不显得张扬，所以它夹在那里就像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孤儿。西起居室里的高保真调频电视控制台低矮而狭长，而且用布蒙着。里面可移动的酒柜储存有必富达（Beefeater），这是一种苏格兰百龄坛（Ballantine）金酒。白色纸板火柴上印有“总统官邸”的题字，硬布面剪贴簿的书脊上只简单地印着“卡罗琳”三个字。

总统办公室的门打开，肯尼迪探出头来。越过他的肩头，你能看到一位非正式顾问团的成员正坐在里面，从其表情猜测，他正在接受断断续续的交叉询问，而杰克是交叉询问的高手。第一家庭的其他人正在纽波特，而肯说过，肯尼迪总统想要讨论关于印度的事。杰克建议你自己合成一种饮料。一位服务人员到来，拉上宽大西窗的窗帘，将玫瑰花园挡在了窗外。在东区，月光斑斑点点地洒落在美国财政部大楼的绿色旧楼顶上，而在白宫里，小的点状光源投射在走廊里的立式小钢琴上，投射在李·拉齐维尔的照片上，投射在相框中年轻的杰奎琳·鲍维尔和其父亲的快照上，也投射在另外一张卡罗琳和她一起嬉戏的照片上。

总统办公室的门再次打开。“进来，比尔。带着你的饮料。”

杰克的贴身侍从在早晨7点30分叫醒了他，肯尼迪总统撑起身子，在床上吃了早餐，包括橙汁、两个半熟的鸡蛋、烤面包和掺入奶油和糖的咖啡。他一边吃一边快速翻阅报纸，某些天的早晨，他的军事助理邦迪或特德·克利夫顿会带着3000字的美国总统情报核查清单前来。乔治·托马斯现在可能已经在他的热水浴缸放满了水，他此时起床，让自己泡在里面放松一下。克利夫顿或邦迪会带着行动指令离开。杰克会在浴缸里待20～30分钟，在浴缸上放的一块板上阅读更多的报纸，潦草地写下一些命令，或签署文件，这些文件常常是潮湿的。上午9点，他会动身

去办公室，卡罗琳会跟着他。他会按照预约，开始会面和研究文件，一直忙到下午1点或1点15分。接下来通常会是一顿工作午餐，如果碰巧有空，他会穿过官邸去找杰奎琳和卡罗琳。让她们惊讶和高兴的是，杰克比过去有了更多陪伴妻子和孩子的时间。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尽情享受彼此的爱了。

白天，他也会在游泳池里游泳，该游泳池是用公众捐款建的，目的是用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治疗。杰克不喜欢一个人游泳，如果你跟他一起游，只能在一旁蛙泳，而且一边游泳一边说话。他父亲托人为游泳池的四面墙画上了壁画，那是维尔京群岛圣克洛伊（Saint Croix）港口的再现，这会让游泳者产生置身于舄湖的幻觉。如果你在夜晚游泳，灯光会在港口周边闪烁，月亮和星星悬挂于头顶之上。离开游泳池，杰克会进入游泳池附近的白宫健身房，按照克劳斯博士的要求训练。那里安排有三位海军主任药剂师，他们全都受过这种特殊任务的培训，其中一位会在他锻炼时加以监督。游泳、锻炼和吃过午饭之后，他通常进入卧室，小睡45分钟或1小时。接着简短地淋个浴，然后返回办公室。他常常会工作到晚上8点或更晚，因为从来不知道他何时结束工作，邀他吃饭常常只能是临时通知。时间允许的话，之后还会放映一部电影。开始时，杰克可能会选择一张舒服的椅子，坐在上面观看，但在把一连串的椅子坐过之后，也没有能让他舒服的，后来，就安了一张床。现在，他很容易对无聊乏味的电影感到厌倦，就算电影不错，他往往也会被人中途喊走，当然，他从不说原因。在令人愉快的晚上，某位客人会受邀上楼。杰奎琳会放唱片，通常是“艾莉猫”舞曲和波萨诺伐舞曲，或试图说服“兔宝宝”模仿诺埃尔·科沃德，但常常是白费力气。她不在的时候，他和朋友会在楼上吃饭。在他下班之前，白宫的厨师会把烤鸡或羊排留在二楼的一个电热板上保温。然后，杰克会建议看电视，或在晴朗的黄昏，坐在杜鲁门阳台上交谈，杰克抽着雪茄，而你则抓着瓶子小口喝着喜力啤酒。大约晚上11点，他会把他喜欢的布鲁克斯兄弟牌的短睡衣换成宽松的睡衣，跪在床边，喃喃地念着主祷文，然后说困了，“晚安，伙计。请关灯，好吗？”

就职之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试图“要过原来的生活”。在他刚当上美国总统的第一个周日，当汽车拉着他穿过城镇时，他要求特勤司机绕到自己在乔治城的旧房子附近看一看。在车驶入N街时，他转向你，恼怒地说：“看看那些报纸，都把前面的台阶堆满了。我不止一次告诉他们要取消这里的投送。我那些共和党邻居可能准备要到处说这件事

了。‘他都管不好自己的家，怎么可能管理国家？’”在豪华轿车中的其他人插手之前，他下了车，捡起旧报纸，把它们扔到汽车后座上。别的总统通常是不会做此类事情的，过了一会儿，杰克停了下来。在乔治城，在那个周日，他仍然处在竞选状态。

一天晚上，他和一位朋友从官邸的西北门溜出去，溜进附近的电影院观看《斯巴达克斯》（*Spartacus*），但在那之后，特勤人员便恳求他在家看电影。他最成功的突围或许就是葛底斯堡之旅了。周三时，他打电话给你，并且提醒你做好周六开车去战场遗迹的准备。他和他的其他乘客坐着福特水星车抵达，车的顶篷打开着。显然，很快就知道了，他专门研究过战争，并打算扮演一位导游。遗憾的是，那种方式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他可能会忘记官职，但他的客人不会忘。起初，他没有被人认出来。聚会中的所有人都穿着随便，没有特勤人员，而且所乘车辆不是那种会让人联想到总统的车。但那天，葛底斯堡的游客很多。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看他，最后，他们发现了这一惊人的事实。说实在话，他们当时只是双眼看着美国的总统，并没有更多的举动。回到水星车上，你感觉到了：他现在终于要为匿名出行付出代价。

最初，这个新的第一家庭认为他们会像华盛顿的其他夫妇一样外出游玩。他们的第一个东道主是小罗兰·埃文斯，当时他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聚会那天早晨，埃文斯的一位邻居打开前门，发现自己家的人行道结了冰。不过，埃文斯家人行道上的冰正在快速消失，本社区的一小队员工正在铲除地面上的最后一堆碎冰。这位邻居气冲冲地质问为什么埃文斯可以享受特殊待遇。他被告知真相，但是，因为他跟埃文斯一样是位职业记者，肯尼迪想要过一个安静夜晚的愿望破灭了。事实上，他们再也不是过去的自己了。白宫收到过400多封信，都是询问为什么总统似乎经常走在自己的妻子前面几步。有一次，他愉快地回复道：“杰奎琳只需要走快些就好了。”实际上，她不被允许这样做。总统比任何人的地位都高，包括女士在内。入主白宫初期，他有一次想为埃莉诺·罗斯福把住门。她踌躇不前，说道：“不，您先走。您是总统。”他笑着说：“我总是忘记。”罗斯福夫人温柔地说：“但您必须做到永远都不要忘记。”

1856年，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 party）从美国政治中销声匿迹，但其反智识主义的传统延续了下来，就像是某种低级但又无法破坏

的动物生活方式。它激起了麦卡锡主义者的热情，随着美国中下层社会的人对新第一家庭生活方式的了解，其余烬便又再次燃烧起来。大多数选民赞成杰克作为总统的言谈举止，但要是说很多人熟悉或曾经听说过在罗伯特·弗罗斯特之后拜见总统的那些文化名人，那就值得怀疑了。肯尼迪正要再次实现政治上的突破。美国的名人要想吸引普通观众的兴趣，比较常见的办法是让他们自己比观众更粗鲁和更下流，俄克拉何马州绰号“苜蓿比尔”的默里就是个例子，他是一位有修养的人，在家乡竞选时，每次公开露面，他都会特意解开自己裤子的门襟，把自己的衬衣下摆从前裆开口拉出来几英寸。在华盛顿，仍然有少数“苜蓿比尔”的门徒，他们被这位年轻的新总统惊得目瞪口呆，因为他会邀请一些在他们老师的眼里属于偏离社会价值观的人来到白宫，比如艺术家、诗人、音乐家、科学家和学者，而且他的邀请还是一周接着一周。在肯尼迪执政时期，白宫的宴会令人眼花缭乱。通常，客人会坐在长马蹄形的宴会桌旁，但有时会被一簇小餐桌取代。背景音乐通常取自美国空军“漫步弦乐”的乐曲，它要与食物和酒相配，却能安静到让大家听到祝酒声，根据风俗，祝酒词要简洁和机智。客人会起身到处转转，发现重新装饰过的蓝厅、绿厅和红厅的壁炉都是炉火熊熊，而且每一个壁龛里都摆放着鲜花。然后，他们进入东大厅欣赏各种节目，表演者有芭蕾舞团、歌剧明星、斯特拉温斯基、伊萨克·斯特恩、巴勃罗·卡萨尔斯和一个莎士比亚剧团，这是自塔夫脱总统任期内的1910年以来，该剧团第一次出现在白宫。

肯尼迪最精彩的社交活动并不在官邸里，而是在弗农山庄的草坪上，那里是美国第一任总统的私人不动产，站在那里，波托马克河一览无余。肯尼迪总统正是用这种方式偿还非常特殊的外交欠债。他与赫鲁晓夫的谈判使得老挝得以停火，尽管他的提议能够带来最大的利益，但克里姆林宫也不会考虑他的建议，谈判期间，虽然知道这一点，肯尼迪还是不顾一切地寻求结盟。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同意戴高乐的声明，即他不想在那个地区参与任何的军事行动。肯尼迪总统认为，即使结束战争也要符合苏联的利益，中国是另外一回事，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并不打算公开反抗莫斯科。赫鲁晓夫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所以莫斯科给老挝的共产主义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其停战，然后组建了一个联合政府。英国支持肯尼迪，菲律宾和泰国同意象征性地派送部队，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提议来自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他同意派出5000人的部队，这是他军队中的精英。当一切结束时，杰克告诉他的工作人员：“从现在开始，无论阿尤布

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他都能得到。”

几个月之后，阿尤布宣布他要带着女儿访问华盛顿。美国的外交官汇报说这位强硬的老巴基斯坦领导人喜欢红色的地毯，越宽越厚的越好。杰克要求杰奎琳负责接待事宜。这就像是要求电影导演巴斯比·伯克利筹办合唱表演，并且预算不受限制一样。确切地说，那场“电影”从载着138位客人的总统豪华车队停在阿纳卡斯蒂亚河的一号码头就开始了。在身着白衣的军官的陪同下，他们在欢迎的哨声中登上4艘船：一艘改装过的PT鱼雷艇、“帕特里克·约瑟夫”号、“甜菲茨”号和“红杉”号。其余乘客都是多年前的华盛顿精英，包括鲍勃和埃塞尔、萨姆·雷伯尔尼、林登和小瓢虫、小罗斯福、道格拉斯·狄龙夫妇、麦克纳马拉夫妇、曼斯菲尔德夫妇、埃弗里特·德克森夫妇、赛明顿夫妇和尼古拉斯·朗沃思夫人，在“帕特里克·约瑟夫”号上，你跟他们相谈甚欢。这只小舰队以11节的速度沿河而下，每只舰上都有一只三人演出小组，因此，气氛很轻松，直到抵达弗农山庄，才开始传统的致敬仪式：钟声敲响，乘客站在甲板上，面对着这座古老的宅第。岸上，停放着一长列黑色的凯迪拉克轿车，用来将乘客载到小山上，道路两边站着的是身着蓝色制服的海军战士，手中举着步枪致敬，登岸之后，你钻进其中一辆车，之后在一个巨大的帐篷中进行烛光晚宴。第一夫人没有遗漏任何一件事情；前三天，撒药飞机撒遍了4平方英里的土地，把恙螨、蜱和蚊子灭了个精光。饭菜很可口，这是勒内·韦尔东的功劳，他是杰奎琳亲自挑选的厨师，那天的饭菜品种有：鳄梨和蟹肉炒含羞草；配有米饭、豌豆、碎蔬菜、蘑菇、西红柿的炖鸡；拌有糖粉和香草精的奶油树莓和小甜饼及蛋糕。酒足饭饱之后，你漫步草坪，以利食物消化，顺手点燃一支花冠牌长雪茄，又喝干了很多杯香槟酒，因为它们就在路过侍者擎着的诱人的托盘里，随手可取，同时，又可以听到美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比如格什温的《美国人在巴黎》（*American in Paris*）和莫扎特D大调第三十五交响曲中的一段精神饱满的快板。由于聚会的人重新登上了船，助理们给女士们拿来了外套和运动衫，但很快它们就被脱下来了，因为伴随着更多的音乐，吃得过多、有点儿醉醺醺、兴高采烈的宾客们跳着舞回到了一号码头。第二天早晨，在寻找阿司匹林药瓶时，你不禁想知道：如果阿尤布要给杰克派一个加强师，他会做什么。

在此，必须把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的品位区分开来。杰奎琳·鲍维尔的品位是教出来的，她出身于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小说的读者都熟悉的环境，菲茨杰拉德的女儿斯格蒂是杰奎琳的朋友。在那个世界，有宽阔的

庄园、游泳池、网球场和马厩，小女孩们会在女家庭教师的看护下玩耍，并且会有穿着伊顿制服、戴着白手套的小男孩教她们跳舞。她特别喜爱法国食物，同样也偏爱法国家具和法国酒。她还为杰克找了一位法国裁缝。作为美国总统，他要穿着她认为与身份相配的衣服，戴我们都戴的PT鱼雷艇领带夹，以此作为忠诚于国家的徽章，有些人现在仍在佩戴。至于总统对你的衬衫发表的那些高谈阔论，或许杰奎琳也负有责任，他坚持认为，你的衬衫不但过时，而且看上去显得像是被弄脏了一样；难道你每天没有至少换4次衬衫吗？在一次严肃的讨论中间，他突然说："我认为鲍勃的穿着很不合适，你觉得呢？为什么，他还穿那些领尖钉有纽扣的衬衫。5年前它们就过时了。我认识的人中，还在穿它们的只有切斯特·鲍尔斯和阿德莱。"但杰克有他自己的品位。小时候，他没有学到。他只认为某些态度是明智的和有尊严的，他就把它们与直觉认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结合了起来。在海恩尼斯港夏天的一次聚会上，有个陌生人显然是从没见过罗素参议员，在谈到罗素时不断地称呼他是"迪克·罗素"。肯尼迪总统很是恼火。后来，他生气地说道："在我认识他的这么多年里，除了'罗素参议员'外，我从未称呼过他别的。"伊夫琳·林肯为他工作了十几年。他从来都是称呼她为"林肯太太"。

在20世纪60年代的竞选期间，他从未像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那样举起双手，在头两边挥动。这是马戏团里的一种蹩脚的手势，最没品位；与其这样，他宁愿退出政坛。竞选活动十分艰苦，作为一位政治家，他认为应该避免自己的妻子介入其中。当竞争对手夸耀帕特、朱莉和特里西娅时，他觉得似乎他们就是一群剧团演员，肯尼迪只用过一次"杰奎琳和我"这个短语，随后他感到很尴尬。如果候选人败选，他应当走出去，面对镜头，体面地认输。1960年，尼克松没有这样做。相反，他派赫布·克莱因去外面读了一个冷淡而又简短的声明。你议论说他应该自己露面，哪怕只是为了感谢共和党的选民也好，他们可是为他尽心尽力了，而且正在看着电视。对于这一点，杰克表示同意。他说："他退出的方式一如他进入的方式，不漂亮。"出色的感觉总是最好，他始终追求这一点。传统上，总统常常要抛出华盛顿参议员赛季首场的第一个球。他讨厌第二，即使对自己也是一样，因此，1961年4月初的一天，在工作约见之间，杰克在玫瑰花园试投了几次球。问及原因时，他非常不好意思地说道："我希望确保投得准确。"有位医生告诉他：如果每天早晨用半个小时发咆哮声，他就能够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深沉有力。当你进入他的卧室听到他那特别的声音时，你会好奇地看着戴夫·鲍尔斯。戴夫解释说："刚进来时，我也吓了一跳。我还以为白宫里养了一只海豹。"

杰克的品位在判断作者方面最准确，他们知道这一点。《纽约客》的埃尔温·布鲁克斯·怀特在缅因州的农舍里看了他的就职演讲，之后写信给他：“让美国民众感到兴奋的事情之一是一个人能与当选总统有同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从来没有像1961年2月20日这天一样强烈地冲击着我，在观看电视时……我首先看到讲台起火，然后，又有几次，多亏你说的那些勇敢的话。我保证：无论什么时候，如果由我操刀，我将尽我绵薄之力，让爱的火焰更加旺盛。”桑顿·怀尔德说肯尼迪唤醒了“一个（艺术上）让人惊讶的自尊新世界”。刘易斯·芒福德描述他是“让艺术、文学和音乐在美国的国民生活中得到尊贵和荣誉地位的首位美国总统”。

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也喜欢听自己年轻时与姑娘约会和跳舞时曾经流行的歌曲。夏日夜间，坐在杜鲁门阳台上，他会把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那种每分钟78转的老唱片利落地放到他的立体声唱机中，放的歌曲有：《全心全意》（*Body and Soul*）、《星尘》（*Stardust*）、《天边外》（*Beyond the Blue Horizon*）、《暴雨天》（*Stormy Weather*）、《深紫》（*Deep Purple*）、《我的幻想》（*My Reverie*）、《爱情闯进门》（*Love Walked In*）、《我的浪漫史》（*My Romance*）和《一想到你》（*The Very Thought of You*）。在音乐剧《卡默洛特》（*Camelot*）上演之前，《窈窕淑女》（*My Fair Lady*）是他的最爱，《卡默洛特》的首演就在他就职典礼的前几周，地点是纽约的美琪戏院。他把自己的立体声唱机放在卧室里，喜欢听着最喜欢的歌曲迷迷糊糊地入睡。他最喜欢的是《卡默洛特》唱片的最后一首，亚瑟国王在他最后一战的前夕给一位小伙子授以骑士，并告诉他：

> 不要让人们忘记
>
> 曾经有一个地方
>
> 有过短暂的辉煌
>
> 它的名字就是卡默洛特

在他去世后，有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说那是“丢人洛特”。他们从来没有理解过他，或者他也没有理解过他们，尽管他很努力地尝试过。这符合他的个性，他解决问题的本能方法是冷静、不受个人感情影响和善于分析的。他们因为猪湾事件对他的指责，不无道理，他也很自责。但他们既不愤怒，也不失望，而是欢欣鼓舞。他拧着眉毛，摇着头告诉你说：“我算明白了，这些人似乎全都希望我失败。我对此很不理解。如果

我不成功，找另外一个总统也是白搭。”而他们不在乎这些，如果他受挫，只能证明他们是对的，对有些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更重要的了。杰克大声问道：“他们想要我做什么？为什么他们不写下来？”有人写了，《记者》杂志（*Reporter*）就曾刊发过一篇相关的文章。但在乔治城，如果无须承担责任的话，听人聊一些只有在鸡尾酒会上才会说的话题很容易，因为在这些派对之间进进出出，你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很长时间以来，对过去的向往都归因于保守的共和党人的巫术，归因于渴望美国从地球上消失的那些人，他们渴望赛璐珞衣领、捕蝇纸、鲸骨紧身胸衣、收获结束后的晚餐和克利夫兰商人行军俱乐部仁慈的家长作风。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初，那种渴望堪比自由主义对“大萧条”的向往，“大萧条”时期正值这一代人的童年，当时，新政自由主义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事业，罗斯福总统的狗法拉还活着，还在摇摆着它的小尾巴。

在肯尼迪执政时期，“新左派”这种词还没有成为美国人街头巷尾都会谈及的语言。但是，“激进的右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约翰·伯奇社已经兴盛了4年，民主社会学生同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成为它的翻版。肯尼迪兄弟在政治判断上出现了一次罕见的失误，时任美国司法部长称约翰·伯奇社是“荒谬的”，肯尼迪也警告说它是共产主义的翻版，认为谴责约翰·伯奇社反而会扩大它的知名度，提升它的形象。罗伯特·韦尔奇是其会长，他是一位退休的糖果制造商，喜欢被人称作“创始人”，似乎很享受为众人所知的身份，并确信这会有助于招募新的成员。韦尔奇是个奇怪的人，而他所拥有的同盟组织更奇怪。当时，在“右翼”的大旗下，聚集了一批类似的组织。牧师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的基督教十字军（Reverend Billy James Hargis’s Christian Crusade）、弗雷德·施瓦茨博士的反共十字军（Dr. Fred Schwartz’s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生活》杂志出版商查尔斯·道格拉斯·杰克逊（C. D. Jackson）很不情愿地成了见证弗雷德博士十字军力量的那个人。在他的一期杂志对施瓦茨表示轻蔑之后，广告商的抗议迫使杰克逊现身施瓦茨在好莱坞露天剧场（Hollywood Bowl）举行的集会上认错：“我认为我们错了，我深表歉意。今晚来到这里，并与施瓦茨博士和其他无情反共的斗士结盟，我感到非常荣幸。”

唯独有一次，一位极端组织成员差点儿就要惹得杰克大发雷霆了，然后，他的拳头一阵抽搐，压制住了怒火。《达拉斯晨报》（*Morning News*）的迪利，人称“特德”，自命不凡，戴着一副绿框眼镜，在白宫为

报纸出版商举办的午宴上，他给自己的主持人讲了一句话，这让其余的宾客尴尬不已：“我们需要一位骑在马背上的人来领导这个国家，得克萨斯州和美国西南部地区的很多人都认为，你正骑着卡罗琳的小三轮脚踏车。”肯尼迪瞬间就火了，为了表明一种赤裸裸的看法而用到他女儿的名字是不可原谅的。他冷冰冰地回应道：“没有。”而且作为总统，他必须权衡提出的所有解决方案，找到一个“能确保让1亿8000万美国人生存和成功的”方案。达拉斯晚报《时代先驱报》（*Times-Herald*）的编辑给肯尼迪写信，让他相信迪利并非所有得克萨斯人的代言人。肯尼迪总统回复说：“我确信到了下午，达拉斯人就高兴了。”

弗莱彻·克内贝尔的《五月中的七天》（*Seven Days in May*）是当时的一本流行小说，描写的是一群军官试图接管美国政府的故事。你问肯尼迪是否熟悉这本书。他点头说道：“弗莱彻给了我一本。不久前的一天晚上，我读了它。”你接着探问，像书里那样的政变有没有可能在美国发生？五角大楼有没有将军和海军将领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杰克咧嘴一笑。他答道：“我知道有几个人可能希望他们能做到。”你继续追问，因为这很重要。他像是在沉思，过了很长时间，他很平静地说：“有可能。我们可能由一支军队接管这个国家。但需要恰当的条件才行。例如，我们有一个年轻的美国总统，他有一个猪湾，那就有些令人担忧了。而五角大楼可能还会在他背后制造些批评之辞，通常那也是军队对文官治国不满的一种表现。如果还有另外的猪湾，这个国家的反应会是‘他是不是太年轻和没有经验了？’军队大多会觉得时刻准备保护这个国家的完整是它们的爱国义务，不过，上帝才知道，当它们推翻当选的国家权力机构后，又会保护民主政体的哪个部分？”他停顿下来，好像是要振作自己的精神。他慢慢地说道：“如果有第三个猪湾，它就会发生。”两次停顿之后，他用最坚定的声音说：“不过，在我的任内，它不会发生。”

但在古巴惨败之后，杰克首要关心的，并不是极端主义者或五角大楼的阴谋诡计。他最大的担忧是克里姆林宫。有可能的话，他必须说服苏联领导人不要将他抛弃旅团的行为解读成一种示弱的信号。登陆失败之后，他做出了战斗的姿态。他说过，这一次他想让卡斯特罗下台，但他想让全世界知道“美国人的克制不是没有限度的”。美国准备采取行动，“有必要的话，还会单独行动”，以“保卫自身的安全”，他警告莫斯科：“倘若那一刻来临，美国人不打算被那些时刻会用布达佩斯血腥的街

头来体现信仰的人干涉”。

在阅读古巴报告的读者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属于是有头脑的。他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如果你要跟他讲话，那就得称呼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他并没有被关于冷战的雄辩所打动，尽管他自己说过很多关于冷战的话。赫鲁晓夫确实看到了肯尼迪不希望他看到的东西：一位新总统，年轻而且易受伤害，并且刚刚栽了一个大跟头。詹姆斯·赖斯顿后来写道：赫鲁晓夫“本来理解的是，肯尼迪不会理会卡斯特罗，或干掉他；但当肯尼迪不计后果地攻击古巴，却没有足够的胆量进行到底时，赫鲁晓夫确定，他正在跟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领导人打交道，这个人是可以被恐吓和威胁的。”对于克里姆林宫里的专制者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发动突然袭击的好时机。

1961年3月，美、苏两国的外交人员安排美国总统和苏联领导人在6月会面，地点选在维也纳。猪湾事件后三周，经过一段适当的间隔，5月12日，苏联领导人写信说邀请仍然有效。杰克认真地考虑过是否要建议延期。此时此刻，所有优势都在对方手里攥着。然而，他判断，这会被解读为释放了继续示弱的信号。他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但赫鲁晓夫认为，共产主义政权的时代来临了。他的自信并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肯尼迪执政的第一年，也是苏联感觉共产主义是大势所趋的一年，这在之前和之后都是无法想象的。斯大林的去世、朝鲜战争的结束和军备竞赛的缓和已经将过去的障碍一扫而空。俄罗斯的工业增长率远超美国。苏联的技术人员欢欣鼓舞；他们已经造出了氢弹，并在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中超越了美国。

两个月前，81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齐聚开会，他们信心满满，希望在第三世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共产主义信徒能在每一块大陆上擎起红旗。苏联领导人说世界大战毫无可能，它们培养了核毁灭的幽灵。但“解放战争或人民起义”则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此类起义的态度是什么？”他自问自答道：“最为赞许的态度。”他确信古巴、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是人民推动解放的典范，他宣称“被美帝国主义奴役的”拉美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正在倍增”。整个20世纪，或许更晚，苏联会向在“正义战争”中为独立自主而战的人提供“无限的支持”。这将是共产主义的新指路明灯。事实上，这等于是扣动了非正规战争的发令枪，在苏联领导人演讲后的若干年里，这种战争在全球各地从最初的闪烁不定，猛地燃烧起来。

赫鲁晓夫有他的目的，他也有一大堆的麻烦。比如东南亚问题，比如核试验问题。按照红军和苏联物理学家的说法，两年多前，它被搁置了，现在需要继续，他们现在有20、30、50，甚至100百万吨级当量的核武器，急欲试验效果。摆在他那个麻烦清单最前面的，只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的重要性超过了所有其他的问题。在描述它时，赫鲁晓夫用过几种说法："如鲠在喉""需要动外科手术的癌变组织"和可能导致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这个骨头、组织或萨拉热窝就是柏林的分割。在苏联人看来，允许西方国家出现在柏林是无法容忍的，而且还忍受了15年。艾克曾做出过某种程度的让步。他同意按照现在的构成来说柏林是"异常的"。他认为，有必要商谈西方国家在那里的驻军规模，以及联邦德国将这座城市用作宣传和情报活动基地的限度。现在，由于他们确立了维也纳的日程表，赫鲁晓夫开始在这一点上紧盯着肯尼迪不放。在其关于解放战争的演讲中，苏联领导人严厉地申斥柏林。他公开威胁这位未经过考验的总统，声称：如果"帝国主义"拒绝考虑"实际情况"，苏联将"采取断然措施"，并"在年底前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署和平协定"。苏联领导人说得很清楚，该协议将包含一个保证，即民主德国前线的任何"侵犯"将被视为"攻击所有华沙条约成员国的侵略行为"，那将意味着英国、法国和美国要么必须撤出其所有的军民，要么开战。

他是认真的吗？美国最有经验的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埃夫里尔·哈里曼认为，赫鲁晓夫在试图威胁肯尼迪，想震慑住他。他认为，最好的反应是避开赫鲁晓夫的日程安排，但要做得彬彬有礼，肯尼迪不必高估他的对手。赫鲁晓夫也感到紧张。他去西方国家的唯一一次出访也未成行。他从没有忘记自己出身低微。在动身去欧洲之前给国民的告别辞中，肯尼迪说："我要去维也纳见赫鲁晓夫先生。我是作为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革命国家的领导人去的。"他说，有些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固执的社会"，但"我不那样认为"。不过，他知道，在事关柏林未来的核心问题上，他不可能灵活。

事实上，没有哪架飞机能赶得上"空军一号"。总统拥有4架同型号的波音707，机尾编号分别为26000、86970、86971和86972，每一架都由同型号的普惠喷气发动机驱动，价格昂贵，令人梦寐以求，这部重达100吨的闪闪发光的机器拥有近乎完美的设备，客舱装有空调并且隔音，包括一间讲究的办公室和一间奢华的卧室，如果总统和第一夫人想

要单独在一起的话，他们可以在此就寝。肯尼迪可以授权其副总统或内阁成员使用其中的一架飞机，但只有他乘坐的那一架才可以绘有美国总统徽章和“空军一号”的名称。其他的不同之处还有：飞行员都是专门为他个人配备的，詹姆斯·斯温多上校就是这样的专职飞行员，他是一位潇洒的亚拉巴马人，外形就像《特里与海盗》（*Terry and the Pirates*）中的人物。后来，在肯尼迪总统的监督下，雷蒙德·洛伊设计了一架特殊的波音707飞机，基本色调是蓝色，它将载着肯尼迪去得克萨斯州，并于1963年11月返回，但肯尼迪在1961年5月30日登上的那架飞机的机首和飞机引擎基座被绘成了猩红色。不管何时，如果能受邀登上总统的专机，你都会喜欢上与吉姆·斯温多坐在驾驶舱里的感觉。单单看着这个人的一举一动，就是一件乐事。他的动作总是很优雅和果断，没有多余的动作，当看到仪表板上的红灯闪烁时，他的手指会灵巧地按顺时针转动黑色的纵倾调整小轮，在35000英尺的高空，向上爬升穿越湍流，进入清畅的气流中。

不无吃惊的是，他们了解到，苏联代表团还没有动身。就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在旅行方面，他们也根据不同的星星确定方位。尼吉塔·赫鲁晓夫和尼娜·赫鲁晓夫是在三天前离开的家，他们乘坐的是一辆个人专用的铁路机车，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抵达维也纳。美国人的方式似乎更可取。在斯温多抵达大西洋海岸之前，杰克和杰奎琳就已经上床休息了。在睡了7个小时之后，他们降落在奥利机场，巴黎人在高大的夏尔·戴高乐的率领下，等在那里迎接他们。肯尼迪总统没有意识到，但他的妻子打算给法国人留下一个值得珍惜的回忆。11年前，她曾是巴黎大学一名默默无闻的学生。现在，她凯旋故地，带的行李足够装满两卡车，一系列的珠宝让人眼花缭乱，还拥有了选择巴黎社交圈子的权利，就在上一次，她还被拒之门外。

法国人在自我管理方面并不总是那么成功，但在导演礼节性的国事访问仪式方面，从来没有人超越过他们。“空军一号”出现在远方，但由于春天的薄雾，再加上阳光的照射，而显得朦朦胧胧，此时，身穿蓝色罩衫的法国妇女对约75米长的红色地毯进行了最后的清扫。法兰西共和国卫队的士兵一动不动地站着，红色的羽毛在柔和的微风中飘动着，他们齐膝高的黑靴亮铮铮的，他们的剑竖直立着。在他们的旁边，便是戴高乐总统，他身穿双排扣的灰色西装，也直挺挺地站着。斯温多的降落堪称完美，落地，滑行，轻轻按下开关。普惠发动机嘶嘶着安静了下来。后舱门打开，显露出美国总统的徽章；杰克迅速进入人们的视线，

杰奎琳则紧随其后出现。她面带微笑，佩戴淡蓝色的平顶无边筒状小帽。她丈夫则紧张地用手指摆弄着他的领带。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世界上其他领导人的年龄大多与他的父亲相当，其中两位甚至公开地表达过对尼克松的赞赏，他们是蒋介石和康拉德·阿登纳。他必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获得了他们的友谊，但也需要他们的尊重。

鼓隆隆敲响，然后归于沉寂。肯尼迪夫妇走下舷梯，受到伟大的夏尔·戴高乐的欢迎，只是这一次，他屈尊说了几个英语单词，他问道："你的空中之旅愉快吗？"杰克确信说旅途愉快，戴高乐说："啊，那很好。"并领着肯尼迪去了一辆等在那里的雪铁龙汽车，车队开始行进。远处某个地方，101响礼炮开始轰鸣。他们的目的地是奥赛站台[注]，离机场10英里远，观众云集，有100多万法国人出来迎接他的客人，戴高乐显然得意扬扬。对于肯尼迪夫妇来说，当他们抵达圣蜜雪大道，并进入拉丁区时，一行人迎来了巅峰时刻。为了向杰克表达敬意，一群美国学生聚集在那里。他们高举着哈佛大学的横幅，用法语重复喊着："肯尼——1，肯尼——2，肯尼——3，肯尼——迪！"这种模仿火车头声音的欢呼方式让本地人感到迷惑不解，但曾经看过美国大学橄榄球比赛的人立刻就会知道这是在做什么。

在法国外交部，一个宫殿式的套房已经为肯尼迪总统收拾停当，另一间则属于第一夫人。肯尼迪的房间曾经是法国国王的卧室。当门在他身后关上的那一刻，他径直走向路易十六的卧室，一边走一边脱衣服。几周前，在渥太华举行的一次植树仪式上，他的下腰椎受了伤，对他来说，从奥利机场开始的长途旅行简直是一场极度痛苦的噩梦。在他给自己注射麻醉剂时，一位朋友提前在他的浴缸里放好了水。巨大的浴缸全部镀金，很有异国情调，杰克发出非常舒服的呻吟声，将身子沉入其中。他不能再继续泡澡了，接下来，他要去爱丽舍宫吃午饭，并与戴高乐进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但在整个巴黎访问期间，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待在那里，让热水一直浸到他的下巴。

在爱丽舍宫，法国人吹响喇叭向肯尼迪致敬，然后，他很快跟着戴高乐来到了二楼的办公室。在某些问题上，他们同意各自保留不同意见。伟大的夏尔·戴高乐说，法国再也不会向老挝、柬埔寨或越南派遣军队了，东南亚就是"一个打仗的地狱"。两位总统会面的主要议题当然是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即将到来的会面。跟哈里曼一样，戴高乐也认为这位苏联领导人是在装腔作势，他劝肯尼迪不要试图威胁他。法国总统预言

道："他会告诉你在6个月内签署一个单独的和约，打破我们的《波茨坦协定》，将我们赶出柏林。这些话他都已经说了3年了。6个月后，他会将和约再延期6个月，然后又是6个月。他永远不会签署那样的和约，因为苏联不想打仗。"

如果美国、英国和法国从西柏林撤出，那将是背叛。他们会违反《波茨坦协定》，出卖联邦德国，它现在可是它们的盟友。当然，配备传统武器的盟军抵御不了红军的进攻，几小时后就会失守。只有核武器才能扭转局势。戴高乐告诉肯尼迪：赫鲁晓夫知道这一点，让他不要忘记。坚守住自己的阵地，并让苏联领导人确信你正计划一次新的空运。然后他就会退让。法国领导人说他本人曾经告诉过赫鲁晓夫：西柏林处于苏占区的包围之中，这种地理位置太糟糕了，现在仍然如此，但它未来的地位只能在世界裁军框架内决定。

肯尼迪和戴高乐两人推心置腹谈了近8个小时，前前后后三天的时间，显然，他们俩的谈话本着这样一种精神：发挥最出色的政治才能，为各自的国家争取最大利益。美国总统情绪高涨。当时你觉得很好奇，现在仍然如此。因为法国总统与其大西洋对岸的盟友在几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并不一致：他的国家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作用，英国对欧洲共同市场的参与，如何与新兴国家打交道，法国是否真的需要核威慑力量。哈里曼告诉你，戴高乐会变得更糟，通常，埃夫里尔是对的。然而，后来肯尼迪告诉你：对于与他意见不一致的人，法国总统总是愿意考虑他们的理由，既礼貌又通情达理。在他们第一次谈话开始时，戴高乐的态度就像是一位叔父。在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结束时，他评论说：美国总统负责任，能力出众，还有一个戴高乐式的赞美，他称肯尼迪是"一个严肃的男人"。后来，杰克向你展示了戴高乐前些时候送给他的一封信的翻译稿，信中力劝他压根儿就不要跟赫鲁晓夫谈判。结尾部分是这样开始的："你们应在什么地方一决雌雄呢？"接着是一串雄辩的隐喻，意在表明：依据写信人的判断，没有适合"决斗"的场所。杰克怀着极大的热情阅读了这些翻译稿。最后，他说："这难道不是很漂亮吗？"你糊涂了，问道："你同意他说的？"杰克说："噢，不。但这是多么绝妙的文体啊！"实际上，这激发了他的热情，并不是因为他其实根本无法阅读这种语言的文体，而是因为他对一位"二战"领导人的英雄崇拜。不过，它不会持久，也的确没有持久。

同时，杰奎琳正在征服巴黎，她彻底告别严肃持重，不断地追求时尚。她住的套房本来是王后的卧室，在此等待指示时，她找到了欧洲最有名望的化妆师纳塔莉和著名的巴黎发型师亚历山大。杰奎琳为她第一天晚上的公开露面选择了一件修长的礼服，白色和粉红色搭配，人造纤维做的花边，还配了一个14世纪的发型。最后一切收拾停当，她要出击了。当她出现在奥赛站台的台阶上时，上千架相机不停地闪烁，就像一道炫目的闪电。法国记者喊道："太可爱了！很迷人！"等在那里的她的丈夫也在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最后，他说："哇，我简直目不暇接。"那天晚上，她对杰克在竞选活动时经历的事情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她握了1000次手，手套都被弄脏了，累得筋疲力尽。不过，她仍然保持优雅，身体挺直，她的微笑仍然灿烂。法国人奔走相告："她比女王更像女王。"

第二天，她拥有了自己的车队。组织者是法国的文化部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杰奎琳和戴高乐夫人坐第一辆车，随后的雪铁龙轿车上载着杰奎琳的妹妹李、尤妮斯·施赖弗和罗丝·肯尼迪，随从人员还有一群巴黎女子，她们或因自己的美貌、才能，或因自己丈夫的影响而知名。巴黎市议会隆重地赠予美国第一夫人一块手表。她参观了约瑟芬皇后的乡村庄园马尔梅松，并在蓬巴杜夫人的隐居处就餐。她说着一口流利的法语，完美而且没有口音。法国人聚集在她去的地方，大多数人只顾盯着她看。他们惊奇于她的优雅和美丽，耸耸肩，告诉其他人说，"她是法国人"，你还能期待什么呢？但她真正的"猎物"是夏尔·戴高乐。在午宴上，她的座位紧挨着他，因此得以与他愉快地交谈，她用非常地道的法语谈论复杂的法国历史问题，比如，波旁家族末期时王朝的复杂性、昂古莱姆公爵和路易十六的各种困扰等，直到法国总统隔着餐桌倾过身子告诉美国总统：他的妻子比大多数法国女人更了解法国历史。当然，她是故意留下这种印象的。后来，杰克自豪地告诉你，这种感觉就像是戴高乐夫人问他亨利·克莱的私生活一样。但有一个问题。如果戴高乐和其他人断定美国总统的妻子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个例，那她的成功就只是关乎她个人的事，也就对美国的事业毫无助益。运气还算不错，这个问题竟然解决了。马克·邦迪坐在戴高乐附近，不知怎么的，就引起了法国总统的注意。马克的头发浅黄，那天理了个平头，看上去与其年龄略显不符。确实没有人会猜到，差不多10年前，他就被任命为哈佛学院的院长。法国总统低头看着他，傲慢地问道："这位年轻人是谁？"杰奎琳认出他是一位哈佛人，现任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戴高乐问了邦迪一个关于哈佛的简单问题，语速很慢，而且用的是法国一年级学生所能

掌握的有限的词汇。马克微笑着用一连串流利的法语回答，语言精彩，就像一位学识渊博的法国人在说话。

在为答谢媒体举行的告别午宴上，杰克说：“我认为向在座的诸位做自我介绍没有任何的不妥。我就是那个陪杰奎琳·肯尼迪来巴黎的人，我乐在其中。”在他们话别时，戴高乐称肯尼迪“我的朋友”，并且说道：“现在，我对你的国家信心更足了。”杰克对此表示感谢，也意识到了杰奎琳对此贡献颇丰，因为到了维也纳，就再也没有盟友给予支持了。在他就任美国总统的典礼之前，他曾被领着认识了“提包的人”。事实上，他们有5位，全都是军队中的准尉。“包”“橄榄球”或“书包”是一个30磅重的金属手提箱，用一个复杂的暗码锁锁着。里面装的是发动核攻击的密码。肯尼迪通常在工作时会忽视这些提包人，毫不奇怪，“包”的出现等于是在提醒美国总统，他是在下达通知几分钟之后便能够摧毁西方文明的两个人之一。现在，他将要去维也纳会见另外一个人。

当斯温多降落在维也纳国际机场时，大雨滂沱。飞机上的所有人齐声抱怨。从一开始，这次访问似乎就不太吉利。甚至在他们离开美国之前，令人烦恼的问题就已经产生。奥地利人、苏联人和美国国务院坚持认为，美国总统应向维也纳的无名战士墓献花圈。肯尼迪说绝对不行。那样的话，陷入政治危机的可能性太大了。奥唐奈给他在维也纳的人打电话，告知杰克的最终决定。肯说：“无名战士可能是纳粹，但你要告诉他们：当赫鲁晓夫在其需要致敬的墓地献花圈时，肯尼迪总统将在圣斯蒂芬大教堂为其灵魂而祈祷。”

美国大使馆的气氛有些压抑：它的外墙被涂成了灰色，而门窗的镶边却是难看的棕色，周边围有带刺的铁丝网，还有站岗巡逻的奥地利卫兵和体形健壮且咆哮不已的警犬。美国总统的苏联客人很准时：12点45分，黑色海鸥牌的四门汽车嘎吱嘎吱地开了过来，先是赫鲁晓夫那短而粗的腿出现在了一扇打开的车门前，紧随其后便看到了赫鲁晓夫本尊。肯尼迪急忙迎出去，微笑，握手，并表示欢迎。苏联领导人穿着一身整洁的灰色制服，胸前佩戴两枚星形奖章。他贴近肯尼迪的鼻子，咧着大嘴笑着，而美国总统的脸上始终保持着的淡淡的微笑突然消失了，他转过脸，避开镜头，把手插到口袋里，从头到脚打量起了赫鲁晓夫。所有人都不再讲话。肯尼迪总统并没有显得不愉快，了解他的人意识到，他只是想满足一下他那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掂量一下苏联领导人是个什么

人物，揣测他的身高、体重、个性、心情和气质等。后来，有人问杰克，赫鲁晓夫跟他预期的有什么不同。他答道："完全不同。"他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复合体，"表面上高兴，内心却狂怒不已"。

日程安排看上去很单调。第一天的午宴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美国总统做东。当天晚上，奥地利政府设宴招待其尊贵的客人，餐后接着在金碧辉煌的美泉宫观看芭蕾舞表演。明天的午宴将在苏联大使馆举行，赫鲁晓夫主持。第一天的午宴是杰奎琳使赫鲁晓夫着迷的唯一机会，她倾尽全力。有一次，在他引用乌克兰教师现在的人均收入，并与沙皇统治下的数字加以比较时，她柔声地说："噢，赫鲁晓夫先生，不要拿统计数字来烦我。"他笑了，并告诉她苏联的太空狗斯特雷卡（Strelka）不久前刚生了一窝小狗。她说了"多讨人喜欢""多可爱"，诸如此类的话。

她那起到润滑剂作用的魅力，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第一次会议上，就烟消云散了。尽管身材又矮又胖，但赫鲁晓夫此时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他有一种蛮不讲理的劲头，眼睛快速地转动，而且闪着亮光，给人的印象是他会迅速注意到别人的怠慢，并因此深感不快。坚冰已破，通过一次让人感到紧张的闲聊，到了完全破冰的程度。赫鲁晓夫问肯尼迪对安德烈·葛罗米柯的看法。杰克说："我妻子认为他的微笑挺迷人的。你为什么要问这个？"赫鲁晓夫说："噢，不少人认为葛罗米柯看上去像尼克松。"慢慢地，谈话变得严肃起来，赫鲁晓夫的态度也变得狂暴起来，声音中带有某种粗鲁的情绪。肯尼迪坐在那里听着，等他开口。最后，他说："我们承认我们的错误。""你承认你们错了？"赫鲁晓夫给了肯定的回答，他承认了斯大林的所有错误。当他支持的"解放战争"受到质疑时，他回答说，它们是历史必然性的结果。肯尼迪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通过历史必然性的考验，他引用了一个又一个例子，说明少数共产主义者正想方设法推翻受人民支持的自由选举的政权。但赫鲁晓夫打算寸步不让。如果他想不出如何回答，就会沉默不语。没有人知道何时何事会引燃他的怒火。肯尼迪提到，如果判断错误就会有引发核战的危险。用肯尼迪总统的话说，赫鲁晓夫此时"狂怒起来。他开始叫嚷：'误判！误判！误判！'我从你们的人、你们的记者、你们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朋友那里听到的，都是这个该死的词——'误判'！你应该把这个词带走，埋进坟墓，永远不要再用它！我讨厌它！"所有人开始局促不安，然后，休会吃午饭。在餐厅，肯尼迪总统伸手摸了摸赫鲁晓夫的其中一枚奖章。他问道："这是因为什么获得的？"赫鲁晓夫吃了一惊，但不无骄傲地说："这是列宁和平奖章。"肯尼迪轻声地说："我希望他们

让你一直戴着它。”

后来，杰克说与苏联人的那些会面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办的事”。因为他们与翻译分开坐着，而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再加上赫鲁晓夫明显越来越严厉的态度，这让肯尼迪觉得越来越不舒服。在过去，当有令人痛苦或不幸的事情发生时，他都会与跟他的意见完全不一致的人协商。不过，最终结果是，有些事情双方都接受，有些事情达成妥协，有些事情则形成共识。后来他说道：但在这些谈话中，他发现没有“调和的余地”。杰克指出，一旦走错路，就会带来巨大的后果，那就是无数美国人的尸体，无数苏联人的尸体。实际上，赫鲁晓夫有着同样的担忧，这正是他与中国人失和的起因，虽然没有暴露出来，但裂痕已经越来越大，而在这里，在任何有助于阻止一场人类浩劫的事情上，他都拒绝任何让步，拒绝任何调整，哪怕是最低的限度也不行。当美国总统正全力以赴解决这个问题时，赫鲁晓夫再次声称，他要与民主德国签订和平协定。

在深吸一口气之后，肯尼迪对他的坦率表达了感谢，回答说：他要同样直率地回答。同盟国在柏林并非是哪个人忍让的结果，而是争取来的。在波茨坦，苏联承认了既定事实，签署了协定，该协定赋予了它们占领国的法律地位。基于协定，同盟国随后做出了正式的、有约束力的保证。一旦美国接受了被逐出柏林的结果，其未来的承诺都将会受到蔑视。因此，美国拒绝了苏联的最后通牒。赫鲁晓夫的回答很独特。他说肯尼迪是在拿国家安全为借口，以留在柏林。或许肯尼迪的下一个动作就是占领莫斯科，因为这也会提升美国的战略地位。美国总统说：美国人任何地方都不想去；他们只是决心留在该留的地方。

如此两天之后，会谈如期结束，午宴安排在苏联大使馆。肯尼迪一边沉思着，一边拨弄着自己的食物，此时，有人提醒他：到该离开的时候了。“不！”他怒冲冲地说道：“我们不能按期离开，在我了解更多之前不能走。”他把赫鲁晓夫拉到一边，再次对柏林的形势加以审议。赫鲁晓夫仍然不愿意改变立场，并表示会在12月，与民主德国签署协定。这件事之后，他确认，美国将失去其在联邦德国的权力。如果美国因此选择开战，“那是你的问题”。肯尼迪紧张地说：“想迫使改变的是你，而不是我。”赫鲁晓夫耸了耸肩。他重复表示，他的决定是最终决定。肯尼迪厉声说道：“那将会有一个寒冷的冬天。”他突然转过身，大步离去。

等到“空军一号”返回安德鲁斯机场，赫鲁晓夫已回到克里姆林宫，全世界都知道了苏联人的最后通牒。苏联领导人增加了31.14亿卢布的军事预算，并发表了一系列好斗的演讲。杰克私下说：“我有两个麻烦。第一，搞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做，而且是以如此充满敌意的方式。第二，搞清楚我们对此能做什么。我认为第一部分很容易解释。显然，他这样做是因为猪湾的事。我觉得，他认为一个乳臭未干的人在陷入那种狼狈处境时，都会选择装聋作哑，于是，任何卷入麻烦却又无法渡过难关的人，也就丧失了勇气。因此，他就逮住我一顿痛击。所以，我的麻烦大了。如果他认为我缺乏经验，而且没有胆量，除非我们消除他的这些想法，否则，我们就拿他没办法了。因此，我们必须有所行动。”

他的行动跟赫鲁晓夫一样，提高军备开支，征召后备军，并且将强制征兵人数增加三倍。为了让柏林人放心，他把美国副总统和卢修斯·克莱将军派去了德国的旧都，克莱将军是1948年柏林的空军英雄。肯尼迪总统不太愿意拿原子弹吓唬别人，或者别人所说的“核威慑”。他告诉你，他最大的担心是赫鲁晓夫“想要揭我的疮疤”，如果是那样的话，“游戏就结束了”。与此同时，他就对抗和可能随之而来的牺牲之间的矛盾陷入了沉思。他不想导致他的国民“在某个火光冲天的城市的半夜”死在“某个有争议的路障之处”，而且这个城市只是整个城市的一半，而守在路障旁的则是东柏林的警察。他说：“所有的战争都始于愚蠢。上帝知道我不是一个孤立主义者，但为了一个关乎进入德国苏占区一条高速公路的权利之争，或因为德国人想要德国统一，就要冒险让无数美国人丧失生命，似乎特别的愚蠢。如果我要用一场核战争来威胁苏联，那一定要有比这个更大和更重要的理由才行。当我把赫鲁晓夫逼得没有退路，并使其面临最终的考验时，所有西欧人的自由将会处于险境。”

与此同时，柏林陷入骚动。1961年7月，30444名逃难者涌入这个城市的西区。8月的前10天，又有16500人跑了过去。仅仅8月12日一天，有数可查的西流人数就达到了4000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医生、技师和技术熟练的工人，他们正是民主德国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实现5年计划所需要的人，乌布利希是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绝望之下，他决定采取行动。8月13日凌晨0点30分，警报声划破夜空，回响在空无一人的民主德国的街道上，在低矮的T34和T54坦克的护卫下，民主德国军队散布到了将这座城市分割为东、西两部分的25英里长的分界线上。戴着钢盔的民主德国警察分乘几辆卡车，占领了主要的交通路口。军队卸下了木料、带刺的铁丝网、混凝土柱、镐和铲。4小时以后，就在太阳升

起时，一堵墙的雏形就已经清晰可见。4天以后，最终完工，它把留在东柏林的德国人圈禁了起来。

同盟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吃惊不已。美国总统远在华盛顿。9月1日，当赫鲁晓夫又逼近一步时，他仍在设法厘清所发生的事。赫鲁晓夫重提核弹头实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苏联进行了30次大型核爆，几乎全在空中引爆。因此，对于空中更多的放射性毒物，苏联人要承担比美国、英国和法国加起来还要大的责任。肯尼迪批准美国重新进行核试验，不过他提出的条件是：所有的核试验必须在地下进行，这样也就可以控制放射性尘埃带来的风险。现在是1961年9月8日，危机的巅峰时刻。柏林墙已经建成，这个由砖和参差不齐的水泥块砌成的建筑蜿蜒曲折地穿过了柏林的中心地带。唯一通向同盟国的过境站也被关闭了。

10天后，当杰克从海恩尼斯港动身去华盛顿时，一份残酷的通知被递到了他的手里：达格·哈马舍尔德在刚果死于飞机失事（此次空难至今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自日战胜利日以来，战争似乎从未离得如此近过。但是，肯尼迪在维也纳学会了一件事情。言行一致不是苏联人的优点，逻辑性也不是。当然，苏联最高领导人说过，他承认自己的错误，但那是斯大林的错误。这是非常荒谬的，除非有意把它当成一种精妙的幽默，认识他的所有人都同意一点：赫鲁晓夫完全缺乏这种精妙。类似地，他在“误判”这一说法上的勃然大怒毫无意义。肯尼迪推断：苏联人并不在乎世界的舆论，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改弦易辙。那边已经处于战争动员的边缘，这边苏联大使及其两名工作人员正在白宫拜访，并带来了一条神经紧张的、毛茸茸的小白狗。大使还呈递了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和妻子很高兴能“满足肯尼迪夫人的愿望，送给您和您的家人这只小‘普辛卡’，它是世人皆知的宇宙旅行者‘斯特雷卡’亲生的后代，1960年8月19日，斯特雷卡乘坐宇宙飞船进行了一次太空之旅，并成功地返回了地球。”肯尼迪瞪眼看着这只狗，然后看着杰奎琳，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嘴上，悄悄地说：“我只是设法让谈话……”

在信的末尾，赫鲁晓夫写道：“谨代表尼娜·彼得罗芙娜和我，向您、您的妻子和家人致以最良好的祝愿。”这可不是一个准备发射氢弹的人说的话，而发射氢弹的目的是将华盛顿夷为平地，让它变成一个炙热的白色茶碟。苏联人的下一个动作是安德烈·葛罗米柯对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的拜会，说是要谈一谈。（肯尼迪告诉一位朋友说：“看上去像是要解冻。”）实际上，葛罗米柯没有说多少新的内容。杰克听着，吸着

一支雪茄，没有让步。葛罗米柯建议让联邦德国变成一个国际区，让联邦德国人和信仰共产主义的警察共同管理。肯尼迪摇摇头说：“你这等于是递给我们一个苹果，却要换走一个果园。在这个国家，我们不做这种事。”

不过，此次拜会是有意义的，至少它是一种象征。赫鲁晓夫开始从危险的边缘后撤了。他对比利时外交官保罗–亨利·斯巴克说：“我意识到，跟我希望的相反，西方列强是不会签署和平协定的……我不想让你进退两难；我非常清楚你不想做一个失败者。”似乎如鲠在喉并非真的不能忍受。他继续对比利时人说：“要知道，对我来说，柏林算不上是一个大麻烦。不过是10亿共产主义者包围着200万人而已！”现在也不用着急。他已经给肯尼迪下了最后通牒，他对斯巴克说：“到今年年底，但我不受任何最后期限的约束。”10月17日，在苏联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时，他宣称：“西方列强现在已经对形势有所认识了，并有意寻求解决德国问题和西柏林问题。”最后，他做出决定：“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坚持非得要在1961年12月31日前签署和平协定了。”

柏林危机的成功化解让肯尼迪重新挽回了在猪湾事件上失去的颜面，这不仅让美国缓了一口气，整个欧洲也轻松了不少。然而，贫困国家的“人民起义”可不是靠摊牌就能解决的。讽刺的是，肯尼迪制止此类暴动的努力却使得美国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导致美国被指责为侵略者，并最终酿成了越南的灾难。在谈到赫鲁晓夫时，杰克会告诉你：“嗨，那个人根本不关注你说了什么。他非得看你是怎么行动的。”他解释道：这就是他命令迅速集结一只常规部队的原因。为了避免世界大战中的核毁灭，他准备干涉，但不是用美国军队，而是用武器、资助和军事顾问，去影响一些肮脏的小规模战争。为实现更大的和平而流血，这个矛盾的做法却是麦克纳马拉提出的。他说：“我们必须处理‘解放战争’的问题。如果当地的农民领袖被有组织地谋杀，你是无法实施土地改革计划的。”

肯尼迪注意到：共产主义者的暴动在没有中产阶级的地方取得了成功，在那些地方，富人活得悠闲而奢华，而农民则要忍饥挨饿，这与最初的观察不完全相同。然而，在其任内，他认为破坏美国安全的最大危险来自格兰德河（Rio Grande）的下游，几乎没有人认同他的看法。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在横穿南美的长途旅行期间，他对穷人的苦境及其富

裕统治者的冷酷无情感到震惊。作为美国参议员，他曾呼吁与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密切的关系，主张拥有世界人口6%的美国再也不应继续消耗世界50%的资源。类似议案全部被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的游说给扼杀了。不过，作为美国总统，他可以不理会游说，1961年3月13日，他把拉美国家的外交使团召集至东大厅，邀请它们加入一个新的争取进步联盟。基于“为了完成美洲的革命……政治自由必须伴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要发展，不要专制”这样的主张，该联盟致力于改善地区市场、促进国家计划和实现商品的稳定，以及推动教育、技术培训和研究的计划。这获得了长时间的鼓掌，虽然意识到这会进一步稳固他们各自的政权，但很多人心里不无怀疑，甚至私下里还会冷嘲热讽，不过，大使们显然被感动了。

5个月之后，该联盟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Punta del Este）正式组建。肯尼迪每年都会飞往南部会见各个代表团。杰奎琳能说一口标准的西班牙语，她可以对礼堂里的人发表演讲，同样重要的是，还可以跟外面的公众对话。对于需要改变做法的呼声，肯尼迪总统总是严厉斥责；这是他的大棒，除非对此做出反应，否则，他们仍然够不到经济的胡萝卜。为了说服所有怀疑他受大众欢迎程度的人，这位美国总统的车队会载着政治领导人，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前去他的会面地点，而欢呼的人群像潮水般涌向总统的豪华轿车，抛洒的粉红色纸屑就像暴雪般飞舞，并且异口同声地反复喊道：“万岁肯尼迪！万岁肯尼迪！”20年后，一位持有不同观点的美国人入主白宫，考虑到那时的形势，再去读肯尼迪最后一次出访南美时在哥斯达黎加大学对聚在一起的中美洲各国总统讲的话，那是很有趣的。他宣称这个半球上的每个人“都有享受社会公正的权利”，这意味着“没有土地的人要享有土地，被排除在校门之外的人要享受教育……以及让特权得以延续的古代制度（的结束）。”从哥斯达黎加大学返回的途中，你问他：为什么尼克松在4年以前会在拉美国家输得那么惨。利马和加拉加斯愤怒的民众攻击了尼克松及其夫人，他们高喊：“尼克松，去死吧！”他和帕特有幸活着逃了出来，艾森豪威尔紧急派出了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却让美国副总统感到了尴尬和丢脸。杰克回答说：他认为自己的就职演讲更能吸引拉美的新生代，而不是其他地方的人。在制服了大型钢铁公司之后，他在那里大受欢迎。另一方面，尼克松对出访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按罗斯福的话说，尼克松代表了错误的党派，但不管怎样，尼克松就是尼克松”。肯尼迪对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顾虑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尽头。在最后的几个月里，他不断重复自己的信念：“我认为，拉丁美洲是当今世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区

域。”在他去世之后，再没有人重新扛起过他遗落的争取进步联盟的大旗。定时炸弹仍然在远离美国国境线南端的地方滴答作响，但他再也不可能在那里听到这种声音了。

如果不加以利用，成功也会过期作废。这是肯尼迪所珍爱的格言。他最伟大的成就是解决了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从而结束了他白宫岁月里最可怕的窘境，开启了一条新的和平之路，在当时，这个挑战似乎超出了所有政治家的能力。其所达到的高度和成果向美国人以及外部世界表明，肯尼迪这一届美国政府在处理问题上更加成熟了。假如肯尼迪和他的团队失败了，美国就会蒙羞，从此一蹶不振，他们的后代将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人，所生活的土地也要比今天小得多。

距离肯尼迪第一次笨拙地与卡斯特罗的政权发生冲突，已经过去了18个月。肯尼迪及其助理和内阁是一个经验丰富而又善于随机应变的团队。人们只记得来自古巴的挑战，但真正的挑战者在莫斯科，对于杰克来说，这个挑战始于1962年10月16日早晨8点，那天是周二，马克·邦迪走进肯尼迪总统的卧室，杰克正在阅读晨报，马克说：“总统先生，现在有了确凿的照片证据，一会儿你就能看到，表明苏联在古巴架设了攻击性导弹。”

很明显，自从8月末以来，那个地方就一直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5000多苏联人出现在岛上。有人认为他们是正在安装攻击性核导弹，但这种可能性没有被接受，苏联从来没有在其他国家部署过导弹，甚至在根据《华沙条约》依附于他们的东欧卫星国也没有。奇怪的是，伦敦《泰晤士报》的亨利·布兰登当时正在哈瓦那，他了解他们的所有情况，并猜测华盛顿也知道。但华盛顿并不知情。U–2涡轮喷气式飞机可以飞升至10英里，并能清晰地拍摄到一张报纸的存在，甚至你能读出它的大字标题，当U–2飞机带回确凿的证据时，美国政府才第一次知道此事，照片表明，导弹发射场正处于建设初期，现场有运输车辆、安装工和发射架。它们一旦建成，导弹发射基地就能先发制人，一次齐射40枚核弹，打击美国的目标，最远可至美国西北部的蒙大拿州。

肯尼迪总统迅速行动起来，命令紧急增加U–2飞机的过境侦察，组建由21位政府高官组成的顾问小组。该小组成员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简称执行委员会）选定。鲍勃·肯尼迪是成员之一，他描述

说，执行委员会在第一天的情绪就像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不相信”。为了不让苏联人了解他都知道了些什么，肯尼迪总统仍继续按照他的工作日程做事，包括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讲，而同时，执行委员会也会检查新的证据，集结美国的军事力量，并权衡可能的选择。10月18日，周三，美国的情报机构做出了预测：如果开火，现在设在古巴的武器会在几分钟之内杀死8000万美国人。执行委员会倾向于用美军飞机发起大规模的攻势，可能的话，紧接着就要侵入该岛。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建议实行海上封锁，不过要以别的名义出兵，因为封锁实际上等于战争行为。美国国务院的法律顾问建议将之称为“检疫隔离”，鲍勃·肯尼迪表示赞成。周六，他打电话给他远在芝加哥喜来登黑石酒店的哥哥，告诉总统执行委员会，他们已准备好了一份计划。皮埃尔·塞林格按照指示宣布肯尼迪总统患了感冒，正返回华盛顿。当天下午1点37分，“空军一号”抵达安德鲁斯机场，鲍勃前去接机。

周一早晨，美国海军已经在加勒比海布置了180艘船。满载原子弹的B–52轰炸机在空中轰鸣。第一装甲师离开得克萨斯州，驶向佐治亚州的登乘点，其他5个师则进入警戒状态。中午，塞林格宣布肯尼迪总统将在下午7点发表电视讲话，他称要讲的话题是“最紧急的”。肯尼迪准时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他告诉他的国民：在过去的一周里，“毋庸置疑的证据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那个禁锢的岛上，一连串的攻击性导弹发射场已经准备就绪。这些基地的目的无非就是提供抗击西半球的核打击能力”。他解释了检疫隔离的事，称之为“这是坚决消除核威胁目标计划的第一步”。如果需要，紧接着就会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封锁线在10月24日周三上午10点划定。一艘苏联油轮获准穿越该线，其运送的唯一货物就是汽油，但最新的U–2侦察机发出警报：导弹发射场的作业正异常快速地进行着。另一艘苏联船只受到美国驱逐舰的怀疑，被拦停接受搜查。推断这是莫斯科指示苏联船长在观察封锁情况。周五下午6点，赫鲁晓夫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通过连接美国国务院和驻莫斯科美国大使馆的电传打字机咔嗒咔嗒传过来，他同意美国所有的条件。10月28日，周六上午9点，莫斯科广播电台宣布了苏联的一份“投降书”。官方声明称：“为了尽快消除损害和平事业的冲突，苏联政府……发布新的命令，拆除你们称之为攻击性的武器，装箱运回苏联。”卡斯特罗声称，他受到了背叛，但他无能为力；导弹在苏联人的手中，古巴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发射。执行委员会兴高采烈。肯尼迪总统告诉其成员要保持克制。他指出，打退堂鼓必定让赫鲁晓夫十分恼火，并

提醒一定不要宣布美国的胜利。那天晚上，肯尼迪和兄弟们一同回顾了此次13天的危机。最后，杰克说：“或许今晚我应该去看戏。”他们都哄堂大笑。然后，鲍勃说：“如果你去，我想跟你一块儿去。”

其他人看到了胜利，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肯尼迪总统看到了机会。在他兄弟离开，自己就寝前，他认认真真地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结尾写道：“我认为我们应优先考虑与核武器扩散有关的问题，不管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外层空间，并考虑付出巨大的努力来禁止核试验。”他觉得，在宇宙的某处，档位已换，做出重大转折的时机已经来临，而他知道如何启动它。迪安·艾奇逊曾评论道，肯尼迪总统的讲话“常常是在政策制定的情况下做出，而不去理会它是否应该制定”。就其本质而言，美国总统的讲话是一个国家意向的声明，它不仅是要说给自己的国民听，更是要告诉全世界。时机恰好。导弹危机之后，苏联人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就是，肯尼迪伸出了橄榄枝。在其他时候，比如在维也纳，他们会把它解读为意志薄弱的信号。但是现在，由于在柏林和古巴的事情上感觉到了他的力量，他们会在意，可以不必牺牲自尊而做出反应。演讲之后，他想要乘飞机前往欧洲。在那里，他也有些话要说。

1963年6月10日，周一，他要在美国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他希望拿出周日的时间修改一下他的初稿，但总统的日程安排随时都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南部各州的民权危机让他确信，他必须在周日的美国市长会议上发表演讲，那天是他长时间西部旅行的结束之日。在返回的路上，他对讲稿进行了润色，采用了已成为肯尼迪标志的平行句和不连贯的短语。接近上午9点，飞机抵达安德鲁斯机场，他径直去了白宫，换好衬衫，10点30分来到了毕业典礼的讲台前。虽然累得要命，而且因为闷热，他一直在出汗，他知道苏联的官员很警觉，他们已经竖着耳朵等着听他的反应了。在美国，媒体忽视了他所传递信息的意义，《纽约时报》只在第16版刊登了报道，其他报纸则几乎未报道任何相关消息，也就因此错过了他三次最精彩的演讲之一，因为此次演讲与他在休斯敦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和就职演讲齐名。

从一开始，他就致力于维护持续的和平，而“不是由美国的战争武器强加给世界的一个泛美洲……不只是美国人的和平，而是所有人的和平；不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而是所有时代的和平”。他评论道，

有些人说在苏联人改变其政策之前的努力毫无意义。“我希望他们能做到。我认为，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做到。但我也认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态度。”他说，苏联的宣传令人伤心，看到两种政体之间存在隔阂同样令人伤心。“但这也是一种警告，告诫美国人不要跌入跟苏联人一样的陷阱中，不要只看到扭曲的和令人绝望的另一面。”他强调指出：美国人“做的事必须让共产主义者觉得赞成实现真正的和平是对他们有利的……如果现在无法消除分歧，至少我们可以帮助这个世界确保多样性的存在。归根到底，我们最基本的共同点是都居住在这个星球上。我们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我们都对孩子的未来抱有希望。我们都会终有一死”。他提醒听众说：美国的武器不会率先发难，它们会受到小心翼翼地控制，“众所周知，美国永远不会挑起战争。我们不想要战争。我们不期待打仗。这一代美国人经历的战争、痛苦和压抑已经够多了，可以说是太多了……我们应保持警觉，想方设法阻止它。但我们也要为建设一个和平世界而尽自己的一分力量，在这样的世界里，弱者是安全的，强者是公正的。面对这样的任务，我们并非束手无策，或没有希望取得成功。我们会本着和平战略而非灭绝战略坚持奋斗，自信而无所畏惧”。

英国曼彻斯特的《卫报》将其演讲描述为“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政府文件之一”。赫鲁晓夫后来告诉埃夫里尔·哈里曼，他认为它是“自罗斯福以来所有领导人里面最好的演讲”。它是人们所能记得的通过《美国之音》向苏联和东欧播送时没有受到干扰的第一个意义重大的美国演讲。《消息报》和《真理报》全文刊发。身在莫斯科的各国使节都将美苏关系缓和的消息报告给了各国政府，克里姆林宫等待着美国总统的下一步行动。他已经准备好了，即建议拥有核力量的大国之间签署一份有限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赫鲁晓夫早就对此有所警觉。苏联领导人立即声明，原则上同意签署，外交谈判人员开始埋头起草草案。

不到两周，肯尼迪便出现在了戈德斯贝格。你刚好在离那儿不远的埃森市调查德国实业家在纳粹时期的一些往事。白宫的接线员总是知道在何处找到你，不免让人吃惊，这次是肯·奥唐奈打来电话，他问你是否愿意南下。你解释说自己有个麻烦急需解决。当你的调查结果发表之后，它们会让许多有影响的德国实业家感到不安。如果他们想起曾看到你跟美国总统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得出某种推论。你不想让杰克因此感到为难，因此，改期似乎更为明智。肯表示理解。他说，或许你应该出

现在人群中。事实上，这种期待极有诱惑力。如果你了解白宫特勤局特工的一些底细，就会知道他们会发现你正处于人群中的一个好位置，他们确实发现了，你靠得足够近，近到杰克可以在科隆大教堂外面认出你，吃惊的微笑一闪而过。你来早了，这也是好事；40万德国人正聚集在那里，为的是一睹美国总统与阿登纳一起参加弥撒的情景。数千名儿童正挥舞着小小的美国国旗。肯尼迪总统问这个老头："国旗是哪里来的？你不会是要告诉我，他们家里碰巧有美国国旗吧？"老头咯咯地笑起来："噢，我们的确像安排竞选活动时那样安排了一些事情，但我们没有安排这么多人。枢机主教心想，他要是有次弥撒也能吸引这么多人就好了。"

在之前的7月4日，肯尼迪在费城的独立厅发表了一份"相互依存宣言"，期待着欧洲和美国结成新的联盟。作为回应，伟大的夏尔·戴高乐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用很不礼貌的词语抨击这一概念，不仅将美国排除在了他的宏大设计之外，还排除了英国。肯尼迪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回应了戴高乐。他已经尽其所能让伟大的夏尔·戴高乐相信美国的意图是值得尊敬的，它的动机对法国最有利。他承诺过戴高乐：如果苏联准备攻击法国，美国将毫不犹豫地发起第一轮的核打击。戴高乐似乎被感动了。但随着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即将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法国总统通知美国总统，表示他不想参加了，他说，他的参与会侵犯法国的主权。在巴黎，《快报》开始抨击戴高乐，指责他采用了共产主义者的口号——"美国佬，滚回家"。肯尼迪终于发现，他心目中的英雄原来脚是瓷做的。他告诉戴维·布尔克利："夏尔·戴高乐只会被人记住一件事情：他拒绝接受条约。"

现在，圣保罗教堂，阳光正从1848年德国议会召开会议的那间简陋房间的高高的窗户照射进来，照亮了日耳曼人的旗帜，肯尼迪重申了美国对欧洲安全的承诺。"我在这个国家的停留是短暂的，但从更大的意义上讲，这块大陆希望和需要美国在这里停留多久，我们就留多久。你们的自由就是我们的自由，任何对你们领土的攻击就是对我们领土的攻击……大西洋共同体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实现共同防守。这种防守过去是单独进行的，现在仍是。美国会冒着牺牲自己城市的危险去保护你们的城市，因为我们需要你们的自由来保护我们的自由。"

你乘坐法兰克福的航班去了滕佩尔霍夫机场，在一个便宜的小旅馆里住了下来，你知道那里就在选帝侯大街附近，当时有差不多150万德

国人正乌压压地聚集在大街上，他们是来欢迎美国总统的，以表明柏林人的与众不同，而旅馆附近只是这一场景的一部分而已。后来，你了解到，当“空军一号”抵达柏林泰格尔机场（Tegel Airport）时，肯尼迪问肯·奥唐奈：“让罗马人引以为傲的是什么？我是罗马公民？派人喊邦迪来。他知道如何用德语说这句话。”邦迪赶到，把“我是柏林人”译成了德语“Ich bin ein Berliner”。杰克写下来，然后要求道：“现在告诉我如何用德语说：‘让他们来柏林’。”把这些记在脑子里之后，杰克为这座城市做好了准备，但他很快就发现，这座城市远没有为他做好准备。事实上，它变成了一个情绪上的大漩涡。各个年龄段的人在他的车队经过的路旁站成4排，每扇窗户和每个屋顶都有人挤在那里观看，他们重复地喊着：“肯——尼——迪！肯——尼——迪！肯——尼——迪！”如果被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迷住，德国的民众就会有不同于这个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人的表现。你置身于沸腾的、热情洋溢的和半歇斯底里的群众之中，他们挤满了舍恩贝格市政厅外面的鲁道夫·王尔德广场，你已经意识不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融入人群中，他们人数众多，而且不断增加，拥挤着，极度兴奋，几乎可以做出任何事情，此时你想到，曾几何时，德国民众就已经证明他们能做出任何事情。杰克出现在平台上，他看上去有12英尺高，帅气又阳刚，没错，像雅利安人，直到此时，你们还不完全了解他。他被他们改变了。而且，他的讲话也不同于他曾经发表过的演讲。他刚刚看过那堵墙，感觉那是对每一个信仰自由之人的侮辱，他被激怒了。柏林也被激怒了。你几乎可以感受得到他们的愤怒，群众情绪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恒温器被突然升高了温度。他说：自由之路困难重重，而且民主并不完美，继而他大声说道：“但是，我们从来不曾筑起一堵高墙，把我们的人民封住！”德国人大声喊叫，一片怒吼。他把他们的情绪迅速调动了起来，在他的声音中，有一种印刷出来的文字永远无法表达的新节奏，他利用自己的修辞技巧，对他们说出了一通豪言壮语，就像皮鞭抽在撒了盐的伤口上，每击打一下就比上次更加疼痛。

然后，他大声说道：“不管生活在何处，所有自由的人都是柏林的公民，因此，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会自豪地说：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一个柏林人）！”

半歇斯底里变成了歇斯底里。人群变成了乱糟糟的乌合之众，不断

晃动着，发出很大的声响，你被挤在一群工人和一群家庭主妇之间，呼吸困难，心中既困惑又担心。这不是杰克的风格。如同他后来所说，他简直是不知不觉陷了进去。随着演讲完成，他吐露了心声，他感到振奋，然后是担忧，再然后感到了害怕。他觉得如果要是他说："向那堵墙前进，拆掉它！"那群失序的人可能真的会那样做。你害怕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去做，你后来了解到，维利·勃兰特市长也打算去做这件事。当时，维利在附近掌控着军队和坦克，倘若他的市民或者正在另一边聆听的东柏林人猛地冲向将他们分隔开的屏障，他好进行干预。想必杰克没有感到惊讶。他常常认为，群众是非理性的，容易蜂拥而动。这一次，他们就处在实施私刑的情绪之中。只需一个火花，他们就能熊熊燃烧起来，他差点儿成了纵火犯。随着恢复平静，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东柏林人欢呼雀跃，其中一个人隔着墙，扔过来一束花。他笑了，挥手示意，并快速离开。那天下午，在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他恢复了自我，平静而深沉。关于社会进步和人权，他说："现代科技社会的本质需要人的能动性和自由思想的多样性。"不过，他在鲁道夫·王尔德广场感到的某些狂热仍然在柏林蔓延。在他的车队返回机场时，德国人仍旧站在道路两侧，声音嘶哑地高呼："肯——尼——迪！"他对身边的那些人说："我们再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日子了。"听上去他并没有感到后悔。

肯尼迪总统及其团队从泰格尔机场飞到了都柏林机场。此次访问没有正当的理由。奥唐奈指出了这一点："如果你去爱尔兰，人们会说那只是一次愉快的旅行。"肯尼迪点点头。他曾经说过："那正是我想要的，一次愉快的爱尔兰之旅。"在离开白宫前，他已经读完了几本有关爱尔兰历史的书。戴夫·鲍尔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做了一次小研究，汇报说：他从一位布赖恩·博鲁皇室成员的身上，追踪到了肯尼迪家族中总统的这一支脉，被称为"Cinneide"，翻译过来的大意是"脑袋就像顶着个头盔"。杰克迅速说："我们可不能透露出去。"肯尼迪本人发现他所属的血统在17世纪时被迫逃到了国外。托马斯·戴维斯是一位爱尔兰的爱国者，17世纪时受到英国人的伏击，杰克也喜欢引用他的诗歌《奥恩·鲁阿兹·奥尼尔的叙事诗》（*Ballad of Eoghan Ruadh O'Neill*）的最后一节：

> 我们以为你不会死——我们确信你不会死：
>
> 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撒手而去，

撇下我们饱受克伦威尔的残酷打击——

在大雪遮天蔽日之际，羊群失去了牧羊人——

唉，奥恩，为什么要离我们而去？为什么你要死？

差不多一年之后，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坐在希考里山庄鲍勃家游泳池的边上，你告诉鲍勃：自从达拉斯遇刺事件之后，这些诗句就在你的脑海里再也挥之不去。过去，鲍勃经常俯身蹲在地上，那天的姿势也一样，他迅速抬头看了你一眼，说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并迅速改换了话题。

6月，在爱尔兰的都柏林、韦克斯福德、科克、戈尔韦、利默里克等地，肯尼迪活动了两天，谁受到的感动最多，是杰克还是他的听众，这很难说，而这些听众是他的曾祖父帕特里克·肯尼迪乘船驶向波士顿时离开的那些人的后代。帕特里克曾居住在新罗斯，那里靠近顿甘斯顿，一抵达那里，杰克就看到身穿白色套衫的学生躺在新罗斯的一个斜坡上，用身体拼出了单词“Failte”，这是盖尔语“欢迎”的意思。站在帕特里克逃离马铃薯饥荒、怀揣希望动身去美国的码头上，他说：“这趟旅程用了115年和三代人。当我的曾祖父离开这里，到波士顿当修桶匠时，除了两样东西，他什么都没带：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对自由的强烈渴望。我很高兴地说，他的曾孙们非常珍视这份遗产。”然后，他话锋一转，开始幽默起来。他环顾四周，目光停在了一座很难看的大型建筑上，在它上面竖着一个大型的标志牌，表明那里是信天翁肥料厂（Albatross Fertilizer Plant）。他指着那座建筑说：“如果我的曾祖父没有离开新罗斯，我现在可能就在那边那家公司里干活儿。”如果当时离他只有两英尺的距离，你就会听到他又低声地说了一句：“铲粪。”

他在爱尔兰参众两院发表了讲话，这是爱尔兰议会会议第一次在全境内通过电视播出，他引用了詹姆斯·乔伊斯描写大西洋的那句话——“一碗辛酸的泪”。《爱尔兰时报》（*Irish Times*）指出，这是乔伊斯的名字第一次在爱尔兰众议院而非争辩是否接受审查时被人提到。从那里出发，他乘车去了爱尔兰天主教国立大学（Catholic National University）和都柏林三一学院（Protestant's Trinity College）。两所学校都授予他荣誉学位。他说：“我想说的是，与这两所优秀的大学产生联系，我是多么高兴。现在，我感觉自己也成为这两所学校中的一员，如果它们之间比赛爱尔兰式橄榄球或爱尔兰式曲棍球，我会为都柏林三

一学院欢呼，为爱尔兰天主教国立大学祈祷。”

“太棒了！”每当白宫中有人问他此次旅行过得怎么样时，肯尼迪就会这样回答：他们想要知道些细节，但他急于听到禁止核试验谈判的消息。得益于哈里曼、葛罗米柯和英国的黑尔什姆勋爵的辛勤工作，进展惊人。几个月前还想不到的一个条约竟成为可能，而且现在似乎不可避免了，因为克里姆林宫里那位精明的农民和白宫中这位冷静的贵族认定逐步升级的军备竞赛是缺乏理智和不可接受的。肯尼迪在美国大学的演讲已经成为催化剂。赫鲁晓夫越研究，就越受它感动。7月2日，他称该演讲“因对国际形势冷静的评估而很有分量”，并迈出了一大步，提议所有国家认定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为非法行为。如果达成协议，再加上“互不侵犯条约的同时签署”会让“国际气候焕然清新”。他被告知：和禁止核试验一样，互不侵犯条约需要经美国参议院的通过，一次迈一步比较明智。另外，为确保各方的利益，监督审查也是必要的。赫鲁晓夫曾经提议审查之事不用考虑。他解释说他的将军们会发怒的。现在，感到“让核爆炸的轰鸣在地球上销声匿迹”势在必行，他同意每年进行两到三次的检查。

除了苏联的军事编制之外，赫鲁晓夫所处的位置要远比肯尼迪困难得多。这意味着他要跟其南面重要的盟友公开决裂。7月4日，赫鲁晓夫公开宣称：“只有疯子才希望通过核战争摧毁资本主义，每摧毁一位资本家，就会有100万名工人被摧毁……有人有不同的看法。随他们的便吧。历史会教育他们的。”直到这时，西方人还没有回过味来。第二天，中国代表团抵达苏联，准备讨论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应采取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立场。从所有的报告来看，两个代表团相互指责，其中核战争是它们之间的争论焦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暗示裂痕越来越大。

当肯尼迪作为当选总统听取美国核能力的简要汇报时，他对核武器的看法就已经酝酿成形了。他厌恶所听到的一切，特别痛恨先发制人的攻击武器。然后，他听到了有关“放射性尘埃”的介绍。除了科学专业领域，当时美国很少有人知道热核聚变试验会污染空气，并对几代人带去危害。杰克喊来了他的科学顾问杰里·威斯纳。威斯纳解释了放射性尘埃的性质和危害的程度，以及会导致未出生胎儿的畸形等。杰克问：“它会如何落下？”威斯纳说，一种方法是下雨。雨会冲刷掉云彩中的放射性碎片，将它们带回地面。在美国总统办公室的外面，天空正飘落着蒙蒙细

雨，雨水湿润了玫瑰花园。杰克走到其中一扇高大的法式窗户前，向外看去。他问道："你的意思是说，那些东西就在外面下着的雨水里？"威斯纳说："是的。"肯尼迪默默地站在那里，凝视着窗外，脸色阴沉凝重。

禁止核试验的提议在两个国家引起了争议。有关苏联人的抗议只有一些大概的信息，但在9月，苏联进行了一连串的满载试验，它表明赫鲁晓夫的将军和科学家们正在尽快试爆，如此，他们便可在最后期限之后分析获得的数据。支持禁止核试验的美国人却是肯尼迪不需要的盟友，比如汉弗莱、加尔布雷斯，在保守民族主义者眼里，他们也是可怕的人，甚至中间派也怀疑他们。爱德华·特勒表示反对，当然，还有巴里·戈德华特。美国海军上将刘易斯·斯特劳斯说："我不确定紧张关系的消除是不是一件好事。"纳尔逊·洛克菲勒被人视为一位自由的共和党人，他公开抨击禁止核试验。海军上将阿瑟·雷德福是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他在条约的每一句话中都看到了危险，并且预言它会"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肯尼迪大声读着《纽约时报》上的这些报道，并告诉一位朋友说："我希望他是对的。"

条约得以草签，赫鲁晓夫邀请哈里曼与他共进晚餐。肯尼迪此时正等待着华盛顿的正式批准，他告诉工作人员，就像民权一样，这件事情比竞选连任重要得多。他需要得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支持，而且他也得到了，尽管他们趁机敲竹杠，或用他们的话说，这是"保护措施"。9月24日，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经过336次大气核爆之后，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核试验彻底停止，但13年来的核爆将那些放射性污染物积存在了地球大气之中。签署该条约，美国总统用了16支钢笔，他打算将它们送给参与条约谈判并在之后为之斗争的那些人。他用第17支钢笔在自己的签名下面重重地画上一道线，并把钢笔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他笑着说："这支是我的。"

在他看来，这只是开始。他宣布华盛顿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热线电话"已从8月30日起正式开通，此举旨在降低意外战争的风险。就在条约获得通过那天，肯尼迪总统听说了苏联农业歉收的消息，准备卖给苏联6500万蒲式耳[注]小麦。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从东欧来美国的移民为此感到愤愤不平，奥唐奈和林登·约翰逊都认为，这种政治招数未必会有好的效果。毕竟，美国共和党指责肯尼迪未能就此事与国会领导人"磋商"。他们说得对：由于预见到无休无止的争吵，他在条约

签署之后才将此事告诉他们。在接下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被问及是否预料到它的“政治反响”。他回答说：是的，会有“某些人不同意这一决定。大多数决定都会这样。但我已经认真考虑过了，并认为这对美国非常有利。”

然而，肯尼迪关于国家利益的观点与战后斯大林炫耀武力时双方达成的共识完全不同。在华盛顿，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但自从就职以来，肯尼迪就在悄悄地挑战那个共识，他在自己的演讲中摒弃了冷战的陈词滥调。他的洞察力使得“weltpolitik”（国际政治）这个词被创造出来，它始于美、苏之间关系的戏剧性改变。他从没有让特勒、斯特劳斯、戈德华特和雷德福这些人转变思想。但他指出，他有自己的顾问所缺乏的东西。他年轻，他有时间。有一天晚上，他跟你讲：“看看他们的年纪，看看寿险精算表。最迟，在我第二个任期的中间，我就会成为西方国家资格最老的政治家，或许是全世界。”他说：在美国国会山对他评头论足的那些老弱无用的批评者会走向坟墓，嘴里还喃喃地说着让人讨厌的关于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陈词滥调，主张所有的国家必须与其他人结盟，而不管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这就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神奇王国。他会气愤地对此大嚷大叫。你告诉杰克你在新德里与福斯特度过一个沉闷早晨的事，当时，他还是艾克的国务卿，他坚持认为尼赫鲁必须做出选择，因为这是好坏之争，没人有权保持中立。又有一次，他对温斯顿·丘吉尔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但做得有些过分，丘吉尔转身走开，嘴里嘟囔着说：“没意思，很没意思，杜勒斯。”

肯尼迪对杜勒斯主义没有耐心。他相信多元主义，相信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不必遵从超级大国的做法，甚至咨询了各国的意见。在华盛顿大学，他说：“我们必须面对我们只占世界人口6%的事实，我们不可能将我们的意志强加给其他94%的人，我们不可能纠正每一个错误，或扭转每一个逆境，因此，不存在一个解决世界所有问题的美国方案。”他总结说：美国不可能按照自己的观念来评论这个世界，也不应该试图那样做。每个国家都有权构建一个适合其国民传统、天赋和生存本能的社会。

虽然对他吹毛求疵的人可能是因为这些观念而被激怒的，但肯尼迪的多样性概念却深植于美国的传统。多元主义是对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政治表达，它是美国最古老的哲学立场。虽然它受到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但“pragmatism”这个词却是由查尔斯·桑德斯·皮

尔斯创造的，他是一位哈佛人，而另外一个人，威廉·詹姆斯则成了这一运动的领导者。詹姆斯认为，没有人能够发现绝对的真理，但思想自由的人能够发现它的一鳞半爪。通过将其聚合，它们不会构成教条，而是会形成权宜之计，伴随终生。实用主义令人激动及非常吸引肯尼迪的地方在于它被赋予了行动的权利。詹姆斯写道："这个问题只取决于当下。这就使得我们的道德生活处于忐忑不安的现实之中，并让人感到刺痛。"

一天，杰克把膝上的一摞报纸猛地掼到地板上，说道："我看烦了这些大字标题。它们描写的全是危机，给人的印象是我们已在世界上走投无路了。但这是错觉。不妨从赫鲁晓夫的角度看一看，现在让他头痛的是中国、阿尔巴尼亚、农业、知识分子和东欧，我敢打赌，他现在跟我们一样备受煎熬，很可能更厉害。事实是，在最近10年里，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大多数变化对我们有利。"他继续说了很多美国正在强大起来的理由。苏联在柏林的地位被贬低。它在非洲和中东也搞砸了。虽然杂乱无章，有时还很气人，但多元主义通过了实用主义的测试，因为它有效。当他在伯克利给学生讲话时，"没有人对任何单一的教条都不可能征服世界的未来趁势产生过怀疑，征服世界的力量一定是自由国家和自由之人多种能量的释放。"

哈里·杜鲁门认为多元主义没有什么用处，因而不予考虑，他认为共产主义集团不只是铁板一块，也会玩策略，需要有一个中央情报机构控制所有左派的激进活动。在其回忆录中，杜鲁门记录了他是如何看到激进团体"在中南半岛采用的某种在时间上恰好与攻击朝鲜相吻合的模式"，以及看出在两个相距遥远的世界战场上的行动，都是"一种阻止美国援助欧洲重建的诡计"。他只是总结了两个党派大多数人的意见，如果他是正确的，美国军队就永远不会被派到越南。从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来往于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电报中，不难看出他的判断失误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在肯尼迪的力劝和哈里曼的促成下，赫鲁晓夫说服巴特寮接受了老挝政权保持中立的做法。因此，事实证明，美国派步兵保护万象的承诺失去了必要性，而本来艾森豪威尔视其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行动。1963年初，肯尼迪邀请赫鲁晓夫再次与他一起就越南南部越来越严重的危机达成一个类似的解决方案。这一次，赫鲁晓夫不只是尝试去做，而且是千方百计全力以赴。虽然这有利于他与肯尼迪政府改善关系，但却失去了毛泽东对他的尊重。苏联领导人因古巴导弹基地而蒙

羞，全世界有目共睹，这让他的威望大跌。杰克闷闷不乐地告诉你："我让他丢尽了老脸。"

因此，一系列被丘吉尔称之为"极端的假如"就凑到了一起。假如没有猪湾惨败，赫鲁晓夫就不会得出肯尼迪是个懦夫的结论；假如赫鲁晓夫不认为美国总统是个软骨头，他就不会冒险挑起柏林危机；假如他不在柏林败下阵来，就不会试图通过在古巴部署导弹来寻求补偿；假如不发生导弹危机，赫鲁晓夫仍拥有其政治影响，他就会利用其影响力来压制越南南部的共产主义者，在当时，除了用作谈判筹码外，越南南部对苏联毫无用处。如果这些事件以及核试验、太空竞赛、大型钢铁厂、戴高乐、拉丁美洲和美国南部的民权冲突没有引起人们对美国总统的全面关注的话，他可能就会重新考虑把闲着没事又好动的美国副总统派去处理那些棘手的情况，约翰逊在那种情况下的承诺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比他们俩人的生命还要长。

美国的男学生不无夸耀地说：自从独立战争以来，"美国从未打过败仗"。肯尼迪去世后很长时间，当美国不可避免地即将输掉越战时，每个参与者都匆匆忙忙地、孤注一掷地掩藏他的痕迹，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的崇拜者开始设法散布对于这位美国前总统的指责，而他们俩才是罪魁祸首。他们无法抹黑富兰克林·罗斯福，因为他在1945年3月曾想方设法制止法军向东南亚增兵，以阻止法国殖民者的返回。对亚洲的爱国者来说，罗斯福的去世是很大的不幸。他的继任者缺乏他的眼光。他们认为他们需要法国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一个盟友，当法国告诉他们中南半岛的起义者全是共产主义者时，他们决定拨款资助法国部队对越盟（Viet Minh）的作战，越盟是当地起义者对该组织的称呼。

随着关系的发展，美国总统和副总统相处得还算不错。当然，也并非像其公开所说的那样好得不得了。每一位总统都会对等着顶替他的人感到不舒服。身旁的这个接班人等于是在时刻提醒自己将来必然完蛋的命运。还不止于此，他站在那里是要等着接任总统最珍视的占有物——他的总统宝座。为了打发他离开自己的视线，并且忙个不停，肯尼迪总是会以各种借口把约翰逊派到国外。结果常常很有趣，因为约翰逊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搞笑天才。他的思维一直处在竞选活动中，一位在巴基斯坦的美国医生喘着粗气说："我的上帝！他竟然跟麻风病患者握手！"他决定把一位赶骆驼的卡拉奇人转变成亲善大使，这让媒体高兴了好一阵子。但林登·约翰逊仍旧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艾哈迈德的美国之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肯尼迪告诉你："如果是我，我会在白宫草坪上撒满骆驼粪。"

这只是他具有拉伯雷式幽默的证据之一，但正因如此，才使得这次最不吸引约翰逊的出访在事后看来，历史意义甚为重大。在琼和史蒂夫·史密斯的陪伴下，这位美国副总统闷闷不乐地飞去亚洲，根据白宫的指示，他要为非共产主义的政权提振自信，尤其是蒋介石。跟在柏林时一样，他并不是美国决心与越南南部军队并肩作战的标志性人物。但其实，当时美国的承诺还没有说得很过头。然而，他在西贡信誓旦旦的许诺比杰克打算要说的更带劲儿。由于很讨吴庭艳的喜欢，约翰逊便越权问他是否需要美国军队的支持。吴庭艳说他不需要，但钱总是受欢迎的。约翰逊召集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称赞吴庭艳是"南亚的丘吉尔"。在其飞机离开越南后，一位作家问约翰逊是否真的那样认为。林登·约翰逊回答说："狗屁，伙计。他是我们唯一想从这里清除出去的家伙。"

"南亚的丘吉尔"肤色黝黑，身材矮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是一个冷漠超然、不爱社交的政要人物，属于典型的握有实权的强人。批评他的人会被送去集中营，从未实行过新闻自由，任何改革的建议都会被愤怒地拒绝。吴庭艳用其狂热盲信的弟弟及其漂亮又恶毒的妻子来管理这个国家。他们鄙视佛教徒，尤其是年轻僧侣，认为僧侣们贫穷、好斗，而且对西方的一切皆不信任。当时，西贡持不同政见的人里一个共产主义者都没有。但很快，共产主义者就结成联盟，他们是越盟之子，当时正在丛林中打游击。

约翰·肯尼迪曾经是少数几个实地研究过越南问题，并在返回之后确信罗斯福是正确的人。他曾在1951年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会见新闻界"节目中宣称："没有当地人的支持，美国在任何东南亚国家都没有取得成功的希望。"在美国和其他盟友拒绝为当地人提供援助后，越盟转而求助于共产主义者，此时，他稍微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肯尼迪不想让越南也被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但他认为，中南半岛将不再属于法国。他感觉当地人组建的独立民主国家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替代选择。

20世纪50年代，有关越南的信息难以获得。作为那时的一位外国记者，你报道了法国外籍军团在河内西部红河三角洲的战斗，能够将可靠的报道发回美国的唯一办法就是乘飞机去香港，从那里发送你的通讯。审查制度在法国的治理下就已经够严格的了，但吴庭艳和吴廷琰夫妇仍进一步加强了对新闻的审查。对客观现实的无知解释了越战的一大秘

密：为什么它会变成葬送专家声誉的坟墓。1954年，通过引用先前对越战的评价，肯尼迪拿他的参议员同事着实消遣了一回："军事形势显然进展顺利"（迪安·艾奇逊，1952年）；"在中南半岛，我们认为局势正在扭转"（美国国务院的沃尔特·罗伯逊，1953年）；法国胜利"有其可能性，而且很有可能发生"（美国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1954年）；"法国正在走向胜利"（雷德福上将，1954年）。在牺牲了1.9万名志愿兵之后，法国战败，这似乎证明持怀疑态度的新苏格兰年轻参议员是正确的。在入主白宫的前几个月里，人们对肯尼迪能力的怀疑逐渐增加。戴高乐曾提醒他要防备丛林战，根据他在所罗门群岛战时服役的经验，肯尼迪知道戴高乐是对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建议则更有说服力。这位老兵瞧不起五角大楼那些新生代的将军们，就像告诉其他人的一样，他告诉肯尼迪："任何想要将美国地面部队投入亚洲大陆参与作战的人都应该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脑子是不是有病。"

肯尼迪总统继续设法获知那边的真实情况。上任伊始，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成立美国国防部、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白宫特别小组，为美国在越南的行动提供建议。不出麦克阿瑟所料，特别小组的报告呼吁美国派出作战部队。肯尼迪否决了此提议，但同意增派军事顾问。他的决定受到了美国参议院委员会报告的影响，这份报告是年前提出的，它预测"基于在越南的军事援助代表团负责人的保证……美国军队……在不久的将来可以逐步撤出越南"。再加上还有很多志愿者顾问，肯尼迪总统被告知战争将在18个月内胜利。在其1954年的参议员演讲中，他批评了法国和美国将军们，称他们"自信的预测是在哄骗美国人"。现在，仅仅凭借这样一种预测，他就会更倾向于吴庭艳政权。当谈到放弃"只会让共产主义者更容易得手"时，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按兵不动。"

1951年的众议员肯尼迪和1954年的参议员肯尼迪可能会被吓住。但为什么总统肯尼迪也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呢？答案在于政治。作为众议员和参议员，对连选连任是有自信的。但作为总统，他对此却不太有把握。共和党影响力最大的战后竞选议题就是指责杜鲁门将中国"输给"了共产主义者。如果可能的话，肯尼迪希望避免"输掉"中南半岛。人们决心不让自己与张伯伦的绥靖罪过扯上关系。白修德写道："越南的事业"就是"美国的事业"。《纽约时报》告诉其读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越南南部。"

大多数华盛顿官员想当然地认为，在艾森豪威尔和吴庭艳之间交换

的信件中，美国已经正式承诺会支持西贡政府。肯尼迪认为是这样，约翰逊也是如此。约翰逊后来说："艾克的许诺，我必须信守它。"特德·索伦森写道：美国支持的撤离会让"世界对这个国家的诺言的可靠性产生怀疑"。阿瑟·施莱辛格进一步说："1954年之前，我们在越南南部是否有切身利益并不重要，但艾森豪威尔的信件创造了那些利益。"他补充说：肯尼迪"除了在从其前任手里承接下来的处境中做些工作外，别无选择"。约翰逊指出"拔腿就跑"等于是在"向世人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践约，不能支持我们的朋友"。麦克纳马拉、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莱曼·莱姆尼策将军都认为，如果在吴庭艳说他需要美国兵时不能派他们去越南，美国就会毁约，违背神圣的诺言，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我们就会失去亚洲，并一直延伸至新加坡"。

这些话都没有什么意义。艾森豪威尔的信声称，美国会"协助越南政府建设和维护一个独立自强的国家，能够抵御借助军事手段的颠覆或侵略"。但艾克之所以同意这样的协议（而且信中也是这样表达的），条件是它要伴随着"越南一方在改革所需的事业上的表现"，并且吴庭艳要在1956年7月20日进行自由选举。艾森豪威尔的信现在已经没有效力了，因为吴庭艳公开藐视他推行改革的义务，而且表示不管是否"需要"他的改革，都拒绝在任何时候考虑举行选举。鉴于这种表现，要求他维护遵守该协议，就显得荒唐可笑了，即使有一项具有法律意义的条约，比如，经美国参议院批准的条约，据此美国对其负有责任，那也没有必要了，况且并不存在这种条约。肯尼迪政府的真正压力在于担心吴庭艳有可能变成另外一个蒋介石。那样的话，他们就会重复为蒋介石做顾问的美国人所犯的错误。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关乎政治，提供的援助却关乎军事。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末期，越南相对平静。肯尼迪就职典礼前1个月，吴庭艳的敌人成立了"民族解放阵线"，很快它就以"越共"而知名。吴庭艳并没有放在心上。他承认：来自美国的有些帮助是受欢迎的，而且对肯尼迪同意派遣400多人的顾问团也表示欢迎。然而，从1961年5月开始，越共便开始横冲直撞。随着形势的恶化，一份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催促肯尼迪总统接受把打败越共当成"一个现实而终极的目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他，4万美军会"荡平越共的威胁"，如果再有12.5万美军就足以阻止越南北部或中国人任何进一步的干预。

肯尼迪再次否决了派遣军队的提议。几周过后，吴庭艳的军队就在全线撤退了。他请求美国提供更多的帮助，而肯尼迪总统的回应是：他派出了两位自己最信任的顾问——马克斯·泰勒和沃尔特·罗斯托。这是一个失衡的团队：一位将军和一位好战的平民，而这位平民却是杜勒斯主义的信徒。在启程的前夜，他们在白宫总统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一边等待，一边讨论着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罗斯托还在一架小型立式钢琴上瞎弹了一气。他们俩的事可能是肯尼迪那天下午最后一个工作预约。杰奎琳和孩子们外出了。跟平常遇到这种情况时一样，杰克打算让你晚上留下来陪他。你正坐在西客厅里读书，无意间偷听到泰勒和罗斯托之间的对话。后来，吃过便餐之后，你告诉杰克，他的这个高层代表团对极权主义国家知之不多，并提醒他，你曾在越南待过，只是当时，越南归法国领导，你的级别很低，一直到奠边府战役之后，你都陷在深深的沮丧之中。他侧着脸看了你很长时间，并说等他从泰勒和罗斯托那边返回之后，他想听到更多的内容。

他们的报告令人震惊。为了遏止吴庭艳地位的下滑，美国承诺的地面部队完全有必要派出。他们提议由8000步兵组成的一支先头部队应立刻动身，而且泰勒恳请肯尼迪做一次以越南为主题的全美电视讲话。随着其他顾问也被召集过来，你第一次意识到了派别的分立，后来它们被称为“鹰派”和“鸽派”。在非正式顾问中，带头批评《泰勒–罗斯托报告》的人是切斯特·鲍尔斯、乔治·鲍尔和埃夫里尔·哈里曼。然而，唯一质疑它的高层人士就是肯尼迪本人。他不会上电视去讲，也不会派遣美国兵。索伦森写道：“他主要的越南顾问也都希望如此，称之为我们善意的‘里程碑’，是我们决心的象征。但总统实际上投了反对票，只有他的票才算数。”

现在，杰克想听你在法国外籍兵团中的冒险故事，你坐在总统办公室白色的双人沙发上讲给他听，他背对着壁炉，在一把摇椅上前后晃着。在回忆往事时，不要凝视其他人是一个好规矩。你越过杜鲁门阳台向外望着华盛顿纪念碑，从头到尾讲着自命不凡的法国殖民者的惨事，在喝醉了的时候，他们喜欢唱“抗击越南人”，并且嘲笑敌方士兵的素质，让他们吃惊和沮丧的是，他们后来意识到，尽管可以在白天统治这个国家，但到了晚上，它就属于当地的游击队了，游击队变得很强大，以致当太阳升起，处在海防（Haiphong）和河内之间一连串要塞中的法国人都得在清醒过来之后确信自己还活着，这种要塞就像是小说《火爆三兄弟》（*Beau Geste*）中描写的那种老式的法军要塞。杰克会不时地快

速提出尖锐的问题，打断你的话，但大部分时间，他只是摇晃着，用一只手支撑着下巴。1953年秋日的一天，1.5万法国伞兵被空投到奠边府，一想到此，往事历历在目：机场的建筑物，用于不断侵扰敌人的豪猪式据点，以及外国记者逐渐形成的共识，即法国人为他们的抵抗所选择的阵地极易受到攻击。它处于一个天然的盆地中，或者说它呈浅碟形，四周是连绵起伏的群山。法国人并没有占领盆地的边缘。如果敌人拖来重型火炮，记者们推断，他们的炮口就会居高临下瞄准法国人豪猪式的工事和新建的碉堡，而越南的炮兵则会将防守者压制在那里，不敢动弹，他们的步兵会同时进行挖掘作业，挖出“之”字形的战壕，通向法国的据点：名叫安娜玛丽和克洛迪娜的几座小山，或者通向盆地中间的两个小丘——埃莱娜1号和埃莱娜4号，它们有一个值得记忆的绰号——“洛洛布里吉达的咪咪”。法国的高级将领克里斯蒂安·德卡斯特里在被问及是否要考虑这种可能性时，他傲慢地回答说，法国的大炮优于当地人拥有的任何东西，此外，这个问题太学究气了，当地人凭人力不可能拖着大炮穿越盆地外围的崎岖地段。但德卡斯特里错了。而他的对手——越南将领武元甲动用了9万越南农民，将几个连的105毫米野战炮拖到了山顶，并部署就位，当他在随后3月13日黎明轰开奠边府的包围圈时，外国记者都登上了飞往河内的下一班飞机，那位可怜的法新社记者除外，因为他是政府雇员。不到两个月之后，5月7日，奠边府落入越南人之手。

肯尼迪总是很务实，他问这有什么寓意。你引用了一句格言：对于任何军队来说，不管多么能征善战，当所在地区的群众同情它的敌人时，它就处在了致命的劣势之中。你说：“还记得李吧，只要待在弗吉尼亚，他就是无敌的。但当他跨界来到宾夕法尼亚，他就输了。”

杰克在椅子上稍微摇了一下，用指甲敲打着他的牙齿。他说："没有信息我就无法行动，我送去了一个特殊问题的清单。美国国务院逐一做了回答。然后，我捡起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面是哈伯斯坦写的长篇报道，与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完全相反。"他又敲了更多次牙。然后说："他们不断地告诉我要派作战部队到那里去。这意味着要征兵。但是，连法国人都不派征召的人去。我永远不会做那样的事。"又一次暂停。他现在正在整理自己的领带。"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派军队？'他们说：'为了信心，为了士气。'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军队会入场，乐队会演奏，人群会欢呼，不到4天它就会被人忘记。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他们需要更多的部队，还是为了自信和士气。这就像是喝酒。酒劲儿会逐渐消失，你必须不断再喝才能维持气氛。"他摇晃的时间稍长了一些。"只要他们仍维持着战争状态，他们应该能够打赢。如果白人士兵采取行动，人们会认为'法国撤退了'。然后，就像法国人一样，我们会输。"但是，你指出，任何美国人的出现都代表一种承诺，即便是志愿者顾问也是一样。如何让他们退出呢？他咧嘴一笑，说："噢，那容易，我会支持一个要求我离开的政府。"他起身。当总统站起来时，那就是你要离开的信号。在你离开时，他还站在那里，轻柔地按摩着他的肘关节，嘴里说着："但我们永远不会派军队。至少，我当班的时候不会。"

然而，肯尼迪确实也会敷衍，他同意与吴庭艳恢复书信往来。吴庭艳承认有必要进行改革，美国总统则向他保证，美国援助指日可待，只是数量没有确定，而具体是何种援助，援助的日期和最后期限也没有提及。乔治·鲍尔预测吴庭艳会继续施加压力，直至得到美国军队。他预言承诺的规模不会小。他告诉肯尼迪，5年之内，越南会有30万美军。杰克笑着说："乔治，你疯狂至极。"

在西贡的两位美国高官是小弗雷德里克·诺尔廷大使和保罗·哈金斯将军。这两个人选的搭配极不成功。诺尔廷是反共的强硬分子，他会力挺吴庭艳，支持到底。虽然肯尼迪总统说得很清楚，他想了解所有事情，无论好坏，但若有坏消息，哈金斯还是会选择延迟汇报。他认为这会对他不利。结果，大使和将军反而变成了公关团队。他们说：顽强而勇于献身的吴庭艳是取胜的关键，他将是他所在国家的拯救者。没有好消息，哈金斯就直接捏造。当美国的驻外记者引用事实和数字证明将军的报告不真实时，他则称他们喜欢耸人听闻，谎话连篇。

又一个丘吉尔式的"假如"出现了。假如越共不断发展壮大，哈金斯

的媒体炒作很快就会露馅。如果按其正文统计一下的话，差不多能编出两套书。但是，游击队活动的突然减少似乎证实哈金斯是对的。泰勒将军说，他感觉到“一场宏大的越南民族运动”要压碎越共。麦克纳马拉说：“我们得到的每一个量化指标都表明，我们正在赢得战争。”听到这样的报告，肯尼迪既吃惊，又高兴，他翻开了1963年1月14日的美国国情咨文：“越南的进攻锐气已然受挫。”这是他任职之后的第三个新年，在这一年的前几个月里，冲突持续减弱。越共正养精蓄锐，等待攻击，吴庭艳的将军们闲来无事，他们知道自己的部队士气低落。但即使没有这些预兆，这个国家也正在变得骚动不安。享有特权的上层天主教徒和社会地位低下的佛教徒处于决战的情绪之中，只等一个偶发的事件激起他们之间的战斗。6月11日，有位和尚让抗议变得引人注目，他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并划着了火柴。在他自焚之后，其他想要自杀的和尚纷纷步其后尘。瑈夫人（吴廷瑈夫人，陈丽春的别称）告诉记者：每当这些“所谓的圣人”上演“烧烤秀”时，她都会拍手称快，如此，等于是表露出了这个统治家族处理公共关系的本质。接着便是佛教徒不断的示威游行。吴庭艳花钱雇用暴徒，把报道这些事件的美国通讯记者和摄影记者打得头破血流。

7月初，肯尼迪总统知道他的越南政策陷入了大麻烦，或者说没有获得越南让他陷入了大麻烦。吴庭艳几乎完全受其弟弟的影响，而其弟弟通常受鸦片的影响，而瑈夫人正收拾行装，去美国做巡回演讲，公开谴责肯尼迪。美国新闻记者继续抨击，政府腐败的证据逐渐增加，更有甚者，当肯尼迪总统设法咨询诺尔廷时，才得知美国驻西贡大使已经离岗，到遥远的爱琴海去游览两个月了，根本联系不上他。肯尼迪解雇了他，派亨利·卡伯特·洛奇接替他的职位。但吴庭艳当局在迎接洛奇到来之后的一系列行动只能被解释为它们在故意藐视美国人。越南政府军违反了最近的所有协议，包括向诺尔廷的个人承诺，它们攻占了所有的佛塔，拘捕了所有的僧侣，开始对佛教徒实行恐怖统治。

在华盛顿，迪安·腊斯克强调指出，美国军队必须继续留在越南，直到打赢这场战争。麦克纳马拉和泰勒表示同意。鲍尔和哈里曼则说那是荒唐的。秋天临近，两大阵营之间的分歧日渐加大。到了9月，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派另一个真相调查团去西贡时，这个分歧就变成了深渊。调查人员是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和一位相应级别的高级外交官。当他们返回时，肯尼迪再次召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听取了他们的报告。将军说战争正走向胜利，吴庭艳的表现好得不能再好。外交官则

说吴庭艳的政权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一阵寂静。肯尼迪总统客气地问道："你们两位绅士是一个国家的人吗？"

令人惊讶的是，哈金斯将军似乎对此一无所知。重大事件已经蓄势待发，但身在那个国家的美国高级军事长官却乐呵呵地视而不见，继续敲打着他们的新闻稿。这些新闻稿不仅受到了重视，而且还成了麦克纳马拉和泰勒所提交报告的原材料。这个内容丰富的文件开头写道：吴庭艳的军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将继续取得进步"。该报告忽视了罗伯特·肯尼迪的一个离经叛道的建议，他是第一位访问越南的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返回以后，他建议应立即召回驻扎在那里的所有美国人（"这是在为那个小国家的人做什么呢？"他不断地问道，而将军和外交官们则盯着他看，就像是因为他造成了社会公害一样）。那里是一个远离美国7000英里远的封建国家，一块水稻田遍布、丛林密布的原始土地，蜷缩在中南半岛的远端，在写到这个国家时，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声称："越南南部的安全仍然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要坚持以拒绝将这个国家交给共产主义者，以及尽快镇压越共作为首要目标。"

在西贡，吴廷瑈似乎脱离了现实。他威胁着要与河内的胡志明结盟，以此把美国人赶出这个国家。在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搜捕中，吴庭艳的秘密警察将大学生投入监狱，然后是高中生，最后是在读小学的孩子。甚至是天主教徒都无法避免受到迫害。杨文明将军人称"大明"，他是越南军中当时最有威望的官员，各个信仰和派别的越南人都向杨文明将军发出呼吁，恳求他废黜吴庭艳和吴廷瑈。在一次秘密会谈中，洛奇向杨文明保证，美国不会阻止一场政变的发生，11月1日，周五，白天的高温让人昏昏沉沉，晚上，大炮和迫击炮齐射，围攻吴庭艳官邸的战斗打响。黎明时分，从一楼的窗户中打出一面白旗，但吴庭艳和吴廷瑈并没有在那里。他们俩伪装成天主教神父，从一条秘密地道中逃走了。在那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无人得知，但一小队大明的士兵在堤岸（Cholon）郊区的华人居住区将他们捉住，并就地枪决，至于是谁下达的命令，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吴庭艳的尸体也被人反复刺戳。

在贝弗利山宾馆，醒来听到这一消息的瑈夫人呜咽着说，这都是肯尼迪造成的。华盛顿的大多数官员都无奈地接受了这一新闻，甚至是松了一口气。只有一个大人物除外。林登·约翰逊心中凄苦。这位美国副总统向吴庭艳伸出了援助之手，并成为他的朋友，在约翰逊看来，那种友

谊象征着美国对吴庭艳的承诺。在华盛顿批评吴庭艳的那些人，其实也是在批评副总统。他知道此事，并且认识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穿的是皮尔·卡丹衬衫，用的是PT–109领带夹。后来，在1971年的回忆录里，林登·约翰逊写道：西贡政变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它会导致严重的政治混乱”，并把账记到了肯尼迪头上，认为这都是他的援助不到位造成的。事实上，吴庭艳被人推翻是必然的，若要说有美国人卷入其中的话，那就是共和党人洛奇，他直白地告诉大明及其身边的人：美国会保持中立。但在总统行动的领域，真实情况常常不如高层官员认为的真实情况重要。约翰逊把暗杀一个外国的、神秘莫测的越南南部小总统视为对人格的侮辱。他告诉朋友：倘若有机会纠正对越南的做法，他拼老命也会抓住它。

瑈夫人对肯尼迪的责难是荒唐的，但在当时，她就是荒唐的。事实上，肯尼迪总统也对此感到震惊，自猪湾事件以来，这是他第一次情绪低落。吴庭艳总是很难打交道，虽然不久前，他就已经让人难以忍受，但确实不至于落得被人残杀的结局。在对待高级政治人物方面，肯尼迪跟约翰逊不一样，他不会受喜欢或不喜欢某个人的因素影响。他衡量一个人是看其能力和判断力。他本人对性格的判断并非完美无缺。在安排总统事务的优先顺序，即决定哪些问题在其议事日程上最先考虑方面，他把越南的位置放得太低，因为他对麦克纳马拉有信心，但在此事例中，这种信任，麦克纳马拉受之有愧。但人们必须记住，1963年，越南还不是美国的一个重大问题，尽管后来，它让迷惘的新一代理性受到蒙蔽，观念被扭曲。这代人恐怖的屠宰场岁月即将来临。第一次有美国人在那里战死是在1959年7月9日，时值艾克第二个任期的中期。当1961年10月31日另外一位美军顾问被杀时，肯尼迪已经入主白宫9个多月。在他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从未向越南扔过一枚炸弹，从艾森豪威尔开始，截至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害，在越南被杀的美军士兵总数为108人，他们全是专业人员，而且全都是志愿兵。每一次死亡都是个人的一场悲剧，但即使在和平时期，我们身边也会有人死去；美国开汽车的人中，平均每天有314人死于交通事故。而且，在肯尼迪执政时期，他的同胞很少考虑东南亚的事。它太遥远了。当时，电视机起的作用很小，直至1965年4月约翰逊向那里派出第一支美军后，电视机才进入美国人的客厅。广播电视网的每日新闻播报被限制在15分钟，而且全都是黑白画面，没有发自越南的直播节目，只有录像带可看，而且还要在前一天的

白天用手持摄影机拍摄，并连夜用飞机送到纽约。

在规划应对越南的方针路线时，肯尼迪坚持有两件事情必须做：该国必定不能落入共产主义者之手，以及他不会向那里派出美国军队。直到1963年，这两件必须要做的事情之间也没有发生相互排斥，但当这种可能发生时，他决定宁可失去亚洲的势力范围，也不能牺牲美国人的生命。这意味着他只能对其主要助理和内阁成员的建议不予采纳，因为责任在他，而不是他们。他似乎看到越南未来会成为一个脓疮，使其党分裂，让美国的年轻人转而抗议政府。在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之前，他决心解决它，或者趁早结束。

他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但他尊重的人会影响他的判断。在这件事上就发生了。他在这件事情上的顾问不是政府成员，但正因如此，他的建议才增加了砝码。1962年末，他要求迈克·曼斯菲尔德去东南亚走一趟，回来时将他的印象告诉他，曼斯菲尔德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瘦高个。在当时，曼斯菲尔德可能是美国国会山最受尊重的人。他也是一位研究东方问题的专家。他曾在亚洲为三位领导人服务过。通常，他属于静静沉思的那种人。因此，当被告知迈克从越南返回，直接飞来了佛罗里达，并带来了紧急建议时，肯尼迪着实感到吃惊，当时正值1962年的圣诞假日，肯尼迪总统正在棕榈滩与其他家族成员欢聚一堂。

杰克从未看过他如此紧张。迈克把所有内容都写在了纸上，肯尼迪总统在阅读报告时，他就静静地站在那里。报告说：不要再派美军顾问去西贡。这个国家正在遭受内战的蹂躏。美国无能为力。如果情况没有变化，那里只会迫切要求更多的美军，直到美国军队卷入一场别人的战争。美国在亚洲的声望会受到损害。越南南部的人则会打消做他们必须学会之事的念头，那就是自立。杰克脸涨得通红，突然合上报告：“你是不是期望我会根据这些表面的东西接受它？”这位多数党领袖接连吸了几口烟斗，温和地答道：“确实是你要求我到那里转一圈的。”杰克现在冷冰冰地说：“好吧，我会再读一次。”后来，他告诉奥唐奈，自己因为过于心烦意乱，无法发表意见。他说：“我生迈克的气是因为他的建议与我们的政策完全不同，我生自己的气是因为我发现我同意他的意见。”

接下来的春天，迈克再次直言不讳，这次是在白宫为美国议会领导人举行的早餐会期间。他希望立即、全部撤回在越南的美国军事顾问。肯尼迪总统建议他们俩到总统办公室里私下谈谈。当他们单独在一起时，杰克告诉迈克，自己同意他的观点。必须把所有美国人带回家。但

现在不行。他说："1965年以前，我不能这样做，要等我再次当选之后。"选举之前任何的撤离行动只会给共和党加分，引发几位民主党领导人的背叛，副总统可能也会加入其中，这会让竞选活动变成一场让美国盟友震惊的争斗，对美国的声誉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迈克思考着，再次抽了几口烟斗，最终同意了。在他离开之后，肯尼迪告诉奥唐奈："1965年，我要成为有史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总统之一。我会被当成共产党的绥靖者而到处受人指责。但我不在乎。如果我现在想方设法从越南退出，我们就会引发另一次乔·麦卡锡的恐怖，但在我再次当选之后，就会下令撤退。所以，我们最好能确保我会再次当选。"

当然，他希望在1964年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任何希望连选连任的人都会如此。然后，他会逐步取消美国在东南亚的承诺，直到1965年底，最后一位技师、戴绿色贝雷帽的顾问、直升机驾驶员，全部安全回家。与此同时，他必须坦率、诚实。如果他心里承受不起对他欺骗了这个国家的指责的话，后果将是灾难性的。重要的是，他要阐明自己的立场。为此，他答应了在1963年最后几个月里参加两次电视访谈。在这两次节目中，他声称不会派美国作战部队前往越南。9月2日，他告诉沃尔特·克朗凯特，战争的结果取决于越南人的军队及其指挥官。他解释说："这是他们的战争。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送设备给他们，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人送到那里当顾问……说到底，这是他们的人和他们的政府在这场斗争中谁必须赢或输的问题，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帮助。"

在那年秋天最后三次的公开演讲中，他谈到了自己在越南问题上的左右为难，并重申了自己的决定，那就是永远不会派美国军队去解决只应由越南人自己解决的问题。在提到外界对美国在西贡问题上的批评时，他说美国人在得知自己不再被人需要时就会立马离开。10月2日，在他接受克朗凯特访谈之后一个月，他主持了一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目的是召集大家审议麦克纳马拉和泰勒的报告。当成员们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时，他要求美国国防部部长向等在外面的媒体宣布，1000名美军顾问将在圣诞前撤离越南回国，并且他希望最后一批美国人也能在1965年底前离开那里。就在麦克纳马拉还能听得见的时候，肯尼迪补充说："告诉他们，这也包括所有的直升机驾驶员。"美国国防部部长将这条口信重新措辞，因而改变了它的含义。他仅仅说：在他看来，"美军任务的主要部分"将在"1965年底前完成"。但肯尼迪总统的指示被一字不差地写在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他进一步照此行事。麦克纳马拉在传达肯尼迪总统的话时含糊其词，肯尼迪总统却没有躲躲闪

闪。在10月的最后一天，他告诉美国国民："我们的目标是在1965年底前将每一位美国技师、直升机驾驶员和军事顾问带回家，让吴庭艳的政权作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自己保卫自己。"他也没有就此打住。两周之后，1963年的11月14日，他去世前8天，他宣布第一批的1000人已经准备收拾行装，在圣诞节前踏上返美的旅途。

鉴于这些清晰、明确和公开发表的政策声明，再加上他对曼斯菲尔德的个人保证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足以表明他的态度，但让人惊讶的是，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不怀好意的评论者仍然试图将他与约翰逊和尼克松相提并论。他们尚有待于编造证据，哪怕最不可信的也好。在了解美国在越南的遭遇且负有责任的批评者中，戴维·哈伯斯塔姆肯定是最不留情面的。肯尼迪的顾问很少有人没有中过他的枪。然而，哈伯斯塔姆断定，肯尼迪本人仍然"感觉应付得了，感觉还有时间，而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是支持他的。他可以慢慢地调动他的人，他耗得起；太用力地推动会带来反作用。时值1963年末，因为1964年是选举年，延迟做出任何重大决定都是合理的；如果越南人能多坚持一会儿，他也可以。"在动身去得克萨斯之前，肯尼迪给洛奇拍了电报，建议他回家后做个长谈。肯尼迪总统失去了耐心，他想加快撤离。洛奇回复说他正在安排尽快离开西贡。可能会在11月21日，周三。他会在华盛顿，等周日肯尼迪从林登·约翰逊牧场返回时与他一起吃午饭。

白宫平常非常安静。偶尔会有例外，曾经有一次，你来到美国总统官邸，看到卡罗琳光着小屁股在宽大的走廊里疯跑，而她的保姆莫德·肖则为难地追着她，但大多数时间，这里都是安安静静的，就像一座管理得很好的图书馆。事实上，新到这里的人常常会有同样的反应：他们会放低声音说话。当杰奎琳听到一对夫妇喃喃细语时，她活跃气氛的方法之一就是带着她那最迷人的微笑走向他们，并且说道："我们来的头一个月也像你们现在这样说话。"

然而，在达拉斯之后的那个毁灭性的周末，在人们预期它应该安静的时候，这座官邸却是一片嘈杂。它的不合时宜源于电视。白宫的7台电视机大部分时间都是开着的，而且音量常常会调到最大。美国电视网已经决定在接下来的4天，暂停所有的商业节目，只播放肯尼迪的消息。由此导致了白宫的喧闹。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节目制作人，由于要赶时间，他们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要快速翻找挖掘录像带库，即便不是很

相关的内容也要播放，并重复播放。观众这会儿看到的可能是一张杰克·肯尼迪穿着哈佛大学泳衣的静态照片（1940年）。片刻之后，中尉肯尼迪正因为在太平洋上表现出来的勇气而被授勋（1943年）。众议员肯尼迪正在波士顿开展竞选活动（1946年）。参议员肯尼迪正通过鼓掌欢呼支持埃斯蒂斯·基福弗的美国副总统提名（1956年）。美国总统肯尼迪正在向他的国民通报封锁古巴的事（1962年）。它们的次序可能是颠倒的，胡乱拼凑的，或被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葬礼打断，而按照次序，接着播放的可能是一位业余摄影师对193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生活的记录，或者甚至是20多年前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受伤时的影像。

制片人只能是手里有什么材料就做什么片子，想方设法地将一个临时节目表换成另一个临时节目表。如果把肯尼迪总统每一个难忘时刻的记录都进行标记，如果给予有才华的电视人足够的时间，他们可能会为广大观众制作一期珍贵的传记片，并给不易打动的大学生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引用10年后《纽约时报》的评述，他们把那些年的意义缩减成了“魅力、杰奎琳和海恩尼斯港的橄榄球”。它还应包括就职演讲一瞥、导弹危机、与戴高乐的谈话、被包围的柏林、维也纳对抗、核试验、哥斯达黎加的热烈欢迎和鲜艳的五彩纸屑、双眼紧盯亚拉巴马州长和密西西比州长，然后热情地把马丁·路德·金迎进白宫、西贡街头的暴力和某种其他时刻，既有公开的，也有私人的，在此只能略加叙述。

很多内容都保存在电影胶片上：美国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等待总统发表美国年度国情咨文；外号“鱼饵”的美国众议院看门人威廉·米勒特殊而洪亮的嗓音：“议长先生，美国总统到！”然后是演讲本身。更激动人心、更接近难以捉摸的历史的本质可能是杰克返回官邸后的非正式评论。“你曾试着与查利·哈勒克交谈吗？”他问众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它就像是设法捡起一块油腻的猪肉。”他曾计算过，普通众议员大约比他大10岁，普通参议员要大得更多，“这的确是个问题。让我们面对它吧。因为这位美国总统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受苦大众的保护者，美国国会绝对不可能做到。”最让他感到失望的是美国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以52：48的微弱票数被否决。他继续通过电视告诉美国国民，“对于每一个美国家庭来说，这都是最为严重的挫败”，并表示这将成为他下一次竞选的主要议题。他至少向美国国会介绍了联邦医疗保险的想法，下一次，它就会获得通过，但他却再也无法看到了。他永远不

会被轻易打败。幸运的是，他有着最为有效的减震器，那就是他的智慧。一天，在他的经济发展计划被美国国会批评而感到苦恼时，他转向自己的首席经济顾问沃尔特·赫勒说：“沃尔特，我想清楚地表明我憎恨对你的这些攻击。”

当然，在国会山，他们看到的则截然不同。埃弗里特·德克森被称作“奥兹国的男巫”，他努力在自己惨不忍睹的老脸上露出关切的表情，用颤抖着声音说：“以他做事的速度，如果这位美国民主党总统不要求我们通过1000亿美元的预算，我是不会感到吃惊的。”更吸引人的是一位来自田纳西农村的众议员，他一直在摇头，“那里所有莫扎特的弦乐和芭蕾舞以及猎狐装和伦敦服饰，对我来说，都太讲究了。”回想之下，令人惊奇的是，肯尼迪总统及其在有魅力的拉里·奥布赖恩领导下的国会山的使者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肯尼迪提交了107个建议，其中87个送交了美国国会，73个被制定成了法律，当第88次会议休会时，肯尼迪在健康立法方面的成就超过了有史以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总量，包括对水污染处理、医院建设、精神疾病防治、药品安全和医学院建设等方面的措施。

1961年4月12日，尤里·加加林的太空飞行再次促使肯尼迪来到了国会山，他要发表一个关于“美国迫切需要的”特殊咨文。他要求美国国会接受“一个坚定的承诺，它是一个新的行动方案，会持续很多年，而且成本巨大……我认为我们应该去月球”。

不无矛盾的是，苏联人拥有比美国更大的火箭这一事实恰恰证明他们在技术上并没有优势。在军备竞赛中，美国人已经找到设计氢弹头的方法，不论是体积还是重量，它都只有之前核弹的一个零头。因此，他们并不需要苏联科学家正在制造的强力火箭。在后期阶段，美国技术的优越性展示出了效果。白宫里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同样，克里姆林宫里的所有人也知道。

然而，在大街上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毫无疑问，肯尼迪的太空计划在这个国家很受欢迎，有证据表明美国人仍然准备迎接任何的挑战，正如肯尼迪在其就职演讲中所说：“激发对科学的好奇，而非对其的恐惧……去探索星空。”美国国会用异乎寻常的多数票通过了这一提议。设在卡纳维拉尔角（Cape Canaveral）的发射基地破土动工，而任务控制

中心则建在休斯敦。航空和航天工业即将起航。

为美国执行第一次太空飞行任务的飞行员是45岁的小约翰·格伦，他是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1962年2月20日，上午10点，在肯尼迪总统焦虑地看着其在棕榈滩的电视屏幕时，格伦从卡纳维拉尔角的火箭发射架上腾空而起，一大团黄白火焰从“宇宙神D”火箭的底部喷涌而出，并且在“友谊7号”飞船的水星座舱里绕地飞行了三圈后，壮观地返回，在返回舱撞击大西洋的水面时，极热的汽云爆炸开来。一辆待命的汽车正准备载上肯尼迪，他要去那里向格伦表示祝贺。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格伦知道肯尼迪讨厌滑稽的帽子，就故意试着给肯尼迪戴上一顶安全帽，就像格伦之前失败过的很多人一样，他也未能得逞。这都被录到了电影胶片上，但胶片的声音令人失望。因此，你无法证实以下报道的真假，即杰克对格伦说的第一句话是：“干得漂亮！”

格伦欢迎肯尼迪总统的方式很适合电视镜头。肯尼迪的公开露面大多如此。或许在其担任公职期间，这一次是最自相矛盾的。肯尼迪总统要依靠报纸发布自己的消息，而他是那个时代最有文化修养的总统，珍视与记者的友谊，而他本人也曾从事过短暂的记者职业，作为赫斯特（Hearst）报系的记者，曾报道过联合国的第一次会议和英国1945年的选举（他当时预测丘吉尔会输掉竞选），并将其胜利归功于电视这个新颖的、易变的和不可预测的媒体，显然，在全美4400万家庭中，它的能量得到了充分展示，要知道这可是美国90%的家庭。

大多数的华盛顿记者并不知道他们报纸的发行量，但肯尼迪知道，并且对采访时间做了相应的分配。就像所有政党的领导人一样，他也喜欢出版人的微小支持（1960年，他们中有16%的人赞成他）和新闻界声势宏大的支持。不过，尽管很有经验，也了解媒体的内情，但他对评论性的专栏作家和社论作者却没有免疫力。他一度视纽约的《先驱论坛报》（*Herald Tribune*）为折磨自己的主将。一天早晨，他在该报读到了一篇他认为带有倾向性的文章，他咕哝着说再也不想看《先驱论坛报》了。杰克·麦克纳利是他的助理，忠诚多于审慎的判断，他信了他的话，将白宫订阅的22份《先驱论坛报》全部取消了。然后，肯尼迪又开始厌烦《纽约时报》。他喜欢上了嘲笑艾森豪威尔的新闻杂志，但亨利·卢斯现在把他惹毛了，他大发雷霆。夹在中间既不快乐也很无辜的人是《纽约时报》专门负责报道白宫的记者休·赛迪。跟许多新闻杂志记者一样，

他发现自己的稿件在印出来之后变得面目全非了。杰克反倒对此表示理解。他告诉你："每周，赛迪交给他们的是《圣经》，他们却印成了《古兰经》。"

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既不是《先驱论坛报》，也不是《纽约时报》。如同肯尼迪总统在选举之后6天所说："是电视扭转了局势，而非别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电视辩论，在白宫里生活的可能就是尼克松。正如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霍华德·史密斯（Howard K. Smith）所说，电视转播了肯尼迪的63次正式记者招待会，这证明他是一位"出色的时事评论员"。但他对新媒体的利用并不限于记者招待会。例如，1962年12月17日，他就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桑迪·瓦诺克尔、美国广播公司的比尔·劳伦斯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乔治·赫尔曼一起参加了电视直播节目。本·布拉德利观看了该节目，"作为一个试图以写作为生的人来说"，他感觉到了一种"职业上的威胁"。节目结束后，他打电话给肯尼迪，把这一想法告诉了他。杰克毫无怜悯地说："好啊，我常说，只有在不必经过你这个浑蛋的手时，我们才能把我们真实的故事告诉美国人。"跟记者一样，电视评论员也怀疑他这是在利用他们，但却想不出如何避免的办法。他们提议让肯尼迪总统参加一档时间较长的会话节目的录制，然后由制片人后期决定采用哪个镜头。肯尼迪表示同意。似乎他看上去比过去好多了。多年以后，在再次筛分录像带时，有位评论员才认识到，每当杰克被问及一个他不喜欢的问题时，他就会说一套冗长乏味又难懂的话作为回答，因为他知道，这些镜头只会被卷作一团，扔在制片人剪辑室的地板上。

在那些年里，马丁·路德·金主导着美国黑人追求平等的斗争，后来他称肯尼迪是这场运动最好和支持力度最大的朋友。作为一项原则，他和他这一届政府最高级的官员都退出了华盛顿专属性的大都会俱乐部（Metropolitan Club），因为它不允许黑人进入楼内，即使是客人也不行。结果之一就是他与媒体来了一次极其机智的交易，《纽约时报》的阿瑟·克罗克赞成俱乐部的隔离政策，并且愿意继续做它的会员。与此同时，他开始为莫伊兹·冲伯的事业奔走呼吁，莫伊兹是反叛的刚果领导人，肯尼迪曾拒绝他进入美国。克罗克为此不断烦扰肯尼迪总统，直到肯尼迪转而说道："阿瑟，我们做个交易。如果你能带他在大都会俱乐部里吃午饭，我就给冲伯一个签证。"

在这种问题上，杰克·肯尼迪是他这代人中一位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但在将其中的不足区别对待之前，他的立场必须为人所理解。在其整个总统竞选活动期间，他都会提醒美国南部及其他地方的听众：在教育、健康、收入甚至是寿命方面，生于美国的黑人婴儿面对的是极其有害的不利条件。作为美国总统，他发誓要推行旨在改变这些不公平的计划。1961年，他在美国南部白人听众前赞成种族平等的行为被认为是勇敢之举。同年5月6日，在佐治亚州的阿森斯，作为美国司法部部长的鲍勃·肯尼迪在其首次重要演讲中就是这样做的。他说：如果黑人不能被平等对待，“美国司法部就会采取行动。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或漠然视之”。当然，正如他和他哥哥私下对黑人领袖解释的那样，这些事情需要时间。他们现在不可能期望全都得到。

差距就在这里：肯尼迪希望审慎对待，而黑人现在就想要。他们知道肯尼迪心地善良，但他们年复一年地听到承诺，却什么事情也没有改变。对他们来说，种族偏见比白人自由主义者所能意识到的要强烈得多，它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而如果要战胜种族偏见，有些人可能会因此送命，甚至是他们自己的人。到该行动的时候了，但这个行动表现在了身体的对抗上：白人和黑人肉搏，黑人对抗俱乐部、警犬和消防水龙带，甚至是子弹，但鲍勃的意思不是诉诸武力，而是发出传票。他们改革运动的先头部队已经行动起来了。就在鲍勃在阿森斯演讲的前两天，争取种族平等大会（CORE）的7位黑人和6位白人成员乘巴士离开华盛顿，打算冒险穿越美国南部腹地，挑战州际公交车站在候车室、饭店和厕所里实行的种族隔离法。他们自称“自由乘客”（freedom riders）。

后来，美国南部的领导人和舆论指责他们是被“肯尼迪兄弟”派去的。实际上，不论是杰克、鲍勃，还是其他某个美国政府工作人员都对他们一无所知。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曾经给美国司法部送过一份关于此次远征的声明，但它被放在伯克·马歇尔的办公桌上之后，就没了下文，马歇尔是美国民权司的司长，因为得了流行性腮腺炎，他当时正在家中养病。当报道铺天盖地而来时，白宫才开始知道他们的旅程，华盛顿的反应是愤怒，针对的自然是那些自由乘客。这是新一届美国政府当时需要应对的最意想不到的事情。肯尼迪正在为猪湾失利头痛不已，感觉有点儿发蒙，苏联人刚刚在环绕地球载人航天飞行的竞赛中先拔头筹，而且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肯尼迪总统就要去维也纳面对赫鲁晓夫。在杰克看来，此时没有什么比可怕的种族事件更糟糕的了。苏联人还在利

用“小石城事件”，将美国人描绘成种族主义者。任何类似情况的发生都会进一步提供证据，让美国人蒙羞。因此，白宫首先就会把那些自由乘客看成是一种尴尬。自由乘客期待如此。他们知道，从政府的角度看，他们在时机的选择上是不合适的。但对黑人来说，他们的自由要比古巴、维也纳、越南或任何外层空间的问题更重要。

起初，自由乘客并不会去理会每个站台上都写有“白人”和“有色人种”的标示，那只不过会引起白人旁观者厌恶的表情和咕哝着说些骂人的话。但随着活动的进行，有关他们行程的报道出现在沿途的报纸上。美国南部各州的反应开始加剧。自由乘客被人用棍殴打，并被关进监狱。警察拒绝干预，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连救护车司机都赞成不去理会伤者的求助。不论是美国总统，还是美国司法部部长，都无法通过电话与亚拉巴马州州长约翰·帕特森取得联系。帕特森在1960年支持过杰克，但他将自己的当选归功于三K党徒。最终，一位中间人告诉他们，该州州长可以接受来自白宫的私人使者。肯尼迪兄弟选择了一位美国南部的显贵约翰·席根塔勒，他是田纳西人，美国司法部官员，而且是鲍勃最好的朋友。在蒙哥马利的公交车站，约翰发现了故意伤害致残的罪行：殴打；断腿；自由乘客被泼打火机油，并被点燃；其中一位自由乘客是白人女孩，她被一群中年妇女连续猛击，倒在人行道上。她求助。约翰停下来，但在她进入他租来的车之前，他被人从车里拖了出来，遭人重拳猛击，失去了知觉。在有人伸出援手之前，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已经在血泊中躺了25分钟。

鲍勃非常生气，他派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拜伦·怀特调集了400名接受过制止暴乱培训的联邦官员。而州长则声称，违反州法的美国联邦官员会被亚拉巴马州的警察逮捕。与此同时，新闻报道称马丁·路德·金已经抵达蒙哥马利，并将于当晚在第一浸信会教堂（First Baptist Church）的集会上发表演讲，全美震惊。一群亚拉巴马白人武装暴徒聚集在街对面的一个公园内。面对他们的是怀特的联邦官员，美国司法官们分散站立着，就像一条散兵线。暴徒们冲击着，投掷石块和破碎的瓶子。该州州长给鲍勃打电话，抗议说亚拉巴马州正遭受“入侵”。他已经派出了美国国民警卫队，用催泪瓦斯驱散了暴徒，但他尖声叫道：“你们正在从政治上搞垮我们！”鲍勃平静地说：“约翰，教堂里那些人的生命比我们的政治生命重要得多。”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美国国民警卫队进入，没有遭遇反抗，金讲完话后离开，蒙哥马利恢复正常。

自由乘客被认为胜利了。没有人被杀，吉姆·克罗败下阵来。实际上，美国机场、公交车站和火车站的种族隔离现在也结束了。那年年末，你若在美国东西海岸之间旅行，就会发现候车室里“白人”或“有色人种”的标示不见了。在《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中，鲍勃宣布美国的种族主义即将结束。美国司法部的大多数成员都同意他的说法。伯克·马歇尔是个例外。他以密西西比州为例，认为它是美国最穷、最受忽视而且最不自由的州。大多数密西西比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民权运动。马歇尔预测，如果他们听说了，死亡也就开始了。

詹姆斯·梅雷迪思是一位来自密西西比的黑人，作为在美国空军服役了9年的退伍军人，他通过收音机听到了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讲，受其激励，当天晚上就给位于牛津市的密西西比大学写了一封信，申请入学。曾经他因为“一位美国密西西比黑人公民”的身份，入学申请被不可避免地拒绝了。迈德加·埃弗斯是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州会长，他于1961年6月开始为其辩护，1962年9月，经过一年的裁决、上诉和撤销，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密西西比人雨果·布莱克命令密西西比大学立即准许梅雷迪思入学。州长罗斯·巴尼特喊道：“决不！”两天之后，他继续通过电视在全州范围内宣称：“我们不会向高压政治的邪恶和非法行为屈膝投降。”

接着便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复杂的交涉，参与者有美国总统、美国司法部部长和密西西比州州长。巴尼特总是设法不跟他们俩保持步调一致。肯尼迪兄弟提出了一系列的复杂动议，目标是让梅雷迪思静悄悄地注册。州长则是变来变去，先是同意，接着改变主意，再改回来，郑重承诺他会信守承诺，但10分钟之后便又再次食言。一通疯狂的对话之后，杰克挂上电话，转向白宫总统办公室中站在他身边的人，问道：“你们知道那家伙说了什么吗？他说，‘我想谢谢你在家禽养殖计划上的帮助’。”之后，鲍勃问：“为什么你不试6个月，看看情况怎么样呢？”他试图说服州长启动梅雷迪思的入学注册，但巴尼特说：“他最好不要上密西西比大学。”鲍勃轻声答道：“但他喜欢密西西比大学。”

州长现在成了整个事件的焦点。美国联邦法官裁定他藐视法庭，判决如果梅雷迪思在4天之内没能注册的话，他就每天要被罚款1万美元。与此同时，肯尼迪总统声明，他要通过美国的全国性电视台解释当前的形势。其间，巴尼特模棱两可的话和拖拖拉拉的行动已经形成了一种只

能通过暴力才能解决问题的政治气氛。在美国牛津市的这个校园里，提心吊胆的教职员工注意到来自美国南部各州的访客越来越多，他们受前少将埃德温·沃克的指挥，而沃克是一个阴险且不易对付的人，瞪着一双恐怖的眼睛，携带着步枪和猎枪，问道："黑人要从哪个地方进来？"拜伦·怀特升职去了美国最高法院，现在尼克·卡岑巴赫是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他正飞往美国南部监督军事行动。巴尼特躲了起来。在400名美国联邦司法官的陪同下，梅雷迪思被平静地带到了校园一侧的巴克斯特男生宿舍，而尼克和司法官们则在校园另一侧的漂亮旧红砖莱西姆大楼里设立了指挥所。

意识到行动被挫败，但不了解详情，暴徒们准备攻击莱西姆大楼。这群乌合之众反复喊着："2——4——1——3，我们恨肯尼迪！"他们用石块和砖头投击司法官（他们都是来自美国南部的白人），而其他人则挥舞着一节节的管子发起攻击。晚上7点58分，尼克授权施放催泪瓦斯。两分钟之后，肯尼迪总统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并不知道这边的进展情况。他透露梅雷迪思已经进入密西西比大学校园，解释了执行法院命令的必要性，并呼吁密西西比大学的在校生维护"你们的大学和州的荣誉"。

在牛津市，看到他的学生们禁不住起哄。攻击者投掷燃烧瓶、水泥块和砖头，步枪打出的噼啪声此起彼伏，并且还有隐蔽的狙击手将枪瞄准莱西姆大楼。共有两人被杀，28人受伤，166人受重伤。晚上10点，卡岑巴赫要求派军队。60名美国国民警卫队员抵达，拂晓之前，他们之中共有16人伤亡。军队的主力包括一个宪兵营，他们逮捕了200名暴徒，其中只有24名是学生。州长巴尼特把暴乱的责任推到"没有经验、神经紧张、动辄开枪的"美国司法官身上。第二天，不到8点，三位司法官便陪着梅雷迪思来到莱西姆大楼，一位板着脸的注册主任在那里给他办理了入学手续。在他离开大楼时，一位白人学生叫喊道："这值两条人命吗？"

在肯尼迪总统任内的第三年，马丁·路德·金全力在伯明翰开展活动，他称之为"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伯明翰的警察局局长布尔·康纳很喜欢引用他的这句话，事实也如此。不仅这个城市的学校是种族隔离的，它的公共厕所、喷泉式饮水器、剧院、公园、运动场、饭店，甚至是教堂都实行种族隔离。美国联邦裁决不会吓倒康纳。在他看来，它们

只不过是“肯尼迪兄弟”的官样文章，企图破坏伯明翰的法律和秩序，同样，反对意见也遭到无情的压制。金在伯明翰的活动始于1963年4月2日，包括静坐抗议和游行示威。康纳迅速逮捕了400位黑人。金随后派出几组人去白人教堂做礼拜。除少数几次外，他们都被拒之门外。阿瑟·黑尼斯市长告诉媒体说：“这个黑鬼”是美国总统和美国司法部部长派来的，针对这两人中的一个，他说：“我希望他把流出的每一滴血都喝下去，而且我希望噎死他。”

年轻黑人都是非暴力主义者，并听从金的严格指示，他们的人数在增加，直到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2000多人涌入伯明翰的市中心。康纳则用警犬和消防水龙带迎接了他们。1963年5月4日，世界各地的报纸读者被一张野蛮的照片震惊了，照片中，一只咆哮的大狗正扑向一位吓坏了的黑人妇女。肯尼迪总统说，这张照片让他感觉“愤恨”，“我完全能够理解伯明翰的黑人为什么对要求他们耐心感到厌倦了”。

杰克现在为此忙得不可开交，近两年来，他的弟弟一直充满激情地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5月11日，有人引爆了自制炸弹，先是摧毁了一位黑人领袖的家，然后炸毁了一家被取消了种族隔离的宾馆。第二天，被激怒的黑人冲上街头，这一次，布尔·康纳的警察、警犬和消防水龙带已经力所不逮了。他打电话给亚拉巴马州新任州长乔治·华莱士，请求增援。华莱士一直在等着求助，他已经准备好了一支混杂的队伍，他们由副治安官、渔猎执法官、酒代理商和高速公路巡警组成，人数达到700人。他们高喊着威胁的话，从城市四周发起突然袭击，把黑人猛推进门口，气势汹汹地猛地打开手枪的保险栓。他们有一个精心策划的恐吓计划，逐步升级，而这是第一阶段，但华莱士再也不会走到第二阶段了，因为肯尼迪总统用飞机把3000名军人运到了美国伯明翰附近的空军基地。肯尼迪说：“这届美国政府要做必须做的一切来维持秩序，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安全，捍卫美国的法律。”愤怒的华莱士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指控军队的调动“违反美国宪法，没有法律效力”，这是一种“军事独裁”行为，“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美国司法部回复说：作为掌管美国三军的总司令，美国总统可以命令士兵移动至任何他希望去的基地。

用其平静而有说服力的方式，伯克·马歇尔在这个城市的黑人和白人领袖之间进行调解，持续的和平又重新回到了伯明翰垃圾遍地但取消了种族隔离的街道。结果是金又一次取得了胜利。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布尔·康纳的管辖范围。跟在蒙哥马利和牛津一样，这里的几百万美国白

人的良心被唤醒，在其他地方抗议的黑人也在游行示威，比如亚拉巴马州的塞尔玛、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和费城以及北部的芝加哥。肯尼迪总统说：“挫败和纷争的怒火正在每一个城市燃烧……法律补救正在考虑之中。”肯·奥唐奈用一个能想起来的短语预测这是“一个长长的炎炎夏日”。秋天结束前，可能有1.4万游行示威者被关进了美国南部的监狱里。

华莱士现在成了全美的知名人物，他意欲要尽可能长期地和努力地利用种族主义做斗争。他的下一个动作就是为鲍勃的前进设置障碍。在他竞选期间，这位州长一再发誓要站在亚拉巴马任何一所白人学校的门口，阻拦黑人孩子进入校园。美国司法部部长乘飞机去蒙哥马利跟他会谈。那真是一次奇怪的会面。州议会大厦莫名其妙地被州部队包围，而抗议者举着的牌子上写着：“洁食团伙（Kosher Team，Kosher指按照犹太教规制成的食品）：肯尼迪——卡斯特罗——赫鲁晓夫”。鲍勃告诉华莱士，亚拉巴马最急迫的法律问题源自法院命令，因为它裁定该州的州立大学必须接受黑人的入学申请。他一次又一次地强调，法律必须执行；而矮小、好斗的州长一次又一次地声称，这意味着暴力，肯尼迪兄弟的手上会沾满鲜血。

肯尼迪总统下决心阻止另一次牛津事件的发生。他飞往马斯尔肖尔斯，在与华莱士同样的平台上发表讲话，直接警告对方不要藐视法律。根据法院的命令，三位黑人获得了在夏季学期入读大学的资格。华莱士比巴尼特更胆大妄为，他声称自己不仅会阻止这些申请，还打算迫使美国联邦官员逮捕他。尼克·卡岑巴赫谋划了一个方案，以便让华莱士看上去很愚蠢。这位州长曾命令在学生注册的大楼外面画一条白线，并在那里放了一个讲台。他打算在讲台边发表演讲。但卡岑巴赫与大学管理层达成谅解，他们不仅接受黑人入学，而且还会给黑人安排宿舍。尼克乘车离开，走向那条线，而州长在高大的州警护卫下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州警头顶钢盔，佩戴着随身武器、瓦斯枪和警棍，此时，州长被告知，他象征性的抵抗毫无意义，没有什么好抵抗的了，一切都结束了。不过，如果州长拒绝履行职责，不能确保学生的安全，亚拉巴马州的国民警卫队就将被美国联邦接管。

华莱士看上去要崩溃了。他狂怒地喊着这是“美国佬的正义”和美国“中央政府”在“权力诱导下的入侵”，但只有媒体和州警冒着约40摄氏度的高温在那里听他演讲。卡岑巴赫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车上，载着黑人

学生来到了他们的宿舍楼。那天晚上，肯尼迪总统在电视上告诉美国国民：种族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跟《圣经》一样古老……跟美国《宪法》一样清晰”。他说：“巨大的变化即将到来，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责任就要让那种革命、那种变革给所有人带来和平，对他们有所助益。”最后，他敦促美国国会基于“种族问题在美国人的生活和法律中无立足之地”的前提，通过一项全面而彻底的民权法案。尽管最终，大多数美国人会接受，但在那个漫长的炎热夏季的初期，种族主义显得似乎没有尽头，种族主义就潜藏在美国人心中某个黑暗的角落里。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迈德加·埃弗斯是詹姆斯·梅雷迪思的朋友和顾问，当肯尼迪说这些话时，埃弗斯刚参加完某教堂的民权集会，返回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但他再也没能走到自己家的前门，一位狙击手埋伏在那里，杀害了他。肯尼迪总统感到心灰意冷，他说：“我理解不了那些美国南部人。我开始认为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是对的。而我受到的教育却总是让我视其为一位有恶意偏见的人。但当我看到这种事情，我开始想知道你还可以怎样对待他们。”

当肯尼迪总统得知民权运动领导人正计划在华盛顿举行一次人数众多的和平游行示威时，他感到惊愕。他说：“我们想要在美国国会取得胜利，而不只是一场大型表演。”但是，对于那些认为黑人的不满可以通过制度内的调整加以解决，以及参与游行示威的人要比那些藐视他们的人更文明、行为更规矩的人来说，1963年8月28日的华盛顿游行示威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个国家从未见过那种场面，20多万美国人全都秩序井然。他们唱着圣歌和属于美国南部黑人的灵歌：

我心深处，

一直坚信，

总有一天，

我们会胜利。

他们的自律是个奇迹。除了引导交通外，华盛顿特区的警察无事可做，守在一旁的4000名士兵也从没有受到召唤。肯尼迪总统深受感动。他在白宫接待了金和参加游行的所有领导人，并告诉他们，他对他们“深深的热忱和默默的尊严”印象深刻。他对媒体说：“这个国家理所应当感到骄傲。”后来，他与弟弟一起讨论了民权法案的政治寓意。鲍勃说：民意调查显示，在多家报刊发表文章的经济专栏作家埃利奥特·詹韦所谓白

人的“抑制”已经开始。在美国北部城市的大型种族选区，金根本不是英雄。所有的研究都表明：肯尼迪总统在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立场使其不再受到蓝领工人的欢迎。杰克戴上眼镜，开始研究民调数字，然后，摘掉眼镜，抬头说道：“好吧，如果我们的支持率在下降，那就让我们因为原则问题而下降吧。”

5月29日，周三，这一天，他已经46岁了。意识到今年不会跟去年一样收到弗兰克·西纳特拉的礼物，杰克反而心情放松了，去年他送了一张摇椅，覆盖着黄色的菊花和白色的康乃馨，在杰克看到它之前，工作人员就已经把它转送给了儿童医院。但厨师长勒内·韦尔东还是制作了一个巧克力蛋糕，他会制作多种巧克力蛋糕，而这是肯尼迪喜欢的那种，工作人员还为他策划了一个生日聚会，想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不过，有些工作人员知道，他还是一头“老虎”。他们假称在白宫军情室有一个加密电话等他接，引他来到聚会上，但这位总统并没有感觉非常惊讶，当马克·邦迪领着他进入白宫西翼的餐厅时，他只是咧着大嘴笑。皮埃尔·塞林格担任仪式主持人，他递给肯尼迪一个发言稿，它是这样开始的：“46年前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莱恩……”然后，有人递给肯尼迪一个人造卫星的模型，附带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希望你旅途愉快，巴里”。杰奎琳则送给他了一大篮子枯草，因为他对其办公室外面的新花园感到自豪，而她则拿自己丈夫的这种自豪感开起了玩笑。卡片上写着：“来自古代玫瑰花园的真正古代的草，白宫历史学会赠。”

真正的生日庆祝是在那天晚上举行的，他们乘船沿波托马克河而下，同行的有鲍勃和埃塞尔、特迪、施赖弗夫妇及其亲密朋友，比如比尔·沃尔顿、布拉德利夫妇、费伊夫妇、巴特利特夫妇、吉姆·里德、戴维·尼文以及乔治·斯马瑟斯和他的妻子。阵容很庞大。一支三人乐队整晚都在演奏，而且在扇形船尾提供鸡尾酒，接着是到下面就餐。杰克非常开心。他命令船长晚上10点30分之前返回码头，但在游船回到它的停泊处时，肯尼迪命令再游览一圈，之后又转一圈，又转一圈，又转一圈。天气状况很差，霹雳频闪，骤雨倾盆而下，但如果你有所抱怨，你就会在增进肯尼迪家族男子气概的人面前丢尽脸面。到了祝酒的时候，所有人都有点儿微醉了。特迪开始模仿“甜菲茨”和“红费伊”，这让不认识“甜菲茨”这位老人的人感到困惑，多次催促之后，他开始模仿穿着软底鞋、戴着平顶硬草帽、手拿马六甲手杖的歌舞杂耍表演，这会让人想到在所罗

门群岛的PT鱼雷艇上服役的岁月，常常让杰克大笑不止：

好莱坞万岁……
那个疯狂而令人讨厌的好莱坞，
当任何办公室勤杂工或年轻机工，
对只不过是一张好看的脸，
感到害怕时，
任何酒吧女郎，
跟或不跟粉丝跳舞。
都可以成为星女郎。

1963年，扭摆舞已经不再流行了，但没有人有勇气告诉美国总统，因为他喜欢，因此，你会一遍又一遍地听到查比·切克的乐曲。杰克决定延迟打开一大堆礼物，等明天到了戴维营再说。遗憾的是，它们没有受到保护，宾客名单中包括克莱姆·诺顿，他是特迪最后加入邀请名单的客人，跟他的交情可追溯到1946年杰克的众议员竞选活动。诺顿绝对是喝醉了，走路摇摇晃晃，一脚踩到了杰奎琳送给她丈夫的礼物上，那可是一个无价的古代雕刻，十分稀有，简直独一无二。无疑，这是一场灾难，但杰奎琳良好的教养使她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做到自我控制。她故意若无其事地说："噢，没关系。我可以修好它。"它看上去已经无法修复了，你感觉到杰克不经意的反应："太糟糕了，是吧，杰奎琳？"近乎没有感觉。但这可能是一种误读。正如本·布拉德利看到的那样，肯尼迪总统及其妻子少有地没有情绪外露，只是笑了笑。

尽管因宿醉而感到难受，周四下午，还是有一小群人聚焦在白宫的南草坪上，等着乘坐直升机去戴维营。每位宾客或夫妇都被安排了房间，他们参观了附近的双向飞碟射击场，事实表明，这群人中没有神枪手，之后，他们在热水池中游泳，在露台上喝口味极佳的血腥玛丽鸡尾酒，所有人都恢复了精神。除了被毁坏的雕刻之外，杰克的生日礼物都堆在他的椅子周围，仪式继续愉快地进行，不过你现在可以看出，他们对雕刻已经不大抱希望了。就像小孩子一样，杰克会把其中一个礼物的包装纸撕开，看一看，放到一边，转而再拿起另一个。最让他高兴的礼物是埃塞尔送的一本剪贴簿，她模仿白宫纪念册，将鲍勃和埃塞尔乱糟

糟的希考里山庄按照总统官邸的规格加以介绍。

无疑，这些事情现在看来似乎已没有什么吸引力。他曾经被解释过的一位魔术师的手法也不再迷人。经历过那个年代，并有幸活到今天的人只能确定，那时的肯尼迪兄弟有一种魅力，在他们所有的庆祝活动中都充满一种罕见的品质，因为你仍然不理解这种戏法是如何操作的，所以，这种魅力会在你珍贵的回忆中历久犹存。常识会不断地提醒你：欢笑和辉煌的胜利是不可能永远持续的，但不知怎么，毫无缘由地，你觉得这些人会是个例外。在那些日子里，在那个悲伤的黄昏之前，似乎在这位总统领导下的美国人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不管是美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你从没有想过要由其他什么人主政华盛顿。你想当然地认为，一切都不会改变，带有“美国退伍军人”标签的这一代人永远不会老。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把无云的晴天称为“女王的天气”，而在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万里无云的艳阳天则是“恺撒的气候”。从1960年开始，杰克开展了一系列运动，人们称那种光耀辉煌为“肯尼迪的气候”。随着1963年的渐渐过去，你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日子所剩无几。现在，不管怎样，你会对经历过那种平和无忧的生活心存感激。

接近夏季结束时，在哈默史密斯农场，住在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的这对夫妇庆祝了他们结婚10周年。杰克送给杰奎琳的礼物是古董商开具的一个古董清单，没有一件的价值是低于1000美元的，并且让她自己挑选。之前，他只是扫了一眼清单，但现在，因为他仔细看了看清单，看到其中确实有一些昂贵的物品，他的脸上掠过一丝惊慌的表情，他在你的耳边低声说道：“想办法让她不要选那个。”她选择了一个简单的蛇纹石手镯。她送他的礼物花了很多心思，它是玫瑰花园前后对照的照片剪贴簿。每张照片的旁边都注有他那天的日程安排，她还亲手写下了语录。他很高兴，所有的语录他都喜欢，并且大声地朗读了一遍。

回想起来，这些庆祝活动似乎是肯尼迪兄弟的高潮期，而我们这些当心船首三角帆的人不过是在船长顺风扬帆并且驶向辉煌时的免费乘客。当然，杰克期待着在其第二任期内掀起更大的高潮，之后便可以轻松地航行。（有一次，杰奎琳说她想他可以当一辈子的美国总统，他则假装惊恐地瞪眼看着她。）他曾计划在剩余的5年白宫生活过完之后，创办并编辑一份华盛顿的新报纸。它将会是一份高水平的报纸，最好的记者都会想为它写稿。但在1963年，这一切都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正义、和平和青少年成为那届美国政府日益严峻的议题。肯尼迪夫妇的生

活方式与当时所谓的“年轻夫妇”在很多方面是一样的，杰奎琳、埃塞尔和琼三位妻子在那年春天都怀孕了，婴儿车和婴儿围栏是这届美国政府高官的家中较为熟悉的家具，而其他届的美国高官已经都当祖父了。这就是肯尼迪当时所处的部分环境，就像和平队一样，它提醒美国的年轻人这就是他们的总统。你想起了他生命中最后一个6月对一件很小之事的关心。他了解到约翰·伯勒斯高中在洛杉矶的毕业舞会很早就在贝弗利山庄预定了希尔顿酒店的舞厅，现在，毕业舞会组委会的工作人员被告知他们必须另寻他处了，因为当地的民主党计划为这对夫妇举办一场所值1000美元的晚宴，以向肯尼迪总统致敬。杰克命令取消此次变更。晚宴中，他离开主桌，带着杰克·本尼作客毕业舞会。在介绍本尼时，他说：“我希望你们见见我的弟弟特迪”，学生们大笑起来，而本尼平生头一次无言以对了。诚然，作为美国总统，一定还会有其他的同代支持者。为了庆祝其在哈佛大学监事6年期满，他在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为著名的哈佛校友举办了一次清一色男性参加的晚宴。但即使在那时，他对自己的年龄还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他告诉他们：“邀请你们到白宫来不容易，因为你们中至少有2/3的人比我在这里参加的不带女伴的宴会要多。”

然而，他在总统任内是十分惬意的，最后也适应了丧失个人隐私和行动自由的生活。有时，他不再把自己当成是美国民主党政治家，而按他自己的想法，他要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在你的印象中，这个转折点始于维也纳。这既是政治家的风度，也是一种有利的政治手腕：下次竞选时，大众会降低对他竞选策略的兴趣，转而更看重他在白宫的业绩记录。跟其他总统一样，他显然成熟了。你曾经觉得他差不多早熟了30年，但现在他确实已经变得沉着稳重了，也有威严了。他的头脑跟从前一样敏锐，或许更加敏锐。在白宫西翼办公室，他的脑子比嘴快：不厌其烦地说完一句再说一句，说着说着他会突然停止，开始说下一句，因为他的工作人员都了解他的思维方式，他们可以应对这种口头上的速记。现在，他的阅读速度已经提高，在阅读完所有文件的同时，享受到阅读的乐趣。他建议你阅读埃米特·约翰·休斯的《权力的折磨》（*The ordeal of Power*），它描述了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的一些内幕，“它是一本很棒的书”。坦白地说，他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工作。杰奎琳现在称呼奥唐奈为“猎狼犬”，因为当她看到他那没有笑容的脸出现在白宫二楼的电梯门廊时，她就知道自己的丈夫又要离开她了，并且不知道要走多长时间。虽然很累，杰克总是精神抖擞地迎接新的挑战。他想不到有什么事情比当美国总统更有吸引力的了。即使事情不顺利，他也会说：“这是我曾经

工作过的最好的白宫。”就像所有的美国总统一样，他知道难免有孤单的时刻，但每当孤独时刻结束，他就会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家人，跟他们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到了1963年，杰克的家庭已经与当初庆祝就职日的那个家庭不同了，向来如此。

当时，肯尼迪家族中还有一位杰出的人物，那就是他的父亲。美国老大使和新总统之间的联结仍然紧密。在杰克担任美国总统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几乎每天都通电话，在外交政策上，他们难得能说到一块，乔认为他儿子的柏林防卫战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虽然如此，老头儿确实发挥了一个极好的意见探询者的作用，只不过他的回声音量也的确非常大。然而，在第一个夏季，形势已经明朗，决策权已经逐渐转到杰克的手中。显然，他现在是海恩尼斯港的大院里最重要的人了。因为要为总统的直升机建一个小型停机坪，三座房子之间的游戏场地变小了。无论何时，只要直升机盘旋而下，大使都会等在场边，笑容可掬，满眼都是爱。考虑到杰克的背部有病，乔购买了一辆淡蓝色的电动高尔夫球车，它可以载着肯尼迪总统去他喜欢的任何地方，通常是去附近的糖果店，而肯尼迪的孩子们则尖声大笑着紧抓着车边，搭车同往，只要他儿子感到疼痛，不论白天还是晚上，老头儿的男按摩师都随叫随到。

父子俩之间的关系在1961年12月被永远地改变了，当时肯尼迪入主白宫还不到一年。感恩节过后，他跟朋友透露说他担心父亲的健康。杰克的忧虑很快得到了证实，圣诞节前6天，在出访拉丁美洲返回之后，他在棕榈滩短暂停留，发现大使的身体状况还不错，但仅仅过了一个小时，在打高尔夫球时，老头儿就病倒了。白宫接到了通知。杰克压抑着声音给鲍勃打电话：“爸爸病了。”当天晚上，“空军一号”载着肯尼迪总统回到了佛罗里达州，但他束手无策。在西棕榈滩的圣玛丽医院，他的父亲徘徊在死亡的边缘。临终祈祷已经开始，然后，他慢慢地苏醒过来。当枢机主教库欣呼唤他，并得知他会好起来时，他不连贯地说：“我……知道……我……会……”但他没有康复。他变成了植物人。他的语言表达被缩减成两个词汇——“外”和“不”，之后，干脆只剩下了一个“不”。他能听得懂你的话，但当他试图回答时，就会一次又一次地说“不”。

你最近一次见他是在他中风前两周。那时，他还如此灵活。一年以后，你在白宫的一次小型晚宴上再次看见他，当时在场的还有杰克和杰

奎琳、鲍勃和埃塞尔、特迪和琼、尤妮斯和安·加根，安是老乔的外甥女，现在，她将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来照顾姨夫。他难以抑制沮丧的表情，身体瘦削、扭曲，还有偏瘫，右半边身体从头到脚全部失去了知觉。似乎难以置信，这位老人的身体已今非昔比，现在的状况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但事实的确如此。每个人都高兴，没有比这家人更高兴的了，大使可以做出反应了。从他的眼睛里、歪着嘴的笑容里和令人吃惊的摇手的力量上，你能看得出来。那天下午，肯尼迪总统在玫瑰花园完成了授予温斯顿·丘吉尔美国荣誉公民的仪式，并告诉他的父亲："你的老朋友都到场了，爸爸。"并且一口气说出了好几位乔厌恶的人的名字，打头的就是伯纳德·巴鲁克和迪安·艾奇逊。这个家庭曾计划为他安排此类的小型团聚，确保他在特殊的日子里不会感觉孤独，比如圣帕特里克节，届时，他们会站在他周围，高唱《绿色的服饰》（*The Wearin'o'the Green*）。这天晚上，杰奎琳简直神了，她不停地说话，表面上看很随意，但其实技巧很高，使他想到他们一起度过的所有幸福时刻，并告诉他，她是多么欣赏他和他的好友弗兰克·莫里西的做事方式，因为他们的帮忙，才说服他向她求婚。

当肯尼迪的一家人聚在一起时，他们的能量似乎是按照某种几何级数在增长，就像是一个核反应堆，当他们拔出控制棒时，能量还会更大。他们从交换名人和政治家的流言蜚语开始，有些传言令人震惊，有些则非常有趣。每个人都会被其他人打断，而被打断的人会再次插话，因此，你同时会听到几个故事。虽然难以解释，但最终你知道了所有的事。唯一想说话就有机会发言的是杰克。他脑子里经常在想着工作，当时正掂量着纳尔逊·洛克菲勒这个反对者有几斤几两，因为知道你对纳尔逊略知一二，他就问你是否知道一些关于他的内幕消息。这可不是通常会被人问及的那种问题，甚至朋友之间也不会这样问，但他问了。幸好这件事容易回答。你确实跟他不是很熟，除了他跟"开心果"墨菲的关系外，你也没有听到其他什么事，而且那也算不上什么新闻。但他会追问下去，他现在有一个不太正面的形象，那就是选民不会支持一个本应有参战记录而实际却没有的人。他问道："当你和我在所罗门群岛躲闪子弹时，这位老纳尔逊在哪里？"意思是说，洛克菲勒躲避征兵是没有正当理由的，而杰克则按照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要求，完成了争夺拉丁美洲这个棘手的冷战任务，很好地维护了美国的利益。

这个家庭的成员从没有停止过竞争，彼此的竞争，跟任何人的竞争，这一点仍然让人啧啧称奇。一天晚上，肯尼迪总统及其妻子与一位

朋友正看电视新闻，屏幕上出现了一位9岁的男孩，他正朝着镜头扮鬼脸。杰克喊道：“我的上帝，那是鲍勃·施赖弗！他最喜欢上电视了，我们家的人都知道！”因此，他让白宫的接线员接通了这个男孩父母的电话。他告诉他们要少让鲍勃抛头露面。从他这一方的对话，以及尤妮斯对她年幼孩子的喜爱强烈程度，不难判断，这件事是典型的吃力不讨好。肯尼迪家族的好胜心已经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你最喜欢听的一个关于他们好胜心的故事涉及玛丽安·安德森，她是一位专业演员，埃塞尔曾为了就职典礼的事去机场接她。因为玛丽安身在娱乐界，埃塞尔的司机认为她可能喜欢听到有实力的出众嗓音。因此，埃塞尔对着她唱了一路。

在进入白宫的第一个周末，杰克给他小弟弟一个小箱子，上面写着：“后来者居上”。杰克经常喊特迪为“埃迪”，1962年3月14日，埃迪30岁生日过后20天（美国宪法规定当选参议员的法定年龄为30岁），他宣布竞选美国参议员，由此朝着权力的顶峰迈出了第一步。这等于是对着大家庭吹响了嘹亮的号角，所有人都集合于旗帜之下。那时，大使还能清楚地表达，他说：“你们这些孩子现在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每个人都会帮助你们得到它。现在轮到特德了。”对外人来说，这些话可能会令人目瞪口呆，即使是他们家的朋友也会感到吃惊。他们给予的帮助不涉及赞助、外交政策和国家事务，大部分是政治建议。特德是肯尼迪兄弟中唯一有长胖趋势的人，因此，家人给了他一张卡路里量表，并提醒他会频繁地给他称重，而且不会事先通知。然后，鲍勃和特德·索伦森乘飞机前来指导他，就像所有年轻演员都要接受的训练一样，训练他在镜头面前如何走路、摆姿势和挥手。特德曾参加过一个电视讨论会，并当场回答问题，杰克看了他的表现之后，感到很紧张，于是他启动了对他的培训。

一旦特德当选，杰克自然就会让他自己做主。在一次家庭聚会上，你看到他们兄弟二人正在笑谈，于是走过去问个究竟。特迪说：“我应该有一个进入白宫的途径。一些渠道。我告诉他，福尔里弗（Fall River）有1000人失业，菲奇堡（Fitchburg）有400人失业。当军队得到新的步枪时，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就还会有600人失业。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那也没办法’。”这就是肯尼迪总统的反应。不过，后来，你与特迪还交流过一次，你对杰克很少感到失望，而那次是为数不多的失望之一。他说在自己入主白宫8年之后，可能会想要重回参议院。特迪会辞职以便让他得到他的席位吗？特德称当然没有问题，可以

理解，这会让特德感到沮丧。鲍勃不会那么无情。但杰克比较残忍，而这次似乎就是一个例证。然而，你永远不能跟家人讲。他们在想方设法让彼此不舒服，而这种不舒服在带给他们快乐方面绝对是非比寻常的。

如果大使还跟以前一样，这会让他咆哮着采取行动，但现在，他已经没有能力处理家庭纠纷了，中风之后，在你那次见他时，他只能说出一个词。他坐在那里动弹不得，明亮的眼睛扫视着房间，耳朵竖着以便听到微弱的说话声。这家人的快乐是真心的，甚至还有感染力。但这都是假象。后来，单独在一边的时候，杰克就装不下去了。你看到他的眼中充满泪水。他哽咽着说："是他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可看看他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接下来，他告诉你，当他的电话铃声响起，就听到安·加根告诉他：他的父亲想要连上这条线，跟他讲话时，他经常会感到自己的心脏猛地一跳。然后，短暂的停顿之后，电话另一端会有一个声音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此时，他会急得咬牙切齿。

杰克控制情绪的能力惊人，在古巴导弹危机最为紧张的时刻，他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委会连夜开会，而他则站在门口平静地说："先生们，美国总统要去睡个好觉了。"只是，对于那些从未见过他跟孩子们在一起的人来说，这似乎显得有些不近人情。跟孩子们在一起，他会欣喜若狂，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卡罗琳小的时候，他叫她"小可爱"，当她搬进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的那幢老官邸时，她3岁，当他们搬离时，她6岁，在入住白宫的1000天中，只要看到她的一个姿势、一个微笑，甚至是很明显的睫毛下面害羞的一瞥，你的心都会随之而猛跳。在那之前，她只能断断续续地见到自己的父亲，在总统竞选活动几乎不能中断的那年年底，一天下午，杰克用力拉着一大袋玩具，来到海恩尼斯港大院，此时，父女之间的联结才真正建立起来，这些玩具包括一个由玻璃纸包裹着的粉红色泰迪熊，它几乎跟卡罗琳一样大，以及一只填充玩具长颈鹿，事实上，它比泰迪熊还要大。你回想起褐色贝蒂布丁的香味从这所大房子的厨房里飘过来，以及大使和他的儿子互致问候的奇怪方式，那就是乔用手掌扣顶在杰克伸出的紧握的拳头上，但你想到的大多数情景仍是父亲和女儿进行的目光交流。初次见到刚刚出生的她，他就被迷住了。在选举之后的过渡期，他开始认识她，在他成为美国当选总统和入住白宫期间，他们才真正发现彼此。他会张开双臂，而她会快速地扑向它们，冲向快乐。

他很少管教她，甚至都不会对她大声说话。有一次，从在白宫总统办公室的桌子后面向高大的窗户外面望去，他注意到她下巴的运动和往常有些不同，于是喊道：“卡罗琳，你在吃糖吗？”没有回答。他重复了一遍：“卡罗琳，你在吃糖吗？”还是没有动静。最后，他生气地说道：“卡罗琳，回答我，你在吃糖吗？是或不是？”但只要她一哭，他便会就此打住。他发现自己无法对她严厉，你记得肯尼迪总统当时的声音从邻近的房间传来，听上去有些伤心，他恳求道：“卡罗琳，请挂断电话。我得打电话。”如果她离开，他就会担心。不管她是去了棕榈滩、海恩尼斯港，还是哈默史密斯农场，每天晚上，他都会给她打电话。有一次，肖小姐告诉他：她去了朋友的生日聚会，还没有回来。她的父亲就说：“从现在开始，她晚上必须待在家里。”听上去，她就像是个任性的十几岁少女。快6岁的时候，他才同意她离开家过周末。她会和粉红小熊、蓬发安布娃娃以及小阿加莎·波津待在一起，波津的父亲在美国内政部门工作。1963年11月22日，周五，午后不久，阿加莎的母亲赶到白宫把她接走了。

她学会的第一个词是“飞机”，接着是“爸爸”“汽车”和“鞋”，至少有两个表示动作。她的父母决心让她避开公众的视线，但他们充其量只是在为破除围攻而战。在乔治城的那天早晨，当杰克在浴室里泡澡时，她还很小，她快步走进来，把一份封面上有他照片的《新闻周刊》扔进了浴缸，快乐地尖叫道：“爸爸！”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开了浴室。她公开露面的次数很少，但每一次都令人难忘。她首次现身于一次美国外交使团的欢迎会上，当时她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礼服迎接客人。她告诉赞赏它的人说：“这是我最漂亮的衣服。”她让欧洲那些年长的贵族气派的外交官感觉不可思议。她的屈膝礼下深而优雅，拖曳衣裙的动作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她和自己的小弟弟见过的国家领导人可能要比大多数美国内阁成员还要多。他们会在杜鲁门阳台上观看白宫南草坪上的各种仪式，并随着21响礼炮的每一次发射大喊一声“砰”，在炎热的一天，她和她的小伙伴机智地瞒过了肖小姐，从大楼里逃了出来，被发现时，他们正光溜溜地在南草坪的喷水池里洗澡。那时，卡罗琳已经是个名人。全美国都知道她的小矮马名叫马卡罗尼；知道她问过萨姆·雷伯尔尼为什么没有头发；知道她曾溜达进白宫新闻厅，告诉记者们，她父亲“正在楼上坐着，鞋袜没穿，啥事也没干”；还知道她被拍到手里抓着布娃娃，和她父亲一起离开教堂。（杰克告诉一位朋友：“我不介意他们在弥撒之后的拍照，但很肯定的是，我不希望他们在忏悔之后围上来。那会让我感到丢人，而且我知道我会带出那种表情。天主教徒喜欢找不认识自己的教父

忏悔。坐在室里，听到帘子另一边有一个声音说：‘晚上好，总统先生’，会让人心里很是不安。”）

在总统的住处，媒体渗透不进去，家庭生活与他们在乔治城的日子略有不同。卡罗琳每天早晨都能看到她父亲刮脸和洗澡的样子，然后，她会和晚到的约翰一起跑去看电视上的动画片。下午结束时，她和小狗会闲逛到白宫西翼办公楼。如果他在忙，她便会跟伊夫琳·林肯闲聊，或探索放玩具和游戏器具的橱子，它们是伊夫琳专门为此目的保存的。杰克对狗过敏，但卡罗琳喜爱它们，他也只好那样了。杰奎琳曾在官邸的三楼为卡罗琳、阿加莎·波津和其他新边疆政策支持者的孩子们设了一间小教室，并在白宫里靠近总统办公室的草坪上建了一个游乐区，铺了沙坑，安设了滑梯和秋千。在查利陪护下，卡罗琳和她那时才蹒跚学步的弟弟会在那里玩上几个小时，在场的还有一只西班牙长耳猎犬香农和赫鲁晓夫的礼物普辛卡。在工作预约的间隙，肯尼迪总统常常走到外面，拍拍手，然后，将两个飞跑过来的孩子和三只冲过来的狗拥入怀中。有时会受伤。你可以看到他的脸都变白了，但他知道，身体的剧痛是这种爱心交融时刻要付出的小小代价。

卡罗琳像她妈妈一样喜欢马，像她爸爸一样喜欢海，并且跟两个人一样喜欢读书。女儿和儿子继承了肯尼迪鲜明的特性：他们友好，但对陌生人保持拘谨，敏锐、聪明、好奇心强，能被可怕的能量所激发。媒体称赞他们如天使般可爱。事实上，他们不是。在读斯波克博士的书时，他们的妈妈告诉一位朋友说：当“知道其他人的同龄孩子”跟她的孩子“一样顽劣时，心里便释然了。”杰奎琳及时察觉到卡罗琳的爸爸对于保护孩子隐私的热情不如她高。小孩子的吸引力是有影响力的政治资本，偶尔，他也会屈服于这种诱惑。杰奎琳则努力将公开宣传的次数降到最少。为了带她幼小的儿女出白宫，她会让他们俩挤进她那辆蓝色庞蒂亚克旅行车里，拉着去公园、商店或彼此相熟的朋友家中，消磨几个小时。万圣节前夕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但他们俩可以戴面具，她也可以戴。阿瑟·施莱辛格、乔·艾尔索普和迪安·艾奇逊应声开门，迎接一对认不出来的小妖怪，他们俩上蹿下跳，迫使主人款待，否则就威胁使坏。遗憾的是，顽童可以化妆，但声音是无法伪装的，当她告诉孩子们该去下一家时，玉米糖的施予者认出了女扮男装的美国第一夫人。

作为父亲，杰克很擅长讲故事。通常，他有保留节目——健忘的波比、金发姑娘擅自进入熊的家和伦敦桥之灾。同时，他还有自己的童话

故事，比如，住在森林里叫梅贝尔的小姑娘、叫灰狼波波的巨人以及白鲨和黑鲨奇怪的口味，白鲨只吃人的短袜，等等。你想起有一天下午，杰克坐在“甜菲茨”号的船尾，旁边是弗兰克·罗斯福。弗兰克正在读书。他跷着二郎腿，脱了鞋子，穿着一双脏兮兮的汗袜。杰克正在讲白鲨，在他看来，袜子越脏，越会成为美味佳肴。他边讲故事，边俯身脱下了弗兰克的一只袜子，并把它扔到了船尾外面。然后，他解释说：相比一只臭袜子，白鲨更喜欢两只臭袜子，并再次俯身，脱掉了弗兰克的另一只袜子，也把它扔进了河中。弗兰克从头到尾就没有抬头看。卡罗琳的两只眼睛则瞪得没法再大了。她听故事完全入了迷，确信袜子一消失在波托马克河，它们就被跟在船后面的鲨鱼吞进了肚里。

到6岁时，她的父亲觉得她应迈出一大步，到了阅读诗歌的时候了。她很喜欢一首两行诗，并喜欢听父亲读给她听，他认为它是埃米莉·迪金森所作，当她在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的诗集中找到它时，他感到惭愧。

平稳立在坚硬岩石上的房子真难看，

来看我在沙滩上建的宫殿多华丽！

在她的一再要求下，他同意在演讲中引用它，当时是在白宫南草坪上向一群人发表演讲，他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让他高兴的是，她的记性很好，他可以自豪地坐在那里，咬着一根雪茄，听她用清脆甜美的嗓音背诵莎士比亚：

蜜蜂在哪儿吸花蜜，我亦在哪儿吸；

我躺在野樱草的钟形花之间；

猫头鹰叫时，我就隐身其中。

骑着蝙蝠我就能飞，

夏天过后多欢畅。

欢畅啊，欢畅，

现在我住在花下，

而花儿挂在树枝上。

小约翰的父母从来没有喊过他“约翰——约翰”。这个传言的起源是这样的。一天，肯尼迪总统离开他的办公室，喊他的儿子：“约翰”，而他正在附近玩耍。没人回应。肯尼迪大声喊道：“约翰。”这次儿子听到了，跳起来跑向他。一位低级别的助理把这一幕告诉给了一位记者，记者问道：“肯尼迪总统到底说的是什么？”这位助理答道：“约翰！约翰！”等到印出来，它就变成了“约翰——约翰”。读到这篇报道，杰克不无讥讽地评论说：“倘若我要喊他三声，他就成了‘约翰——约翰——约翰’。”

肯尼迪与其女儿建立了一种温柔的关系，但对男孩子们则不同，他们被期望更为粗犷，而父亲应当与他们有更多的互动。对大多数男人来说，这种活动的乐趣之一就是将他们的儿子抛向空中。然而，杰克却因为背疾无法做到。阿登纳86岁时还能把小约翰抛举起来，孩子快乐得咯咯笑，要求再多抛几次。杰奎琳说这是他第一次被人抛举。杰克保证说这不会是最后一次。他的朋友们被拉来替他做这件事。他伤心地告诉他们：“约翰还不知道这件事，在我能背他之前，他得先背我。”前一年的夏天，在斯阔岛（Squaw Island）上，杰奎琳坐在附近，规划着去一个新的国家静养，杰克倒在房后的草地上，面朝大海，因为有地面支撑着他的背，他得以拉着约翰一起倒下。他希望儿子会把这当成抛举的一种替代做法，但约翰并没有接受。杰克说：“约翰，有一个爸爸跟你这样玩，难道你不觉得幸运吗？”让人难过的是，男孩没有回答。当他发现自己不会被爸爸抛举时，就会去找在场的其他人，说：“抛抛我。”

但那只是一次小小的失望。父子本身就是彼此无限欢喜的源泉。他们会不断地相互逗弄，甚至是些不必要的逗弄。如果他们四目相遇，这就够了，彼此会感到一种震颤。坐在斯阔岛的村舍里，杰克会朝着儿子做出一个动作，表明他要抓住他，而因为咯咯笑个不止，约翰几乎无法动弹，但会踉跄着跑开，在被抓住时抗议着说：“爸爸，放开我。妈妈，让爸爸放开我。”他们会趴在地上较劲，父亲会一边喊：“我要逮住你！”一边抓着、挠着他的儿子。在棕榈滩，他会追着约翰到游泳池的扶梯，将他的小泳裤拉下来，儿子尖叫道：“爸爸傻瓜！”或“爸爸下流！”当他们最后一次在棕榈滩度假时，不知怎么，约翰学会了一种无礼，杰克认为这是肆意的侮辱。在父亲想要抓他时，他会蹲下身子躲开，然后说：“爸爸，你是一个榆木脑袋。”肯尼迪惊得下巴都快掉了，眼珠子瞪得突出来，因为越来越生气而浑身颤抖，站起身喊道：“约翰·肯尼迪，你怎么敢喊美国总统榆木脑袋？等着，我非抓住你不可！”于

是，两人继续追逐。一天夜里，当大人都坐在游泳池边时，孩子们正在道晚安，约翰倚在他父亲身上，用一种别人也都能听见的低语说道：“榆木脑袋！”肯尼迪总统愣在那里，他被彻底震惊了，小家伙扬扬得意地飞快跑开，扑到床上，确信他赢了，而且是大获全胜。

在家中、公园或海滩，一天之内，人们会见到无数次类似的情景。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具有特殊的意义。当他在维也纳为想威慑住赫鲁晓夫的努力付诸东流之后，杰克告诉你说：“就你我而言，这确实没什么关系。真正重要的是孩子。”他一心想着的是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在去新墨西哥州的旅途中，他向下看到了一个大坑，这是地下爆炸留下的痕迹。两位物理学家热情地解释说他们正在完善一个更小的核弹，但却可以造成一个更大的坑。他皱起眉头，感到困惑。后来，他问你：“为什么他们会对此类事情如此兴高采烈？他们不断地告诉我，如果他们能多试验几次，就能研制出一种更清洁的炸弹。如果你想杀死1亿人，有没有污染又有什么分别呢？”另外一次，在谈到需要阻止核试验时，他告诉你：“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是还未出生的几代人的总统，而不只是美国的几代人。”

卡罗琳和约翰源源不断地给他带来了快乐，因此，1963年夏天，帕特里克的死才会让他突然陷入悲痛之中。帕特里克本应是他们的弟弟。他只活了39个小时。他没有跟预期的那样，提早5周就出生了，8月7日，在带卡罗琳去奥斯特维尔（Osterville）上完骑马课之后，杰奎琳突然出现阵痛，即将临盆。她在白宫的产科医生约翰·沃尔什博士恰好在附近度假，在从海恩尼斯港去奥蒂斯（Otis）“空军一号”基地的救护车上，他一直陪在她身边。肯尼迪总统于下午1点30分抵达。那时，沃尔什已经为杰奎琳做了剖腹产手术，生下一个儿子，重量不到5磅。基地的牧师立即给他取名帕特里克·鲍维尔·肯尼迪。帕特里克呼吸困难，沃尔什和一位顾问医生决定用救护车将他送到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医疗中心。杰克看望了在斯阔岛上的卡罗琳和约翰，看望了杰奎琳，并在波士顿的丽思卡尔顿酒店过夜，研究禁止核试验的文件。

早晨，传来坏消息。婴儿已经发展成肺病。他们再次转院，这次去了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他被放入了高压氧舱。杰克决定在医院的一间空房里过一夜。凌晨两点，一位美国特勤局特工喊醒了他，帕特里克病情加重。肯尼迪总统在走廊里来回走了两个小时。然后，他的小儿子心跳停止，夭折了。后来，他父亲简单地说了一句话：“他进行了英勇的抗

争。他是一个出色的宝宝。”此时此刻，他几乎说不出话来。他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在啜泣，因此，来到他楼上睡觉的房间，坐在床上暗自呜咽。

葬礼弥撒由枢机主教库欣主持，并且只有家人参加。在其他人已经动身前往布鲁克莱恩墓地后，枢机主教告诉了你他和杰克落在后面的原因。悲痛之中，肯尼迪试图自己搬着小棺材，它那么小，他都可以用胳膊抱过来，但他却抱不起来，老主教粗声粗气地说：“杰克，你最好自己走。死亡并非一切都结束了，它只不过是新的开始。”在墓地，肯尼迪总统再次徘徊，直到差不多所有人都走了，他才离开。戴夫·鲍尔斯看到他弯下身子，触摸着地面，轻声说道：“一个人待在这里太可怕了。”然后，他转而安慰杰奎琳。她想跟他和孩子待在一起，保持生活的正常状态似乎是治愈沮丧的最好方式。他却有不同的想法。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曾建议她乘坐他的豪华游艇“克里斯蒂娜”号去爱琴海游玩散心。因此，在杰克的催促下，她跟妹妹李，以及弗兰克·罗斯福一起出发了。不出杰克所料，对于她的出游，媒体大肆批评。报纸充斥着有关那艘“灯火辉煌的豪华游艇”的报道，把它描述成“宾客们寻欢作乐，满是美酒佳肴”“船上的宴会挥霍浪费”，而且还伴有“舞曲”，“船上有60人”，包括为美国第一夫人配备的“两位男理发师”。

让杰奎琳感到吃惊的是，杰克在旅行这件事上的决定是正确的。转移注意力的做法确实奏效了。此次航行很不真实，简直是一种完全的与世隔离，以致好像是到了另外一个星球。她甚至无法通过电话与杰克联系，她会在游船停泊的其中一个小地方拨打电话，等上3个小时，然后知道接线员“没有接通”。最终，她突然想到打电话可能是不慎重的，因为她说的每个词都会被别人听到，因此，她给他写了一封长达10页的信，就像她写任何东西时一样，不时地使用破折号。她告诉他，她有多么爱他、想他，并且希望他能和她一起分享地中海让人无忧无虑的环境。从伊斯坦布尔到莱斯博斯岛，再到克里特岛、德尔斐、马拉喀什和奥纳西斯在爱奥尼亚海拥有的蝎子岛，随着她的进程，一封封急件被发出。从希腊国王和王后开始，皇室成员款待她、向她祝酒、夸赞她，并赠送她带有异国情调的礼物。当她于10月17日返回白宫时，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杰奎琳满眼是星星——希腊的星星。”

她邀请朋友参加她的鸡尾酒会，听她讲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她称奥纳西斯是“一位快活而充满活力的人”。她谈到了摩尔人、宫殿、舞会和

她如何必须用手吃饭，当然是用一只手，另外一只手竟然被认为是脏的。短暂消失，回到她的卧室之后，她再次现身，穿着缀满宝石的白色丝绸刺绣摩洛哥长袍，这是当地国王穆莱·哈桑送给她的，在留声机放了几首摩洛哥音乐之后，她展示了那个国家的舞蹈。后来，她似乎对美国的宣传有点儿懊恼，她了解到这可能会对选举带来不利的影响，她有些不好意思。肯尼迪告诉一位朋友：他已经禁止奥纳西斯在1964年前入境美国的任何申请，清楚地表明，他认为此次旅行在政治上得不偿失。但在与本·布拉德利私下说话时，他注意到他所谓的“杰奎琳的内疚感”可能对他有利。情况确实如此。他微笑着建议她加入他的旋风之旅，从圣安东尼奥、休斯敦、沃思堡一直到达拉斯，最后在林登·约翰逊农场结束，这位美国副总统会在那里劝诱他们尽情享受他家特殊的烹饪手艺。她回答说：“我肯定会去，杰克。我们应当开展竞选活动。我会跟着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她翻开自己红色的预约记录簿，在印着11月21日、22日和23日的地方潦草地写下了“得克萨斯”。

“等到1964年！”你越来越多地听到这句战斗口号。11月13日，恰好是他动身去得克萨斯的前一周，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内阁会议室（Cabinet Room）召开了他的首次连任竞选战略会议。鲍勃在那里，拉里·奥布赖恩、肯·奥唐奈和其他60年代的退伍军人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在肯尼迪总统的绝对主导下讨论了三个多小时。此次会议在很多方面很像1959年4月和10月的棕榈滩和海恩尼斯港会议。杰克说：“跟往常一样，竞选活动从此开始。”下周一，他将在坦帕和迈阿密发表讲话，然后，在华盛顿稍作停留，他和杰奎琳会前往埃尔帕索，他要对林登·约翰逊家乡所在的州施加大的影响。得克萨斯州是个麻烦，他需要它的选举人票，但其党派分裂，一方是州长约翰·康纳利，他是右翼民主党人，另一方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参议员拉尔夫·亚伯洛。林登似乎无能为力，因此，肯尼迪要去那里，利用美国总统的威望，让康纳利和亚伯洛团结起来，至少要坚持到1964年11月3日。

此次，他希望开一个让人振奋的美国全国代表会议。他说：“生平头一回，我愿意听到一个好的主旨演讲。”然后，他要在电视上与来自共和党的竞争对手展开辩论。目前来说，需要保密，但它肯定是要发生的。一个大的疑问是：他要跟谁对抗？无疑是民主党最喜欢的共和党人。他们希望是戈德华特，确切地说，他宁可做一个立场正确的右翼，也不愿

意妥协以换取选票，从而当上美国总统，他在两党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家。杰克确信他会打败巴里。他说：在大佬党（即共和党）能提名的人中，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是纳尔逊·洛克菲勒。但这位州长当时已与原配妻子离婚，而后又再婚。杰克困惑地直摇头。他是最不可能放过享受性爱之乐机会的人，但让他不解的是，为什么要因此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呢？

实际上，他已经开始竞选活动了。作为美国总统，他的每一个行动都会成为来年的议题，但事件离得越近，人们就会看得越清楚。繁荣或缺乏繁荣是任何选举都不可能避免的议题。艾森豪威尔对凯恩斯经济学困惑不解，他在一篇杂志文章中大喊：“华盛顿的这些人能想到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要故意为我们的国家做这种事？”读到这里，肯尼迪暗自发笑。在道格拉斯·狄龙和沃尔特·赫勒的帮助下，他有意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培育一个有史以来最长的和平发展时期。他认为，如果美国国会接受他的减税建议，也就不会发生1964年的经济衰退了。

最让人兴奋和最出乎意料的新议题是禁止核试验条约。对肯尼迪总统而言，禁止核试验是一件需要信念坚定的事。他推测这会导致选票流失。在条约听证会时，爱德华·特勒就宣称：“如果你签署这个协议，让它生效……你就出卖了这个国家未来的安全。”这是不对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和一批科学家证实这是不正确的，但肯尼迪毫不怀疑：在美国的某些地方，有人已经找到了攻击的靶子。这些地方包括11个山地州，3年前，尼克松曾赢得其中8个州的支持。在批准协议的当天，肯尼迪飞往西部，设法改变这一大片区域的政治态度。他提出此次行动的理由是：这是一次自然保护之旅。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政治之旅。下一年，10个参议员席位恐有保不住的危险。约翰·伯奇社正对它们进行积极运作，杰克想要减少他和其所在党派的损失。除非有人质疑，否则，他不打算谈论禁止核试验的话题。如宣传的那样，他的第一轮演讲主题是保护自然资源。但到了第二天，在蒙大拿州的比林斯市，他把众人深深地打动了。这纯属偶然。当时，迈克·曼斯菲尔德在讲台上，说到第三句话时，肯尼迪总统表扬了他在影响美国参议院通过协议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让他感到吃惊的是，这竟然引发了持续时间很长的欢呼。几分钟后，他决定再次验证一下听众的情绪。他说他希望能降低“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双方拥有的核能力足以在短短一天之内杀死3亿人”。这一次，众人的热情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那天晚上，他将其他关于自然保护的演讲草稿插入公文包的背面，开始着手写新的演讲稿。他会谈论其“和平战略”。在蒙大拿的大瀑布城，他宣称这项工作“不会结束……我们必须坚持不懈。我们一定不能疲于应付”。与苏维埃制度的竞争一定不能“变成核暴力的竞争”。在那里以及华盛顿的汉福德市，听众长时间地起立为他热烈鼓掌。但到了盐湖城，他迎来了巨大的挑战，这是极右翼的老巢。肯尼迪在这里不仅要论述禁止核试验问题，而且要谈论他的多元化政策。他说：可以理解的是，在这样一个混乱和复杂的时代，美国人会以怀旧之情回顾从前的日子。但科技的成就是不可逆转的。他说：最深谋远虑的事业是保存和保护“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没有哪种军事力量或哪个军事力量联盟能威胁到美国的安全”。演讲结束时，众人站在椅子上欢呼。之前，他曾想过，也许只有之后的几代人才能理解多元主义。那天晚上，面对圣徒教堂中的人山人海，他开始意识到，他们就已经理解了他。禁止核试验并不是他之前认为的那样，是政治牺牲品。盖洛普的民调报告表明：80%的美国选民赞成《禁止核试验条约》。

如果他能击败戈德华特，肯尼迪就会获得一场大胜，这将给他带来取得第二任期胜利所需要的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届时，他将会履行自己在第一任期内的立法承诺。这届美国政府现在挤满国会山议事日程或积压在委员会里的议案将变成法律，这些法律涉及公共交通、保守主义、民权、青年就业、教育、减税、向贫穷宣战和联邦医疗保险。美国国会抑制他提供外援和阻挠把小麦销往国外的企图会销声匿迹，白宫也不会再为此感到痛惜。尽管受到保守派的抗议，但事实证明，向苏联销售小麦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苏联似乎很感激，西欧又一次见识到了美国人的慷慨，根据民意测验，美国人普遍认为《禁止核试验协议》是值得赞扬的。肯尼迪想知道粮食捐赠会不会导致与当时被孤立的中国建立一种“门户开放”的关系。他私下说过：“如果这能减轻他们的敌意，我现在就愿意做这件事。”他知道这样做的风险。理查德·尼克松会抨击其与中国人的任何交易。另外，没有办法确保这些粮食真正到了最需要它们的人的手中，也无法保证中国人是否知道他们的粮食是谁送的。他说：“让我们面对它吧，这是第二任期的主题。”

那时，他希望能更好地理解东方。从欧洲返回之后，他就计划着与杰奎琳一起深入访问一次远东，并在1964年选举之前访问俄罗斯。日本、菲律宾、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已经接到了通知，肯尼迪总统和美国第一夫人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抵达。肯尼迪考虑在元旦之后不久就动身，

但这意味着肯·奥唐奈要在整个圣诞节假日期间打前站，而且肯强烈地反对，威胁说要是那样他就不干了。因此，杰克将出行推迟到了1月。他问道：“但你能保证我能及时离开得克萨斯，周日赶上和卡伯特·洛奇在这里吃午餐吗？”肯说：“不用担心。都安排好了。”肯尼迪总统已经签署，并且发布了将第一批1000名美军顾问从越南撤回的命令。无论好坏，美国对这场战争的参与将在他第二个就职典礼的年末结束，洛奇会相应地制订计划。

肯尼迪总统决定在周五乘坐敞篷车驶过达拉斯市区，很多人对此感到担心，他们可不是会危言耸听的人。拜伦·斯凯尔顿是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得克萨斯州的委员，他强烈地感觉到肯尼迪应在行程中避开这座城市。他给鲍勃·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的首席助理沃尔特·詹金斯写了封信，然后，他飞往华盛顿，跟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约翰·贝利交谈，跟杰里·布鲁诺沟通，但杰克已经先期去了得克萨斯。斯凯尔顿描述了达拉斯的政治气氛，并一再说那里不安全，要避开它，不要在乎之前的承诺。但他们告诉他，肯尼迪已经下定了决心。他认为存在暗杀的可能性只是“工作中很多的不愉快之一”。当一位美国总统害怕进入一座美国城市时，他也就到了搬出白宫的时候。当参议员詹姆斯·威廉·福布莱特告诉肯尼迪总统“达拉斯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我不想去那里”，而且“你也不要去”时，肯尼迪就是这样回答的。福布莱特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来自与得克萨斯相邻的州。

达拉斯并非邪恶之地，那里的大多数人也不同情他们中间的极端主义者。肯尼迪在那里拥有众多的狂热追随者，从参加欢迎其车队的人数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但其领导人愿意接受激进的右派，而且往往就是它的成员。在肯尼迪当上美国总统的第三年，人们越来越感到一种政治瘟疫侵染了这个城市。凶杀率达到惊人的程度。在公路边的大广告牌上，某些人贴出了他们的要求：“弹劾厄尔·沃伦！”爱德温·沃克少将在那里买了一套房子，他在自己的院子里将美国国旗颠倒着升了起来。极右派的论战蔓延到了公立学校，肯尼迪总统的名字在教室里会被嘘，基层经理人被要求参加极右派的研讨班。达拉斯已经变成某些人或组织狂热政治支持者的圣地，比如韦尔奇、哈吉斯、施瓦茨、帕特里克·亨利社、美国革命之子、快速反应民兵组织和美国全国公愤大会，该大会认为那些提倡弹劾厄尔·沃伦的人不可信，并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决议，要求把美国最高法官以私刑处死。

穿着牛仔靴、身材矮壮的企业高管将“打倒肯尼迪”的贴纸贴在他们镀铬的汽车保险杠上。印有美国总统照片的传单在到处流传，有正面照片和侧面照片，就像邮局墙上展示的逃犯布告，而文字内容是：

叛国罪通缉令。

此人因犯有背叛美国的行为而受到通缉。

在肯尼迪到访达拉斯的那天早晨，《达拉斯晨报》（*Morning News*）刊发了一个巧妙修改过的通缉令版本，该报的发行人曾谴责肯尼迪总统竟在骑着卡罗琳的小三轮车到处跑。尼曼百货的斯坦利·马库斯将其高层管理者集合起来，告诉他们，他希望肯尼迪会避开达拉斯。他说：“坦白地说，我认为这个城市不安全。”时间再近些，不到一个月前，阿德莱·史蒂文森来到达拉斯，在联合国日发表了讲话。当他从讲台上走下来时，一帮人围住了他，还有人朝他吐唾沫。在用手帕擦脸的时候，阿德莱扫兴地问了一句：“这些是人还是野兽？”当杰克在《纽约时报》读到相关的报道时，他给阿瑟·施莱辛格打了一个电话，对他讲：“给阿德莱打电话，表达我对他的同情之意，告诉他我们认为他做得很好。”自然地，现在毫无疑问，肯尼迪会乘坐一辆敞篷车穿越达拉斯市区。如果阿德莱能忍受，他也能。

到了一天要结束的时候了，到了拥抱道别的时候了，到了握手再见的时候了，只不过，当时没有人知道。现在回想往事，你几乎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心会发紧，若有块石头垒压在胸腔，仿佛你正在观看某人的悲剧，而这个人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且是你的挚友。随着剧情走向高潮，你的情感被再次激发，但跟你能觉察到正在走向灾难的那些舞台人物不同。你渴望向男主角发出警告，却做不到，因此，在戏的高潮就要来临时，你惊恐而无助，只能坐在那里，等着最后一个角色——死神的入场，而它就在附近徘徊。现在你好像看到了1963年时的杰克，他与父母离别，他最后看了一眼科德角，特迪唱起《我的心肝宝贝》，而琼弹着钢琴；11月10日，周日，他们在韦克斯福德别墅招待朋友，杰奎琳称那里是他们新的家外之家，它坐落在弗吉尼亚州米德尔堡西部丘陵区的一大片空地上，而这片空地是从邦尼·梅隆手里购得的。这一切令人愉快，但现在想起来，心情却无比沉重。

肯尼迪人生的最后一个周末是在佛罗里达度过的。他飞到南部开展竞选活动，与托伯特·麦克唐纳和戴夫·鲍尔斯一起消磨时光，麦克唐纳是他在哈佛大学时的室友，现在是美国民主党的参议员。他们会从周五一直待到周一，到时杰克会返回白宫，辛苦地读完文件，然后与杰奎琳一起飞往得克萨斯州。杰克和托比的车队穿过了坦帕和迈阿密，两位上了年纪的室友站在一起，以一种老练的风度向欢呼的人群致意，但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待在大使的家里。通常，11月的棕榈滩是最不吸引人的季节，狂风呼啸，冷酷无情。你不得不闪避着风向。但在那4天里，此地却没有刮风，一丝儿风也没有，简直是晴空万里，简而言之，这就是所谓的“肯尼迪的气候”。杰克说他的背疼了好几年都没有好转。托比回忆道：“这就像是回到了1939年，当时，所有人都没在考虑什么重要的事情。诚然，有时会谈论政治……但不是通常那种十分紧张的周末。”

周六早晨，他们在卡纳维拉尔角观看了北极星导弹的发射，午饭后，大家杂乱地围在一台电视机旁观看美国海军学院队与杜克大学队的橄榄球比赛。杰克押海军学院队赢，如果它赢杜克大学的分数少于10分，就算托比和戴夫赢。结果他赢了，罗杰·斯托巴克拱手将胜利送给了海军学院的学生，海军学院队以38：25胜出。如果杰克输了，他会宣称自己身无分文，但要是赢了，他就会要求立刻清账，他说的“立刻”就是“当场”，因此，托比和戴夫不得不小跑着上楼，去拿他们的钱包。大多数周日，他们也会在露台上度过。杰克会选择押芝加哥熊队战胜绿湾包装工队，运气不错，这让他的钱包更鼓了，其实，他很有钱，个人储蓄账户中有差不多1500万美元。那天晚上，他看了《汤姆·琼斯》（*Tom Jones*），他喜欢这部电影。在上床睡觉之前，他用肯尼迪家族那种冲动的方式唱了一首歌。只是这一次，他的嗓音不再低沉，尖而清脆：

噢，从5月到12月，时日漫漫，

但到了9月，白天变短了，

当秋天的气候将树叶变成耀目的颜色，

人们还没抽出时间，

去玩等待中的游戏。

噢，日子在减少，只剩下珍贵的几天

9月，11月！

在这些为数不多的珍贵日子里，我要跟你在一起，

在这些珍贵的日子里，我将与你共度。

返回华盛顿，他辛苦地处理着文件和行政命令，俯身在白宫总统办公室中他那张由战舰木材制成的桌子上，挑选出来自国会山的需要特别关注的文件。美国国会已失去了耐心，烦躁不安，但肯尼迪总统说得很清楚，参众两院要继续忙碌，直至完成它们的工作。在其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预测说："到这届美国国会休会放暑假时，明年夏天吧，在教育、心理健康、税收、民权等领域，大量的新立法需要通过，将是创纪录的。不管现在看上去有多么黑暗，我认为'看呐，西方，大地一片光明'。"周三晚上，在东大厅举行了美国司法系统的年度招待会。当然，鲍勃也在场。那天是他38岁的生日，所以他要在那天稍晚些时候赶回希考里山庄庆祝。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餐并沐浴之后，杰克做完晨间的宗教仪式，戴上背撑，系好鞋带，左脚的鞋有一个1/4英寸的医疗增高垫，匆忙穿上乔治·托马斯早已摆放在那里的衣服，用一个明亮的PT鱼雷艇领带夹固定住领带。他在零乱的镜面中检视了一下自己的容貌。在镜子边，以不规则的角度斜插着几张纸片，一张是肯尼迪在爱尔兰"祖籍"的图画明信片，一张是寄自意大利阿马尔菲的明信片（"相比海恩尼斯港，我更喜欢意大利，但我要多喜欢海恩尼斯港一点点儿，因为这才公平。我很想你，爸爸，吻你，卡罗琳"），一个潦草写就的在华盛顿圣史蒂芬教堂和圣使徒马太教堂做弥撒的日程安排，一张卡罗琳穿着她妈妈的鞋站着的快照，杰奎琳的一张宝丽来一次成像照片，以及杰克、杰奎琳、埃塞尔和鲍勃的一张老照片。

"卡罗琳！"他喊道，同时拍着手，"约翰！"他们俩跑了过来，约翰穿着格子布短裤，他姐姐穿着蓝色的紧身裤和深蓝色的丝绒连衣裙。他们的妈妈正在梳理发型，因此，他独自一人带他们吃早餐。他通过电话给五角大楼下达了一项指示。然后，9点15分，到了他女儿上学的时间。她拥抱了他，低声说道："再见，爸爸。""再见，卡罗琳。"两条蓝色的小腿轻快地迈步走开了。约翰玩着玩具飞机，此时，他的父亲则走向白宫总统办公室，忙碌了一个小时之后，信步走向内阁会议室，对着新窗帘夸奖了一番。它们是昨天被挂上去的。他用手指触摸着其中一个的红饰边，喊着问伊夫琳："我们的何时能有？"她回喊道："当我们在得

克萨斯时。”他问：“小地毯也是吗？”她向他确认道：“小地毯也是。”他说：“很好。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有新办公室了。”

回到住处，肖小姐称外面正下毛毛雨，因此不能带他的儿子出去，他否决了她的意见，嘱咐杰奎琳的女佣普罗维为约翰做好搭乘直升机去机场的准备。直升机的离开常常是一景，那天早晨已经有三次了。直升机就像是棕色的大黄蜂，它们在各自的小型停机坪上震颤着，升空，然后降落至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基地位于华盛顿东南，飞行需要12分钟。约翰在肯尼迪总统的直升机上，裹在一件伦敦雾牌的小雨衣中，戴着一顶西南风牌的帽子，坐在肯尼迪总统一位朋友的膝上，这位朋友稍后会参加杰克的聚会。小男孩渴望着得克萨斯之旅，他告诉自己的父亲：“我要来了。”他的嗓音开始变声。杰克轻声说道：“你不能去。”他的母亲拥抱了他，但他却开始哭泣。然后，肯尼迪跟这位朋友讲：“照顾好他。”这位朋友说他当然会照顾好他，并把约翰抱到他的膝上，开始用各种故事分散孩子的注意力，比如，海狸伯特伦、美洲豹贾吉和喷气式飞机杰斯珀。美国副总统已经登上另外一架波音707飞机。上午11点5分，随着吉姆·斯温多迅速将飞机的巡航速度提升至每小时550英里，肯尼迪乘坐的那架最好的飞机急遽上升，优美的白色机身升入灰暗的天空，它那蓝色的闪光消失在快速掠过的云层中。直升机中的小男孩叹了口气。他总是爱看那架飞机。

杰克说：“看呐，西方，大地一片光明。”他引用的是阿瑟·休·克拉夫的诗，但从安德鲁斯机场向西看去，天空是阴沉的，大量暴风云团正在翻滚。当然，斯温多会选择在它们之上飞行。“空军一号”是当时世界上最安全和最受人尊敬的飞机。不管是军用的还是民用的，其他航班的飞行都要服从于它。雷达会监控它的进程，并时刻显示在雷达的屏幕上，在其航线下方的地面上，美国特勤局建立了一连串的核查点。倘若它迫降，一位特勤人员便会乘坐一辆加强了马力的汽车快速抵达现场。没错，如果飞机上高级别的特勤人员在通过核查点A或B时未能报告，这就足以引发警报器的尖叫。在斯温多从任何一个机场落地或起飞之前15分钟，其他飞行器都不能使用那个机场。你必须将你的飞行情况上报美国特勤局。他们想得很周全。

---

1. 西卵（West Egg）、东卵（East Egg）是子虚乌有的地名，源于长岛北岸伸向海湾的两个地段，原名分别为Great Neck（大颈）或Little Neck（小颈）。有钱人住西卵，但更体面的人住东卵。——译者注

2. 奥赛站台（Quai d’Orsay），法国外交部的别称。——译者注

3. 薄式耳，是一种计量单位。它是一种定量容器，薄式耳大约相当于36.37升。——编者注

第五章 如今长眠于此

1961年，他步入白宫，成为美国第35任总统。他接受了挑战，也希望他的国家接受挑战。他的突然离世，不仅是其家人的损失，也是美国的损失，更是世界的损失，否则，不仅美国会有所不同，甚至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世界格局也会发生变化。他受到多数美国民众的尊敬和怀念。他成为传说中的亚瑟王，他执政的时代被称为“卡默洛特时代”。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灿若星辰。

1963年11月22日，周五下午，得克萨斯时间12点30分，肯尼迪总统被一位狙击手枪杀，当时，他的车队正在通过达拉斯的市区。在遥远的弗吉尼亚的麦克莱恩，当约翰·埃德加·胡佛打电话告诉鲍勃这个消息时，他正在希考里山庄的游泳池边吃工作午餐，胡佛的语速很快，毫无同情之意。一位朋友从华盛顿市区快速穿过波托马克河，希望能赶去帮助他们。鲍勃想起了拜伦·斯凯尔顿的警告，他说过，肯尼迪总统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去达拉斯。跟鲍勃不同的是，杰克从来没有担心过暗杀的问题，而且他们俩都认为鲍勃更有可能成为狂热分子下手的目标。这位朋友绝望地寻找着某种能让坏事变好事的托词，说：“或许这会减少仇恨。”鲍勃摇摇头。他说：“几个月之内，就会被人们忘记。”

在那些以预测公众情绪为业的人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虽然暗杀会被人记住，但在公共意识中，它很快就会减弱。人们对20世纪其他美国总统的尊崇永远无法与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尊崇相提并论。1945年春天，罗斯福总统去世时，全体美国国民无不感到极度悲伤。然而，到了夏天，人们的情感宣泄也就自然而然地偃旗息鼓了。随后，哈里·杜鲁门入主白宫，整个美国对此都感觉很舒服。没有理由期待肯尼迪和约翰逊的过渡期会有任何的不同。在阿灵顿举行完葬礼之后，肯尼迪的助理们要赶在他们的读者消失之前急急忙忙地完成他们的回忆录。当杰奎琳请求你写一本记述肯尼迪总统最后几天和葬礼的书时，你认识到即便再有3年的时间可能也出版不了，而你的出版经纪人预测届时公众可能已经对杰克没有了兴趣，但这位经纪人确实被视为其所在行业中最好的经纪人。

官方的哀悼期持续了30天，但并没有如宣传的那样令人印象深刻。

只不过是将美国国旗降半旗，并规定美国政府成员在此期间不能安排社交活动。其他的商业场所在11月26日可照常营业，那天是周二，国葬的次日。电视里的商业广告重新活跃起来，股市急剧上涨，戏院的招牌也全部被点亮。30天过去了，美国国旗又重升到了旗杆的顶部，华盛顿的舞女又重新开始招待客人，但你发现哀悼并没有完全终止。在纽约，约有1000人慢慢走上第五大道，就像是一群失去牧羊人的羊，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支蜡烛，以怀念他们遇刺身亡的总统。1963年圣诞节，在阿灵顿公墓，人们纷至沓来，一整天都没有停息，他们5人一排在肯尼迪墓的长明火前绕行；当时地面上覆盖着6英尺深的雪，但等候的队伍仍一直延伸至几个街区以外。斯科蒂·赖斯顿写道："肯尼迪的传奇在发展和深化。现在看来，显然他激起了世界多地那一代年轻人的兴趣，尤其是大学校园里的年轻人。甚至那些贬损过他的人现在也开始赞扬他，许多谴责过他的政敌现在反而开始寻找看上去和听上去都像他的候选人。"

杂志开始出肯尼迪纪念专刊，所有的书店都辟有一个小角落，在桌子或书架上摆放肯尼迪写的书或写肯尼迪的书。拍卖行的人发现，他的信和林肯的信一样值钱。为了强调政府的延续性，在约翰逊离开华盛顿外出访问时，白宫工作人员会同时分发两位美国总统的照片，但这一做法很快就被中止了。因为林登·约翰逊的照片每被拿走1张，就会有10张肯尼迪的照片被拿走。当约翰逊因为一位美国特勤局工作人员戴了一个PT鱼雷艇领带夹而训斥他，并把它从其衬衫上扯掉时，美国特勤局被激怒了。约翰逊的愠怒是可以理解的。他的光彩被自己的前任遮蔽，有时甚至会让自己黯然失色。支持约翰逊的人认真筹划着1964年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想把它当成一个约翰逊派系的节日，即便如此，他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人抢了风头。一个月前，他从自己的美国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上划掉了鲍勃的名字。但大会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仍并不属于林登·约翰逊。当鲍勃走向讲台，介绍一部关于他哥哥的总统岁月的电影时，与会人员的情绪达到了高潮。代表们向他报以了15分钟的欢呼，并起立热烈鼓掌，而当他用那种独特的嗓音轻柔地引用莎士比亚的剧本台词时，他们又都潸然泪下：

等他死后，
再把他带走，
让他化作小星星，
他会让天空变得异常的晴朗，

以致整个世界都会爱上夜晚，

而不再崇拜耀眼的太阳。

鲍勃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鼓励这种情感的表露。他再三设法阻止它，然后，咬住嘴唇，低下头，以抑制自己情绪的爆发，看到这一切，泪水模糊了你的双眼。你感觉心碎了，因为此时，你想起有一天晚上，你与杰克在白宫南草坪上散步，谈起了星星时的情景。他问你是否还记得所罗门群岛的天空。你只能回想起南十字星座，但作为PT鱼雷艇的艇长，他接受过天文导航的培训。对于指引方向的明亮星星的名字，他耳熟能详，那天晚上，他声音轻柔，将那些每天晚上都在群岛上方苍穹上眨着眼睛的星星一口气说了出来，按照次序，一个接一个，天燕座是一个，罗盘座可能是另外一个。他回想起他是如何依据它们确定方位，然后试探着从狭槽撤回到鱼雷艇基地的。星座位置让他着迷，那时仍然如此；他描述着它们是如何在夜空中的运动，并由此带来赤道以南地区的四季更替。你想起从椭圆形草坪返回时，你和他谈了一些你当时的感觉：你们未来的命运会如何，以及你们还有没有未来。在当时，在那样一个地方，你们的预期寿命太短，以致没有保险精算师同意你们购买人寿保险。现在，他就这样被人从我们身边夺走了。杰克在所罗门群岛的狭槽中九死一生，逃过一劫，却在和平时期明媚的正午阳光下，死在了一个喧闹的美国城市，当你听到鲍勃在本应由他哥哥独占优势的美国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这些时，一切似乎都十分荒谬。你会发现萨特是对的，生命就是一出荒诞剧。找不到其他的词来形容它。

1964年的某一时刻，你意识到其他美国人和许多非美国人正在想方设法做你曾经做过的事情，即将对他的怀念体现到他们的生活中。最明显的做法就是常常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某种东西。卡纳维拉尔角、纽约的爱德怀德机场和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文化中心都以肯尼迪的名字重新命名。在整个美国大地上，无数的桥梁、公路、堤道、娱乐中心和学校也纷纷效仿。美国财政部铸造了5000万枚图案为肯尼迪头像的50美分硬币。因为人们把它当成纪念品收藏，所以没能流通，差不多20年以后，情况依然如此。加拿大的一座山峰变成了“肯尼迪山”，不过第一个爬上它的人是罗伯特·肯尼迪，那时，他是纽约的参议员，1215年，《大宪章》在兰尼米德签署，当英国在这个历史上著名的牧场上辟出3英亩用于建设肯尼迪圣地时，纪念肯尼迪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这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主意。1965年5月14日，她主持了肯尼迪纪念碑的开工仪式，在致

辞中，她说：“我的人民对其死仍感悲痛，也会爱戴和钦佩他的生。”杰奎琳回应说：“知道您跟我的内心深处一样，都有眼泪所无法表达的悲伤，甚感欣慰。”

但这种现象也是深不可测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仍然如此，尽管对其政策甚至对其性格不无批评，他在美国国民心中的位置却是牢不可破的。1982年，一份哈里斯民意调查问卷要求美国人评价最近的9位总统，肯尼迪的好评率遥遥领先。根据那次在全美范围内对各行各业选民的调查，在这些总统中，他最能鼓舞人，让人信心倍增，危机来临时他最值得信赖，不但树立了最高尚的道德标准，而且拥有最富有感染力的个性。由于其他接受评价的人中包括罗斯福总统，而罗斯福领导美国摆脱了最为严重的经济萧条，并在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胜利，你开始理解为什么反思肯尼迪能广泛吸引美国人的人越多，他们就越无法理解这一点。戴维·布尔克利得出的结论是：刺杀及其余波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告诉你：“那些日子发生的事难以理解。你把它们放到任何地方都讲不通。我们这个时代的智识解释不清。”在他看来，这出悲剧“影响太大，太过突然，太让人不知所措，而且含义太多。必须区别对待”。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智识理解不了的事，或许能被我们这个时代非主流的、其力量不为所知的群体解释清楚。布尔克利非常聪明，善于表达，富有理性，我们其他的社会评论家也是如此。这并不总是正确的。在早期，他们的角色由先知、预言家和圣哲扮演，他们发现当与感情的潮流相对抗时，理性是虚弱无力的。他们不会对肯尼迪总统之死所释放出来的极大能量感到吃惊。他们对正在形成的肯尼迪传奇很熟悉，尽管对我们还陌生，但它与人类一样古老，他们甚至知道如何利用它来巩固这个国家，振奋它的精神。

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感知到这一点。参议员拉尔夫·亚伯洛受过美国南部雄辩术华丽传统的滋养，当肯尼迪总统在帕克兰医院被宣布去世时，亚伯洛转过脸去，低声说道：“亚瑟王的神剑沉到了波涛之下。”杰奎琳没有听说过他，但几天之后，在与白修德谈话时，她也不禁想到了亚瑟王的形象，记得杰克喜欢这样的句子：不要让人们忘记，曾经有一个地方，有过短暂的辉煌，它就是闻名于世的卡默洛特。她说她曾经认为历史是“愤世嫉俗的老人”写的东西。她说：“那时，我意识到历史记录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到他时，必定是这样一个小男孩，大多数时候都在生病，读圆桌骑士的故事，读马尔伯勒的传记。在杰克看来，历史上尽是英雄。如果这能让他看到英雄，或许我们看到的就会是另外

一个小男孩。人是善恶同体的。杰克有着这样一种历史的英雄观，是理想主义的观点。”

当然，卡默洛特其实从没存在过，他只出现在传奇故事中，但这并不能让人怀疑他的真实性。传奇故事不可能用辩证法来衡量。《圣经》中的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是神话。然而，如果你把它们当成谎言而拒不接受的话，不仅会冒犯那些珍视它们的人，而且也是错的。当耶稣告诉本丢·彼拉多，他的使命是“特为给真理做见证”，以及“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时，彼拉多回答说：“真理是什么呢？”2000年来，世人一直在努力地回答这个问题。《牛津英语词典》关于“truth”（真相）的词条有14个，第一个是“对人、原则或事业等是正确的；正确，准确，忠实，恒久不变，忠诚不贰”等特点或倾向。简而言之，真理就是完全的信任，相信当今的信条，也相信过去我们称之为神话或传奇的信条。它们有很多。所有的文化中都可以发现传奇式的英雄，例如，古代印度的维克拉姆帝亚，《尼贝龙根之歌》中的齐格弗里德，日耳曼人腓特烈·巴尔巴罗萨，斯堪的纳维亚的西格德和巴尔德神，爱尔兰的库丘林，英国的亚瑟王和法国的罗兰。

毫无疑问，这些出类拔萃的人全都以某种形式存在于世间。难题在于如何将与他们有关的事实挑选出来；由于广受欢迎，以致分不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虚构。塑造传奇的人从来不满足于只留下故事梗概。比如，罗兰理应因其在龙塞斯瓦耶斯隘口战役中的坚决抵抗而被人们铭记。他不需要别人再为他添油加醋。然而，《罗兰之歌》告诉我们，他在战斗时会用一把神奇的剑和一支奇妙的号角，远在20英里之外人们也能听到这支号角的声音，而这两件东西是他从一个巨人手里赢来的。在所有传奇英雄最非凡的故事中，这种不真实的添枝接叶致使需要更为精心地设计复杂的故事情节，尽管如此，就像存在许多特殊情况一样，英格兰的亚瑟王也必定是个例外。石中剑、湖中剑、圆桌骑士、圣杯这些虚构的细节彼此吻合，从整体上给人一种极其宏伟的感觉，它们能自圆其说，以致不朽。亚瑟王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名声并不局限于英格兰，的确，几个世纪以来，他在欧洲大陆比在自己的国家还要知名。从英格兰的黑暗时代（Dark Ages），到文艺复兴的形成和鼎盛，然后再经历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他是唯一的历史人物，直到今天，他跟20世纪的其他世界领袖一样被人赞美。他死于1444年前。然而，他的故事就像一条

金线贯穿于我们整个文学遗产之中，出现在乔叟、马洛里、斯潘塞（*Faerie Queene*，《仙后》）、米尔顿、德赖登、菲尔丁、卡莱尔、沃尔特·斯科特爵士、斯温伯尔尼、马克·吐温、白修德和约翰·斯坦贝克等人的作品中。

他是谁？

公元6世纪，因为不再受罗马军团的保护，英格兰被来自德国的撒克逊入侵者围困。这群撒克逊暴徒遭人厌恨，因为他们是强奸犯、纵火犯和带病者；如同塔西佗所说，男人为了寻欢作乐和战利品而战。不列颠人祈求能保存他们的文明遗产。英格兰从未实现统一，它就像一床拼花被，几个小王国同时存在。国王们转而求助于亚瑟，当时他还不是王室成员，只是一位军事指挥官和拥有极高天赋及勇气的骑兵。那些昏暗世纪被保存下来的档案寥寥无几。它们只被少数人拥有，因此它们是无价之宝。其中，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复活节瞻礼单》和《不列颠史》就是它们的代表，《复活节瞻礼单》是那个时代在大修道院起草和修改过的档案，而《不列颠史》是由8世纪的威尔士修道士南尼厄斯所著。公元488年，《复活节瞻礼单》记录道：英国人打了一场激烈的大仗，撒克逊人的首领被杀。在这次战斗中，南尼厄斯评述说："在那些日子里，亚瑟与不列颠的几个王共同抗击他们（撒克逊人），但他是那些战役的指挥官。"

南尼厄斯当时列举了撒克逊人的12次败绩，全是栽在亚瑟之手。在最后一次战斗中，他领着军队发起攻击，杀死960名撒克逊人。按照南尼厄斯的说法："除非他自己完蛋，否则，没有人能打败他们。在所有的战役中，他必定是胜利者。"《复活节瞻礼单》记录下了这最后的一次战斗。抄写员在复活节日期的计算上搞混了，但年份不是499年就是518年。该词条是这样记录的："巴顿山战役（Battle of Badon），亚瑟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扛在肩上（盾牌）三天三夜，不列颠人获胜。"巴顿山战役是大不列颠历史上的重大战役之一。6世纪时的凯尔特人修道士吉尔达斯对当时的史实有自己的记录，他称巴顿山战役"几乎是对敌人的最后一次屠杀"，并且称亚瑟的胜利将撒克逊人的前进步伐至少阻止了一代人。有人能够经受住三天三夜的战斗，似乎难以置信，但吉尔达斯解除了人们的疑惑，他说：巴顿山战役是一场包围战。《复活节瞻礼单》最后一次提到亚瑟的日期是539年。它记录的内容是："剑栏之战（Battle of Camlann），亚瑟和莫德雷德亡。"

剑栏之战并非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之间的战斗。赶走德国人的需求让英格兰的一些小王国结成了同盟。撒克逊人的撤退让这种联合变得松散。同盟各方彼此争吵，最后求助于剑来解决问题。在导致他们死亡的争斗中，亚瑟和莫德雷德或许是在解决私人之间的恩怨，或为不同的王国而战。在所有的事件中，只有骑手参与其中，农民没有受到扰乱和威胁。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亚瑟运用他的本领和勇敢，为英国人带来了一生的平安，这在黑暗时代是非比寻常的，因此，他赢得了人们的感激之情，而且事实证明这种感激是永远的。在对撒克逊人几乎是种族灭绝式的残忍行为加以评述之后，伊丽莎白·詹金斯写道："它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在一系列激战中打败撒克逊人的指挥官……变成了英雄和拯救者的形象，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拒不相信他的死亡，并渴望和期待着他们的回归。"

在《复活节瞻礼单》、南尼厄斯和吉尔达斯之后，有档案可查的线索变得模糊不清。但我们必定记得，当时那些年代只有修道士具备读写的能力。甚至连国王都未受过教育。不过，人们之间的交谈是没有问题的。亚瑟的故事即是靠口口相传而流传开来的。围着炉边讲的传说无疑是在讲述中积累起来的。到10世纪，人们已经想当然地认为亚瑟是一位国王，事实上，他从来都不是。直到12世纪初，有关他生平的详细叙述才现于世，而要将其中不可凭信的作品挑选出来，或者确定哪些内容被省略了，却是不可能的。例如，它们没有提到吉尼维尔。然而，她是真实存在的，关于她为什么会被人记住，没有多大的争议。直到今天，在遥远的威尔士乡村，如果一位妇女违背了其婚姻誓约，她就会被人称为"十足一个吉尼维尔"。

1184年，一场大火焚毁了5世纪时用抹灰篱笆墙盖成的一座小教堂，它是英格兰第一个基督教圣地，是亚瑟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后一座建筑，在走向战场前，他可能在此做过祈祷。不过，与此同时，亚瑟王传奇继续发展，并且走出了英格兰。蒂克斯伯里的修道院院长注意到，英国的朝圣者到过埃及、博斯普鲁斯、迦太基、安条克、亚美尼亚和西欧的所有主要城市，从国外返回后，他们无不描述那些地方"对亚瑟的崇高赞美"。在接下来的两个多世纪里，作家们在故事里添上了兰斯洛特和圆桌骑士，其实，他们的故事，农民们已经讲述了几百年，直到15世纪60年代，托马斯·马洛里爵士写出了他的杰作《亚瑟王之死》，才永远地树立起一位掌管着侠义骑士的尊贵国王形象，并且慢慢地让人们认识到卡默洛特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都是注定要毁灭的，因为他貌美的妻子和他最

威猛的骑士成了情人，而他们俩是他最为珍视的两个人。经过一场剧烈的动乱之后，兰斯洛特死了，吉尼维尔并拢两条腿，走进了女修道院，湖中剑再次没入水中，亚瑟离世，墓志铭文如下：“永恒之王亚瑟长眠此地”。就这样，他加入到那个可以永生的神话英雄的小圈子，用斯坦贝克的话说，他得到了“一个让人无论羡慕还是妒忌也坐不上的座位，居其上的人不再是常人，寄托着世人的希望和雄心”。

在亚瑟生活、战斗和死去的年代，他的所有同胞都相信英雄，自然也包括修道士和修女在内。而肯尼迪从政的年代是反英雄的时代，他们往往成为牺牲品。异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时尚。杰出的领袖属于过去，狮子般英勇无畏型的强人已不再受追捧。由此得出结论：这位似乎拥有狮子型风格的年轻总统必定是一个欺世盗名之徒。尽管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少数，但他们的影响巨大。因为肯尼迪所处的社会阶层、品位和对理想世界的兴趣，他已经与知识分子和记者们轻松自在地打过多年交道。他熟悉他们的方式，但并不接受它们。他继续用文字赞扬受那些人贬低的勇武的骑士精神，并且生动地谈论树立新理想主义的必要性。在休斯敦，在他被杀害之前，他引用过《圣经·箴言》中的一句话：“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他看到灰压压的一大片平庸之才正在威胁着他的国家，并且对他所赞扬的卓越的理念充满了敌意，而且这种敌意难以消弭。

在他有生之年，这常常不被人理解。他的高雅、老练和自谦的机智是一种有效的伪装。他需要它们，他是一个说话低调的人。然而，有些人对自由主义的虔敬已经到了令人腻烦的程度，但这种病从来没有折磨过他。他既没有感到被异化，也没有感到成为牺牲品。责任、奉献和忠诚就是他的本质所在，如果这些词听上去有些离奇，那错在我们，而不在他。1940年，在读哈佛大学时，他写道：“除非民主制度能够孕育出有能力的领导者，否则，它存活的机会就很渺茫。”这种想法成为他行为的基石。似乎他要比看上去更高大，因为他在不断地追求；因为从未停止追求，他就能实现非比寻常的目标。

有些知识分子理应认可他的总统身份，却并没有这么做，到了达拉斯，他和那些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不再重要了。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道英雄主义已经过时了。他们在1963年11月的悲伤跟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一样，他们的保护者已被杀死。电视台长时间地播出同一个节目，时长达74小时54分钟，期间约7000万人观看电视，平均差

不多一口气看10个小时。他们被震惊了。有些人自始至终就没有完全镇静下来。有些习俗是普遍存在的，而为死者举行葬礼就是其中的一个，尽管葬礼可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各地都举行了悼念肯尼迪的仪式，这些仪式的壮观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那根原始的心弦，唤醒了他们比这个国家还要古老的回忆。比如，跟随炮车而行的、装饰华丽却没有骑者的战马，倒挂着战靴的马镫，表示深受爱戴的骑者不再骑乘，这种风俗至少要追溯到成吉思汗和帖木儿时代。几个世纪以来，为颂扬去世领导人做出的牺牲，人们为他们举行了最为庄严的葬礼，杰克的年轻寡妇对此进行了回顾和研究；然后，她将那种庄严的气氛和自己的悲痛相结合，借助自己的葬礼致辞，将它们转化成一束明亮而有穿透力的光，直抵人们的心灵，让全体美国国民为之泪眼模糊。

有个结果是可以预见到的。这个国家对肯尼迪总统的印象永远地改变了。一旦一位领导人成为殉难者，人们对他的看法自然就会发生转变。尽管有天赋的光环，他也必须有所掩饰，虽然他觉得那是一身“奇装异服”，却可以让大众赏心悦目。如同埃德蒙·威尔逊指出的那样，美国人从小就听人讲林肯的故事，卡尔·桑德伯格更是千方百计地要让林肯不朽，但作为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与那些无所畏惧地治理这个国家的冷漠超然的天才们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1865年4月14日夜，他被枪杀了。而作为其之后的第19任继任者（即美国第35任总统），这位文质彬彬的社会活动家经历了跟他同样的命运。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2日撒手人间。因此，虽然林肯和肯尼迪对法治政府的信念同样是历久不渝的，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传奇故事让这样的细节变得无足轻重。英雄是什么？英雄的信仰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被其哀悼者的需求淹没了。在神话中，他变成了他们希望他成为的那种人，任何轻视这种转变的人都不可能完全理解整个美国的情绪是如何被调动起来的。对“应该是什么”的浪漫印象已经比“曾经是什么”更加引人注目。桑塔亚纳评论说：“爱有很强的洞察力，但它看穿的是可能性，而不是事实。”所有人都期望一位传奇英雄要高尚，应该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受人爱戴，并极为痛苦地死去。随之而来的是赞美。至于热爱，国家会跟个人一样慷慨地付出；说到不幸，它们同样会跟个人一样受到悲伤的影响。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国民对英雄人物的眷恋会与日俱增。

就像我们知道的杰克·肯尼迪那样，传奇的亚瑟王在海洋和河流中更

得心应手。传说他母亲是在廷塔杰尔孕育他的，在那里，狂暴的波涛拍打着悬崖，汹涌的浪花如白云飞溅。在他从蜂拥而来的撒克逊侵略者手中拯救英格兰的战役中，有5场是在河岸上的战斗；他最后一次受伤倒在了另一条河流的岸边；他将圣剑还给湖夫人（the Lady of the Lake），而她从湖的深处升起来接受它；并且他是被3位王后用王室之舟带走的。

但那些渴望得到他的力量和勇气的人不会看向大海。自从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求解开天空中的难解之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星星受到崇拜。公元前3800年以前，人们沿幼发拉底河两岸观察星相，并把它们记录下来；到公元前2300年，中国人已经发现太阳年为365.25天；埃及人设计出金字塔，并通过绘制天体运动图，确立了勘测法则。因此，寻找亚瑟王的人会在布满星星的苍穹中搜寻，看到他在大角星，据说此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或者看到他在闪闪发光的大熊座，即亚瑟王的战车。

1963年11月22日，“空军一号”开始从达拉斯返程，借助强劲的顺风，它以近乎声速向东疾飞，途中，如果坐在驾驶舱中吉姆·斯温多的旁边，你就会意识到黑夜正在快速逼近。离开达拉斯之后不到45分钟，阿肯色州东部已开始被浓重的夜幕笼罩。向南远眺，能看到一弯小小的月牙，像幽灵一样悬挂在最高点附近。吉姆几乎落泪，正在极力抑制自己的情绪。交谈已是不可能了，不指望还能说出声来。飞机外面，黄昏变成了橄榄色的夕暮，进而变得幽暗。大家望着外面的苍穹，意识到在秋季的最后几天里，北部的天空群星闪耀。木星悬浮在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之上，北斗七星则在另一边的芝加哥上空。仙后座和大正方形的飞马座在头顶上闪耀。大角星坐落在堪萨斯的天空上，红光闪闪。但在墨蓝色的天空中，最明亮的发光体是御夫座的五车二，此时它刚刚开始每年5个月的北半球寒冬巡游。它始终是亮度最大的星，但今晚看上去只是有些耀眼。随着“空军一号”高速飞驶向西弗吉尼亚，它从东北1000英里以外的波士顿上方壮丽地升起。也就是从那时起，人们把五车二看成了肯尼迪星。它闪耀着光芒，它行动迅捷，它翱翔太空。当然，为了看到它，你必须抬头仰望，但他也让我们知道了如何才能高瞻远瞩。